

葉永烈 著

毛澤東 重返人間

新版

在一個冬夜他突然復活
目睹了毛後中國的一切……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九思實錄書系

毛泽东重返人间

叶永烈 著

时代风云出版公司

目录

告读者

第一章 冬夜惊魂

纪念堂里的怪声
毛泽东忽然苏醒
以假乱真
夜巡天安门

第二章 隔世之感

毛泽东不识江泽民
恍若隔世
“你办事，我放心”
真毛评“假毛”
乔装打扮毛泽东
穿上最时尚的唐装

第三章 走出圈圈

目击百姓百态
从“雅贿”说到腐败
“毛派”书法大师
百元大钞上的毛刘周朱
闻所未闻“毛家饭店”

第四章 书房夜读

五次选定接班人
不满“右倾翻案”
颂毛与批毛
毛泽东读《邓选》

第五章 一夜三梦

华国锋垂垂老矣
江青夜访毛泽东
“文革”受到猛烈抨击
商潮席卷故乡韶山

第六章 港人说港

惊闻苏联解体东欧易帜
洋快餐“必胜客”
高处不胜寒
“董特首”为何人
还是喜欢羊肉泡馍

第七章 奢华豪门

笑谈“下海”
“豪门府邸”
开国第一宴
夜宿“皇帝套房”
电视大扫描
“龙榻”难眠

第八章 又做三梦

对答如流毛新宇
喜见嫡孙
“老朋友”赫鲁晓夫求见
与蒋介石第三次握手

第九章 深入底层

晨曦之中闻国歌
胡同深深情深深
四合院里访百姓
跟打工仔聊家常
登上林肯豪华大礼车

第十章 新新人类

重游十三陵水库
发思古之幽情
豪宅里的叹息
遭遇“美眉”和“帅哥”
“新新人类”与“旧旧人类”
与邓小平论“左”右
对江泽民的谆谆教导
“泼辣记者”法拉奇来访
毛泽东“闪回”纪念堂
尾声：叶永烈采访梦境

后记

告读者

如果毛泽东重返人间，重返中国，将会怎样呢？他会如何看待今日中国——毛后中国，邓后中国？他会大声呵斥今日中国是“资本主义复辟”，会咒骂今日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修正主义”吗？他将如何评价粉碎“四人帮”？他将如何看待华国峰下台？他会如何对待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又怎样评价江泽民？……

我在十年前就打算写这部《毛泽东重返人间》，以求淋漓尽致地写出“毛眼看中国”。

当然，把“如果毛泽东重返人间”这个“如果”写出来，只能借助于小说，或者说是“政治幻想小说”。

对于我来说，具备了写作这部小说的两大素质：

一是我写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红色历程的“红色三部曲”，即《中共之初》、《毛泽东之初》和《毛泽东与蒋介石》；也写了关于“反右派运动”的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以及关于“文革”的五部纪实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以及《陈伯达传》；还写了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从华国锋到邓小平》，正在写作续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这一系列上千万字的写作，使我能够熟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历史。

二是我早在一九六一年就写出了充满幻想色彩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此后又写出了共三百多万字的幻想类文学作品。

我把这两种素质结合在一起，经过多年的构思和酝酿，终于把这一“政治幻想小说”一气呵成……

这是一部视角非常独特、构思格外奇特的小说，调侃的笔调和幽默的文笔，会使读者诸君在非常轻松的氛围中读完本书。

叶永烈
于上海“沉思斋”

第一章 冬夜惊魂

纪念堂里的怪声

数九寒冬，才下午四点多，红太阳就已经陨落西山，北京城暮霭沉沉。刚过五时，天安门广场就夜色凝重。北风呜呜横扫过来，卷起一地枯叶。

下班的人们缩头缩脚，把脑袋深深地埋在鸭绒滑雪衫的三角帽里，步履匆匆走过天安门广场，急急朝着公共汽车站或者地铁站奔去。

夜幕越发深沉。在彩灯照耀之下，天安门城楼正中央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俯视着整个广场。

夏日的夜晚，这里原本有着众多溜达的男男女女，但在西伯利亚寒流驰骋的此时此刻，除了巡逻的武警之外，偌大的广场见不到半个人影。

人民英雄纪念碑挺立在广场之上。汉白玉上所镌刻的毛泽东的题字，依然是那么潇洒。

广场南端，在摇曳的树影之中，矗立着一座白墙黄瓦、正方形的建筑物。外有四十四根福建黄色花岗石明柱，柱间装有广州石湾花饰陶板，通体青岛花岗石贴面。屋顶有两层玻璃飞檐，檐间镶葵花浮雕。基座有两层平台，建筑物的台基高达四米，砌着来自大渡河畔的枣红色花岗石。台基砌进了来自珠穆朗玛峰的石块并浇入了来自台湾海峡的水。

四周环建汉白玉万年青花饰栏杆，上面雕刻着葵花、万年青、腊梅、青松图案。

这座长方形的建筑物的大门——北门，正对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淡淡的灯光，映照在大门上方汉白玉横匾上所镌六个金色大字，那是华国锋所题写的“毛主席纪念堂”。用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

日报》上的话来说，华国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如今，尽管华国锋早已下台，中国的最高权杖已经从邓小平手中交给江泽民，而江泽民又交给了胡锦涛，但是华国锋所写的这六个字一直高悬在毛泽东纪念馆的大门之上。倘若按照中国的惯例谁被赶下台谁的题字跟着销踪匿迹的话，这华国锋的题字早应铲去，正如华国锋刚下台由他亲笔题写的上海《文汇报》报头立即更换那样。不过，毛泽东纪念堂本身是华国锋的“杰作”，依然保留华国锋的题字，比铲去更加恰当，清楚表明这是华国锋时代的“产物”，更具“历史感”。

“毛主席纪念堂”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华国锋挥锹奠基动工。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竣工落成，一九七七年九月九日正式对外开放——那一天，正是毛泽东去世一周年纪念。

“毛主席纪念堂”在刚刚落成的那些日子里，门庭若市，人们天天排着长蛇队，前来瞻仰伟大领袖的遗容。

步入“毛主席纪念堂”的正门，迎面便是一尊三米多高汉白玉石雕毛泽东坐像。天花板上有着一百一十盏葵花灯，团团围着“红太阳”。

在毛泽东坐像之后，便是主题的所在——瞻仰厅。厅正中是黑色花岗石棺床，四周环绕着万紫千红的山花，黑色花岗石棺床上安放水晶棺，距地面八十公分。毛泽东遗体就躺在水晶棺内，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前来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们，在这里向毛泽东深深鞠躬。在一片肃穆之中，惟一能够听见的是抽泣之声。

随着时光的流逝，毛泽东渐渐被人们淡忘。“毛主席纪念堂”变得门可罗雀。此外，“毛主席纪念堂”还不时挂出“内部整理”的牌子，闭门谢客。

只有到了每年圣诞节的欢乐之夜刚过，“毛主席纪念堂”便人声鼎沸，毛泽东的亲属、故旧，纷纷前来拜谒，送上鲜花。其中，华国锋是每年此日必到的。这倒不是人们要到毛泽东纪念堂里过圣诞节，而是“历史的巧合”——圣诞节的翌日，即十二月二十六日，正是毛泽东的诞辰。在“文革”岁月，每到这一天，中国人家家家户户吃面条，庆

贺“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如今，虽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欢歌曼舞远远超过了十二月二十六日，但是这一天“毛主席纪念堂”还是会摆满四面八方送来的生日蛋糕，甚至各种各样的大寿桃。

毛泽东的生日，是清朝光绪十九年（癸巳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原本都是按照中国阴历过生日的。解放后，他的生日被“转译”为公历，亦即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一过，“毛主席纪念堂”便恢复了常态，又变得冷冷清清。

眼下，在黑漆漆的冬夜，“毛主席纪念堂”大门紧闭，杳无音声。在毛泽东那巨大的坐像前，只有四名值班战士与一位值班女医生在那里闲坐。虽然毛泽东已经去世多年，但是仍配备医生为他的遗体值班，因为他的遗体需要精心照料，万不可稍有疏忽。

长夜漫漫，万籁俱寂。本来，他们可以一边嗑着葵花籽，一边聊天，但这里向来是中国最为严肃的场所，他们一进到这里，就本能地降低了讲话的声音——倘若不需要说话，就尽量不说话。他们从来都是静静地呆在这里，往往值八小时班，没有说一句话。就连交接班的时候，彼此也只是点一下头，用目光互视一下——值班的情况，已经“无声”地写在每天的值班记录上。

四名战士之中，三人二十出头，班长稍长几岁。子夜之际，是最困倦的时刻，他们却毫无睡意。他们毕竟年轻，每隔一小时，都要沿着北大厅、瞻仰厅和南大厅巡逻一圈。此外，他们还要每一回巡逻，都走上二楼，在六个纪念室核巡一遍。他们行进在镜子般光滑的“印度红”大理石上，要比巡逻在边境线上轻松得多，不时的走动驱走了困倦。

二楼本来只有四个纪念室。那是在一九八三年建成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陈列着诸多图片和遗物。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增设了邓小平、陈云纪念室。这样，二楼的纪念室也就增加到六个。“毛主席纪念堂”成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聚会之处。

医生张霞，是这群值夜班者中的惟一女性。三十出头的她一身白大褂，把长发卷在白色的圆帽里。一双俊美的大眼睛配上两只小酒窝，仿佛是中国当红影星许晴的姐姐。人们都说她当年不应该报考医科大学，而应该步入电影学院的大门，何况她本人生性活泼，能歌善舞。

当然，人们不明白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她的爷爷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担任过中国高官，不愿让孙女在银幕、舞台上抛头露面，而医生治病救人，用她爷爷的话来说，是充满“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职业。她学医之后，被派到“毛主席纪念堂”工作，也是她爷爷的意愿，同时也只有她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才可能在这神圣的地方工作。爷爷对她说，当年爷爷为保卫毛主席而奋不顾身，如今你继续在毛主席老人家身边工作，可以说是无上光荣。

毛泽东不再“患病”。除了给水晶棺内的毛泽东遗体记录一下温度、湿度之类数据之外，别无它事。所以，在这里值夜班，可以说是最清闲不过的工作。

为了打发漫长的冬夜，张霞真想把手提电脑带来。倘若一边值班，一边在网络中冲浪，那是消磨时光的最佳选择。可惜，这里的纪律严格，绝不允许在上班时间内上网。不过，看书倒是允许的。这样，张霞总是带着书本前来值夜班。她静静地在灯下看书。她曾经听爷爷说起，毛泽东看书从来不计较环境，年轻时甚至专挑人多声杂的地方看书，以求锻炼自己的专注力。张霞做不到这一点，最怕杂音的干扰。正因为这样，张霞以为这里是最好的看书的地方，没有一丝杂音。她喜欢带英文原版的书到这里看，一则曾经在美国哈佛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的她，担心回国之后荒疏英语，总是常读英文原版的书；二是这里的值班战士不懂英文，只知道张医生很用功，连值班的时候都放不下书本，却不知道她在读什么书。

这天她带了一本英文版的《苏联解体亲历记》，看得津津有味。这是一位美联社常驻莫斯科的记者写的。作者在莫斯科呆了三十多年，一口纯正的俄语比许多俄罗斯人还道地。他是美国的“俄国通”，亲眼目

击了俄罗斯的政治巨变。这本书充分体现西方记者擅长的那种以大量生动的细节和花絮描述重大政治事件的风格，把当年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写得活龙活现。

大约是下午跟一位美国朋友到北京郊区打了一场高尔夫球的缘故，今晚张霞还是显得有点疲惫。尽管手中的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午夜时分张霞还是哈欠连连。终于，她抵挡不住频频袭来的睡意，眼前的一切变得朦胧起来。不过，她的潜意识毕竟知道自己正在值班，而且是在“毛主席纪念堂”值班，她依然保持笔挺而坐的姿势，没有伏案而睡。如果没有见到她那双迷人的大眼睛已经闭上，谁都不知道她正在梦乡遨游……

就在张霞迷迷糊糊的时候，忽听得极其细微的笃笃两声。张霞睡意顿消。她侧耳细听，四周一片寂静。值班战士前去巡逻了，只有她一个人在北大厅。

她以为自己大约在睡梦中产生错觉，也就不在意，重新看起那本英文版《苏联解体亲历记》。

过了一分多钟，她清晰地听见笃笃两声！

她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因为她在这里值过那么多个夜班，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声音。

她发觉，那笃笃声是从毛泽东那座硕大的汉白玉坐像后面发出的。

她毕竟学医出身，曾经亲手解剖过那么多尸体。她从不信神，也不疑鬼。她站了起来，走向毛泽东的坐像。

她绕着毛泽东坐像走了一圈。当她走到毛泽东坐像背后的时候，第三次听见笃笃声。这一回，她清楚地判断出声音是从中厅，也就是瞻仰厅里发出的。

她朝瞻仰厅走去。

瞻仰厅里四周空荡荡的，正中央的水晶棺里安放着一身银灰色中山装的遗体。水晶棺周围摆满了鲜花。

她朝毛泽东的水晶棺走去。她已经数不清多少次走向毛泽东的水晶

棺，进行观察、测试、记录。

这一回，当她站在毛泽东的水晶棺前时，第四次响起了笃笃声。这声音是那么的清脆。当她循声望去，大吃一惊：毛泽东的手指在动！

原来，是毛泽东用手指在敲打着水晶棺材！

她的目光投向毛泽东的脸。毛泽东睁开了双眼，正热切地注视着她！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她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惊叫。

毛泽东忽然苏醒

不可思议，张霞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她揉了揉那双戴了隐形眼镜的眼睛，看见毛泽东确实睁开了双眼！

她颓然一屁股坐到了冰凉的大理石上。

她的那一声惊叫，打破了长夜的沉寂，打破了“毛主席纪念堂”这圣地的静谧。那四位正在巡逻的战士听见了，迅速赶到了张霞身边。

“张医生，你怎么啦？”战士们问。

张霞朝毛泽东遗体指了指。

当四个战士的八只眼睛都聚焦到毛泽东的脸上时，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叫声：“啊！？”

战士们每日在这里值班，每天看着毛泽东的遗体。死去二十几年的毛泽东，怎么可能重新睁开双眼？

然而，眼前的一幕，却那样地出乎意料：张开双眼的毛泽东，朝他们微微颌首。

班长刷地一下，向毛泽东敬礼。

三个战士也跟随着班长的动作，把右手啪的一下举到了帽檐。

这时，从地上爬起的张霞，也赶紧向毛泽东深深地鞠了一躬。

毛泽东的脸上，漾着微笑。他缓缓地举起左手，朝上指了指。谁都

明白他的意思：把水晶棺掀开！

班长问张霞道：“张医生，你看怎么办？”

大约遗传了爷爷的军人性格，张霞向来是个办事果断的姑娘。她干脆利落地只说了一个字：“掀！”

对于如何打开水晶棺，张霞非常熟悉。她用右手食指摁动一个电钮。因为毛泽东的水晶棺虽然沉重，但是安装了水晶盖的自动升降装置。平常，张霞随她的老师们——保护毛泽东遗体的专家们一起检查毛泽东遗体时，就是这样升起水晶棺的盖子。

当水晶棺盖徐徐升起时，毛泽东笑了。

张霞扶着毛泽东慢慢坐起，战士也赶紧过来帮忙。水晶棺里本来充满氮气，无法呼吸，以隔绝细菌的侵入。毛泽东在里面“闷”了二十几个年头。这一回，当毛泽东的头终于从水晶棺中伸出之后，长长地吸了一口纪念堂里的清新的空气。

毛泽东坐起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什么地方？”那话，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不过，张霞的爷爷也是湖南人，所以在她听来显得格外亲切。

“这里是……”当张霞想说“这里是‘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赶紧把下半截的话噎进了肚子。

见张霞没有答复，毛泽东接着说道：“我这一觉睡得太久了，睡得太沉了！”

“是的，主席！”张霞这一回答话了。张霞记得，她爷爷跟她谈起毛泽东的时候，只称“主席”如何如何，从来不加一个“毛”字。她爷爷说，毛泽东的战友们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跟毛泽东交谈时，向来只称“主席”，只有老百姓才喊“毛主席”。所以，她也按照爷爷的习惯，把“毛”字去掉。

“小张呢？扶我起来！”毛泽东说道。

张霞这时又陷入惊讶之中：毛泽东怎么知道她姓张？怎么会叫她“小张”？

张霞不由得打心底里佩服，毛泽东真是“神人”！

当张霞准备扶毛泽东站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又问：“小张呢？”

张霞答道：“我就是小张呀！”

毛泽东摇头：“你是小张？你是张玉凤？”

哦，张霞这才明白，毛泽东所说的“小张”，是指张玉凤。

张霞听爷爷多次说起过张玉凤。张玉凤原本是毛泽东出巡全国时专列上的服务员。一九六二年冬，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长沙。十八岁的张玉凤也参加了毛泽东举行的舞会。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敬，她邀请毛泽东跳舞，从此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位单纯而漂亮的姑娘。后来，张玉凤被毛泽东调到身边工作，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一九七四年，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因肺癌住院，张玉凤就兼做毛泽东的文件收发工作。到了今年年底，张玉凤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这时，张霞向毛泽东自我介绍道：“主席，我也姓张，叫张霞，是医生。”

毛泽东不失为大诗人，随口吟诵宋朝柳永《玉山枕》一词中咏晚霞的诗句：“断霞散彩，残阳倒影，天外云峰，数朵相倚。”

张霞一听，随即以宋太祖赵匡胤的诗《咏初日》相答：“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朝霞满天！”

毛泽东听罢，大笑道：“你这个小张比那个小张有文化，不错，想不到你这个医生，也懂唐诗宋词。小张，你扶我起来吧。”

毛泽东实在身躯魁梧，不是张霞所能扶得动的。四位战士连忙上前，小心呵扶，这才终于帮助毛泽东迈出水晶棺。

这时，毛泽东才注意到，那瞻仰大厅正面的白色大理石墙壁上，镶嵌着一行鏤金大字：“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毛泽东看罢，仰天大笑，那笑声在纪念堂里久久回荡：“我只是长长地睡了一觉，怎么就变成‘永垂不朽’了？！”

这时候，张霞也没有什么顾忌了：“主席，这里是专门为你盖的纪念堂！”

哈哈，哈哈，毛泽东又发出一阵朗朗大笑。

瞻仰厅里空空荡荡，没有一把椅子。张霞和战士们赶紧请毛泽东朝北大厅的值班室走去。

毛泽东见到北大厅那座汉白玉坐像笑道：“他倒有椅子坐！”

张霞和战士们把毛泽东请进值班室。毛泽东坐在张霞那把带滑轮的椅子上，他那重量级的躯体跟小小的椅子实在大不相称。

到底是张霞机灵，对班长说：“赶紧把贵宾室的门打开，请主席到那里坐。”

贵宾室里放着一张张宽大的沙发，是专供首长们前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时休息用的。毛泽东在那里坐下来，显得很舒畅。

班长平时多次招待过来访的首长，他熟练地从消毒柜里取出白瓷杯和龙井茶，揭下纯净水的热水开关，给毛泽东沏了一杯滚烫的热茶。

“谢谢你，我好久没有喝茶了！”毛泽东用双手捧着茶杯，当即呷了一口，说：“好茶！”

乘毛泽东在那里喝茶，班长附在张霞耳边，轻声道：“要不要马上打电话报告领导，请示领导？”

想不到，这话给毛泽东听见了：“用不着打电话。我就是领导，向我报告、向我请示就行了！来，来，来，你们都坐下，我要向你们作‘调查研究’。”

张霞和战士们只得遵从毛泽东的意见，在他两侧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毛泽东是“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他的名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早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就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当年回家乡湖南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后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后，曾经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主张在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调查者要“口问手记”。

不过，这一回他只是向张霞和四位战士发问，并没有做记录。

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到底睡了多久？”

张霞马上答道：“主席，你睡了二十几个年头了！”

毛泽东显得很惊讶：“什么，我睡了那么久？”

班长说道：“首长，张医生的话没错。您‘睡’过去的时候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班长不敢像张霞那样称毛泽东为“主席”，他按照部队的规矩叫“首长”，而且称呼总是用“您”，不像张霞那样用“你”。

一位战士也跟着班长说道：“首长，张医生和班长的话都没错。我是在您‘睡’过去的那年出生的，现在都二十好几了。”

毛泽东这才恍然大悟：“这么说，我确实睡了那么久，这真正叫‘长眠’！我‘长眠’的时候，华国锋一定以为我死了，所以给我盖了这样一个‘纪念堂’，让我躺在水晶棺材里‘永垂不朽’！”

毛泽东说罢，笑了起来：“我真的‘永垂不朽’了——我躺了二十几年，没有‘朽’，又活过来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写过这样的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我不相信在八十三岁的时候就见马克思去！”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在我‘长眠’的二十几年里，中国是怎么过来的？华国锋在哪里？”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问题，张霞只能很简略地告诉毛泽东，这二十多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也就是在毛泽东“长眠”后的二十多天，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汪东兴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毛泽东一听，当然明白“四人帮”指的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因为“四人帮”这一“专有名词”的发明权属于毛泽东。

毛泽东听到“四人帮”被抓起来，似乎并不惊诧。他说道：“我早就警告过江青，警告过‘四人帮’，他们就是不听！”

张霞接着告诉毛泽东，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

出，取代了华国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

毛泽东听了，只说了一句：“怎么，华国锋没有把‘反对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进行到底？”

张霞又告诉毛泽东，在一九八九年，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

毛泽东一听，问道：“江泽民？！江泽民是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张霞最后又告诉毛泽东，胡锦涛成了江泽民的接班人。

毛泽东自言自语道：“胡锦涛？！胡锦涛是谁？我更没有听说过！”

毛泽东向战士们“调查”道：“你们觉得江泽民怎么样？”

战士们齐声答道：“报告首长，我们坚决拥护！”

毛泽东又向战士们“调查”道：“你们觉得胡锦涛怎么样？”

战士们同样齐声答道：“报告首长，我们坚决拥护！”

毛泽东问张霞：“华国锋现在怎么样？”

张霞答道：“他现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闲居在家。”

毛泽东屈指一算，说道：“我记得，华国锋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他是一九二一年出生的。哦，到现在也该八十多岁了，这个‘年轻人’也老了，跟我一般年纪——我‘长眠’的时候，是八十三岁。”

毛泽东依然不忘调查研究，问道：“你们以为华国锋怎么样？”

战士们说：“首长，华国锋当主席的时候，我们还很小，不知道。”

倒是张霞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不过能力太差。”

毛泽东夸奖张霞道：“小丫头看问题，倒是入木三分呢。”

张霞笑道：“主席，那不是我的‘货色’，是我从爷爷那里‘批发’来的。”

毛泽东追问道：“你爷爷是谁？”

张霞答道：“就是你手下的那个‘小张飞’！”

毛泽东用他的大手，拍了拍张霞的脑袋：“原来是‘小张飞’的孙女。你爷爷络腮胡子，脸又黑，脾气又急，我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小张飞’。你爷爷现在怎么样？”

张霞说：“离休在家，养花钓鱼！”

毛泽东大笑起来：“你带我去看你爷爷！”

张霞说：“主席，我爷爷是你的老部下，哪有你去看他的道理？我打电话把爷爷叫过来！”

毛泽东连忙说：“现在是半夜三更，怎么可以把你爷爷叫醒？”

毛泽东习惯地看了看手腕，这才发现手表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毛泽东掏了掏自己那套银灰色中山装的所有衣袋，发现所有的衣袋全都空空如也。毛泽东笑道：“如今，我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了！小张，你干脆带我住到你爷爷家吧。”

一听毛泽东这句话，张霞乐了。

以假乱真

听说毛泽东要去张霞家，一位战士赶紧去值班室拿来了军大衣和棉军帽，递给毛泽东：“首长，外面零下十度，您一定要穿大衣！”

毛泽东连忙向小战士道谢。

这时，班长指了指瞻仰厅，对张霞说：“那边怎么办？”

张霞明白班长的意思，马上说：“我来处理。”

张霞让毛泽东先在贵宾室里休息一下。她请班长命令三位战士在贵宾室陪同毛泽东，不得离开。

张霞知道，班长所担心的是，一旦毛泽东去了张霞家，这座规模宏大的圣殿没了主，那怎么办？

张霞倒是胸有成竹，不慌不忙。

她跟班长前往瞻仰厅。瞻仰厅里，那水晶棺空空如也。即便是把水

晶棺的盖板返回原处，透过清澈的水晶，依然一眼就可以见到毛泽东遗体“不翼而飞”。

张霞对班长说：“今天我破例带你到一个绝密的地方。本来，这一地方只有‘七六九’成员才能去。因为今天我需要一个人帮忙，所以只好请你一起去。你必须遵守保密纪律，绝不允许外泄。不然的话，你要对严重的后果负责。”

班长一听，向张霞行了一个军礼，斩钉截铁般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党籍保证！”

张霞所说的“七六九”，是毛泽东遗体保护室的代号。这个保护室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长眠”之后成立的，就以“七六年九月”这“七六九”作为代号。“七六九”最初的负责人是黄树则、吴阶平和林均才。黄树则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吴阶平是著名外科专家。

张霞不慌不忙地带着班长，来到瞻仰厅的一角。张霞摁动电钮，一大块大理石朝旁边移去，露出下面的地下室。

班长很吃惊，他在纪念堂工作多年，竟不知道这里有地下室！

张霞领着班长走过地下甬道，来到一扇紧闭的大铁门前。

张霞掀动大铁门上的密码键，厚厚的铁门徐徐打开。

走进这个神秘的地下室之后，班长见到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上，盖着一杯白被单。

当张霞掀起白被单时，班长惊呆了：长桌上躺着一具毛泽东遗体，竟然跟他平常所见到的水晶棺里的毛泽东遗体一模一样！

张霞这时轻声地对班长说：“这是假的。水晶棺里的毛主席遗体需要定期送往我们‘七六九’进行保养、消毒、除菌。在这一期间，就把这具毛主席遗体蜡像临时安放在水晶棺里。蜡像做得非常逼真，所以不知内情的人分辨不出真假。”

班长叹道：“连我都没有看出来！”

张霞说，当时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列宁去世之后，列宁的遗体保存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水晶棺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法西斯兵

临莫斯科城下，苏联人就将列宁的遗体秘密转移，而替代之的是仿真蜡像。

张霞请班长帮忙，一起把毛泽东遗体蜡像搬上一辆手推车，盖上白被单。这种手推车是医院里常见的，只是更宽更长些，因为毛泽东的身材是那么的魁梧。

张霞和班长一起推着手推车，沿着地下甬道的斜坡，推上瞻仰厅。

张霞和班长把毛泽东遗体蜡像安放在水晶棺里，再在遗体蜡像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张霞摁动电钮，盖上水晶棺的盖板。

张霞用布细细把用泰山黑色花岗石制成的水晶棺基座擦了一遍，又把棺座四周镶着的金光璀璨的党徽、国徽、军徽以及玻璃栏杆擦了一遍，顺手把周围的一丛丛君子兰整理了一下。

于是，瞻仰厅里一切景象如常。

班长细细地观看了一番，竟然也看不出一丝破绽。

班长叹道：“这蜡像做得跟真人一模一样，我真服了！”

张霞笑道：“这下子，你该放心了吧！”

班长答道：“嗯。”

张霞说：“不过，要按照首长的指示，严格保密，对谁都不准说出去。”

班长又答道：“嗯。”

张霞在与班长收拾好瞻仰厅之后，一起前往贵宾室。一进门，毛泽东正在继续向三个战士作调查研究呢。

张霞对毛泽东说道：“主席，你不休息一会儿？”

毛泽东笑道：“我‘休息’了二十几年，用不着再休息了。”

张霞看了一下手表，凌晨三时十分。

班长问道：“首长，要不要请机关车队给您派车？”

毛泽东摆了摆手：“不要，绝对不要！”

张霞说：“主席，我们‘打的’，好吗？”

毛泽东疑惑不解：“什么‘打的’？”

张霞道：“就是乘出租汽车。”

毛泽东追根刨底：“乘出租汽车怎么会成了‘打的’？”

张霞只得解释：“出租汽车的英文叫‘TAXI’，香港人翻译成‘的士’，把乘‘的士’说成‘打的’。现在，连北京也流行说‘打的’。”

毛泽东笑道：“那就‘打的’吧！不过，我身无分文，付不出车钱。”

张霞也笑道：“能够为主席‘打的’，我非常荣幸。”

毛泽东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亲手制订的，我不能带头违反。好在我还有《毛泽东选集》的稿费在那里。今后花费什么，小张你先垫，记个账，以后从我的稿费中扣还。”

这时，张霞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口罩，递给毛泽东：“主席，出门的时候，戴上口罩。虽说你已经‘长眠’二十几年，中国的许多老百姓都还认得你。另外，还要戴顶大帽子。‘天下无人不识君’，叫人认出来，明天就会成为中国的头条新闻！”

毛泽东这时反过来提醒张霞：“好啦，别叫我‘主席’、‘首长’了。我一‘长眠’，醒过来不再是主席了，普通百姓一个。”

张霞问：“那叫你什么呢？”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说：“我母亲姓文，叫文七妹。你们就叫我‘文同志’或者‘文师傅’吧。”

张霞大笑起来：“主席！”

刚说了“主席”，张霞马上改口说：“哦，文先生！眼下中国不再时兴叫‘同志’，也不时兴叫‘师傅’，都叫‘先生’、‘女士’、‘小姐’了。”

毛泽东随即说：“那就请你们以后叫我‘文先生’！”

班长说：“叫‘文老’或者‘文老师’，也许更加合适。”

张霞连忙道：“对，对，还是叫‘文老’最好。”

毛泽东大笑道：“哪人一介文人，又已老朽，叫‘文老’名副其

实。”

班长和战士们帮助毛泽东穿上军大衣，戴上海虎绒军帽。张霞帮助毛泽东戴好口罩。

这时，班长说：“我先出去，拦一辆‘的士’，再请首长上车。”

张霞立即更正道：“是请‘文老’上车。”

班长说：“对，对，是请‘文老’上车。”

当班长推开“毛主席纪念堂”的北大门时，一股北风扑了进来。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班长冒着寒风出去了。

毛泽东问张霞道：“这么早，叫得到出租汽车？”

张霞回答说：“如今在北京街头，二十四小时都能叫到‘的士’。”

才一会儿，大门口就亮起两道雪亮的光芒，一辆红色“夏利”轿车驶了过来，车顶亮着“TAXI”灯。

毛泽东走出大门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他已经多年没有吸到这么新鲜的空气了。他回首望了望那座方形的建筑物，见到北大门上方华国锋题写的“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金字，不由得笑了一下。

张霞拉开后座的车门，班长马上用手挡在车门上方，以防毛泽东的头撞在车门上。班长这一熟练的动作，使毛泽东不由得记起当年他的警卫员总是以这样的姿势扶他上车。

“夏利”出租车比毛泽东当年乘坐的红旗牌大轿车小得多。狭小的后座幸亏只坐毛泽东一人，总算勉强容纳他那高大的身躯。

待毛泽东坐定，张霞这才坐进前座。

张霞吩咐出租车司机道：“万寿路！”

出租车启动了。

班长和三个战士齐声向毛泽东喊道：“文老，再见！”

毛泽东也向战士们挥手：“谢谢同志们！”

夜巡天安门

万寿路在北京西三环之外，那里是北京高干住宅区所在地之一。

毛泽东上了车，抬头见到灯光映照下的熟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才明白，原来那“毛主席纪念堂”是建造在天安门广场上。

出租车司机是老北京，对北京的道路了若指掌。他开着车从“毛主席纪念堂”往南，到了前门，径直沿着前门西大街朝西前进。

这时，毛泽东赶紧对张霞说：“小张，能不能叫司机在天安门广场绕个圈，让我仔细看一下？”

往日，毛泽东乘坐他的专车时，前排右侧是机要秘书的座位，眼下张霞成了他的临时“机要秘书”。按照“惯例”，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总是侧坐，面对司机，耳对毛泽东。这样，在行车过程中，毛泽东要走要停要上什么地方，只消轻轻说一句话，机要秘书马上就听见了，随即把毛泽东的指示转告司机。

张霞这位临时“机要秘书”并不知道毛泽东的“规矩”，坐在前座，目视正前方，后脑勺对着毛泽东。再说，毛泽东戴着口罩，严重影响了声音的“清晰度”。这样，张霞竟然没有听清毛泽东的话。直到毛泽东重复说了一遍，张霞这才听见。

张霞马上说：“行！”

这时，出租车已经离开天安门广场有半站路了，张霞还是请司机把出租车掉头，回到天安门广场，绕天安门广场一圈。

这时的天安门广场，杳无人影，一片黑暗，但是彩色泛光灯把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照得通亮。对于这个广场，毛泽东是那么的熟悉。尽管今日天安门广场显得更加漂亮，但还是原来的模样，只是在南端多了一个正方形的“毛主席纪念堂”。

出租车司机善解人意，明白这位“外地人”想多看一眼天安门广场，特地放慢了车速。在毛泽东看来，仿佛恰好相当于他当年乘坐检阅车的车速。

毛泽东有着浓得化不开的“天安门情结”。他以极大的兴趣，“检阅”着天安门广场。

出租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城楼。毛泽东见到城楼正中，依然高悬他的巨幅画像。毛泽东会心而又放心、舒心地笑了。尽管他并不认识当今执政的“晚辈”江泽民、胡锦涛，看得出，江泽民、胡锦涛充满着对他的尊重——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毛泽东的思绪，飞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他在这里高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时候，天安门广场上还没有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历史博物馆，上百万人集聚在广场上欢呼雀跃，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的思绪，飞到那一次又一次“五一”、“十一”大游行，他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在那巨大的红灯笼前向游行群众招手。每当游行队伍中爆发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时，他总是回答一句：“人民万岁！”

毛泽东的思绪，飞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他和“亲密战友”林彪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就在那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他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从此，他成了红卫兵们的“红司令”。

就在毛泽东陷入沉思的时候，从前座传来司机的话音：“老先生是头一回来北京吧？”

司机从后视镜上看见后座的乘客目不转睛如此专注地观看着天安门广场，又加上这位乘客刚上车时说的那句“谢谢同志们”，判定“老先生”必定是外地人。

张霞生怕毛泽东答话会“露馅”，马上替他“嗯”了一声。

毛泽东也明白，此时此刻最好“免开金口”，所以也就保持沉默——尽管按照他的性格，倒是很想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以作“调查研究”。

本来，司机想借助于跟乘客“侃大山”打发夜班的困倦，见到两位

乘客都缄口无言，也就不说了。

这时，毛泽东的视线，从窗外收进，看了看司机。他忽然惊奇地发现，司机在前窗正中，挂了一张毛泽东像，画像下方是“一路平安”四个字。

这下子，毛泽东再也耐不住沉默，问道：“师傅，你干吗在车里挂这张像？”

司机一听，乐了：“老先生，你难道是‘外星人’，连这都不知道？中国现在很多司机都在车里挂毛主席像，因为毛主席能够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毛泽东还是头一回被人称作“外星人”，不由得大笑起来，说道：“照我看，毛主席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吧！”

北京的司机，向来以善于“侃大山”著称，这位司机便是“善侃”者之一。他有板有眼说起了故事：

“说来话长。那是在十几年前，北京发生一起两车迎面相撞的交通事故。一辆是大卡车，一辆是小轿车，不管怎么说，总是小轿车吃亏。嘿，那天真奇怪，大卡车撞得稀巴烂，油箱起火，烧死了司机，可是小轿车却未损半根毫毛，司机安然无恙。警察前来查验，也觉得实在太奇怪了。他们细细查看，这才查明原因：那辆小轿车的前窗，挂着一枚毛主席像章！据说，开小轿车那人，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前些日子到湖南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在那里买了一根带毛主席像的镀金项链。回到北京，顺手把这项链挂在车子里。想不到，就是项链上的毛主席像，保他平安——比平安保险公司还管用！这个故事一传两，两传三，三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遍整个北京，又从北京传遍全中国，所以司机们都抢着买毛主席像……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着司机讲述的精彩故事，对于他来说，其可以用“闻所未闻”这四个字来形容。

司机不时从后视镜里观看“老先生”的反应，只见“老先生”笑出了泪水，却在空空的衣袋里找不到手绢。不过，“老先生”也很灵活，

他把口罩往上拉了几下，也就擦去了泪水。

这时，“老先生”的目光又注意到在毛泽东像旁，还悬着一只金光闪闪的元宝，下面是“招财进宝”四个字。

“老先生”接着又问：“师傅，你怎么又挂金元宝呢？”

司机大笑起来：“老先生，看来你真的是‘外星人’，对地球上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挂金元宝还要作解释吗？眼下，中国人谁不想挣钱，谁不想发财，谁不想‘招财进宝’？老先生，我刚才听你说‘谢谢同志们’，我就知道，你那个思想，老掉牙啦！”

听了司机这番话，毛泽东收住了笑容，又陷入了沉默。

出租车沿着复兴路往西，出了西三环，过了翠微路，一个转弯，就拐进了万寿路。

第二章 隔世之感

毛泽东不识江泽民

万寿路处于北京西面城乡结合部。这里，本来十分荒僻，早年属于宛平县，直到一九二八年才划入北京市——那时候叫“北平市”。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驻扎在万寿路，使万寿路第一次引起人们的注意。

万寿路有着“万寿”之名，令人想起颐和园的万寿山。人们考证过万寿路跟慈禧太后的关系，结果一无所获。倒是万寿路附近的“五棵松”，传说清代皇宫某要人带公主到那里游玩时，无意之中栽了五棵松，若干年后亭亭玉立，人们就把那里叫做五棵松。

在北京，万寿路是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马路。这里虽然有几家商店以及超级市场，但是这里毕竟不是商业街。街道两边，大都是机关大楼以及宿舍区。

张霞爷爷家就住在这条十分宁静的马路上。

车入万寿路，坐在后座的毛泽东一句随口而说的话，张霞倒是清楚地听见了：“这不是‘新六所’吗？”

张霞非常震惊：毛泽东怎么会在这条马路那么熟悉？要知道，“新六所”就连出租车司机都未必知道！

后来，张霞才从毛泽东那里得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中央在这里建造了六幢小楼，人称“新六所”，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每人一幢，这“五大书记”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先是任弼时。任弼时病故，陈云增补），还有一幢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所用。那时候，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倘若不在中南海，便常在这里。毛泽东住在新六所一号楼。另外，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秀才”们，也

在万寿路。中共中央还在万寿路建造了一座高级招待所，专门接待外国“兄弟党”的领袖们。万寿路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政治路”，而由于对外严格保密，北京的百姓们对此一无所知。张霞也只是从爷爷那里听说“新六所”这名字，并不知道“新六所”的来历，更不知道“新六所”住的是何等人物。

在毛泽东看来，今日万寿路，比过去宽敞、整齐得多。马路两边多了成片成片的新楼，那是北京的高干住宅区。

车过“新六所”，张霞要司机拐进一个小区。刚进小区的大门，就被值班战士拦住。平常，进出这个小区的，都是部长级人物，都有公家配给的小轿车。出租车通常是不许进入这一高干住宅区的。考虑到车里坐着毛泽东，张霞请求战士破例给予放行。

张霞出示了小区通行证件，而且指着戴着大口罩的毛泽东说：“我是‘06’的孙女，他是我爷爷的老战友，上了年纪，又感冒发烧，请给予方便。”

值班战士拿起了电话。张霞马上请他挂机。她明白，战士是打电话向“06”——她爷爷请示。她指了指手表：“首长睡觉，别吵他！”

在部队，反正把大一点的官儿，都习惯地叫做“首长”。

战士又一次端详了张霞的通行证件，这才终于放行。

“哎哟，首长住的地方，这么戒备森严，我还是头一回来！”出租车司机不由得叹道。

张霞没有理会司机的叹息，而是向他发布一系列的指令：“向前，往东，朝南，再往西……”

当张霞说了声停时，出租车停在了“06”号门前。张霞对司机说：“师傅，请您稍等，我先送老人进屋。”

接着，张霞跳下车，扶毛泽东下车。

这时，司机口出惊人之语：“小姐，这位老先生长得真像古月！”

毛泽东听了，感到莫名其妙。

张霞强忍着笑。

古月何人？古月乃是以饰演毛泽东出名的特型演员。如今这位司机本末倒置，把毛泽东说成像古月了！

张霞打开大门，进屋，随手关门。张霞进屋之后，这才扑哧一笑，笑得泪水都出来了！

然而，毛泽东却一直不明白，司机所说“这位老先生长得真像古月”有什么好笑的。毛泽东根本不知道古月是何许人也！

张霞笑毕，帮毛泽东脱掉军大衣，摘掉海虎绒帽子，除去大口罩，请毛泽东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定，这才回身出去，给出租车司机付钱。

乘张霞出去的时候，毛泽东站了起来，环顾四周。这房子，在毛泽东的眼里，算是一般；当然，在北京百姓眼里，要算是“大宅”了——上、下两层，十来间房，都是张家。

毛泽东注意到客厅里挂着三幅大照片：

其中的一帧，毛泽东一眼看去，就认出是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拍摄的。那照片是他跟一个“小伙子”的合影。毛泽东的记性很好，他马上认出那“小伙子”就是当年在他身边工作的张军，外号叫“张飞”。不言而喻，张军就是张霞的爷爷。

另一帧则是张军跟邓小平握手的照片。在照片上，张军身边还站着别人，看得出，那是邓小平在接见一批干部时，来到张军面前，跟他握手。

在第三帧照片上，张军已经变成秃顶的老人，跟一个戴宽边眼镜，教授派头的人物合影。

毛泽东正在看照片，张霞回来了。

毛泽东笑着对张霞说：“想不到，我今天会到‘张飞’家做客！”

张霞说道：“我马上去把爷爷叫起来！刚才，我怕在电话里说不清楚，所以没有给他打电话。如果他知道你老人家驾到，会早早站在大门口迎接。”

毛泽东道：“让他再睡一会儿吧，‘有钱难买天光觉’嘛。你给我拿支烟。”

张霞马上拿出一盒她爷爷招待客人用的中华牌香烟，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从中抽出一支烟的时候，张霞“嚓”地一声点燃了打火机，又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平生有两大嗜好：吃饭不离辣椒，写作不离抽烟，经常一天吸五十支烟，半截手指都被香烟点黄了。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指着照片上那教授派头的人物问：“这个人是谁？”

张霞一愣：“你不认识他？！”

张霞细细一想，悟出来了：“对，对，你不认识他。他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江泽民呀！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毛泽东细细端详着江泽民的照片，说道：“我的大弟弟叫毛泽民。这个江泽民跟我弟弟同名。”

张霞向毛泽东介绍说：“江泽民的父亲江上青，是革命烈士。”

毛泽东道：“哦，江上青，我知道。那个江泽民，看上去像大学教授。”

张霞回答说：“解放前，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那时候，他参加学生运动，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分厂当过厂长，曾经去苏联学习。后来，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局长。”

毛泽东自言自语道：“噢，烈士子弟，做过地下工作，政治上应该是可靠的。”

这时，张霞给毛泽东沏好一杯龙井茶。

毛泽东笑着对张霞说：“小张，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对于中国的政治相当了解。”

“哪里，哪里。”张霞连忙说，“那都是我爷爷‘熏陶’的结果。”

毛泽东问：“你爷爷现在做什么？”

张霞说：“他后来‘退’下来，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当研究员，专门研究中共党史。”

就在这时，从客厅门口传来一声尖叫：“啊——”

恍若隔世

张霞和毛泽东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客厅门口，只见张霞的爷爷穿一身睡衣，呆若木鸡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张霞的爷爷中等个子，瘦削，脸的轮廓分明，一双眼睛不大却目光锐利，身板笔直，一望而知军人出身。

是客厅里的谈话声，吵醒了张军。他从卧室走到客厅门口，见到毛泽东坐在那里，在惊叫一声之后，呆住了！

张霞赶紧跑到爷爷跟前，把他扶住。经过张霞的一番解释，张军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张军缓过神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毛泽东跟前，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行了个军礼——尽管此时此刻他只穿着睡衣，跟军礼是那么的不相称。

毛泽东见他穿得那么单薄，对张霞说：“小张，赶快把我那件军大衣拿来！”

不料，两个“小张”一起答应——因为当年张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喊惯他“小张”。

张军披着毛泽东那件军大衣，在毛泽东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毛泽东对张军说道：“如果不是我事先看到你的近照，刚才你往门口一站，你那光秃秃的脑袋，我差一点把你当成林彪！”

张军拍了拍自己的光头，指着墙上他跟毛泽东那张合影说道：“想当初，你看，我的头发多浓多密。”

毛泽东说：“那时候，你的头发垂到前额，你就把头发这么往后一甩。”

毛泽东说着，学着张军当年的模样。

张霞大笑起来：“真‘酷’！”

毛泽东不解：“什么真‘阔’？！你爷爷当年是个穷小子，一点也不‘阔’。”

张霞一听，越发大笑，笑得毛泽东莫名其妙。

张军赶紧转移话题，说道：“时间过得真快，如今我都八十几了。头发越来越少，胡子倒是越长越多。”

毛泽东道：“你当年就因为长着络腮胡子，脾气又急，所以才得了‘张飞’这诨号。”

张军说：“现在‘贫富差别’太大了。如果茂密的胡子‘移植’一部分到‘贫瘠’的头顶，那就好了。”

毛泽东笑道：“这么说，现在还要进行第二次‘土改’！”

他俩相视而笑。

这时，毛泽东开始抽第二支烟。他问张军：“你怎么不抽？”

张军指着张霞道：“都是她！小霞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一定要我戒烟，我就只好遵命。”

张霞连忙解释说：“我是学医的，抽烟有害健康。主席，你也最好少抽或者不抽。”

毛泽东道：“你的话有道理。过去，好多医生也劝过我戒烟。我少抽可以，戒是戒不掉罗，毕竟是抽了几十年的老‘烟卤’！”

张军这时细细打量着毛泽东：“主席，你的气色不错，看上去比我都年轻。”

毛泽东道：“我‘睡’了二十几年，醒过来还是二十几年前的样子，所以我现在应该还是一九七六年的年龄，八十三岁。”

张军说：“这么一来，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主席，这一回，你就住在我家吧。我让小霞把楼上打扫一下，把整个楼上都腾出来，你一个人住。虽说跟你在中南海的房子没法比，但是楼上有两个房间是书房，堆满了几万册书，你一定喜欢。”

毛泽东道：“房不在大，‘有书则灵’。”

张军说：“主席愿意住在我们家，我张军三生有幸。我和小霞都给您当秘书。我的老伴当炊事员。我今天就给小霞的领导打个电话，就说小霞要准备去美国作学术交流，请一、两个月假。”

毛泽东道：“我一来，就害得你们全家总动员，心中有愧。”

正说着，从客厅门口又传来“啊——”的一声惊叫。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客厅里的谈话声、大笑声，把张军的老伴也吵醒了。

当张霞向奶奶讲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满头飞霜的老人急忙上前，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主席，你还认识我吗？”

毛泽东认不出眼前的老妇人。不过，她的一对小酒窝，打开毛泽东记忆的闸门——张霞那对小酒窝，显然是从她那里遗传的。过了许久，毛泽东终于依稀记起：“是‘小放牛’！”

一听毛泽东喊她“小放牛”，她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连声道：“主席的记性真好！”

当年，她是文工团的团员，演过延安歌剧《小放牛》，算得上是半个“红歌星”，所以人人喊她“小放牛”。虽然她后来跟随张军一起进入中南海，当毛泽东那里收收发发的机要员，不过大家仍叫惯“小放牛”，以至只有张军喊她的本名李芳。

“李芳，坐下来。”张军这么一提醒，“小放牛”才从万分激动中渐渐平静下来。

“你们有几个孩子？”毛泽东问道。

“独苗一根。”李芳回答说，“儿子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他现在是大老板，自己买了房子，一家子单独住。”

“你儿子是大老板，是资本家？”毛泽东露出不解的神色，“一九五六年不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了吗，中国怎么还会有资本家？再说，那时候对私房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怎么现在可以买房子？”

张军一听毛泽东这一连串的问话，知道跟这位隔着一道历史鸿沟的

老人，一下子说不清，便把话题岔开：“主席，我儿子家也是独苗一根，就小霞这么一个孩子。我们这一家，都是计划生育的模范”。对于“计划生育”，毛泽东倒是听懂了。他说：“我曾经讲过，‘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我批判过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过，人口太多，确实也是一个问题。看来，是应该提倡节制生育。”

看来，毛泽东对于人口的观点，到了晚年，倒是改变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张军：“你的第四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了吗？”

张军拍了拍张霞的脑袋瓜：“小霞是现代派，要‘丁克家庭’！”

毛泽东还是头一回听说“丁克”，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霞不得不解释说：“‘丁克’是从英文缩写‘DINK’音译而来。‘丁克家庭’就是不要孩子的家庭，在西方现在很流行。生孩子、养孩子太累，我是医生，更是经常看见女人生孩子的痛苦场面，所以我赞成‘丁克’！”

毛泽东听了直摇头：“‘丁克’，岂不是人类要走向自我消灭？我一生，结过三次婚：杨开慧生了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那个岸龙后来丢了，找不到了；贺子珍十年里生过六个孩子，在战争中只活下一个李敏；江青生了一个李讷。如果我的孩子都活下来的话，整整十个！我是坚决反对‘丁克’的。‘丁克’把‘丁克’全都‘克’了，人类就没有希望了。”

尽管毛泽东对“丁克”作了批判，作为坚定的“丁克派”维护者的张霞对此保持沉默。

张霞还说：“在新世纪，中国除了涌现许多‘丁克家庭’之外，还有许多‘单亲家庭’、‘空巢家庭’。”

毛泽东又一次闹不清楚什么“单亲家庭”、“空巢家庭”。

张霞作了解释：“现在中国年轻人离婚率相当高。‘单亲家庭’是指夫妇离婚之后，由父亲或者母亲带着孩子。至于‘空巢家庭’，是因为现在中国年轻人出国率很高，子女出国了，剩下父母守空巢。”

毛泽东叹道：“我‘睡’了二十几年，好像落后了一个世纪，跟不

上趟！”

张霞告诉毛泽东：“你‘睡’了二十几年，你的嫡孙毛新宇，长成了像你这样魁梧的大高个，还成家了呢！”

毛泽东一听，非常高兴：“我的孙子出生的时候，我七十九岁。哦，现在他该已过而立之年。我相信，我的孙子不会是‘丁克派’，不久我会当上‘曾爷爷’！”

张军说道：“小霞现在是‘一人三家’。在我这里，有她的一个‘据点’。在她爸爸妈妈那里，又有她的一个‘据点’。另外，她自己跟我孙女婿，还有一个独立的‘据点’。”

毛泽东笑道：“好嘛，在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家里两边吃糖葫芦，回到自己家里又吃糖葫芦，这小日子真不错。这不叫‘一人三家’，这叫‘狡兔三窟’！”

张军和张霞一听，都笑了起来。

“小放牛”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抽身出去，快手快脚去做早饭。

毛泽东在客厅里跟张军一家聊家常，仿佛沉浸在浓浓的家庭气氛之中。毛泽东的晚年是在凄冷孤独中度过，尽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响彻中国大江南北。毛泽东在与张军一家最初的聊天之中，感到一种隔世之感，一种观念的强烈反差，但是毛泽东却深感其乐融融，所以心境格外的好。

就在这时，“小放牛”发布“早餐令”，请大家从客厅“移师”餐厅。

“你办事，我放心”

餐厅里放着一张四方桌，张军一家请毛泽东朝南而坐，张军夫妇分坐两边，张霞下座。

李芳道：“不知道您大驾光临，没有准备。”

毛泽东指着小米粥、白馒头、豆腐乳、腊肉片和辣椒酱说道：“我

已经二十多年‘不食人间烟火’，这顿早餐家常便饭，我最喜欢。”

张军说：“主席，今天中午让‘小放牛’使出看家本领，举行家宴，为您接风。晚上，我请您到一家特殊的饭店吃饭，你一定高兴。”

毛泽东问：“什么饭店？”

张军：“暂且保密！”

大约确实因为二十多年没有吃饭的缘故，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他再三对张军说：“小张，不必破费。我这个人，喜欢粗菜淡饭。你在我身边工作多年，知道我的脾气。”

张军马上说道：“那家饭店不贵，但是最合您的口味。”

一听说不贵，毛泽东也就不持反对意见了，只是不知道张军葫芦卖的什么药。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张霞跟她母亲一样做事快手快脚，吃完早饭之后，一阵风似的就把楼上的房间收拾好了，请毛泽东上楼。

毛泽东一上楼，没有进卧室休息，倒是要张军、张霞领他到书房去。

“我知道，主席嗜书如命！”张军对孙女张霞说道，“那时候，主席要去外地，我的任务之一，就是把他喜欢看的书，整箱整箱搬上他的专列。”

楼上有两间书房。其中的一间，是工作室，另一间则是藏书室。两位“秘书”领着毛泽东先来到工作室。毛泽东一进屋，视线就落在书桌上那台电脑上。

“这是什么东西？”毛泽东问。

“这是电脑。”张霞答道，“现在中国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有电脑。”

“电脑干什么用？”毛泽东又问。

“现在爷爷写文章，我写文章，都用电脑写，再也不用笔了。”张霞一边说，一边打开电脑。

张霞的十个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电脑屏幕上马上出现一行字：“热

烈欢迎毛泽东主席到我家！”

张霞用鼠标点了一下打印符，打印机立即打印出刚才那行字：“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到我家！”

毛泽东看罢，说道：“电脑真不错，写文章又快又好。我那时候，连中南海都没有电脑。”

正说着，张霞的衣袋里发出一阵滴滴答答的音乐声。只见张霞从衣袋里摸出一个银灰色的盒子，把盖子翻开之后，放在耳边：“嗯，嗯，今天我在爷爷家，不回家啦！”张霞说毕，把那盒子合上。

“这又是什么东西？”在毛泽东看来，似乎什么都很新鲜。

“这是手机，也就是移动电话。现在中国很多人都有手机。在我们家，爷爷有手机，爸爸有手机，我的丈夫有手机，我有手机。刚才，就是我的丈夫见我下班没有回家，给我打来电话。”张霞说着，把手机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问：“这手机也能打长途？”

张霞说：“连国际长途都能打！”

毛泽东又问：“在什么地方都能接到电话？”

张霞说：“不管你在北京，在上海，在中国，在美国，在火车上，在轮船上，都能接到电话。”

毛泽东说：“小小手机，实在大方便了。”

这时，张军说道：“主席，您还记得吗？您过去乘坐专列到外地去，如果您要在车上打个电话，专列要停靠在火车站，把专列上的电话线跟火车站的专用电话线接起来，才能打电话。”

“那时候如果我有手机，就不必那么麻烦了。”毛泽东抚摸着手中那个银灰色的小盒子，无限感叹：“才二十几年，科学技术的进步，真是突飞猛进！”

“是呀。”张军说道：“那时候，您在夏天乘坐专列外出，为了降温，我们在您的那节车厢里放了大冰块，用几台电风扇对着冰块使劲地吹，弄得车厢地上全是水。现在，中国家家户户都安装了空调，夏天打

冷气，冬天打暖气，方便多了。”

张军说着，指了指书房墙上挂着的长方形分体空调机。

毛泽东感叹道：“那时候，夏天开中央全会，总是要上庐山。一九五九年夏天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七零年夏天的九届二中全会，批判林彪、陈伯达，都是在庐山上召开的。其实，我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那时候，每到夏天，蒋介石就把他的政府从‘火炉’南京统统搬到庐山上办公。蒋介石把庐山称为‘夏都’。如果那时候就有空调，不论蒋介石也罢，我也罢，都不必上庐山了！”

张霞把刚才打印的那张纸，顺手塞进碎纸机。“吱吱”两下，那张纸就化为细小的一粒粒椭圆形纸粒。

没等毛泽东发问，张霞就解释说：“这是碎纸机，又叫文件粉碎机。爷爷做惯中央机关工作，保密观念很强。没用的文稿，都用碎纸机粉碎，防止泄密。”

张军说道：“那是在主席身边工作时养成的习惯。过去，那些作废的文稿，要用火烧掉，又麻烦，又污染环境。有了这碎纸机，方便多了。现在，不光是中南海的个个办公室都有碎纸机，许多公司、学校、机关的办公室，都有这种机器。”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张军的书房，笑称自己成了“当代‘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张军拉开书桌的抽屉，里面有许多方形的小薄片。张军说，这是电脑软盘。一本厚厚的书稿，可以储存在这么一张薄薄的软盘里。

张军又打开一个文件柜，里面有许许多多银光闪闪的圆形薄片。张军说，这叫光盘，又叫光碟。光盘的容量更大，毛泽东一生所有的著作，一张光盘就能全部装进去。

张军对毛泽东说：“如果现在您要去外地，我再也不必往专列上装一箱箱书了，只消带一个小小的手提电脑和一盒光盘就够了。”

张军说着，让张霞把一张标明“毛泽东著作”的光盘塞进电脑，电脑屏幕上马上出现一系列目录：

《毛泽东选集》四卷
《毛泽东文集》八卷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卷
《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很有兴味地看着。

毛泽东说：“《毛泽东选集》四卷和《毛泽东诗词》，是经我亲自审定后出版的。这《毛泽东文集》八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卷，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张军解释说：“那是在您‘长眠’之后，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的，我也参加过编选。《毛泽东文集》八卷，收入您的重要著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卷，收入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各种批示、书信，经您审定的讲话记录稿，等等。”

毛泽东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很有兴趣，说道：“你就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打开，给我看看。”

张军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总共十三卷，是以时间顺序编的，您要看哪一卷？”

毛泽东说道：“就看最后一卷吧。”

张霞从电脑光盘里调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把目录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张军说道：“这一卷是‘文革’后期您的批示、书信和讲话记录稿，从一九六九年一月到一九七六年七月。”

毛泽东虽然八十有三，视力倒不错，看电脑屏幕，用不着戴老花眼镜。他在电脑屏幕上看到这样的目录：

关于不要批判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家属的批语（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

对中央转发清华大学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报告的批语（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在一封要求选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来信上的批语（一九六九年一月）

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一九六九年）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关于总结经验》的批语（一九六九年三月）

对林彪中共九大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月）

对周恩来关于苏联要求与我通话的处置意见的批语（一九六九年三月）

对陈伯达在中共九大发言稿的批语（一九六九年四月）

“看看最后几篇。”毛泽东说。

张霞用“翻页键”连续往下翻，翻到了目录的末页：

对江青来信的批语（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对周恩来丧事安排请示报告的批语（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

对周恩来悼词的批语（一九七六年一月）

对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对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稿的批语（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对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稿的批语（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决议稿的批语（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对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稿的批语（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对选印的天安门事件中诗文原件的批语（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

对毛远新请示报告的批语（一九七六年四月）

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最后三篇文稿是：

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句话（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全国实现统一的电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电报（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

毛泽东看了以后说：“给越南和朝鲜的贺电，不是我写的，是秘书起草好，我画了一个圈，发出去的。”

毛泽东皱着眉头问：“那篇《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句话》，是什么东西？”

张霞说：“主席，我马上给你调出全文。”

张霞用鼠标往目录上《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句话》那行字一点，电脑屏幕上立即显示全文：

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句话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五日）

—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二

照过去方针办。

三

你办事，我放心。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载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四

国内问题要注意。

毛泽东看罢，又很仔细地看了此文的注释：

本篇一、二、三是毛泽东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谈话时写的三句话。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遗嘱”的大阴谋》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三句话。本篇四是毛泽东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一句话。

毛泽东回忆说：“那时候我病重，讲话很吃力，声音也很小，只有张玉凤听得懂我说什么话。那天，我跟华国锋谈话，华国锋有时候听不明白我的话，我就用铅笔在纸上写几个字。我的手有点抖，连字也写得歪歪扭扭。我真没有想到，这几行断断续续、歪歪扭扭的字，也上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张军说：“您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可给华国锋帮了大忙。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华国锋拿出了那张纸条。‘你办事，我放心’，成了‘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就成了华国锋手中的尚方宝剑。”

毛泽东连连说：“那张破纸条上的几个字，起这么大的作用，我万万没有想到。”

张霞说道：“我记得有一幅油画，标题就叫《你办事，我放心》，我从电脑里调出来给你看看。”

只见张霞那纤纤细指在电脑键盘上“笃、笃”敲了几下，电脑屏幕上马上出现一幅油画：画面上画着两张沙发，毛泽东斜靠在左边的沙发上，那样子一看就知道在重病之中。毛泽东的目光，注视着右边沙发上坐着的年富力强的华国锋。华国锋的身子略微朝毛泽东倾斜，一副非常忠诚、敬慕的神态。

张霞的手指又在电脑键盘上敲了几下，电脑屏幕上出现一张彩色照片。那是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行进在天安门广场的情景，队伍最前面高举

着“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大字，后面则是那幅巨大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油画。

毛泽东看了，哈哈大笑。

毛泽东笑罢，说道：“电脑这玩艺儿真不错。小张，以后我拜你为师，好好学电脑。”

张军一听，以为毛泽东是对他说，赶紧道：“不敢当，不敢当。我那两下子，是从孙女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又笑了：“你用不着谦虚。我刚才说的‘拜小张为师’，是说拜你的孙女为师。”

张军说：“主席，我们爷孙俩在您的面前，都是‘小张’。以后还是有所区别吧，您像往常那样喊我小张，我听了很亲切。至于我的孙女，她只能算‘小张’，您就像我那样喊她小霞吧。”

毛泽东答道：“好，就照你的办。”

张霞调皮地说了一句：“你办事，我放心。”

张霞这句话，惹得毛泽东和张军笑得前合后仰。

真毛评“假毛”

陪毛泽东玩了一通电脑，张霞说：“主席，电脑的字大小了，看起来大费劲。还是来点轻松的——看VCD吧。”

“什么VCD？”不言而喻，毛泽东又一回遭遇“新生事物”。

张霞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的问题，而是反问毛泽东：“主席，刚才那个出租车司机说的那句话，‘这位老先生长得真像古月’，为什么叫我笑痛肚皮？”

毛泽东说道：“这话有什么好笑的？‘古月’者，大约那人姓胡。”

张霞答道：“没错。那人本姓胡，就用‘古月’作为自己的艺名。现在，古月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影星。我给你看古月的VCD，你既明白了

什么是‘古月’，也明白了什么是VCD。”

张军也觉得孙女的主意非常有趣：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请毛泽东评论“毛泽东”！！

张霞从VCD碟架上，挑选了许多“毛泽东”的VCD。大约由于张军如今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缘故，所以他家关于毛泽东的VCD，差不多应有尽有。

张霞解释说：“老早看电影，得上电影院。现在，电影、电视剧都可以印制在光盘上，这种光盘就叫VCD，在家里就能着。还有更先进的，叫DVD，清晰度比VCD更高。这些，都是有关你的电影、电视剧的VCD，你喜欢看哪一部？”

张霞把一大堆VCD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简直看花了眼睛：

《少年毛泽东》、《青年毛泽东》、《开天辟地》、《日出东方》、《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长征》、《西安事变》、《重庆谈判》、《钟山风雨》、《大决战》、《走出西柏坡》、《开国大典》、《开国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与他的儿子》、《毛泽东与他的乡亲们》、《毛泽东与斯诺》……

毛泽东惊叹道：“这么多呀！如果再拍两部，一部叫《毛泽东的诞生》，一部叫《毛泽东之死》，那就从头到尾都全了！”

毛泽东随手拿起那张《开国大典》VCD，说道：“先看看这一部吧。”

张霞把《开国大典》碟片放进书房里的VCD机里，顿时电视机上就出现“开国大典”四个大字。

毛泽东道：“这VCD，其实也就是小电影嘛！”

张军说道：“主席说得很对。只不过电影拷贝很贵，而VCD碟片很便宜，所以VCD现在很普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VCD机，都能在家里看电影。”

正说着，屏幕上出现字幕：“毛泽东：古月饰”。

毛泽东明白了：“原来古月其人，是专演鄙人的演员。”

张霞说：“这叫‘特型演员’。”

毛泽东说：“我看过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那些电影里就有专门演列宁、演斯大林的特型演员。”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屏幕上出现了“毛泽东”——古月饰演的毛泽东。

看着“毛泽东”在那里抽烟，在那里双手叉腰，在那里讲“湖南话”，毛泽东大笑不已：“古月讲的湖南话，那是‘湖南普通话’一点都不像我说的湖南话。还有，他老是用双手叉着腰，好像我毛泽东的腰有毛病似的。你看，他怎么老是抽烟，一天下来，要抽多少支烟？他老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怕把皮鞋的鞋底磨坏了？”

毛泽东边看边评头论足，惹得张军、张霞笑弯了腰。

不过，毛泽东在对古月的表演挑剔了一番之后，倒也这么说：“古月此人，确实有几分像鄙人。”

张霞当年虽然没能报考电影学院，但是对影视界一直非常关心，“超级影迷”一个。她向毛泽东讲起了古月其人：

“主席，在那么多中国人当中，挑选跟你相象的人当特型演员，并不容易。电影制片厂派人找遍大江南北，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有的人的脸有点像你，可是个子矮小，不行；也有的人个子高大，脸不像你，又不行；还有的人，脸型、个子都还可以，却不会演戏，也不行。古月本来是部队的文化科长，喜欢画画，也能写点诗，但是压根儿没有演过戏。他长得像你，个子也高，在一九八〇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发现，就把他的照片送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去。叶帅一看，就说很像主席，马上下了调令，批准古月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演员。这样，古月成了扮演你的‘专业户’，古月在二十一年里，在八十三部影视剧中扮演你！古月沾了你的光，名气很大，所以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古月。”

毛泽东说道：“那司机数祖忘典，本末倒置。不是鄙人像古月，而是古月像鄙人！”

张霞继续说道：“现在，古月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被人团团围住，要求跟‘毛主席’合影。古月呢，也总是用湖南话向人们打招呼：‘同志们好！’‘人民万岁！’”

毛泽东笑道：“这个‘冒牌货’，居然这么神气活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那个‘毛’，是依附在我这张‘皮’上的。”

看完《开国大典》，张霞特地挑了电视剧《长征》，放给毛泽东看。

出现《长征》片头字幕：“毛泽东：唐国强饰。”

毛泽东问：“怎么换了一个‘毛泽东’？”

张霞说：“古月主要演中年后期以及晚年的你，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有点发胖。唐国强演中年的你。”

毛泽东屈指一算：“长征的时候，我四十二岁。”

屏幕上出现头戴八角帽、一身灰军装的毛泽东，面颊消瘦，目光炯炯。

毛泽东边看边评论：“这个‘毛泽东’，没有古月那么像我。还有，这个‘毛泽东’怎么讲起普通话来？”

张军这时解释说：“这是因为电影、电视里的‘毛泽东’、‘刘少奇’总是讲湖南话，‘朱老总’、‘邓小平’讲四川话，老百姓说听不懂，所以后来都改说普通话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领袖们是应该带头讲普通话。可惜，‘乡音难改’，我怎么也学不会普通话。毛、刘、周、朱之中，要算周恩来的普通话说得最好。”

张霞向毛泽东说起了唐国强：“唐国强本来是青岛话剧团的演员。他的样子有几分像你，所以在一九七六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把他从青岛调到北京，想让他当毛泽东特型演员。可是，试了几次镜头，觉得不算太像。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找到了古月，从此古月成了中国演毛泽东的‘第一人’。这时候，唐国强跟女演员张瑜、刘晓庆主演电影制《小花》，获得‘百花奖’，一炮走红。后来，他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

演诸葛亮，又在电视剧《雍正皇帝》中扮演雍正……”

毛泽东说道：“此人既当‘军师’，又当‘皇帝’，怎么又来演我这个‘革命领袖’呢？”

张霞作为一个“超级影迷”，居然能够对答如流：“唐国强的妻子叫杜丽，担任电视剧《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副导演。她劝唐国强来演毛泽东。唐国强记起二十年前他就曾经要演毛泽东，未能如愿，这一回一定把这个机会补回来。《开国领袖毛泽东》播映之后，很受欢迎。于是，唐国强又在电视剧《长征》里演毛泽东。”

毛泽东说：“此人演我，神似多于形似，也演得不错。张军，你的意见如何？”

张军道：“唐国强跟古月，各有千秋。”

毛泽东笑道：“你可以改行去当影评家。”

张霞告诉毛泽东，《长征》这部电视剧，总共有二十多集，从头到尾要放一整天。不如在看了第一集之后，改看描写中共“一大”的电影《开天辟地》，电影里的青年毛泽东，是一位青年演员扮演的。

毛泽东当即赞成。毛泽东说：“我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讲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我从湖南来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二十八岁，风华正茂。”

屏幕上出现《开天辟地》片名之后，出现字幕：“毛泽东，王冀饰。”

毛泽东说：“此人的姓是中国的大姓，而名字却是僻字。”

张霞问道：“主席，这‘雨’下面写个‘英’字——‘冀’，念什么？什么意思？”

毛泽东深谙中国古文，当即解释说：“‘冀’，也念英，雪花之意。唐玄宗写过一首《喜雪》，其中就有一句‘云密冀飘’，就是说浓云密布，飘起了雪花。此人也许出生于大雪纷飞的冬日。”

屏幕上出现王冀饰演的青年毛泽东，穿一身灰布长衫，一头中分长

发，英气勃勃。

毛泽东评论道：“此人倒是有几分像我年轻的时候。”

张霞说：“当时有二十三人前去应试，只有王冀最像，从此他成了演青年毛泽东的‘专业户’。电影《毛泽东在一九二五》也是他主演的。”

当屏幕上出现杨开慧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评论是否像杨开慧，而是情绪黯然，不胜唏嘘，大约是电影勾起了他对杨开慧的回忆。

一个上午，毛泽东看了一九二一年的《开天辟地》，一九三五年的《长征》，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毛泽东沉醉在往事的追忆之中。

毛泽东是一个最善于总结、概括的人，笑道：“今天，我荣幸地认识了‘三毛’——青年毛泽东王冀，中年毛泽东唐国强，晚年毛泽东古月。”

就在这时，传来“小放牛”的声音：“主席，有请！”

乔装打扮毛泽东

“小放牛”忙了一上午，忙着在厨房“展现”自己的“手艺”。

“小放牛”是上海人，做了一桌“海派”菜：油炸大明虾，松鼠大黄鱼，清蒸海螃蟹，凉拌海蜇头，糖醋带鱼，芹菜墨鱼，还有一大盆三鲜汤……此外，她还特地炒了一大盆鲜红的朝天椒。

入座之后，张军指着这一桌“海派”菜，对毛泽东说道：“‘小放牛’是属猫的，在海边长大，专爱吃鱼腥。”

“小放牛”随口唱起了《沙家浜》：“一日三餐有鱼虾。”

张军将了“小放牛”一军：“你要知道，主席是湖南人，并不喜欢你那‘海派’菜。”

这时，毛泽东指着餐桌上那一大盆朝天椒说：“菜不在多，有辣则灵。”

“小放牛”说：“我知道主席的名言是‘不辣不革命’。张军也是‘辣椒派’。平时在家，我也专门给张军炒一盆辣椒，备一碟辣酱。不过，我这个上海人，怎么也吃不惯辣椒。”

张军说：“江西人是不怕辣，四川人是辣不怕，我们湖南人是怕不辣。”

毛泽东一听此言，说起了关于辣椒的笑话：“想当年，在长征行军途中，休息时无事，我曾经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出过一道关于辣椒的智力测验题。我说，猫不吃辣，你们有什么办法叫猫吃辣？刘少奇想了一下说，把猫抓住，往它的嘴巴里灌辣椒，不就行了吗？周恩来想了一下说，猫喜欢吃鱼，用辣椒烧鱼，猫肚子饿了，不得不吃鱼，也就把辣椒吃进去了。我说，你们两个都不及格。刘少奇的办法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周恩来的办法犯了诱骗的错误。他们两个倒过来问我，你说该怎么办？我说，办法很简单，把辣椒酱抹在猫的屁股上，火辣辣的，猫不好受，就用舌头把屁股上的辣酱全部舔干净了！”

毛泽东关于辣椒的笑话，把张军一家逗得笑个不停。

张军笑罢说道：“主席向来是个幽默派。”

毛泽东这时说：“子曰：‘食不语’。我今天违反了孔老夫子的教导。不过，已经有好多年，我没有享受这样家庭气氛的聚餐。真该谢谢‘小放牛’，做了这么一顿好菜。但是，我要宣布纪律，下不为例。如果还是这样把我当客人，我就回到那个‘纪念堂’去！”

“小放牛”当即表态：“遵照主席指示，下不为例。”

这时，张军说道：“主席，今天晚上我在饭店请您吃饭。饭店里人来人往，您很容易被别人认出来，那就不好办了。”

没等毛泽东说话，“小放牛”就提出自己的建议：“主席，我是文工团员出身，后来到剧团担任化妆师，我给主席化一下妆，比如沾上络腮胡子，人家就认不出来了。”

“好，好，‘小放牛’的主意不错。”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上午看VCD，那个唐国强能够演中年毛泽东，粘上胡子就成了诸葛亮、雍正

皇帝，我何不过一回演员瘾。这么一来，我不光是能够出去吃饭，还能像普通百姓那样泡茶馆、游公园、逛商场，自由自在，其乐无穷。”

吃完中饭之后，张霞去“收拾残局”——洗碗，而李芳则拿出化妆工具箱，着手为毛泽东设计化妆方案。她的手很巧，在测量了毛泽东前额的资度以及下巴的宽度之后，用勾针勾制头套和胡子套。她说，为毛泽东设计的化妆方案力求简便，朝头上一套或者往下巴一粘，几分钟之内就化妆完毕，便于他随时可以出门。

这时，毛泽东感慨颇多：“想当年，我的轿车路过北京新街口时，见到一家羊肉泡馍店，我已经好多年没吃过羊肉泡馍，就要求下车去吃。起初，我的机要秘书高智说什么也不同意。经我软磨硬顶，总算同意跟我一起进泡馍店。没想到，我才吃了一碗羊肉泡馍，一抬头，发现已经有几十个人里三层外三层把我团团围住，几十双眼睛在盯着我！从那以后，‘组织上’硬性规定，再也不允许我‘擅自’外出吃饭。你们别以为我当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有多风光，其实，我的行动一点也不自由，无法享受一个普通百姓的乐趣。过去的皇帝也自叹‘黄圈圈里头有个大圈圈，大圈圈里头有个小圈圈’，那紫禁城就是‘黄圈圈’，皇帝一辈子就只能生活在圈圈里面。当年，乾隆皇帝就多次冲出‘黄圈圈’，三游江南。好在那时没有报纸，没有电影，没有多少人认得乾隆皇帝，所以他只消脱下龙袍，换上便服就行。我就没有乾隆皇帝那么方便，报纸上三天两头登我的照片，连天安门城楼上都挂我的相片，我一出去，就给别人认出来，所以很难走出‘黄圈圈’。”

“小放牛”道：“主席，我一定帮助你走出‘黄圈圈’。”

毛泽东欣然说道：“化妆师。我随你摆布，爱怎么化妆，就怎么化妆。那回，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北京看我，我请他抽中华牌香烟。我指了指他的高鼻子，又指了指自己的脸说，我的脸属于‘中华牌脸’。他问我，‘中华牌脸’有什么特征？我说，我的脸，最容易‘适应环境’。比如，给我安上个高鼻子，我就跟你一副模样。你就不行。你那高鼻

子，没办法用刀削成我的鼻子的模样。可见，‘中华牌脸’有许多优点。今天，我这张‘中华牌脸’要发挥自己的优点，变成什么模样都行。”

李芳用勾针勾制着头套，张军在一侧看热闹。张霞收拾完“残局”，跑过来跟奶奶学手艺。

这时，毛泽东提醒说：“一出这个家门，你们就不要再叫我主席了。”

张霞赶紧说道：“大家统一口径，叫‘文老’，或者‘文先生’、‘文老师’，因为主席的母亲姓文。”

毛泽东则说：“今后，我也得改一下口，我在外面不能叫张军为‘小张’了，就叫‘老张’吧。本来，叫张霞‘小张’是很恰当的，可是我发现我喊一声‘小张’，张霞跟她爷爷一起答应，看来我还是按照你们的叫法，叫她‘小霞’。”

这时，李芳插嘴道：“我呢？在外面，还叫我这老太婆‘小放牛’？！”

张霞道：“那就叫‘张太太’呗。”

毛泽东连连摇头：“听上去比镇江醋还酸！还是叫‘老李同志’吧。”

张霞笑道：“主席，现在不时兴叫‘同志’啦。在出租车上，你那句‘谢谢同志们’，连司机都笑话你。”

“我真想不通，叫‘同志’有什么不好？！连国民党也都互相叫‘同志’。孙中山死了，他的遗像两边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难道我们共产党还不如国民党？”这一回，毛泽东似乎有点动气了。

李芳打圆场说：“没关系，就叫我‘老李同志’，或者干脆叫‘老李’吧。”

在统一了“口径”之后，李芳把头套以及胡子都织好了。

这时，李芳故意制造了一种“神秘感”，要张军和张霞暂时退出，

五分钟之后再进来。

五分钟之后，当张军和张霞进来时，简直认不出坐在那里的老人：一头黑白掺半过耳长发，一脸络腮胡子，那胡子正好把毛泽东下巴上那颗痣遮掉了。

李芳问：“你们看，他像是什么身份的人？”

张军说：“画家。”

张霞说：“指挥家。”

毛泽东问：“为什么看上去像画家、指挥家呢？”

张霞说：“现在，男画家、男指挥家，都流行留长发，艺术家的风度嘛。比如说，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就留长发；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陈燮阳，也留长发。”

毛泽东忽然问：“书法家留不留长发呢？”

张霞抓了抓头皮：“书法家留不留长发，我倒没注意。不过，书画同源，男画家既然留长发，男书法家也应当是留长发的。”

毛泽东说：“我不能装画家，万一人家要我画几笔，岂不丢人现眼？我也不能装指挥家，我连‘豆芽菜’——五线谱都不识，岂不露馅？我说自己是书法家，千真万确。凭我的字，当个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绰绰有余。”

张军、李芳、张霞齐声鼓掌：“我们向别人介绍你时，就说是著名书法家，这最符合你的身份和气质。”

毛泽东笑道：“不错。”

张霞问：“叫什么名字呢？”

毛泽东说：“叫文润之吧，我本来字润之。”

张霞：“主席，现在流行互相交换名片，你作为著名书法家，不可没有名片。我用电脑为主席制作名片。”

没一会儿，张霞用电脑制成一叠名片，上面写着：

文润之

（书法家，教授）

通讯处：北京万寿路888小区06号

宅电：010—65098878

毛泽东一看，连声说：“好，好。”

穿上最时尚的唐装

“小放牛”给毛泽东乔装打扮毕，兴高采烈。她说：“主席这个样子出门，谁都不会认出来。”

张霞把毛泽东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看出了“破绽”：“主席，你这身银灰色中山装虽然做工考究，可是已经落后于时代，只配给古月演戏的时候用用。现在，很少有人穿中山装。”

张霞的话，提醒了“小放牛”。她一打量，也觉得毛泽东穿这身中山装，大不合时宜。

张军说道：“那就给主席买一身西装吧？”

毛泽东不喜欢穿西装。他一辈子都没有穿过西装。他借口道：“书法家穿西装写字，太不方便了吧！”

还是张霞的脑瓜子反应快。她说：“给主席穿唐装，最有书法家的风度！再说，自从APEC会议在上海开过以后，唐装成为中国最时髦的服装，最合潮流。”

毛泽东听不懂什么“APEC会议”，也不明白唐装怎么会在中国忽然流行起来，只是这时候也来不及问了。

“化妆师”赞成张霞的主意，说道：“主席穿唐装，确实很符合书法家的身份。张军就有好几套唐装，快拿来。”

张军苦笑道：“不是我小气。我的唐装，主席怎么穿得下？”

张霞记起来了：“去年大年夜，爸爸到爷爷这里吃年夜饭，穿了一身唐装。不小心，辣酱沾在袖口上，他脱下来，我给他洗了，现在还挂在爷爷的衣橱里。爸爸的身材跟主席差不多，那唐装一定合身。”

张霞去张军的衣橱里拿来了她父亲的蓝色唐装，毛泽东一穿，果然

合身！

张军和李芳一看，齐声叫好。

毛泽东从小就穿惯对襟中装，他一穿这身对襟唐装，倒也习惯。不过，他一照镜子，却以为这缎子面的唐装太“豪华”。他问张军一家：“你们看，我穿了这衣服像谁？”

他们仨齐声说：“像个书法家。”

毛泽东却说：“像个大地主！”

毛泽东的话，逗乐张军一家。

张霞又给毛泽东找来一条灰色的长围巾，还找来张军的一顶紫红色法兰西无沿圆帽。张霞说：“主席，班长给你的那顶海虎绒军帽，跟书法家的身份不协调。现在，中国的影视导演，十有八九戴这种无沿帽，艺术家也喜欢戴。”

虽说张军比毛泽东矮小，帽子倒相差不大，毛泽东戴上去正好。张霞本以为，毛泽东也许不喜欢这“洋气”的无沿帽。不料，毛泽东却说：“一九四五年八月，我乘飞机从延安飞往重庆，跟蒋介石谈判的时候，我就戴了一项法国的拿破仑帽。所以，我跟法国帽还是有缘的。”

这时，张霞又想起，班长给毛泽东的那件重大衣，当然也跟书法家的身份“不配套”。张军拿出了他的一件黑色呢大衣，虽然显得短了一点，勉强还能对付。

张霞笑道：“口罩就免了，不戴口罩人家也认不出主席了。”

解决了化妆问题，又解决了服装、帽子、大衣问题，张霞一看手表，才下午二时半。

张军问毛泽东，要不要上楼休息一下。毛泽东却说：“何不乘此良机，走出‘圈圈’，自由自在一番！”

“好，好。”张军说，“我们全家一起陪您出去。您喜欢去哪里？”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道：“去琉璃厂吧。那个地方字画多，古玩多，我特别喜欢那里的字帖。过去，我没法走出‘圈圈’，只好叫秘书

田家英三天两头替我去那里买字帖。这一回，能够自由自在逛琉璃厂，乃人生一大乐事。再说，琉璃厂那里热闹，老百姓多，我早就想在人堆里听听他们说什么，听听他们侃大山。

张军笑道：“琉璃厂向来是文人墨客最喜欢去的地方，这也最合书法家的身份！”

这一回，不必再“打的”了，因为张军是正部级干部，配有专车。不过，张霞以为，多了一个司机在场，毕竟不方便，干脆由她来开车。

“小丫头，你也会开车？”毛泽东感到意外。

张霞说，会讲英语，会用电脑，会开车，这“三会”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基本功”。

张霞告诉毛泽东，她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学会开车的。美国是一个生活在车轮上的国家。在美国不会开车，等于没有腿。

张霞回国之后，因为有美国驾照，所以很容易就拿到了北京驾照。张霞的父母各有一辆“私家车”。张霞的父亲要给张霞买车，张霞却说不必，因为张霞的母亲胆小，平常不大敢开车上街，母亲的那辆车就经常由张霞来开。所以，张霞的驾车技术还算不错。

毛泽东听说张霞的父母有两辆“私家车”，感到不解。他已经注意到张霞父亲“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只是这时候不便于直说。

张霞到了父亲的车库，没一会儿，就开来一辆枣红色的轿车。这辆轿车比毛泽东清早乘坐的“夏利”出租车要高大得多，座位也宽敞得多。

毛泽东没有见过这种轿车，问道：“这轿车什么牌子？”

“桑塔纳。”张军说。

“要么叫红旗牌，要么叫东风牌、上海牌，这轿车怎么会叫‘桑塔纳’？”毛泽东问。

张霞对于汽车很在行。她告诉毛泽东，那辆“夏利”出租车是天津生产的低档车。“夏利”是国产车，“夏”是“华夏”的意思，“利”是“吉利”的意思。“桑塔纳”是上海生产的。这种轿车是

中国现在最普通的中档轿车，比“夏利”高一个档次，是上海跟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合资生产的，“桑塔纳”是德国轿车的牌子。

“这完全违背独立自主发展我国工业的方针！”这一回，毛泽东终于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在毛泽东看来，跟德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合资生产轿车、轿车的牌子又是用德国的，这显然又是一种“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尽管当年毛泽东乘坐的轿车，是苏联赠送的，但苏联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那是斯大林作为礼品赠送的。

张军此时只得沉默以对。他明白，无法用三言两语向已经“隔世”二十多年的毛泽东说清楚眼下的一切。

张军拉开“桑塔纳”前座右侧的车门，像纪念堂那位班长一样，用一只手扶着毛泽东，另一只手挡在车门上方，以防毛泽东的头撞在车门上。张军多年工作在毛泽东鞍前马后，熟知如何照料毛泽东。张军知道，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总是坐在后座右位，因为这一座位最安全：后座比前座安全，右座比左座安全。在遭遇意外袭击时，总是前座先受攻击；在遭遇车祸时，两车交会总是在左侧。不过，这一回张军安排毛泽东坐在前排右座，是考虑到前排能够看景色，这对于已经“长眠”二十多年的毛泽东来说实在大需要了；再说，毛泽东经过化妆，人家已经看不出是“伟大领袖”，也就不会遭遇意外袭击，坐在前排也无所谓。

张军让毛泽东坐好之后，关上前车门，然后和李芳一起坐到后座。张军嘱咐张霞道：“开慢点，开稳点，注意交通安全。”

毛泽东的运气不错，这天北京是个大晴天，一丝云彩也没有。

好天气给毛泽东带来好心情。上了车之后，毛泽东已经不再嘀咕“资本主义倾向”了，他恢复了诗人本色，说道：“《左传》中《文公七年》有过这么一句：‘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左丘明以冬日比喻赵衰，以夏日比拟赵盾，可谓别出心裁。所以杜预对此句加注曰：‘冬日可爱，夏日可畏。’今天，正是‘冬日可爱’哪！”

张军一家，只有张军听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

张霞驾车驶出小区，沿着万寿路，进入宽敞的复兴路，往东直奔长安街，又在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张霞“兜远路”，为的是让毛泽东在大白天，好好看一下今日的东、西长安街，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尽管在今日凌晨，在一片黑暗之中，毛泽东曾经要求出租车司机在天安门广场绕行一圈。

毛泽东对张霞让他“检阅”北京城，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张霞这位“秘书”最能够体会一位“隔世”老人的心情。

毛泽东的双眼在来回细细“扫描”，以浓厚的兴趣观看车窗外的一切。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急切地想知道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何等模样……

第三章 走出圈圈

目击百姓百态

北京城就像一幅最精彩的当代《清明上河图》长卷，在车窗外徐徐展开。毛泽东在浏览着，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之中，毛泽东最熟悉的就算是北京了，尽管在他的晚年，他喜欢呆在杭州或者长沙。他在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直到一九七六年“长眠”，大部分岁月都在北京度过。

对于北京，毛泽东的回忆和感叹实在太多，尤其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幕——“文革”，跟北京息息相关。

“文革”之初，毛泽东扎营杭州。他斥骂北京是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盘根错节”的“修正主义堡垒”。他“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拉开大幕，矛头直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他利用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炮轰”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打开了缺口。直到北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他突然回到了中南海，坐镇指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真正的对手——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在打倒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毛泽东把林彪确立为自己的接班人。

在打倒了林彪之后，毛泽东一度选择来自上海的“造反司令”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毛泽东不满于王洪文，又起用了在江西“闲居”的邓小平。

毛泽东又不满于邓小平，最后把最高权杖交给了华国锋。

一九七六年，在苦风凄雨之中，北京送走了周恩来，接着送走了朱

德，最后又送走了毛泽东。

毛泽东“安安静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里，一躺就是二十多个春秋……

毛泽东发觉，短短二十几年间，熟悉的北京变成了陌生的北京。作为北京的“老土地”，毛泽东几乎不认识眼前的北京了。

二十几年间，北京迅速“长”高了，到处是高楼大厦。大楼的玻璃幕墙在冬日闪闪发亮，显得格外夺目。特别是处处皆绿草，遍地是鲜花，北京显得非常漂亮。往日的北京，冬天一片灰蒙蒙的，如今的北京却五彩缤纷，充满生气。

他注意到，许多商店的招牌，写着英文。他不明白那写着红底黄字、硕大无比的“M”的餐馆门口，长椅上为什么坐着一个红鼻子的小丑？

他也不清楚，写着“KFC”的饭店前，为什么挂着一个戴眼镜的、长着山羊胡子的外国老头的画像？

除了天安门城楼上那幅毛泽东画像依旧之外，往日挂着他的画像的地方，如今被抹着口红、披着长波浪的影星们的倩影所取代。张霞如数家珍般介绍着那些当红明星的大名，什么“巩俐、赵薇、周迅、章子怡、林心如、刘嘉玲、韦唯”，毛泽东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本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斗私批修”、“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致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红底白字标语，在北京城铺天盖地。如今，这些标语早就不翼而飞，无处可寻。满目所见，是彩色缤纷的巨幅广告：“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今年二十，明年十八”、“人靠衣装，美靠亮妆”、“想喝就喝三得利”、“中华汾酒，源远流长”……

毛泽东见到，在路边行走的女人，个个描眉，涂口红，戴耳环，衣服艳丽，一派“资产阶级情调”。想当年，“文革”岁月，中国的妇女

只穿蓝、黑、灰三色，完全是“无产阶级本色”。

毛泽东见到，在路边行走的男人，十有八九系着领带，很多人西装革履，“全盘西化”。就连警察，居然也系领带。当然，其中也有男人穿着唐装，在阳光之下，那缎面闪闪发亮。想当年，“文革”年代，中国男人们最“革命”的服装，是草绿色的军装，最“流行”的鞋子，是解放军胶鞋。

毛泽东见到，在路边行走的军人，戴着大盖帽，“扛”着大肩章。在“文革”年月，就连他这样的中央军委主席，也只戴一顶有着红五星的军便帽，穿一身只有两块红领章的军服。元帅与普通士兵的服装是一样的。毛泽东想，他从来没有下过恢复军衔制的命令，这种象征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制度什么时候又死灰复燃？

只有走在路边的孩子，个个系着红领巾，还是当年的模样。不过，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校服，一队队走过来，是那么的整齐，充满朝气。他们背着双肩书包，是毛泽东所没有见过的。

车过美容店门前，毛泽东指着上面的大字广告“负离子烫”、“游离子烫”，问张霞是怎么回事？

张霞学医出身，对于化学也很在行。即便这样，她也说不清楚烫发跟“负离子”、“游离子”之类化学名词有什么瓜葛。

毛泽东见张霞也答不上“负离子烫”、“游离子烫”，也就不问那上面写着的“化学纹眉”、“人造酒窝”之类了。

毛泽东注意到，街上的轿车比“文革”时节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北京显得那么繁华。戴着“TAXI”顶灯的出租车满街跑。漂亮的、挂着外国品牌标志的豪华轿车，比比皆是。毛泽东偶尔看到一辆车头有着红旗牌标志的轿车，发觉样子跟当年的“大红旗”截然不同。透过车窗，见到一位时髦女郎在开车，旁边坐着的男孩怀里抱着一只小狗。毛泽东想，只有部长级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乘坐红旗牌轿车，那女郎跟男孩怎么可以坐红旗牌轿车？

毛泽东注意到，在长安街上，一幢用大理石装饰的豪华大厦，上面

居然挂着“证券公司”金字招牌。毛泽东说道：“当年，蒋介石就在上海的证券公司里买空卖空，投机倒把。这种资本主义的垃圾，怎么丢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北京来了？”

在一个路口遇上红灯，轿车停了下来。毛泽东看见路边有个书报亭，挂满各种最新杂志，十有八九的杂志封面，全是娇丽的女人头像，有的甚至是“三点式”。毛泽东叹道，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什么时候占领了宣传阵地？中宣部部长怎么对此视而不见？”

“主席，不，文老，您看够了吗？”张霞问道。

“小霞，以后再慢慢看。”毛泽东答道。

北京街头五花八门的景象，百姓百态，令毛泽东眼花缭乱，一时还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初进北京城时，毛泽东常常有着这样坐在轿车里观察北京的机会。后来，在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后，在北京进行了一项规模宏大的秘密工程——建设北京城的地下交通系统。从中南海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毛家湾一直到西山，有了宽敞的四车道的地下通道。从此，毛泽东出行，轿车总是从地下隧道行进。这么一来，虽然非常安全，可是他再也没有机会从车里“浏览”北京。他本来就被死死地锁定在中南海那“黄圈圈”里，那样子连隔着车窗玻璃看百姓的机会都没有了！

面对北京二十多年间翻天覆地的巨变，毛泽东不由得记起“老祖宗”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天等于二十年。”至于二十年等于多少，毛泽东虽然凭心算还算不出来，他却觉得走出“圈圈”是何等的必要。

这时，毛泽东又记起另一“老祖宗”列宁的一句名言：“走出彼得堡！”当年，列宁鼓励文化人走出彼得堡，去民间呼吸新鲜空气。这一回，毛泽东算是呼吸到民间的新鲜空气了。

张霞驾车朝宣武区开去，来到毛泽东向往已久的琉璃厂。

一进入琉璃厂，人头攒动，车子连连被堵。好不容易找到个停车的地方，第一个跳下车的是张军，他帮助毛泽东打开车门，扶着他下车。

就在这时，一个姑娘走上前来，要把一张纸头塞给毛泽东。

李芳赶紧把那姑娘截住，从姑娘手里接过花花绿绿的纸头。

毛泽东问：“老李，是‘文革’传单？是中央首长讲话？”

李芳摇头说：“文老，是房地产广告！”

李芳说着，就要把那花纸头扔进了垃圾箱。毛泽东却把李芳截住，把那花纸头塞进唐装口袋，说道：“带回去研究研究！”

从“雅贿”说到腐败

步入琉璃厂，那感觉跟刚才在东、西长安街上行走完全两样，仿佛从洋溢着现代化气息的北京，一下子倒回当年的六朝古都。

毛泽东的兴致比刚才高多了，因为他经过乔装打扮，居然可以在拥挤的人群中自由穿梭，犹如一名普通京城百姓，这是他从未有过的快感。

北京的琉璃厂，和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齐名。就古色古香、浓郁的地方特色而言，这三个地方是共同的。然而，北京琉璃厂那浓郁的文化气氛，则是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不能相比的。

位于和平门的琉璃厂，是一条拥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文化街，素有“九市精华萃一衢”的美誉。晚清建筑风格的店铺，在这里鳞次栉比。

说实在的，虽然琉璃厂在北京家喻户晓，可是喜欢逛琉璃厂的人，其中大都是文人雅士，隔三差五要上这里，当年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都是琉璃厂的常客；不爱去的人去过一回就不再想去了。张军一家属于后一类。毛泽东则显然属于前者，只是他往日被“圈”在中南海，无法亲自光顾这里，只能派秘书田家英前来这里。就连毛泽东盖章所用的印泥，也是田家英从琉璃厂买到的清朝皇宫用的八宝印泥。每当田家英从琉璃厂回去之后，说起在这里见到什么古书名画，毛泽东的眼望便露出羡慕的目光。这一回，能够如此自在地逛琉璃厂，对于毛泽东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如愿以偿。

张军一家都是好多年前来过琉璃厂的。他们只记得，琉璃厂有两大名店：一是百年老店“荣宝斋”，专售历代名人字画；一是中国书店，乃中国最大的古旧书店。此外，依稀记得这里有诸多文物商店和小摊，出售历代古币以及古代竹器、木器、牙雕、瓷器、玉器、中式家具之类。

然而，眼下琉璃厂今非昔比，比往日大多了。以琉璃厂文化街为中心，“东方古玩艺术大厦”和“新世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作为两大标志性建筑，把东、西琉璃厂一线向南、北扩展。规模宏大的新建的“文化遗产书店”，成为中国规模最大、门类最全、品种最多、服务最广的一家现代化的中华传统文化类书籍的专营店，成为琉璃厂的一艘“古文化航空母舰”。

毛泽东漫步在如此繁华的琉璃厂，对张军一家说：“往日北京流传民谣：‘东城贵，西城富，宣武破。’东城贵，因为当年北京东城是达官显赫聚居之处；西城富，则因为北京西城是富贾巨商聚集之所。宣武门这一带是贫民窟，又旧又破。今日琉璃厂这么辉煌，宣武再也不破了！”

毛泽东在琉璃厂街心汲古阁茶楼，见到一把两米大的茶壶，兴趣盎然。在荣宝斋店堂内，见到一方硕大无朋的“端砚王”，乐不可支。这巨砚长三米，宽二米，重达四吨，号称“中华第一砚”。

毛泽东对那家“文化遗产书店”情有独钟。这家书店集中了历代珍稀典籍。在一楼展示大厅里，从数千年前的钟鼎铭文、石刻文字的拓片，到千余年来的写本、刻本，还有各种稀见珍贵报刊、照片、契约、地图、公私书牘、碑帖、字画等，应有尽有。

其中，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观看中国书法杰作“宋代双绝”原作。此时此刻，毛泽东仿佛成了现场的“解说员”，对张军一家说：“所谓‘宋代双绝’，是指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和南宋大书法家张即之。张即之抄录了苏轼的大作，成了‘双绝’。”

毛泽东叹道，往日只看到过影印的“宋代双绝”，今日得见原作，

欣喜万分。

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用四个字来形容自己的收获：“大饱眼福”。

毛泽东告诉张军一家，琉璃厂文化街之所以繁荣，得益于两部史书的编撰。一是康熙时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二是乾隆时编撰的《四库全书》。在这两部书的编撰期间，大批的学子纷纷带着书籍进京，住在前门外的会馆里。琉璃厂成为他们购书、售书和看书的最佳去处，使琉璃厂的书市空前繁荣起来。

张军一家打心底里佩服毛泽东的学识。张霞道：“文老，原本今天我是‘导游’，现在颠倒过来了，从来没有到过这里的你反而成了‘导游’！”

“其实，我刚才讲的编《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还只是促成琉璃厂繁荣的一个原因。如果我当琉璃厂的导游，一定要向游客讲一讲琉璃厂繁荣的黑幕，给大家敲敲警钟！”毛泽东说。

张军一家当然对这“黑幕”很感兴趣。

毛泽东说，清朝的官场十分腐败，每到“三节两寿”，下级都要给上级送礼。所谓“三节”，就是春节、端午和中秋这三大节日；所谓“两寿”，就是上级官员和官员夫人的生日。

毛泽东说，清朝官场一方面腐败，一方面又要装模作样“查贿”。赤裸裸地送银子，毕竟太张扬了。于是，有人就“发明”了“雅贿”：下级官员们来到琉璃厂，来到字画店，说清楚要送多少银子的礼，字画店老板就给了一张多少价格的字画。于是，下级官员就拿着字画去上级官员那里送礼，这就显得很文雅。上级官员收到字画之后，派管家持字画到琉璃厂，从字画店兑回银子。琉璃厂的字画店老板，从中收取了手续费。这么一来，琉璃厂的字画生意，也就倍加兴隆。

张霞听罢，告诉毛泽东，清朝官场的“雅贿”，居然也“古为今用”！腐败，在今日中国官场也相当严重。

张霞说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六日，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

体会议，选举成克杰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个成克杰就是大量接受“雅贿”的大贪官。

张霞告诉毛泽东，成克杰也是湖南人。他家庭贫苦，但是从小喜欢书法。小时候，常常用卖萝卜换来的钱，买了从常德到长沙的汽车票，带着自己的书法作品向长沙书法名家求教。后来，成克杰当官，逐步升级，一九八六年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他手握大权，就用权换钱。不过，他的受贿与众不同。那些有求于他的贿赂者，请他题字，然后给了一笔巨款作为“稿费”。他大量接受这种“雅贿”，终于东窗事发，走上不归路……

毛泽东听罢张霞所讲的当代“雅贿”故事，不胜唏嘘！

毛泽东很深刻地说：“当年国民党失败，外因是我们的连续打击，内因就是腐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清除腐败，党将不党，国将不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当我得知天津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犯有严重贪污罪行，尽管他们都是‘红小鬼’出身，我仍亲自批准执行枪决，并由此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毛泽东接着说：“我对于贪污是深恶痛绝的。我当时就说，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刘青山这名字取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说，这样的大贪污犯，就不能让他‘留得青山在’！”

张军补充道：“您当时下令枪决张子善、刘青山，被人们称为中国反贪‘第一枪’。前几年，又枪决了大贪污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被人们称为中国反贪‘第二枪’。枪决大贪污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人们称为中国反贪‘第三枪’。不过，大贪污

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还没有枪决，与他同案的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身亡。另外，在十个省级主要干部中，都查出了严重贪污罪行。现在，反腐败的形势不容乐观。”

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在夺取全国政权前，我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和预防在‘糖衣裹着的炮弹’前打败仗……”

张军没想到游琉璃厂，会从书法、书画引出毛泽东这番沉重的话题。他想，毛老人家好不容易走出“圈圈”，还是应当让他保持愉悦的心态。

正说着，他们一行来到“阅微草堂”真迹前。毛泽东告诉张军一家，这是清朝大学士纪晓岚所书。

张霞一听纪晓岚，马上就说：“我知道纪晓岚，有一部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就是写这位大学士的。影星张国立饰演纪晓岚。”

毛泽东被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四个字深深吸引，赞赏纪晓岚书法的不凡功力。毛泽东伸出右手食指，在左掌心比比划划，在那里模拟纪晓岚的笔法，流连忘返。

就在这时，一位长髯老者也穿一身唐装，翩然而至，上前向毛泽东施礼，说道：“先生如此钟爱纪晓岚书法，想必是当代书坛俊杰。”

毛泽东当即还礼道：“在下只是略爱此道而已，尚未入门。请教先生尊姓大名？”

长髯老者答曰：“区区乃纪家后人。”

毛泽东道：“原来是纪老先生。在下文润之。”

这时，张霞上前，向纪老先生递上“文润之”名片。

纪老先生一看，名片上面印着“书法家、教授”，笑道：“果真是当代书坛名流！”

纪老先生也赠名片给毛泽东，名片上面印着：“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琉璃厂文化遗产书店顾问纪山风。”

毛泽东道：“‘山风’即‘岚’也，有幸拜识大学士纪晓岚传人。”

纪老先生对毛泽东说道：“既是同行，请到敝室略坐。”

于是，毛泽东一行随着纪老先生，来到二楼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桌椅皆红木，古色古香。毛泽东一行刚坐定，便有“Office”小姐前来，给每人送上一盅菊花盖碗茶。

“纪老，请问刘际唐先生还在琉璃厂？”毛泽东问道。

“文先生认识刘际唐先生？”纪山风反问。

“刘际唐先生乃琉璃厂的‘杂志大王’，你只要说出某种杂志，他就可随口说出该杂志何人主编、何处出版、共出了多少期和创刊及终刊年月。我过去听朋友田先生多次谈及，可惜无缘拜识。”毛泽东所说的“听朋友多次谈及”，这“朋友田先生”其实就是他的秘书田家英。

“可惜，刘际唐先生已经不在此处。”纪山风答道。

“郭纪森老先生呢？他是琉璃厂首屈一指的古籍版本学家、书行元老。我过去也多次听朋友田先生谈及，也未曾拜识。”毛泽东道。

“郭纪森老先生倒仍在琉璃厂当顾问，只是不巧，最近回河北老家。”纪山风说，“看来，文先生对琉璃厂如此熟悉，一定是常客。”

“不，不，我虽久居北京，今日却是第一次来到琉璃厂。正因为这样，刚才一见大学士纪晓岚真迹，就反复揣摩。”毛泽东照实道来。

毛泽东此言，引起了纪山风的猜疑。他想，这位文先生既然久居北京，又是书法家，况且对琉璃厂的情况那么熟悉，怎么可能此前没来过琉璃厂？再说，他也久居北京，对于北京的书法家了若指掌，却从未听说过有个名叫“文润之”的书法家？！

纪山风问毛泽东道：“先生可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毛泽东答道：“非也。”

纪山风又问毛泽东道：“先生可是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

毛泽东又答道：“非也。”

毛泽东接连两个“非也”，加重了纪山风对面前这位书法家的疑

心。

“毛派”书法大师

纪山风开始试探面前的这位书法家文润之。

纪山风说：“文老先生久居京城，听口音却是湖南人氏。”

毛泽东道：“纪老先生所言正是。在下早年千里迢迢从湖南前往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此后浪迹四海，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定居北京。”

纪山风说：“在下毕业于北京大学，彼此可谓校友。在下自幼主攻魏体，从《衡方碑》入手，继而《张迁碑》、《史晨碑》、《华山碑》、《礼器碑》、《西狭颂》、《石门颂》，浸淫弥深；汉碑那精整干练的线条，雄浑开张的气象，令我着迷。我朝夕揣摩，寒暑不辍，遂以魏体为本。不知文老先生师从何家何派？”

纪山风故意讲了一大堆书法“术语”，以“测试”文老先生能否讲出书法“行话”。

毛泽东道：“在下不像纪老先生，终生爱魏体，‘从一而终’。我的一生起伏多变，我的字也多变。我早年习楷书，中年习行书，晚年习草书。我年轻时，在湖南湘乡东山书院，常临摹东晋王羲之《十七帖》，也常去观摩附近东台山凤凰寺所藏清代湘乡书法家萧礼容碑。我也推崇北魏《张猛龙碑》、《杨大眼造像》的劲健精整。正因为自幼喜爱书圣王羲之，所以后来定居北京，听我的朋友田先生告知，琉璃厂有王羲之的草书拓本，便托他买来观赏。”

纪山风一听，这位文老先生确实对书法在行。

毛泽东接着说道：“那时候，学书法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

纪山风道：“‘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此言甚好。”

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我的一位青年朋友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得清乾隆时期刻印的《三希堂法帖》两卷，送我。我如获至宝，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我一直把这两卷《三希堂法帖》带在身边。稍有空闲，就仔细捉摸《三希堂法帖》中晋书法家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殉《伯远帖》的书法。”

由于不便暴露真实身份，毛泽东没有说明他是在延安得到这两卷《三希堂法帖》，也没有说明那位青年朋友是从东北的废墟中千里迢迢把两卷《三希堂法帖》带到延安。

毛泽东继续说道：“从一九四九年定居北京之后，我才得以‘神游书海，目览千帖’。我最爱王羲之、王献之这‘二王’以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亦爱独树一帜的宋徽宗的‘瘦金体’法帖。后来，我着重草书，以怀素的‘狂草’为师。怀素是唐朝名僧，湖南长沙人氏，我的大同乡。怀素继承并发展了唐朝张旭的狂草，后人称之为‘颠张狂素’。我对《怀素自叙帖》、《论书帖》、《苦笋贴》，百读不厌。怀素的草书，行行透迤、翩翩恣肆，独成一派。不过，我虽‘师从’怀素，但是绝不拘泥于怀素。在我看来，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上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

毛泽东还说起舞蹈与狂草的关系。他说：“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一诗的序言中写及：‘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杜甫这段话，说出了舞蹈艺术与书法艺术息息相通。所谓‘触类旁通’，便是此意。”

毛泽东又说：“我的书法意境，追求飞走流往之势，惊竦峭绝之气，滔滔闲雅之容，卓犖调宕之志，不衫不履，浑然天成。”

纪山风道：“我研究书法数十春秋，从未听说文老先生这等高论，孤可谓别出心裁，见解独到。”

毛泽东的谈兴越来越浓，他说起自己的“书法三律”：

“第一是写字要懂辩证法。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

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

“第二是字要骨神兼备。人有相貌席骨扁神，字也有相貌、筋骨、神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就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所谓筋骨，是字的形貌、气势和力量；所谓灵魂，是字的内质、神韵。古人的字，一般地说，北碑尚骨，南帖尚神。我主张骨神兼备。

“第三是既广采博取，又独具风格。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

毛泽东概括道：“我的书法所追求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

听毛泽东一席谈，纪山风打心底里佩服！

纪山风道：“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文老先生这‘书法三律’，可以奉为书法界的金科玉律。”

毛泽东连忙道：“不敢当，不敢当。先生是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在下连普通会员都不是，只是‘关公面前舞大刀’而已，见笑见笑。”

纪山风真诚地说：“文老先生绝非等闲之辈。如蒙不弃，请文老先生向北京书法家作两次学术讲座，讲座题目就叫《论怀素》和《论“书法三律”》。”

毛泽东还是那句话：“不敢当，不敢当。”

纪山风道：“好在文老先生名片上有府上电话及地址，改日一定登门求教。”

接着，纪山风拿出上好宣纸，敬请毛泽东留下墨宝。纪山风亲自为毛泽东磨墨。

毛泽东抬头望了望窗外，略加沉思，一挥而就，写下龙飞凤舞的四

个大字：“冬日可爱。”

写毕之后，毛泽东题了落款：“文润之”。

纪山风到底是行家，一看这字，抚掌而道：“文老先生的字，纯属毛体！”

纪山风这话，使张军一家吃了一惊。张军心想：毛泽东经过乔装打扮，虽然别人已经看不出来，然而毛泽东的字，却叫人一眼就看出来！

想不到，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解嘲道：“我师从怀素之后，发现毛泽东的字比怀素更胜一筹，于是又学毛体，甘当毛泽东的弟子！”

纪山风是个精细之人，在端详了毛泽东的落款之后，说：“文先生的名字，也与毛泽东的字‘润之’相同，而且文先生的签名，‘润之’两字非常流畅，那‘文’字显得生硬。”

纪山风这话，又使张军一家吃了一惊。

毛泽东倒很镇静，解释说：“正因为我崇尚毛泽东，所以取‘润之’为笔名。”

毛泽东这么一掩饰，居然也就“混”了过去。

张军生怕“言多必失”，催毛泽东起身。

不料，纪山风一把拉住毛泽东，一定要请他在琉璃厂吃晚饭。张军再三解释，已经另有宴请，纪山风只得作罢。

纪山风对毛泽东说：“今日拜识薄颜，真是三生有幸。”

纪山风拉开抽屉，取出一大叠百元大钞，递给张军。纪山风说：“这是文老先生墨宝薄酬，务请笑纳！”

张军推托再三，无奈纪山风说这是“规矩”，是“按照规定办事”，而且是“按照一般标准付酬，难为了文老先生”。

张军不得已，只好替毛泽东收下这“薄酬”。

百元大钞上的毛刘周朱

出了琉璃厂的“文化遗产书店”，天色已黑。华灯灿烂，霓虹灯闪

耀着五彩光芒。

毛泽东一行上了车，关上车门，车里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声频率最高的，要算是在旁当了一下午“观众”的“小放牛”。

笑毕，张军道：“主席，今天好险，差一点露出马脚！”

张霞则说：“幸亏主席自称书法家，货真价实，就是给北京市书法家协会讲课，也一定滔滔不绝。如果说是画家或者音乐指挥家，那就成了‘冒牌货’。”

张军把纪山风刚才送上的“薄酬”数了一下，整整二十张一百元的人民币，递给毛泽东：“主席，你的一个字，值五百元，四个字两千元！”

毛泽东笑道：“见笑，见笑，还不够‘一字千金’的水平呢！小张，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我向来不摸钱，不管钱。这钱就由你留着，今晚由我请客。”

张军连忙说：“今晚由我‘买单’，早就说定。”

毛泽东不明白什么是“买单”，说道：“你把那人民币给我看看，现在怎么会有百元大钞？我那时候，最大面额的人民币是十元。”

张军把一张红色的百元大钞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正面印着毛泽东头像，说道：“怎么把我的画像印在钞票上面？”

张霞解释说：“这是世界惯例，美金上印着美国国父、开国领袖华盛顿的头像，卢布上印着列宁头像。”

当毛泽东把那张红色百元大钞还给张军时，看见张军手里还有青色的百元大钞，又要拿过来看。

毛泽东一看这青色的百元大钞，正面印着他、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人的头像。毛泽东先是震惊，继而愤怒：“刘少奇是中国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叛徒、内奸、工贼，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已经作出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现在，怎么把他的头像印在千千万万人使用的人民币上？！这简直是翻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张军知道，这又是一道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难题。他的办法是保持沉默，以便在毛老人家对于二十多年来的巨变有了更多感性的认识之后，再向他说明。

张霞见到毛泽东满脸不高兴，启动了轿车，并打开车内的CD机，于是，车内响起歌星刘欢演唱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主题歌，“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张霞问张军：“爷爷，去哪里？”

张军对于晚宴原本一直“保密”，这时才揭开谜底：“毛家饭店！”

张霞一听，说道：“绝了！”

毛泽东听不明白那“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歌，也不明白什么“茅家饭店”，此时没有作声。车子一开动，流光溢彩的北京夜景从眼前移过，毛泽东也就从刚才关于刘少奇的不快阴影中走出来。

眼前的北京，车水马龙，正处于下班高峰，同时也是“塞车高峰”。反正毛泽东不赶路，轿车开几步、停几步，反而使他有机会更加细致地浏览街景。

毛泽东注意到从身边开过的公共汽车，比过去漂亮、宽敞多了，有的车头上闪耀着红字：“空调车”。

毛泽东问：“公共汽车都装‘空调’？”因为在毛泽东那年代，连他都没有享受过空调！

张霞答道：“有的装，有的不装。装空调的公共汽车，夏天开放冷气，冬天开放暖气。但空调车的车票贵一些。”

毛泽东对什么事都喜欢“调查研究”。一路堵车，毛泽东一路“调查研究”：“普通公共汽车的车票多钱？空调车的车票多钱？”

这时，张军“回忆对比”说：“主席，您那时候，北京的公共汽车车票按照车程远近分为五分、一角、一角五分、两角四种。现在公共汽车的票价一般是一元、一元五角，空调车两元。”

毛泽东说：“车票差不多涨了十倍！车票是一个物价标志。照这么

说，这二十几年之中，物价也差不多涨了十倍？！”

“小放牛”这时说话了：“差不多是这样。我天天跟柴米油盐打交道，对物价最清楚。大米，七十年代一角多一斤，现在二元多一斤——跟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买米不用粮票了。鸡蛋，过去一角多一斤，现在二元多一斤，肉，过去七角一斤，现在瘦肉七元多一斤。不过，现在蛋票、肉票、糖票、油票、肥皂票、香烟票、布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电视机票，什么票都取消了，只要一种票——钞票！”

毛泽东关切地问：“物价涨了十来倍，怪不得那时候的大钞是十元，现在的大钞是百元。物价这么高，你们的工资够用吗？”

“小放牛”说道：“工资也涨了。老早我每个月工资七十多元，现在在我的退休工资都八百多。张军的退休工资加上这个补助费、那个津贴费，每月两千多元！”

毛泽东笑道：“这么说，你们都成了大富翁！那时候，我的工资，算是很高的了，每个月四百零四元八角人民币，还不如‘小放牛’你这退休老太婆呢！”

张霞很惊讶：“主席，你的工资每月才四百零四元八角人民币呀！”

毛泽东说起了自己家庭的开支：“我很忙，没时间管家里的开支，请管理员吴连登代管。我们家除了我的工资收入之外，我的那口子——江青的工资先是一百二十元，后来增加到三百多元。我每月要交党费十元，房租、水电费加起来要八十多元，吃饭要一百元左右，还有三个人由我负担——李敏、李讷，还有江青的姐姐。他们每个人的生活费先是十五元，后来增加到三十元，除此之外，孩子们的车费和营养费，还有许许多多杂费，也都是从我的工资里面支出。这样一来，我一个月的工资，到了月底就差不多花光了。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吴连登就给我写了一个报告，请求提取我的部分稿费来补贴家用，我在报告上画了圈，我们家维持了一阵子。过些日子，又不够用，吴连登再写报告，我再画圈。还好，那时候出版《毛泽东选集》，我有稿费。要不，我们家

入不敷出，到月底要喝西北风！”

张霞说：“主席，在今日中国，‘知识就是财富’。像主席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大书法家，大笔一挥，四个字就是二千元，比当年的唐伯虎还厉害！”

毛泽东笑道：“我记得，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原话是‘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怎么变成‘知识就是财富’了呢？”

张霞道：“‘知识就是力量’，那力量一发挥出来，不就创造了财富？所以，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时兴说‘知识创造财富’，‘知识就是财富’。我们都觉得邓小平说的那句话很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毛泽东不以为然：“对知识分子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要尊重的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要改造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我在一九五七年发动‘反右派斗争’，就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

张军一听，发觉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个话题，不能再谈论下去。他发觉，相差这二十几年，从思想观念而言，毛泽东也有着严重的“隔世”之感。他们与毛泽东之间，往往三言两语，就会发生观念上的明显差异，就会爆发争论的火花。他倒并不怕争论，而是希望在出席晚宴之前，能够让毛泽东有一份好心情。

这时，轿车开开停停，终于来到宽阔的长安街，也就不像刚才那样堵车了。他岔开了刚才的话题，对毛泽东说：“主席，您还是头一回遇上堵车吧。”

毛泽东道：“嗯。那时候我出去，前面有警车开道，所以从未体验过堵车之苦。后来，有了地下通道，我的车在地下走，更是通行无阻。看来，当领导的，要像普通百姓一样生活，才能知道普通百姓的疾苦。我遭遇堵车只有一回，那是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乘车检阅时，我的红旗牌轿车被潮水一般涌过来的红卫兵堵在广场中央。经过中央警卫团奋力开导，这才好不容易从围堵中驶出来。”

张霞说：“北京的车子多，每到上、下班高峰，市中心天天这样堵车。只有在二环线、三环线、四环线，全封闭，立体交叉，这才不堵车。”

毛泽东没听说过“二环线”、“三环线”、“四环线”，也不明白什么“全封闭”、“立体交叉”。

轿车从长安街向北转弯之后，车速又慢了下来，再度陷入堵车之中。

就在这时，前方出现两串鲜红的霓虹大字：“毛家饭店”！“韶山毛家菜”！

张军对毛泽东说：“主席，今晚我就在那里请您！”

这时，毛泽东觉得奇怪：“我们毛家，什么时候开起饭店？我们韶山，哪有什么‘毛家菜’？”

闻所未闻“毛家饭店”

在张军的带领下，毛泽东踏进了这家闻所未闻的“毛家饭店”。

一进店堂，便觉得与众不同：店堂里只有红白两色。除了白墙之外，护墙板、地板全是红色。

店堂正中安放毛泽东半身塑像，墙上挂着毛泽东诗词手迹和毛泽东不同历史时期的大照片。最醒目之处，挂着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回到故乡韶山时，与乡亲们合影的巨幅照片。

张军是这里的常客，熟门熟路。一进门，他就说起了湖南话。他告诉毛泽东，这里的服务员，全是“湘妹子”，都讲湖南话。

“毛老板呢？”张军对一位“湘妹子”说。

“毛老板，有人找——”湘妹子一声清脆的呼喊之后，一位中年妇女应声而出。

“张老呀，今天包房全部爆满。幸亏你事先打电话预订、要不，就只能坐大堂了。”这位毛老板说话干脆利落，眼里透着精明的目光，她

已经到了该“发福”年龄，却仍保持苗条的身材。

张军向毛老板介绍毛泽东说：“这位是文老先生，著名书法家。”

“欢迎文老先生光临！”毛老板用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对毛泽东说。

“谢谢！”毛泽东跟毛老板握了握手。

一听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毛老板马上用湖南话说：“哦，湖南老乡，听得出，不是长沙人，是我们湘潭人。”

真厉害，这毛老板只听毛泽东的“谢谢”两个字，就居然断定他是湘潭人。毛泽东的脑海里，不由得记起样板戏《沙家浜》里的那个阿庆嫂。

“毛老板，你的生意很不错嘛。”毛泽东说。

“全靠毛主席他老人家呀，使‘毛家菜馆’生意兴隆。”毛老板说着，把毛泽东领到那帧巨幅照片前。

这时，毛老板像一位展览会的讲解员似的，指着照片上跟毛泽东握手的妇女说：“这是毛主席老人家回到故乡韶山的时候，跟我母亲握手的照片。我的母亲是毛主席的亲戚。现在，我的母亲已经去世。”

她说着，又指了指照片上那妇女手中抱着的一个三岁女孩说：“这就是我，我也姓毛，是毛主席的亲戚。”

大约毛老板在这张大照片前不知作过多少次同样的解说，所以讲得非常流畅。

毛泽东虽然认识照片上那跟他握手的妇女，那是他的一位远房亲戚。照这么说，眼前这位阿庆嫂式的毛老板，也该算是他的远房亲戚。虽说很难断定照片上的小女孩就是这位女老板，但是从毛老板的脸跟照片上那妇女十分相似，倒是可以断定她确实是那妇女的女儿。

站在一侧的“小放牛”显得很高兴，因为毛泽东就站在这位毛老板跟前，她居然认不出眼前的文老先生就是毛泽东，足见化妆是非常成功的。

“你怎么会当起老板呢？”毛泽东问。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们韶山人也转变了观念。”毛老板说起话来，像做报告似的，“我们韶山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韶山成了中国的旅游胜地，大批游客前来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游客们大都早上从长沙来，中午到韶山，傍晚回长沙。这样就需要在韶山吃中饭。我想，饭店到处都有，我要开一家具有毛主席家乡特色的饭店——毛家饭店。毛家饭店一开张，生意格外红火。托毛主席的福，我这老板越当越大，开起了连锁店，在长沙，在北京，在全国各地，都开起了毛家饭店……”

毛泽东听了“报告”，这才知道毛家饭店的来历，毛老板的来历。

毛老板做完“报告”，带着客人们进入“雅座”——包房，这才离去，因为她又要接待新的客人，又要做“报告”。

理所当然，张军一家让毛泽东坐上座。刚坐下，毛泽东却站了起来，不愿坐。张军不解，毛泽东指了指上座正对面，贴着一张毛泽东画像。毛泽东觉得对着自己的画像吃饭不舒服，便换到背对画像的座位坐下。这时，本来坐在下座的张霞，换到了上座。

刚刚坐定，就听见毛泽东的声音：“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抬头细看，这才发现墙上挂着电视机，正在播放关于他的VCD。

张军一家大笑。

紧接着，又是毛泽东在说话：“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接下去，播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起初还有点新鲜感，不久就皱起了眉头，把手一挥：“叫服务员把VCD关掉！”

张霞连忙叫来了“湘妹子”。“湘妹子”说：“这是我们毛家饭店的‘经营特色’，是为了创造一种‘走近毛泽东’的气氛！”

“湘妹子”的话，叫毛泽东哭笑不得：“走近毛泽东？！”

不过，她还是遵命把VCD关掉了。

然而，这时候，从店堂里的大音箱传出来嘹亮的歌声：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不言而喻，这又是为了创造“走近毛泽东”的气氛。好在张军和“小放牛”听这歌，勾起“回首当年”的“怀旧情绪”，而张霞则有若闻所未闻的新鲜感，所以大家对这“革命歌曲”也就“听之任之”，只是把包房的门关上，让歌声音量变得小一点。在《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东方红》、《浏阳河》、《毛主席来到咱农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一曲又一曲，不断在播放着。

接着，“湘妹子”送来一本红色封面的“毛家菜菜谱”，张军当即交给毛泽东，请他点菜。

在中国各大菜系之中，从未听说有“毛家菜”，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是头一回看这“毛家菜菜谱”。

毛泽东打开“毛家菜菜谱”第一页，见到上面印着：“最高指示：不辣不革命。”

在这“最高指示”下面，有一行注释：为了适应不同顾客的口味，本店的菜可分为“微辣”、“中辣”、“辣”、“极辣”四等，请向服务小姐说明自己的“辣级”。

毛泽东看了，不由得噗嗤一笑。

毛泽东翻阅着“毛家菜菜谱”，他发现，其实大体上也就是湘菜菜谱，故弄玄虚冠以“毛家”之名。

毛泽东见到菜谱上写着“腊肉”，说这是湖南的“传统菜”。毛泽东喜欢吃腊肉，理所当然列入“毛家菜”。当年毛泽东去北京时，就给

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教授送去腊肉。虽说别的地方也有腊肉，但是湖南的腊肉在风干之后，还用火焙，吃起来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毛泽东见到菜谱上写着“红烧肉”，觉得奇怪，难道这也算是“毛家菜”？

“湘妹子”解释说：“因为毛主席最喜欢吃红烧肉。毛主席以为红烧肉‘补脑子’。所以红烧肉就列入‘毛家菜谱’”

毛泽东看到菜谱上有一道菜叫“江山一片红”，不解何意？

“湘妹子”说：“其实，这就是湘菜剁椒鱼头。鱼头上的红辣椒放得特别多，象征着‘祖国江山一片红’！毛主席一直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希望早日实现‘祖国江山一片红’，所以这道菜列入‘毛家菜’。”

“毛家菜谱”上居然还写着“武昌鱼”。毛泽东同样不解。

“湘妹子”又解释说：“这‘典故’出自毛主席的《水调歌头·游泳》，其中有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表明毛主席喜欢吃武昌鱼。凡是毛主席喜欢吃的菜，都列入‘毛家菜谱’！”

毛泽东问：“你们这里供应‘长沙水’吗？”

“湘妹子”答非所问：“我们这里只有矿泉水，没有‘长沙水’。”

毛泽东道：“‘才饮长沙水’嘛，‘毛家饭店’怎么可以不供应‘长沙水’呢？”

这“湘妹子”的脑子实在不会“急转弯”，居然说：“我向老板反映您的意见。”

“湘妹子”出去找毛老板，包房里一片笑声。

没一会儿，毛老板进来了，手里拿着好几瓶矿泉水，那矿泉水的牌子竟然是“长沙水”。

毛老板说，前几天她回了趟湖南。从湖南回北京时，带了在长沙买的几瓶矿泉水，供火车上喝。后来改乘飞机，这几瓶矿泉水就没喝。文老先生既然喜欢家乡的“长沙水”牌矿泉水，就送您喝吧。

毛泽东拿过矿泉水一看，那商标上印着毛体“长沙水”三字，显然是从他的《水调歌头·游泳》手稿上“克隆”下来的！

毛泽东要喝长沙水原本是戏言。他万万没想到，他的一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会使长沙的矿泉水公司以“长沙水”作商标，而“毛家饭店”会把武昌鱼列入“毛家菜谱”！这种“活学活用”，使毛泽东充分感受到今日中国浓厚的商业气息。

毛泽东翻看了“毛家菜谱”之后，还是交给张军，让他来点菜。

最先上的，照例是冷盘。冷菜虽然简单，却是正宗的湖南味。就连臭豆腐干，也与众不同，是从湖南运来的。至于辣椒，更是正宗的湘椒，辣而爽口。

一吃这几碟冷盘，毛泽东就仿佛回到了湖南老家。

“毛家菜”的烹饪都很简单，要么炒，要么蒸，所以上菜很快。

毛泽东很有兴味地吃蒸腊肉，剁椒鱼头；

毛泽东也津津有味地吃着红烧肉，清蒸武昌鱼；

毛泽东居然大口大口地喝起“长沙水”。

看着毛泽东吃得那么投入，张军显得非常得意，朝“小放牛”瞟了一眼。因为他毕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所以深知毛泽东生活习惯、饮食特点。

辣椒一吃，热气上窜，毛泽东摘掉了那顶法兰西无沿帽子，脱掉了唐装。毛泽东的座位虽然背对着画像，但是无意之中，正好让毛泽东跟他背后的画像相对照。那位毛老板进进出出，那精明的目光发现这位“文老先生”跟画像上的毛泽东非常相像！

“文老先生，您是毛主席的……”毛老板问道。

“毛主席的母亲姓文，文老先生是毛主席母亲的远房亲戚。”张军赶紧解释。

“怪不得文老先生酷似毛主席！”毛老板指着墙上的画像追问道，“文老先生是毛主席母亲的什么亲戚？湘潭哪里人？听口音，像是我们韶山人！”

看样子，在“毛家饭店”又一次遭到琉璃厂那样的“险境”。

张军倒有急智，他转移目标道：“文老先生是著名书法家，可以为贵店题字。毛老板，你去准备宣纸、毛笔。”

毛老板终于被张军打发走了。

关上了包房的房门，毛泽东与张军一家相视而笑。好在饭局已近尾声，张军悄声说：“此地不可久留！”

毛泽东穿好唐装，戴好法兰西无沿帽，毛老板就进来了，说是已经在经理室备好纸、笔，请文老先生到经理室挥毫。

毛泽东来到经理室，见到书柜里除了陈列着整套《毛泽东文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之外，还放满“文革”期间出版的各种各样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一玻璃柜里，则放满大大小小各种毛泽东像章。

毛泽东提起毛笔，挥就四个大字：“独树一帜。”

当毛泽东在题写落款时，本应写“文润之”，谁知那多少年养成的习惯使他写下了“毛”字。在他正要写‘泽东’两字时，突然醒悟，随即在“毛”字之后写上“家饭店存念”，然后再补上“文润之”。

张军一家在侧，会心互笑，佩服毛泽东随机应变的能力。

毛老板虽然不懂书法，但是懂得“独树一帜”这四个字的含义，当即说：“明天就把文老先生的墨宝送去裱好，然后挂在店堂正中。”

这时，张军找“湘妹子”买单。谁知“湘妹子”却说：“那位老先生已经付过了。”

张军问毛泽东，毛泽东摇头：“我身无分文，什么时候付过？”

这时，毛老板笑了：“文老先生这四个字，就是饭钱！”

毛泽东一行告别了毛老板，出了大门，上了车。关好车门之后，车内又是爆发一片大笑声。

张霞说：“主席这四个字，哪里只值一顿饭钱？！”

张军却说：“看来，万万大意不得！今天在琉璃厂和毛家饭店，都发生‘险情’，主席差一点被人认出，今后可得加倍注意呢！”

第四章 书房夜读

五次选定接班人

从毛家饭店回到万寿路张寓，已经是晚上九时。

张霞把轿车在车库放好之后，已经支撑不住，因为她已经一昼夜未合眼。张军和“小放牛”上了年纪，忙了一天，也感到劳累。尽管如此，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年已八旬，更需要马上休息，便为毛泽东铺好被子，放好洗澡水。

谁知毛泽东却说，他不累。他习惯于夜读。他请“小放牛”帮他“卸妆”之后，便打发张军一家早早休息，尤其叮嘱张霞赶紧休息。

张军深知毛泽东嗜书如命，尤爱在夜深人静之际，遨游书海。于是，他安排张霞和“小放牛”在楼下卧室歇息，自己陪着毛泽东上楼，来到那间专门藏书的书房。

那间书房的四壁，全是书橱，全是书，起码有一、两万册。张军喜欢买书、藏书、读书，是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所受的影响。书房里放着一对沙发，张军与毛泽东正好隔着茶几对谈。张军给毛泽东沏了一杯龙井茶，而他自己则习惯于喝红茶。

张军对毛泽东说：“主席，您在中南海颐年堂书房里的书才多呢！我这里的书，跟您相比，太寒碜了！”

张军记得，从颐年堂院中的东门拐进去，第一个房间就是毛主席的藏书室，里面并排两列三十六个大书橱，装满了经史子集、诸子百家的线装古籍以及中外的哲、经、史、文学、艺术、科技、报刊等各类图书。西厢房是毛主席的书房，南、北、西三面是紧挨着的玻璃书橱，东窗下有一张单人沙发和一个小茶几，毛泽东常常喜欢一个人在这里静静地读书。

张军的藏书，不像毛泽东那样方方面面都有，他的藏书集中于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政治图书，因为他后来一直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研究员。然而，张军的这些藏书，恰恰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因为毛泽东急切想了解在他“长眠”之后，中国的政治变化，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变化。

在张军的书柜里，毛泽东见到一大排中共中央文献选集《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十四大以来》、《十五大以来》。毛泽东问：“十六大开了没有？”

张军道：“就要开了。”

毛泽东屈指算道：“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在我‘长眠’的这二十多年里，开了五六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对于中共党史，烂熟于胸：“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到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前，召开过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一大到五大，总书记是陈独秀。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强调应该由工人出身的人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于是水手出身的向忠发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接着说：“从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七六年我‘长眠’，这四十年是我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工作。中共七大是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从一九二六年的中共六大到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整整相隔十九年！”

毛泽东历数中共七大以来的历届党代表大会：

“中共七大是我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

“中共八大是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

“中共九大是林彪作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

“中共十大是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

张军接过毛泽东的话，继续说了下去：

“中共十一大是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修改党章报告。

“中共十二大是胡耀邦作政治报告，赵紫阳作修改党章报告。

“中共十三大是赵紫阳作政治报告，李鹏作修改党章报告。

“中共十四大是江泽民作政治报告，李鹏作修改党章报告。

“中共十五大是江泽民作政治报告，朱镕基作修改党章报告。

“中共十六大是胡锦涛作政治报告，温家宝作修改党章报告。”

毛泽东发觉与张军的对谈，富有历史感。他们在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等于勾勒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来的发展史、领袖史。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华国锋、叶剑英之后，胡耀邦、赵紫阳也还是他很熟悉的干部。在毛泽东时代，胡耀邦长期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而赵紫阳则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胡耀邦、赵紫阳之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都是毛泽东眼中的“陌生面孔”。

毛泽东向来非常重视接班人问题。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斯大林的教训。斯大林是在去世前不久，才匆忙确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后来，赫鲁晓夫取马林科夫而代之，集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权于一身。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使毛泽东异常震惊。毛泽东为了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很早就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

一九六一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问起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蒙哥马利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蒙哥马利又问。

“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泽东答道。

毛泽东又说起斯大林的教训：“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不同意蒙哥马利元帅所称的“继承人”，而是采用“接班人”一词。

毛泽东后来对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辉说起跟蒙哥马利的谈话：

“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毛泽东还说：

“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一九五六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接班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毛泽东所说是“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当时已经选定刘少奇为接班人。

在中共“七大”之后不久，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便请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从一九四五年直至“文革”爆发，近二十年的时间，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只是后来由于毛泽东以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文革”打倒了他。

于是，毛泽东第二回选择了林彪作为接班人。

在一九六九年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以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作政治报告。甚至在中共党章中，破天荒地规定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一九七一年爆发的“林彪叛国事件”，很使毛泽东失望，他不得不第三次选择接班人。

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王洪文为接班人。王洪文的资历当然无法跟刘少奇、林彪相比，但是这位“造反司令”在“文革”中曾轰动全国。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毛泽东很快发现，王洪文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

于是，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以邓小平为接班人。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否定“文革”，这是毛泽东所无法接受的。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二次打倒了邓小平。毛泽东第四次选择接班人又告失败。

于是，毛泽东又面临第五次选择接班人。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步入风烛残年。他第五次指定接班人时，已经十分匆促。

在毛泽东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确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嘱咐”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还有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在说了这番“临终嘱咐”之后两个多月，就“长眠”到“毛主席纪念堂”里去了。

二十几年之后，当年毛泽东以为只有“天知道”的问题，却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他的面前。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还要通过“调查研究”，以求了解今日中国的接班人——那些“陌生面孔”，是否执行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否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否“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不满“右倾翻案”

毛泽东在张军的书柜里，见到两厚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卷，问道：“三中全会？哪一届的三中全会？”

张军答道：“是指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太重要了，太有名了，所以一提起这次会议，大家都简称为‘三中全会’。尽管‘三中全会’这一提法很不准确，因为不光是历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都差不多开过‘三中全会’，而且许多民主党派的历届中央委员会也开过很多‘三中全会’，但是现在一说‘三中全会’，谁都明白是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干部们作报告，一开口就会说，‘自从三中全会以来’；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也都常说‘自从三中全会以来’；我现在出去作中共党史讲座，也开口闭口‘自从三中全会以来’……”

“请你这位中共党史专家给我讲讲，这十一届三中全会究竟怎么重要？”这时，毛泽东仿佛成了张军的“学生”。毛泽东急于补上最近二十几年的空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在被称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张

军说道，“遵义会议确立了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转折点、里程碑。”

毛泽东听罢，默不作声。他似乎不能接受把邓小平与他相提并论，当然也就不能接受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跟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毛泽东说：“这就是说，华国锋成了‘博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邓小平所取代。”

张军答道：“华国锋正式提出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并得到全会的同意。但是，实际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领袖就是邓小平了。”

毛泽东一听就明白“名义领袖”与“实际领袖”之间的区别，因为当年在遵义会议之后，“洛甫”——张闻天取代了博古。整整八年，中国共产党名义领袖是张闻天，而实际领袖是毛泽东。直到一九四三年，毛泽东才正式成为中共中央主席。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贡献，在于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所谓‘一个中心’，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所谓‘两个基本点’，也就是‘改革、开放’。”张军继续说道。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就是邓小平的路线！”毛泽东“点穿”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质”。当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所向，正是邓小平的这一路线。不过，如今毛泽东已经无法再发动那样的“革命”，那样的“运动”了。

毛泽东又问：“你刚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这‘新时期’指什么时期？”

张军答道：“现在，大家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

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毛泽东听罢，很坦率地对张军说了两个“出乎意料”：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四人帮’，在我‘长眠’之后会闹事，会被打倒，这是我预料之中的。‘四人帮’太不得人心。不过，我没有想到，在我‘长眠’之后不到一个月，他们那么快就被抓起来，出乎意料！”

“华国锋为人忠厚，能够忠诚不渝地执行我的路线，但是他的政治经验不丰富，主持全面工作能力不够。我担心过他会像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那样，稳不住阵脚。不过，我没有想到。在我‘长眠’之后两年，华国锋就支撑不住，下了台，出乎意料！”

毛泽东在书柜里见到《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见到《邓小平文选》。

张军取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张军念了起来：

“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我们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张军告诉毛泽东，邓小平这样概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

“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听罢，表示同意，说道：“邓小平的这一概括是正确的。”

张军接着引述邓小平关于中国共产党形成第二代领导核心的见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段话，毛泽东默不作声。

张军又说，邓小平是这样评价华国锋——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毛泽东不明白什么是“两个凡是”。

张军说，“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执政的理论核心。

张军解释说，“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出来的，后来由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发表：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毛泽东一听，说道：“‘两个凡是’好得很呀！我挑选华国锋作为我的接班人，就因为他坚持‘两个凡是’！”

张军却说：“邓小平坚决反对的，就是‘两个凡是’！导致华国锋下台的，正是‘两个凡是’！批判华国锋，主要就是批判‘两个凡是’！”

毛泽东这时显得有点不平静：“反对‘两个凡是’，其实就是反对我！”

张军见到毛泽东不悦的表情，便细细加以说明：“主席，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无法复出，因为‘批判右倾翻案风’是您的批示；按照‘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就无法平反，彭德怀、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六十一人叛徒案’、邓拓、吴晗等等冤案都不能平反，刘少奇也无法平反，因为这些大案都是您亲自定下来的。”

毛泽东有些忿忿，说道：“我当年说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一

点也没错吧！果真，他重新上台之后，就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翻天安门事件的案，翻彭德怀的案，翻‘彭、罗、陆、杨’的案，就连刘少奇的案，他也敢翻——怪不得，现在的百元人民币上，印着刘少奇的头像。一句话，邓小平翻了‘文化大革命’的案！怪不得，邓小平要批判‘两个凡是’，要批判华国锋，其实就是要批判我！”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我说过，我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倒蒋介石，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我也说过，对于打倒蒋介石，没有多少人持异议，而对于‘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果真，在我‘长眠’之后，反对派占了上风！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他做得对。我绝对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绝对不允许为刘少奇翻案！”

看到毛泽东这么激动，张军不再说下去了。他知道，要毛泽东一下子想通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他劝毛泽东还是早点休息。

毛泽东却毫无睡意。他长期以来，习惯于深夜工作。他反过来劝张军早点休息。

张军想，让老人家一个人在那里看点书，静静地思索，也许更好些。这样，他在给毛泽东添了热茶之后，下楼去了。

在张军下楼之际，毛泽东叫住了他：“小张，我要有言在先。”

张军止住了脚步，问道：“主席，什么事？”

毛泽东道：“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不动笔墨不看书’。我看书的时候，在你的藏书上圈圈点点，你不介意吧？”

张军高兴地说：“主席圈点过的书，将来可以送博物馆保存，成了‘文物’，是我张军的荣幸呢！”

颂毛与批毛

在张军下楼之后，书房里只有毛泽东独自一人。

灯下，毛泽东随手翻阅着书柜里的书。他见到一本《评毛泽东和毛

泽东思想》的书，便取下看了起来。

这本书里有着对于毛泽东的各种各样的评价，有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各种各样的评价。大约不仅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外国人也习惯于在一个人去世之后评价他的一生。这本书中的评论，大部分是在毛泽东“长眠”之后发表的。毛泽东为自己能够读到这样的书，特别兴奋，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重返人间”阅读人们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恐怕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

毛泽东首先读到的是两位美国总统的评价。

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美国总统卡特说：“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用“博士”的语言评论毛泽东的：“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毛泽东读到了法国总统德斯坦的评论：“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回忆毛泽东说：“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日本总理大臣大平正芳评论说：“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作为毛泽东的战友，说了这样的话：“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典范，他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贡献了

自己的一切。”

巴基斯坦总理本·布托说：“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曾经与毛泽东有过诸多交往，他说：“毛泽东的著作反映了经典的普遍真理。他能够把明确性、逻辑性和普通常识结合在一起。在我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

毛里求斯总理指出：“毛泽东的著作不仅是中国的遗产，而且是全世界的遗产。”

早在延安时期就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幽默的语调评论毛泽东：“毛的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油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庭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铺张浪费’。他的‘享受’大致相当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享受到的东西。”

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则这样评论毛泽东：“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评论，具有前瞻性：“几乎像毛泽东本人支配着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一样，毛泽东的幽灵也还支配着新时代的政治意识。”

这本《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收入对于毛泽东的赞扬式的评论，而且也收入许多尖锐批评毛泽东的评论。

在读了一连串“颂毛”的文章之后，毛泽东又读了诸多“批毛”的文章。

毛泽东很仔细阅读了书中一篇题为《台湾学术界对毛蒋功过的评议》的报道。毛泽东一边读，一边在有的地方打上“？”：

最近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孙文学说研究会，全球近二百位中外学者

参加，黄仁宇教授发表了“毛泽东蒋介石的功过”专题报告，引起学术界强烈的反应。报告的大意如下：

一，毛泽东一九四九年统一中国的功勋不能抹杀。

自辛亥革命后，中国四分五裂，各省军阀独霸一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各省军阀无不成为外国侵华势力的鹰犬，军阀混战实为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

毛泽东最大的功勋是打垮国民党，完成土地改革，解放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一九四九年后新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二，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才造成一系列经济战线、文化战线的骇人听闻的错误。（毛泽东打上“？”）

主要表现有：在思想路线上不断加强专制，以个人独裁冒充无产阶级专政，党意服从上意，根本忽视民意。（毛泽东打上“×”）

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之三面红旗，造成百年罕见的人为的政治灾害和经济灾害，把全国人民高度的建设热情空耗在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虚伪构想上。

大炼钢铁毁灭了全国六成以上的森林和自然生态，造成自然生态失衡，大面积水土流失，沃原急速沙漠化，每年沙漠化的耕地比新开垦的耕地还要大，三年的大跃进恶果至少要五十年才能恢复生态平衡。大炼钢铁更是个钢铁复古的世界级大笑话。（毛泽东打了“？？”）

人民公社只不过是日军侵占华北时，强化治安“部落村”，把自由农打成农奴的手段，并不是他的新发明。（毛泽东打上“××”）

三面红旗必将受到全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毛为了扫清政治思想上的障碍，一九五七年开展反右、清右、肃右运动，至少一百三十四万不同程度的右派分子受到劳动教养、劳动管制和劳动改造。“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了有知识就有罪，大学毕业证书成了有罪证明书。（毛泽东打了“？？”）

中国的文化从此凋零，“百家争鸣、百家齐放”成了“一花独放、

一人独鸣”，中国文化一蹶不振。（毛泽东打上“××”）

三，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灾难，是读书人最大最普遍的文字狱，也是老革命们最大的灾难。（毛泽东打了“？？？”）

有十七万人被捕入狱，戴着高帽子跪在北京城各个公共场所。处长级以上的出身于贫下中农的老革命们至少有五六万人，等到一九七八年平反时，多数老革命都是用担架从监狱抬出再抬到医院的。（毛泽东打上“×××”）

毛泽东整死、斗争逼死的共产党人，更是万倍于蒋介石的马日事件。共产党人其命苦，老蒋杀不到的，如刘少奇、彭德怀，全被他们的伟大英明领袖杀光了。（毛泽东打了“？？？”）

毛泽东三次亲手撕了自己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不如一个“最高指示”，“最高指示”成了圣旨的代名词，一纸红头文件就可叫中国人民欲哭无泪、肝胆俱裂。（毛泽东打上“×××”）

不要说被他整死、斗争害死和明正典刑的人数，仅仅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之间，被活活饿死的人数就有二千七百万人。（毛泽东打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顶峰时期，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几首语录歌，再加上《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油画只有《毛主席去安源》。作曲家不敢动笔，画家不敢画，人人自危，除了自己谁也不敢相信。（毛泽东打上“×××”）

所以学者们认为，一九四九年前毛泽东有功，一九四九年以后有过。过大于功。（毛泽东打了“？？？”）

接着，这篇文章谈论起蒋介石的功过：

一是蒋介石北伐有功。

以黄埔军校为本，建立了中国的革命军，统一了南方五省，在内忧外患中，艰苦建国，外御列强内灭军阀。

蒋介石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坚持抗战到底。

蒋介石成为盟国四巨头之一，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并成为当然的常任理事国，拥有绝对否定权。

蒋介石扶植和支持韩国、印度、缅甸的独立，并成为事实。

二是蒋介石的错误。

拖延土地改革，不能最小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封建的土地制度阻碍了中国迈向工业化的道路。

如果说毛泽东是以奴才当人才，蒋介石是以人才当奴才，二者都忽视“士大夫”的作用，但蒋比毛能善待“士大夫”。

蒋属于弹性专制，毛是绝对专制，都沉醉于“英明”“伟大”和“万岁”中。

中国内战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改革，谁能给农民二亩地，谁就会因为得到农民的绝对拥护而成为内战的胜利者。

蒋介石手太软，对部下的贪污腐败不敢像毛泽东对待刘青山、张子善和宋德贵那样。

蒋介石一半是被中共的土改打败的，另一半是被自己的贪官污吏打败的。

北伐以后，革命军被军阀政客的姨太太小姐拖下水了，没有改造，如军阀反而被军阀改造了，拥护孙传芳的军阀变成了拥护蒋介石的军阀，手上的旗帜易了，心中的旗帜一点也没有易。

在国际外交上，盲目屈从美国，被美国卖了还替美国人点钞票。

日本投降后，国共都错过了国共合作建设新中国的机会。国共水火不容正好反映了美苏的水火不容。

毛泽东没有屈从斯大林的霸权，没有沦为乌克兰第二，这也是毛的一项伟大功勋。

毛泽东还注意到，这篇文章写道：

这次学术报告会，缺席的是台独人士，他们认为毛蒋都是台独的敌

人。（毛泽东打上三个“√”）

毛泽东在这本《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里，读得最仔细的，是书中的《邓小平论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些话，都出自《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说：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邓小平在肯定毛泽东的功绩的同时，也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了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

毛泽东很惊讶，邓小平把十年“文化大革命”称为“十年浩劫”！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被邓小平彻底否定！

毛泽东也注意到，邓小平所说的“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那“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指的就是“反右派斗争”。在邓小平看来，“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是“犯了‘左’的错误”！

毛泽东拿起笔，画了一个巨大的“？”。

邓小平还非常明确地说：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毛泽东拿起笔，又画了一个巨大的“？”。

毛泽东读《邓选》

毛泽东是个读书甚细的人，连文末的注解都要读。他在读《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书中的《邓小平论毛泽东》时，有几处引文注解中提到出自邓小平与奥林埃娜·法拉奇的谈话。

奥林埃娜·法拉奇是何等人物？毛泽东从张军的书柜里找到了美国圣·阿里科著、李青黎译的《女人与神话——奥林埃娜·法拉奇传》，读了起来……

原来，奥林埃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是意大利的著名女记者。政治和历史的纷争主宰了她迄今为止的人生，同时也纪录了四个字，就是：“女人不哭”！

十岁那年，法拉奇全家人躲在防空洞里。美军飞机的轰炸声吓哭了她，父亲立即给了她一个耳光：“哭什么？坚强点，女孩子不应该哭！”

从此，“女人不哭”刀刻钢铸般烙在她的脑海之中。

她爱穿长裤和男装，也爱吸烟。写作时，她每天要吸六十枝烟，以使自己一直处于亢奋之中。

法拉奇的勇气是从当战地记者开始的。她以《欧洲人》周刊记者的身份来到越南采访越战，多次受伤但都大难不死。后来她又去过中东战争和暴乱中的锡兰。但她比当战地记者还出名的工作就是直接去面对那些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物。

作为记者，她的座右铭是：“挑战权力，拒绝谄媚”！

在法拉奇看来，“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聪明，有远见，有韧力，他们只不过更能钻营，更有野心而已。”

通过对权力者的采访，法拉奇更发现权力对人的腐蚀。权力像一剂春药，谁沾谁发疯；权力使人腐败、骄横、愚蛮、迷狂。因而法拉奇厌恶权力，她说：“我认为权力是不人道的、令人痛恨的现象。”

正因为对权力持这种看法，法拉奇在采访那些名人时，不仅毫无很多其他记者的那种谄媚、奉承、巴结，而是尖锐地提问，刨根问底地追击，毫不客气地挖掘，然后毫不留情地把权势者的丑陋全部写出来。

在采访基辛格的时候，她问道：“权力是诱人的，基辛格博士，权力对您有多大的吸引力？希望您说真话。”“基辛格博士，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个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

在采访英迪拉·甘地的时候，她问道：“跟您这位受过非暴力教育的人谈论战争，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在发生冲突的日子里您在想什么？”

在采访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的时候，她同样犀利：“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都是坏的？”“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是不是还要挂在那里？”“你们说文革灾难是四人帮造成的，可中国人却举起五个手指头，那第五个是不是指毛泽东？”同时还问这位刚刚获得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什么时候退休。

希腊抵抗运动领袖人物阿莱科斯成了法拉奇爱情故事的男主角，这个男人曾被控谋杀希腊独裁者，被判了死刑后又被改判，囚禁了五年。他被称为疯子也被称为天才，被称为英雄也被称为危险分子。他们在采访中谈情说爱，这段感情维持了三年，直到阿莱科斯被谋杀。

但是，她没有哭，因为“女人不哭”！

她的书本畅销，里面没有任何的雕琢，她的提问就是最有力和最耐品味的内容。因为她，提问成了比回答还重要的语言方式。

能够获准采访邓小平的外国记者不多。邓小平愿意接受法拉奇的采访，就因为喜欢她的泼辣的采访风格。

当时，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的身份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接受法拉奇的采访之后，觉得意犹未尽，主动提出愿与她在二十三日再度交谈，这也是邓小平接受采访所未有过的。

采访中，不时的开心话语缓解了谈话的严肃气氛。她问他为什么总是第二号掌权人物，为什么西方人管他叫“中国的赫鲁晓夫”，这都引起了一阵阵开怀大笑。当法拉奇祝他生日快乐时，他表现出十分吃惊的样子。

“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吧。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这就意味着我已经七十六岁了。七十六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邓先生，我父亲也七十六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七十六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耳光的。”

“他干得好！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法拉奇不喜欢天安门广场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第二天，星期六一早，再次穿过这个巨大的广场时，法拉奇发现那些画像已经被取下来了。

“邓先生！斯大林不在那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在了！邓先生，这不怪我吧？您不会是因为我而把它们取下来的吧？”

“不，不，不是。我们只不过是恢复了旧貌罢了，就像我昨天告诉过您的那样。有必要的话我们会把它们再挂回去的。”

“真可惜！我本来挺高兴。我真希望我能把斯大林从天安门广场取走！”

“我知道，我知道。我可以理解。但我不会满足您的这个愿望。”

尽管邓小平不肯承认自己想让她开心，但他还是把那四幅画像从城市中心取走了，这一行为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她的影响。如果在她墓碑上写上天安门广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肖像是

应她之请取走的，她一定会十分高兴。

毛泽东很有兴味地读了《女人与神话——奥琳埃娜·法拉奇传》，从书柜里取出《邓小平文选》，读起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

奥琳埃娜·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奥：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

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不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奥：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邓：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

人帮”的罪行。

奥：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

邓：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奥：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奥：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奥：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太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

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奥：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邓：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奥：我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

邓：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奥：你是否能肯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更为顺利？你们是否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因为我听说，所谓“毛主义分子”仍然存在。我说的“毛主义分子”是指“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

邓：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罪行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四人帮”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时，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反抗“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最近两年，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

的要求。我们正在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已经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这是得人心的。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只要我们现在走的路子是对的，人民是拥护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情况就不会重复。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奥：那末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奥：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邓：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华国锋主席也不兼国

务院总理的职务了，党中央委员会推荐赵紫阳同志为候选人。我们这些老同志摆在那里，他们也不好工作。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个缺陷在六十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时我们还年轻。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更多地是关系到我们的方针、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老同志带个头，开明一点好。

奥：我看到中国有其他的画像。在天安门我看到有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还要保留？

邓：要保留。“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在重要的节日才挂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改变了做法，经常挂起。现在我们恢复过去的做法。

奥：四个现代化将使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样不可避免地引起私人投资问题。这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

邓：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奥：那末，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都是坏的？

邓：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奥：我记得几年前，你谈到农村自留地时说过，人是需要一些个人

利益来从事生产的，这是否意味着共产主义本身也要讨论呢？

邓：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奥：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说，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作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

奥：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奥：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奥：我们不知道。

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奥：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零分以下。

奥：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第五章 一夜三梦

华国锋垂垂老矣

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读着《邓小平文选》，响起轻轻的敲门声，在万籁俱寂的子夜显得格外清晰。

毛泽东答应了一声，张军进来了。

没等张军开口，毛泽东便说：“小张，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去？”

张军附在毛泽东耳边，告诉他：“主席，我把华国锋同志请来了！”

毛泽东一听，立即放下书本，焦急地问道：“他在哪里？”

张军说：“就在书房门口！”

正说着，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老人，穿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走进书房。

虽说已经二十几年没有见面，毛泽东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国锋同志！”

华国锋一个箭步走到毛泽东跟前，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叫了声“主席——”，泪水便夺眶而出，久久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发现，华国锋的前额深沟浅槽，已经布满皱纹，眼角的鱼尾纹也很深，尤其是眼袋下垂，使他的一双眼睛明显变小。哦，华国锋老矣！不过，看上去，华国锋的精神还算不错。

华国锋在毛泽东对面的沙发坐定，张军给他沏好一杯茶，就退出了书房。

华国锋见了毛泽东，心中似有千言万语要说，一时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毛泽东为了平息华国锋激动的心情，随便跟他聊天：“国锋，我记得你是党的同龄人，今年该八十多了。”

毛泽东如此清晰记得华国锋的年龄，很使华国锋感动。

毛泽东又说道：“我记得，你本姓苏，单名铸。一九三八年参加游击队时，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这句话里取了三个字，从此改名换姓华国锋。”

华国锋听了，感叹道：“主席的记性真好！”

毛泽东回溯往事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那时候，我乘火车来到湖南，你是我的‘父母官’——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湘潭军分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我的老家韶山冲，在你的管辖之下。那时候，你像现在这样穿一身中山装，理着平头，很年轻，才三十四岁！”

毛泽东的话，勾起华国锋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回忆。当然，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比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因为这毕竟是他作为一个地委书记见到了党的最高领袖。华国锋说：“那时候，我正在长沙开会，湖南省委派车来，通知我说是领导接见，马上上车。我不知道是哪位首长接见。上车之后，车子直奔火车站，来到一趟专列前面。我跟三位省委领导一起走进专列，见到车厢里放着一张长方桌子，上面铺着白桌布，您正坐在那里抽烟。我一下子就呆住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受到您的接见。我和省委的三位领导在您的对面坐了下来。那天，您问湘潭的情况，问韶山的近况，我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笑道：“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憨厚、老实，我喜欢老实人！后来，我选择你作为接班人，也因为你忠厚，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两个凡是’！”

毛泽东一提到“两个凡是”，情绪刚刚放松了的华国锋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

毛泽东重申曾经对张军说过的话：“‘两个凡是’有什么错？！你在我‘长眠’之后，提出了‘两个凡是’，恰恰表明我的眼光不错，选

择你作为接班人是选对了！”

听了毛泽东对“两个凡是”的肯定，可以看出，华国锋露出欣慰的笑容，绷紧的神经又松弛下来。

华国锋这时开始主动提问：“主席，我抓了‘四人帮’，尤其是把江青同志也抓了起来，在当时是不抓不行，迫不得已，不知道您的意见如何？”

毛泽东坦然答道：“‘四人帮’是咎由自取，尤其是江青，孤家寡人一个，跟一百多个中央委员对立，四处树敌，不倒台才怪呢！我多次警告过江青，警告过‘四人帮’，可是他们听不进去。我料定在我‘长眠’之后，江青会闹事，江青一伙会闹事，也预料‘四人帮’会垮台。你一定记得，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你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站在我的病床前，我对你们说过，我要交班了，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还好，在我讲了这话三个多月之后，十月六日那天晚上，没有腥风，不见血雨，你不费一枪一弹，就解决了‘四人帮’，中国没有大动荡。”

华国锋告诉毛泽东，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他就在参加“打招呼会议”的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华国锋还告诉毛泽东，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十天，他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华国锋说，他的这四点指示，邓小平除了赞成“要集中批‘四人帮’”之外，没有一点不反对的：

一是“连带批邓”，邓小平当然反对；

二是“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左路线，不是“极右路线”；

三是如果“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中国就无法前进；

四是“天安门事件”必须平反——不仅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这不合实际情况，而且“天安门事件”本身完全是革命行动。

华国锋说，不久他就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华国锋说，尽管他再三强调“两个凡是”，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能为邓小平平反。但是，为邓小平平反的呼声非常高，得到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的支持，不得已，他只得同意为邓小平平反。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猛烈批判了“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的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华国锋告诉毛泽东，邓小平在胡耀邦的配合下，在全国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他不得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得不承认“两

个凡是”束缚了大家的思想。

华国锋告诉毛泽东，一九八零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连续召开了九次会议，对他进行批判，此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向全党通报了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共五条：

- 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 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
- 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
- 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 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华国锋告诉毛泽东，他本来身兼三职，其中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后来由胡耀邦代替，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后来由邓小平代替，国务院总理一职后来由赵紫阳代替。

华国锋还告诉毛泽东，中央委员们还是肯定他为粉碎“四人帮”所作出的抉择，他被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毛泽东听了华国锋的叙述，久久保持沉默……

华国锋说，他一定要请毛泽东主席到他家去住。

但是，这时张军进来了，说毛主席住在他家最合适，不能住到华国锋家。

张军跟华国锋吵了起来！

毛泽东劝他们别吵。可是，他俩还在那里继续吵着。华国锋一生气，扭头就走了。

毛泽东大叫：“华国锋！华国锋！”

毛泽东发觉有人往他身上盖羊毛毯，睁眼一看，是张军站在他的面前。

毛泽东问：“华国锋呢？”

张军反问：“什么华国锋？”

毛泽东说：“不是你把华国锋请来了？”

张军说：“没有哇，我什么时候把华国锋请来？”

毛泽东这才明白，他看书看累了，睡着了，刚才做了一个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梦见了华国锋。

张军怕毛泽东坐在那里睡着，容易感冒，劝他上床休息。

毛泽东这才解衣上床。

毛泽东在生活中有两难：便秘和入睡难。他便秘是与长期嗜辣有关，而入睡难则是由于长期以来头脑紧张过度。

不过，毛泽东毕竟上了年纪，又劳累了一天，这时他的脑袋一碰到枕头，就呼呼熟睡了。

江青夜访毛泽东

毛泽东刚刚睡着，有人连门都不敲，就冲了进来，咋咋呼呼尖声地喊：“主席！主席！”

一听这熟悉的声音，毛泽东明白：江青来了！

毛泽东从床上坐起，定睛一看，站在床前的果真是江青！此刻，江青依然戴她那副深紫色、秀郎架近视眼镜，包一块黑头巾，穿一件黑包对襟棉袄，领子上打着显眼的补丁。

毛泽东一边起身下床，江青一边帮他穿好中山装。

毛泽东问江青：“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江青答道：“我自有神通！我知道‘大叛徒’刚刚来过，就马上赶来了。”

“‘大叛徒’刚刚来过？”毛泽东感到奇怪，“‘大叛徒’是谁？”

“这还用问？”江青气势汹汹地说，“‘大叛徒’就是你那个接班人华国锋！主席，你刚刚倒下去还不到一个月，这个‘大叛徒’就露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狰狞面目，竟然胆大包天，敢冒天下之大

不遑，把我和春桥同志、洪文同志、文元同志抓了起来，把远新也抓了起来。我不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光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我还是主席夫人哪！你华国锋敢于对主席夫人下毒手，算得上是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算得上‘你办事，我放心’？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这一天，是中国的‘国耻日’，是‘反革命政变日’！”

毛泽东在沙发上坐好一言不发，听着江青的长篇大论。

江青在毛泽东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也就是刚才华国锋坐过的沙发。

江青继续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从骂华国锋转到骂邓小平：“华国锋把我抓起来，就是对你的背叛，就是‘大叛徒’！华国锋出卖了我，他也没有落个好下场。邓小平取华国锋而代之。邓小平本性不改，他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那所谓的‘中特理论’，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们居然还敢把老娘关进秦城监狱，还对老娘进行审判，什么‘江青反革命集团’？！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

等江青说够了，骂够了，毛泽东这才说话：“我早就劝过你，不要搞‘四人帮’，你总是不听。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我特地为你写下一段话：‘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合（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你还是不听。你们总是四个人搞在一起，不跟一百多中央委员共同工作。你被抓起来，就是我所说的‘积怨甚多’！”

江青一听，连毛泽东都这么说她，心中的火气更大了：“主席，我被华国锋、邓小平害得那么惨，你怎么还帮着他们说话？我知道，当年你对我的一次次批评，是为我好。可是，在你‘长眠’之后，他们就把那些批示统统拿出来，说‘主席早就批评过你’，置我于死地！他们在一九八零年底到一九八一年初，竟然在所谓的‘特别法庭’上，对我、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进行审判。他们把我列为‘首要分子’，宣

称‘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他们罗织了一大堆‘罪行’，什么‘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呀，什么‘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呀，什么‘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呀。我当场批驳道：‘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江青说：“我在法庭上跟他们进行坚决斗争。我透露说，那天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毛主席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我这么一说，法官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江青接着说道：“在法庭上，我高呼口号：‘坚决不承认反革命的法庭判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宣称，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知道，他们判我什么？他们竟敢判我死刑！”

毛泽东：“他们判你死刑？！”

江青：“在‘判处死刑’之后，又加上一句‘缓期执行’！”

毛泽东：“照这么说，他们毕竟没有杀你。”

江青道：“他们不敢，因为我毕竟是主席夫人！两年之后，他们又宣布，改为‘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起，我获得保外就医。我们的女儿李讷以及你没有见过面的女婿王景清照料我。”

毛泽东问：“李讷好吗？”

江青答道：“她是双重身份，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女儿，又是‘反革命集团头子’江青的女儿，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坏。”

毛泽东又问：“王景清对她好吗？”

江青说：“王景清曾经在中央警卫团工作，人倒老实，对李讷也不

错。”

江青的思维，往往大跨度跳来跳去。此刻，她又突然跳到另一个话题：“主席，真是胜也萧何，败也萧何，我这一辈子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因为你，我成了‘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也因为你！”

这几句话，勾起了江青对往事的无限回忆，她对毛泽东说道：

“主席，你还记得吗，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你在那里主持会议，而我从上海经过西安前往延安，正好路过洛川。我结识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他的夫人朱仲芷。他们知道我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早在山东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把我介绍给你。我们就这样在洛川认识。

“第二天，正好洛川会议结束，你和中央以及军委领导分别乘车回延安，我跟你坐同一辆卡车，你坐在驾驶室，我和一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坐在车厢里。我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坐在车厢的最前边。

“到了延安之后，朱仲芷陪我一起去看望你，我们就这样开始交往，后来发展为恋爱，在一九三八年秋天，我们在延安结婚。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七六年，整整三十八年的夫妻！”

毛泽东听到这里，也叹息道：“是呵，整整三十八个年头！”

江青那跳跃式的思维，一下子又从往事的回忆，跳到了特别法庭：“主席，你知道在法庭上，我说我是你的什么？”

毛泽东：“你一定是用‘毛泽东夫人’这张王牌去压别人。”

江青却说：“我宣称，‘我是主席的一条狗！’法官们个个都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上。其实，我是你的一条狗呀。在‘文化大革命’中，你指向谁，我就咬谁！打倒刘少奇，是我的责任吗？分明是你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我只是‘紧跟’你的‘伟大战略部署’而已！怎么能够把‘打倒刘少奇’的责任，加到我的头上？特别法庭审判我，其实就是在审判你！”

听了江青的这番话，毛泽东心中不悦，却又不好发泄。“文革”，始终是毛泽东心中的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毛泽东已经把发动“文

革”等同于打倒蒋介石那样的伟业，要毛泽东放弃或者否定“文革”是不可能的。

江青继续着她的话：“主席，在秦城监狱，我是个‘活着的死人’，那样的沉闷，那么的孤独。在那些日日夜夜，我常常想到你。我在枕边放着你的诗词手迹，衣服上别着你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我和你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早，我都要背诵你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我亲手用白纸做了一个花圈，我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看望你，献上花圈。他们竟然拒绝了我的这一要求！”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江青仍然滔滔不绝：“为了使漫长的监狱生活分分秒秒都过得有意义，我决定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我的回忆录的题目，想了好多个，有《毛主席的忠诚战士》、《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主席，你觉得哪个题目好？”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反问道：“你写了吗？”

江青说：“我写了，又撕了！”

毛泽东感到惊讶：“为什么撕了？”

江青也没有正面回答：“我是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撕掉回忆录的。五月十三日，我在一张《人民日报》上写了一句话：‘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我记得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路线，同时我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副组长。翌日凌晨，我在保外就医的北京酒仙桥住所，自己结束了自己七十七岁的生命。”

毛泽东此时明白，坐在他对面的江青，只是一个阴魂而已。

江青说罢，化为一阵风，飘逸西去。

这时，毛泽东方知，江青适才来访，乃是他南柯一梦。

“文革”受到猛烈抨击

毛泽东第二次梦醒，却辗转反侧再也无法入眠。那“入眠难”的老毛病又发作。他看看墙上的钟，才凌晨三时。

毛泽东索性起床看书。毛泽东信手从书柜里取出那厚厚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看了起来。

毛泽东是一个目光非常敏锐的人，在目录中迅速注意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为了顺利召开中共七大，为了统一全党内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九四五年经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要的文献，为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明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显然是效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写的，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决议”。

令毛泽东特别感兴趣的是，一篇介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背景的文章介绍说，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当年的住处——北京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里起草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分为几个阶段：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称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称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一九七六年之后，称为“历史的伟大转折”。

毛泽东注意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一

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这“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大体上持肯定的态度。

毛泽东感到困惑的是，这篇在他当年住所里起草的文件，写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这“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对他的批评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

对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则予以完全否定，毫不客气地对他展开批判！

毛泽东注意到，对于他的批评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的“反右派斗争”开始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接着，《决议》批评了毛泽东提倡的“三面红旗”即“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决议》批评了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倾运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决议》接着批评了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关于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错误思想。还抨击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以及“个人崇拜现象”。

《决议》的重点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于毛泽东的批判达到了高潮。

《决议》关于“文革”的一段话，一开头就把矛头直指毛泽

东：“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决议》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尖锐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决议》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读着“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完全错误”、“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样的结论性论断，毛泽东的心灵受到震撼！他从来没有想到，后人是这样完全否定他以晚年心血铸成的“文化大革命”！

《决议》否定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否定了《五一六通知》。

《决议》强调：“‘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读着《决议》，毛泽东又记起刚才梦中江青所高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心境是错综复杂的，是矛盾重重的。

毛泽东一下子无法接受《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尖锐批判，对于他本身晚年错误的严厉指责，但是又似乎隐隐觉得，《决议》之言也不无道理。

尽管《决议》完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思

想，但是毛泽东在《决议》中，还读到了这样一段对他的全面评价：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读《决议》，毛泽东的心灵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在“文化大革命”似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听到许多“走资派”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尖锐批评，他总是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把这些尖锐批评拒于千里之外。然而，今日他读到的，却是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是重要的党的文献，他感觉到了批评的分量。

他依然想不通，又把《决议》从头到底重新读了一遍。

这时，毛泽东一看墙上的钟，凌晨四时。昨天这个时候，他刚刚离开“长眠”了二十多年的“毛主席纪念堂”，前往张军家中。这二十四小时，接受了那么多新信息，看了那么多新文章，知道了那么多新观念，对于他来说，真的“一天等于二十年”！

商潮席卷故乡韶山

老人的特点是说醒就醒，说睡就睡。

毛泽东在书房里看书，看着看看，书从手中滑了下来，他坐在那里睡着了。

在迷迷糊糊之中，毛泽东忽然见到张军兴冲冲地进来，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主席，马上准备动身！”

毛泽东感到奇怪：“到哪里？”

张军道：“空军今天有一架飞机一早飞长沙。那里的主管是我的老

部下，同意我们搭乘那架飞机。我可以从长沙陪你去韶山！”

一听可以回故乡韶山看看，毛泽东的双眼闪耀着兴奋的目光。

毛泽东有着浓厚的故乡情结：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阔别故乡三十二年的毛泽东回到韶山。他回到故居，回到乡亲们中间，他站到父母墓前，他还在韶山水库游泳。异常喜悦的他，写下了《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举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在着手发动那充满惊涛骇浪的“文化大革命”时候，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又一次回到故乡，在那个“西方的一个山洞”——滴水洞住了十一天，思索着“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和战略。

毛泽东打算第三回回到故乡，是在一九七六年病重的时候，他想安眠于故乡韶山。然而，不仅大夫们没有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没有同意。这样，毛泽东“长眠”于北京。

今日，在“长眠”苏醒之后，毛泽东有机会重返故里，当然喜不自禁。特别是昨天晚上在“毛家饭店”吃了那顿“毛家菜”，更加勾起毛泽东的浓浓的故乡情结。

“快走！快走！”毛泽东催促张军道。

这时，张霞、“小放牛”也来了，她们也陪伴毛泽东一起回韶山。

冬日清早五时多，北京依然一片黑咕隆咚。

张霞驾驭那辆“桑塔纳”，朝军用机场进发。毛泽东坐在前座，张

军夫妇坐在后座。

“主席，您已经很久没有乘坐飞机了吧？”张军对毛泽东说道。

“嗯，从一九五六年之后，我就被‘剥夺’了乘飞机的权利。”毛泽东叹道。

自从二十世纪初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之后，飞机成为世界上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世界各国首脑，差不多都拥有自己的专机。美国总统的专机“空中一号”，几乎飞遍了全球。就连蒋介石，在跟毛泽东打仗的时候，也总是乘坐专机飞来飞去，到处“训话”，指挥作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他从延安到重庆跟蒋介石谈判，是他平生头一回乘坐飞机。那时候，毛泽东还没有自己的专机，他乘坐的是美国特使赫尔利派来的美军螺旋桨运输机。毛泽东第一回亲身体验飞机的快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联赠送了一架飞机给毛泽东。毛泽东有机会乘坐这架飞机出巡。然而，一九五六年，当毛泽东从武汉乘坐飞机回北京的时候，飞到河北的衡水地区上空，遭遇雷雨云。这架飞机不得不往东飞到沧州，再向北飞行，经过天津西面的杨村机场，兜了一个大圈子，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当时，坐镇北京西郊机场的空军司令刘亚楼以为毛泽东的座机出事，吓得脸色都变了。从此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不让他乘坐飞机。

从此，毛泽东只好眼睁睁看着周恩来总理潇洒地飞来飞去，几乎成了“空中飞人”，而他只得乘坐他的专列，在地面慢慢地行驶。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的专列增加到三列。他出行时，三列专列鱼贯而行，人们不知道毛泽东究竟坐在哪一列上！

如今，毛泽东成了普通百姓，也就有了乘坐飞机的权利。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登上飞机，显得格外激动。一路上，毛泽东透过舷窗，俯视晨曦之中的大地。当飞机掠过黄河上空，毛泽东注意到河水已经冻结成冰层，真的如同他在《沁园春·雪》中所描写的那样：“大河上下，顿

失滔滔。”

从北京到长沙，飞机只飞了一个多小时。一下飞机，另一辆紫红色的“桑塔纳”已经等候在机场。

真的如“毛家饭店”的毛老板所言，从长沙到韶山，沿着高速公路飞驰，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毛泽东不由得记起，在一九五九年，他从长沙前往韶山，一路风尘，汽车在高低不平的红土公路颠颠簸簸了六七个小时。张军告诉毛泽东，如今韶山还通了火车，长沙每天都有好多直达班车前往韶山。

那么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往韶山，为的是一睹毛泽东的故乡。

韶山的男女老少，都为韶山出了个毛泽东而骄傲。所幸，今日毛泽东“长”了络腮胡子，“长”了长发，变成了“文老先生”，要不，毛泽东一回到韶山，马上就会处于人群的“铁围”之中。

毛泽东一到韶山，便见到最醒目的新景观——广场中心矗立起一座高达十米的毛泽东塑像。这塑像不是在“文革”年月建造的，而是在一九九三年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时新建的。碑座上，刻着江泽民题写的“毛泽东同志”五个金字。

在广场四周，还新建了毛泽东纪念馆、毛氏宗祠、毛泽东图书馆等等。其中的毛泽东图书馆，专门收藏有关毛泽东的著作。另外，还新建了韶山毛泽东纪念园、毛泽东诗词碑林。毛泽东几乎不认识自己的家乡了。

毛泽东最怀念的，当然是韶山上屋场的毛泽东故居。故居还保持原样。毛泽东记得一九五九年他回到故居时，大门上方挂着红底仿宋体金字横匾，写着“毛泽东同志故居”七个大字。在“文革”中，据说红卫兵们咬文嚼字，以为“故居”一词不妥，“故”有着“故去”、“故世”之意，所以改为“毛泽东同志旧居”。如今，仍用“故居”一词，只是大门上方的“毛泽东同志故居”七个大字不再是仿宋体，而是邓小平手书。

毛泽东当然不忘滴水洞。滴水洞在毛泽东故居不远处，原本是一个

不起眼的地方。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后来，在批判林彪时，这封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使这个“西方的一个山洞”引起广泛注意。这个“西方的一个山洞”，就是滴水洞。

滴水洞，当地人称“有洞无洞”。所谓“有洞”，是指原本有一个不大的山洞，滴着水，得名滴水洞。所谓“无洞”，则是因为后来修造韶山水库时，滴水洞被埋在水库里了，从此无洞可言。毛泽东小时候，多次到这里游玩，知道此洞。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阔别故乡三十二年的毛泽东，回到韶山。他在韶山水库游泳时，遥指滴水洞山谷说：“这个地方不错，我退休以后在那里搭个茅棚，要得么？”“要得”是湖南话“行吗”的意思。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中共湖南省委把毛泽东此言当作“最高指示”，将毛泽东所说的“茅棚”，改为“别墅”，极为秘密地在滴水洞为毛泽东建造了别墅——称为“二零三工程”。这一工程从一九六零年动工，一九六三年完成主体建筑。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十一天。

在毛泽东离开韶山之后，中共湖南省委仍继续扩建滴水洞工程，调来“欧阳海连”，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修建了足以防御原子弹的防空洞！这一工程在一九七零年完成后，毛泽东一直没有来过。

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多年，滴水洞仍处于保密之中。直至一九九二年，滴水洞才对外开放，人们这才得以一睹这个“西方山洞”的神秘所在。

毛泽东发现，如今的韶山非常热闹了。便捷的交通把众多的游人送到这里，所以路上、山上，处处是游客。韶山人也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商业意识大为增强。今日韶山，笼罩在一片浓重的商业气氛之中。

由于游人甚众，韶山的旅游业就大为兴隆，光是旅馆、招待所就多达三百多家。其中，韶山宾馆为涉外宾馆，拥有十幢楼房。就连滴水洞

原本供毛泽东随员居住的二号楼、三号楼，也对外开放，供游人居住，称“滴水洞山庄”。

至于饭店，那就更多，甚至可以说有漫山遍野之势——因为大多数来自长沙的旅客，不在韶山住宿，当天来去，但是必须在韶山吃饭。

令毛泽东惊讶不已的是，这里的饭店用“毛家”作招牌的，比比皆是。“毛家饭店”、“毛家餐厅”、“毛家餐馆”、“毛家阁”、“毛家一餐厅”、“毛家二餐厅”、“毛家酒楼”，……那里，不论老板是否姓毛，都打起“毛家”招牌。据说，最初有人开了一家“润之菜馆”，遭到查禁，因为毛泽东名泽东、字润之，用毛泽东的字命名菜馆是不允许的。至于用“毛家”，这就无法禁止了，因为毛家并不一定是毛泽东家。这样，“毛家”饭店也就遍地皆是。很多“毛家”饭店特地加上“正宗”、“真正”之类字眼，但是“正宗”、“真正”也大多，仍然叫人闹不清楚了。大抵由于“毛家”字号太多，有的饭店用自己的名字作招牌，诸如“毛泽建饭店”、“毛泽葵饭店”、“毛泽新饭店”、“毛泽红餐馆”……甚至还有一家叫“毛泽发”，令毛泽东哭笑不得！

毛泽东走在路上，不断有人向他兜售毛泽东像章。毛泽东像章，在“文革”中曾经红火过一阵，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然而，韶山像章厂至今仍在大批生产毛泽东像章，成了韶山的“特色旅游商品”。

毛泽东在韶山见到许多长龙般的小棚，一个摊位紧挨着另一个摊位，所售的大都是关于毛泽东的纪念品，大同小异。有的小摊在出售挂着毛泽东像章的项链，有的出售镶着毛泽东像的领带夹，有的出售附有毛泽东像的钥匙圈，还有的小摊在出售各种毛泽东塑像。有的商店在大声播放毛泽东语录歌，出售《红太阳》歌带以及《巨人之声》录音带。

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四周，毛泽东见到插着许多黄色、红色的旗帜，上书“毛家米酒”四个大字，迎风飘，颇为醒目。毛泽东不由得连连摇头，因为那米酒原本是湖南农村常见的土酒，如今也打起了“毛

家”旗号。在店铺里，毛泽东见到包装精美的“毛公酒”。据云，这酒是一九九三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由韶山市酒厂推出的。同时推出的还有“滴水洞酒”。

毛泽东还发现，在韶山不仅酒姓“毛”，连茶叶也姓“毛”。“毛公茶”已经成了“韶山名茶”。

印有毛泽东故居图案的毛巾、枕巾、被单、浴巾以至蚊帐，还有各种贝雕、玻璃、竹雕工艺品等等，都已经成了今日韶山的特产！

毛泽东惊叹，浓郁的商业气氛，使韶山变成一片商海。就连毛泽东故居对过的山坡上，也开起了餐馆、摄影部之类。密密麻麻，三步一铺、十步一店，已经成了今日韶山的新景象。

“连我的故乡也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毛泽东大声叹息，却发现自己依然坐在张军家的书房里。

毛泽东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又做了一梦——梦游故乡韶山。

毛泽东实在无法再入睡，又拿起了书，看了起来。

第六章 港人说港

惊闻苏联解体东欧易帜

毛泽东看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看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足迹》，看了江泽民著《论“三个代表”》，正在看《中国入世始末》一书。这时，虽然窗外仍是一片漆黑，但已是清早六时了。

忽听见房门吱呀一声，伸进半个脑袋。

“小霞，起得那么早？”毛泽东一眼就认出是张霞。

“主席，你还在看书哪！”张霞说。

“我没睡好，老是做梦。刚才梦醒了，起来看书。”毛泽东说。

“我最近一个星期值夜班，所以夜里睡觉不踏实，一觉醒来，看见窗外的树上泛着灯光——我的卧室就在书房底下。我想，你怎么还在看书，就上来看一下。”经张霞这么一说，毛泽东明白她为什么这样早起来。

“一读书，我发现自己跟不上趟了。”毛泽东指着手中的《中国入世始末》说，“什么WTO，什么APEC，还有‘三个代表’，我都没有听说过，得赶紧读书，赶紧‘补课’。你呢，最近在看什么书？”

“我在看英文版的书，叫《苏联解体亲历记》。”张霞说。

“什么‘苏联解体’？”毛泽东又跟不上趟了！

“那本书就在我的手提包里，我把书拿来！”张霞飞快下楼，又飞快地上楼，手中拿着那本美联社常驻莫斯科记者所写的《苏联解体亲历记》。昨天她在“毛主席纪念堂”值班时，就在看这本书。

张霞告诉毛泽东：“‘苏联解体’，就是苏联解散了，苏联不存在了！”

“苏联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很惊奇。

张霞又告诉毛泽东：“不光是苏联已经解体，苏联共产党也早就解散了。”

“苏联共产党也不存在了？！”毛泽东又很惊讶。

张霞还告诉毛泽东：“还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全部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存在了！”

这一回，毛泽东听了默不作声。在他“长眠”的二十多年间，世界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张霞告诉毛泽东，中国作家叶永烈不久前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了采访，写下纪实长篇《行走俄罗斯》。张霞说着，从书柜里取下叶永烈的《行走俄罗斯》，念了一段给毛泽东听：

在我看来，二十世纪俄罗斯的历史之路，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圆圈——“○”：

从资本主义的俄罗斯——社会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的俄罗斯。

也就是说，在经历了七十四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资本主义实行了复辟，俄罗斯的历史在兜了一个圈子之后又回到了原先的地方。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一声炮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攻占了俄罗斯首都彼得格勒的冬宫，爆发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推翻俄罗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俄罗斯联邦、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后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逐渐扩大为十五个加盟共和国。

苏联经过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了世界强国。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构成了世界两强对抗的格局。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场剧变、巨变发生了：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

务，并决定苏联共产党自行解散。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飘扬了七十四年的苏共党旗从苏共中央总部大楼楼顶黯然落下。

一九九〇年三月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苏联解体。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俄罗斯联邦，成为独立国家。俄罗斯推翻了社会主义制度，重新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宣布独立的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俄罗斯联邦为“独联体”成员国。

现在俄罗斯的全称是俄罗斯联邦，是由原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中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而来。今日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就是当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

不过，现在的俄罗斯联邦继承的是一九一七年以前俄罗斯帝国的传统、沙皇的传统。

正因为这样，根据“旧中加新”的原则，如今俄罗斯联邦的国旗、国徽，都是继承当年沙皇俄国的国旗、国徽，稍稍“旧中加新”而已！

接着，张霞又读了叶永烈的《行走俄罗斯》中《克里姆林宫的九位主人》：

纵观克里姆林宫权力变迁史，从列宁到普京，八十多年间克里姆林宫换了九位主人。

以下便是这九位主人进入以及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间表：

第一位是列宁（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共七年。其中第一年是在圣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经历了几年流亡生涯后，在一九一七年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二年列宁成为苏联

成立后的第一任领导人。列宁逝世于一九二四年。

第二位是斯大林（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五三年，共二十九年）：从一九二二年起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从一九四一年起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直到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

第三位是赫鲁晓夫（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共十一年）：从斯大林逝世后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来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直到一九六四年遭到突然政变而被罢免。

第四位是勃列日涅夫（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八二年，共十八年）：继赫鲁晓夫之后到一九八二年逝世前，一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第五位是安德罗波夫（十五个月）：克格勃头目，在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十五个月后逝世。

第六位是契尔年科（不足一年）：在出任总书记时已经患病，不到一年就逝世。

第七位是戈尔巴乔夫（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一年，共六年）：从一九八五年三月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苏联解体期间担任总书记。

第八位是叶利钦（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九年，共八年）：一九九一年起担任俄罗斯联盟总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宣布提前辞去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

第九位是普京（从二零零零年元旦至今）：在叶利钦提前辞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后，普京出任代总统。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六日俄罗斯总统选举中，以绝对优势当选俄罗斯总统。

在克里姆林宫的这九位主人之中，以斯大林在位的时间最长，共二十九年；以契尔年科在位的时间最短，不足一年。另外，安德罗波夫在位也很短，不进十五个月。其中，安德罗波夫和普京出身于克格勃。

就苏联、俄罗斯的当代史而言，实际上是划分为七个时代，即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其中，前五个时代是苏联时代，后两个时

代是俄罗斯联邦时代。

在这七个时代中，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因病死而离开克里姆林宫。

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是被政变赶出克里姆林宫。

唯一不同于众的是叶利钦，他是主动提出离职，让位给年轻的普京。

值得顺便提一笔的是两位过渡式的人物，克里姆林宫的“临时”主人，即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尽管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是第一把手是马林科夫。马林可夫是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斯大林去世之后，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当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权力大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赫鲁晓夫的强大压力下，马林科夫被迫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提出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一九五七年马林科夫被指斥为“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

还有一位应当提到的是布尔加宁。在马林科夫下台之后，由布尔加宁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赫鲁晓夫的压力之下，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布尔加宁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这一职务由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兼任。

一部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史，也就是一部苏联、俄罗斯的当代史。

一部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史，其实也是一代否定一代的历史：

斯大林否定了列宁战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

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

勃列日涅夫否定了赫鲁晓夫；

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勃列日涅夫；

叶利钦又否定了戈尔巴乔夫以至否定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

正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这样一代否定一代，最后连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也被否定，重返资本主义制度。

这种充满“否定”的苏联、俄罗斯历史，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随着克里姆林宫主人們的“否定之否定”，克里姆林宮大宮雙頂上的國旗也走過了“否定之否定”的道路：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這裡飄揚的是俄羅斯帝國三色國旗；

此後，這裡升起了紅色的鐵錘鐮刀旗；

一九九一年聖誕節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三色旗在這裡升起。

最使毛澤東感嘆的，是張霞讀了葉永烈《行走俄羅斯》中這麼一段：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凌晨，戈爾巴喬夫從克里米亞飛回莫斯科。

八月二十四日，戈爾巴喬夫發表聲明，蘇共中央委員會應該“自行解散”，並宣布自己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

由列寧締造、具有九十三年歷史、在蘇聯執政七十四年之久、擁有一千七百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就這樣在一天之內土崩瓦解！

令人扼腕的是，居然沒有一個蘇聯共產黨的支部上街表示抗議解散蘇聯共產黨！

就在這一天，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內的蘇共中央大樓被查封，在樓頂上飄揚了多年的紅旗落地！

蘇聯共產黨“自行解散”，戈爾巴喬夫不再是蘇共中央總書記，他的頭銜只剩下“蘇聯總統”了。

黨已不黨，國亦不國。隨著蘇聯共產黨的“自行解散”，蘇聯也搖搖欲墜。

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布獨立，戈爾巴喬夫這個“蘇聯總統”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原蘇聯的十個加盟共和國領導人在阿拉木圖簽署《關於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的議定書》。會議致函戈爾巴喬夫，通知他蘇聯不復存在，蘇聯總統的設置也隨之消失。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上午十时，戈尔巴乔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精心准备将于晚上发表的告人民书。下午，戈尔巴乔夫同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科尔、英国首相梅杰、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

晚上七时，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辞职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晚上七时三十八分，在克里姆林宫上的镰刀和铁锤苏联国旗，在寒风中悄然降下，代替它的是俄罗斯联邦的红蓝白三色国旗。

从此，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消亡。

一位学者，用一句话形容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解体这一历史巨变：

“这像一场太空陨星对地球的碰撞，摇撼了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炸开了一个大裂谷。”

苏联共产党亡党，亡在戈尔巴乔夫手中；

苏联亡国，也亡在戈尔巴乔夫手中。

对于这个“亡党亡国”的戈尔巴乔夫，有两种截然相反评价：

一曰：“苏联共产党的叛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

二曰：“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掘墓人”！

不论怎么评价戈尔巴乔夫，这句话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一九九九年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演讲，作了一番内心独白，使人们对这位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如何从内部攻破堡垒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仰。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

市场才能引向发展。”

毛泽东听罢，叹道：“不错，‘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共产党的叛徒，国际共产主义的叛徒！”

就在这时，张军也起床，来到书房，听毛泽东谈苏联解体的感想：毛泽东一脸严肃，说道：

“我早在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时候，就已经看出，苏联共产党内部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我也说过，不彻底清除现代修正主义，就会亡党亡国，就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共产党的覆灭，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证明了我的历史预见。我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清除中国共产党内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曾经说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证明了我的这一历史预见，证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浓厚的“文革”情结，正因为这样，他用苏联解体来反证“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张军和张霞知道，他们一时难以说服面前的这位历史老人，只得保持缄默。

就在这时，响起“小放牛”嘹亮的嗓音：“主席，请下楼用早餐！”

洋快餐“必胜客”

今天的早餐，有豆浆，有牛奶，有小米粥，有正宗的湖南辣酱，还有一个铜锣一般大的饼，这饼热气腾腾，散发着一股洋葱香味。

餐桌上放着四份刀、叉。

“小放牛”向毛泽东介绍说：“今天给你换换口味，吃西餐——‘必胜客’！”

毛泽东笑道：“‘必胜客’？吃了这个饼，就‘无往而不胜’？早

知道这样，我在长征的时候，就该天天吃这‘必胜客’。”

张霞解释说：“‘必胜客’是根据英文名字‘Pizza Hut’音译而来。其实，它的另一译名‘比萨饼’更确切些。这种饼起源于意大利比萨，所以叫‘比萨饼’，现在又被商家译成‘必胜客’。”

毛泽东问：“是不是比萨斜塔的那个比萨？”

张霞答道：“正是。”

毛泽东又问“小放牛”：“这些都是你一早起来做的？”

“小放牛”说道：“除了小米粥是我的‘作品’之外，其余的都是我打了个电话，‘叫’来的！”

张霞告诉毛泽东：“现在很方便，打个电话，餐馆就送菜上门，这叫‘外卖’。‘必胜客’不仅在意大利到处开连锁店，而且在全世界开连锁店，现在中国也到处有‘必胜客’连锁店。你昨天路过长安街时见到的‘肯德基’、‘麦当劳’，是美国的快餐连锁店，也是开遍中国的大街小巷。‘洋快餐’已经深入中国腹地。”

“小放牛”说：“主席，我已经准备明天早上请你吃‘肯德基’，后天早上吃‘巨无霸’，大后天吃‘汉堡包’……”

毛泽东说：“中国的大饼、油条，中国的德州烧鸡、符离集烧鸡，什么时候能够深入美国的腹地，走上美国人的餐桌？看样子，要在饭桌上打一场世界大战！”

虽说毛泽东连吃早餐也要联想到爱国主义，不过，他也承认，“必胜客”确实别有风味。他有点想不通：“在煎饼上面撒点洋葱丝、方肉丁、胡萝卜丝，这么简单的玩艺儿，意大利人就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全世界？！”

张霞说道：“快餐的特点正是简单。德国汉堡的‘汉堡包’，只是在面包中卷了一根肉肠而已，那么简单的东西，征服了全世界；‘三明治’，只在三片面包中夹了两块肉片，那么简单的东西，也征服了全世界。当今世界的潮流，是生活的高节奏，所以简便的快餐，成了时尚。每天清早，人们可以一边吃着‘汉堡包’、‘三明治’，一边乘坐地

铁，赶去上班。”

毛泽东感叹说：“孔老夫子的教导‘脍不厌精’，看来是落后于当今世界快节奏的生活潮流。”

就在这个时候，张霞的手机响了。

“嗯，嗯，我还在爷爷家。什么，今天已经是周末？我都忙糊涂了！”张霞一边接电话一边大笑起来，“好，好，今天我一定回家！”

“是你的爱人打来的？”毛泽东一听，就猜出来了。

“现在不时兴叫爱人，叫‘我的先生’。”张霞道，“今天周末休息，我请主席到我家做客！”

“现在周末也休息？”毛泽东问。

“年轻人比我们幸福！”张军答道，“我们过去一星期只休息一天，现在休息两天——周末和周日，叫做‘双休日’。另外，元旦、春节、五一、国庆，这四个节日再加上把双休日调整到一起一休息就是一个星期，叫做‘放长假’。现在每逢‘放长假’，是全国的旅游高峰，火车、汽车爆满，飞机也爆满，旅游景点人山人海。我和‘小放牛’反正已经退休，不去凑这个热闹。小霞他们一到放长假，不是去桂林，就是去海南岛。小两口来回都乘飞机，叫‘双飞’。”

“飞机票是自己掏钱买的？”毛泽东问。

“不光是飞机票是自己买的，宾馆费、餐饮费、景点费，都是自己花钱。”张霞说，“所以中国老百姓现在有一句口头语，叫做‘毛泽东使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

“小霞，那我就去你家做客，看看你家是怎样‘富起来’？”毛泽东说。

张霞见毛泽东答应去她家，兴高采烈。

张霞细细一想，对毛泽东说：“主席，到我们家，你还是照昨天的样子化妆，你的身份还是著名书法家文润之，好吗？”

“好呀，反正我这个书法家是货真价实的。”毛泽东说道。

“即便是在我的先生面前，你也不要暴露身份。”张霞说。

“看样子，除了在这里之外，我都得干‘地下工作’了。”毛泽东的话，引起张军一家开怀大笑。

笑罢，张军一本正经道：“主席，您在做‘地下工作’时，也万万大意不得。昨天，不论在琉璃厂，还是在毛家饭店，都发生了‘险情’。”

毛泽东道：“请放心，我会随机应变，化险为夷。”

正说着，张霞的手机又响起铃声。张霞对着手机说：“是爸爸呀！什么，下午去你那里？行啊。我这里有一位爷爷的老战友，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书法家，请他一起去好吗？哦，你和妈妈都非常欢迎他。好，好，我们一定去！”

张霞对毛泽东说：“主席，我的爸爸、妈妈都欢迎你去做客！”

毛泽东道：“恭敬不如从命，我很高兴结识你的爸爸和妈妈。”

张霞刚刚收好手机，铃声再度响起。

张霞：“哦，是爸爸，还有什么事？今天下午先去城里的家，我知道了。你晚上要在北京饭店请著名书法家吃‘开国第一宴’，好呀，好呀。喔，请爷爷、奶奶一道去吃‘开国第一宴’，好呀，好呀。下午见！”

张霞接完电话，春风满面地对毛泽东以及爷爷、奶奶宣布：“今晚，爸爸、妈妈在北京饭店恭请各位，吃‘开国第一宴’！”

毛泽东道：“谢谢你的爸爸。妈妈。我这位‘开国领袖’，还是头一回听说‘开国第一宴’，倒是很想去领略一番。”

吃罢“必胜客”，依然是张霞“收拾残局”——洗碗，“小放牛”给毛泽东化妆。这一回，“小放牛”只花几分钟，就把毛泽东化妆成了“文老先生”。

“今天，我‘打的’送主席到我家！”当毛泽东化妆毕，张霞三下五除二，已经把餐厅和厨房收拾干净。

“好，我又开始‘地下工作’！”毛泽东笑道。

这一回，张霞拦到一辆“桑塔纳”出租车，与毛泽东一起上车。

高处不胜寒

这一回毛泽东坐进出租车，已经是“老地下工作者”了，显得从容不迫。

张霞陪着毛泽东，都坐在后座，便于向毛泽东随时“解说”。

上车之后，张霞吩咐司机道：“丰台！”出租车便离开万寿路，朝西南方向，直奔丰台。

毛泽东问：“你家在丰台，都快到宛平城、卢沟桥了，那么远呀！”

张霞说道：“现在北京不仅长‘高’了，而且长‘胖’了。虽说现在的丰台，在北京西、南二环与五环之间，但是住在丰台，已经不算远的了。我的许多同事的家，比我还远。我每天先乘公共汽车，再换地铁，前往天安门广场上班，路上大约一小时。”

“小霞，你爷爷住‘万寿之路’，你住‘丰收之台’，都是好地方哪！”毛泽东说。

沿途，经过规模宏大的北京西站，毛泽东还是头一回见到这座新建的火车站。

对于毛泽东来说，丰台是永远难忘的。车子驶向丰台，毛泽东的脑海中浮现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毛泽东正乘着专列巡视大江南北。沿途，他不断接见各地党政军领导人，发表谈话，揭露林彪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

林彪在北戴河获知毛泽东的一次次谈话，如坐针毡，下达了秘密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之子林立果和他的同伙周宇驰接到林彪手令，策划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企图像当年日军炸掉东北统帅张作霖的列车那样，在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炸毁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发觉了林彪的阴谋，改变行程，在九月十一日下午突然提前

离开上海，通过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林立果措手不及，未能炸掉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的专列直奔北京。在十二日晚，当毛泽东的专列冲破重重险阻，北京站已经近在眼前时，毛泽东却突然决定车停丰台。毛泽东从丰台坐上轿车，平安回到中南海。

这消息震惊了林彪。子夜，林彪的二五六号专机从山海关强行起飞，飞向蒙古方向，最后在凌晨坠毁温都尔汗，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九一三”事件……

眼下的丰台，变得令毛泽东完全不认识了。这里，居然也高楼林立，到处是超级市场，到处是宾馆以及毛泽东从未见过的“卡拉OK”。

出租车驶进一个小区，迎面是一个巨大的喷水池和一座座希腊雕塑，完全是一派欧洲建筑风格。在一片片草地包围下的，是一幢幢高达二十八层的高层建筑。张霞让出租车在一幢大楼前停下。

“你家住在高楼？”毛泽东问。

“是的，现在北京新建的住宅楼，大部分是高楼。北京的地皮金贵，只能造高楼。”张霞一边说，一边领着毛泽东步入电梯。

张霞用手指摁了一下“28”电键，电梯直奔第二十八层。

“你住得那么高，真的叫‘高高在上’哪！万一电梯坏了，那可怎么办？”毛泽东说道。

“电梯有三部，这部坏了，还有那两部呢。如果三部统统都坏了，我就慢慢爬吧。”张霞说。

“我这老头子可不敢住高楼！”毛泽东说道。

出了电梯，张霞来到“2801”，一把门铃，马上听见里面一声“来啦”。

开门的是一位三十几岁的男子，眉清目秀，瘦高个儿，一派文弱书生相貌。他即便在家里，也是西装笔挺，系着领带，头发喷满“摩丝”，显得一丝不乱。

张霞向毛泽东介绍说：“他就是我的‘先生’。”

那男子彬彬有礼道：“您就是著名书法家文老先生吧。”他那普通话里，带着明显的粤语口音。

毛泽东：“在下正是。”

那男子连声道：“有请，有请。”

张霞一进门，便脱下皮鞋，换上拖鞋。看着毛泽东弯腰换鞋不便，就帮助他脱下皮鞋，换上拖鞋。

屋里窗明几净。张霞家跟他爷爷家，全然是两种风格：张军家全是黄色的门，黄色的窗，黄卡其面料的沙发、椅子，铺着绿色地毯，给毛泽东的感觉，跟他在中南海的房子风格差不多；然而，张霞家白门、白窗、白沙发、白床、白立柜，浅黄色地板，窗帘、桌、椅也都浅色调一派美国装修风格，加上高楼阳光充足，屋里显得格外明亮。

张霞家三室两厅两卫。除了主卧室之外，一间书房，一间客房。她是“丁克族”，家中没有孩子。

客厅里挂着巨幅荷兰郁金香照片，占了几乎整整一面坡。那鲜红、淡黄色的郁金香花朵与绿色草地映衬之下，客厅显得生机勃勃。

毛泽东刚刚走进客厅，那男子便双手递上一张名片。毛泽东一看，上面印着：“香港证券公司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陈港生”。

毛泽东看罢，说道：“陈代表出生在香港。”

陈先生答道：“正是，正是，家父家母都是台湾人，我出生在香港，所以取名‘港生’。根据香港法律，在香港出生，就是香港永久居民。”

这时，张霞从手提包里掏出毛泽东的名片，递给陈港生。

陈港生接过名片，对毛泽东说：“文老先生，请坐。”

毛泽东却没有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而是走上跟客厅相连的阳台，举目四望，丰台尽收眼底。他手扶着阳台上的栏杆，就像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大军的姿势一样。

毛泽东说：“我在北京住了几十年的四合院，没有住过高楼。看来，高楼也很不错。‘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高楼，叫人心胸

开阔。”

然而，毛泽东观景良久，又吟颂起宋朝的大诗人苏东坡的一首词《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

毛泽东吟罢，又重复吟诵了“高处不胜寒”！

陈港生不懂毛泽东为什么会对“高处不胜寒”这句诗反复吟诵，却说：“香港的高楼更多更高，一半的香港居民，住在十层以上的高楼里。香港气候暖和，在香港住高楼，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北京比香港冷得多。不过，我们这里安装了双层玻璃窗，就连我这个出生在南方、小时候没有见过雪的人，住在北京的二十八层楼上，冬天也不觉得冷。”

毛泽东对于丰台的历史，如数家珍。他说：“丰台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商、周时期，丰台为蓟和燕国之地，因‘丰宜门外拜郊台’而得名。大葆台汉墓、金中都古城遗址、金代卢沟桥、明朝宛平城，历代名胜，都在丰台。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的‘七七事变’，在这里的卢沟桥打响第一枪。还有，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前一天，毛泽东从南方回北京，是从丰台下车的……”

陈港生听罢，感叹道：“文老先生如此熟知丰台的历史，令我非常敬佩。我在丰台已经住了几年，说来惭愧，对丰台的历史一无所知。”

这时，张霞端出自己刚刚煮好的咖啡，放在毛泽东面前，说

道：“这是正宗的美国夏威夷科纳咖啡，是港生上个月出差美国时带回来的。这是用咖啡壶煮的，特别香，不是那种像泡龙井茶那样泡出来的速溶咖啡。”

毛泽东虽说喝惯了龙井茶，这时候也改一下口味。他呷了一口，这科纳咖啡，果真芳香四溢，非同寻常。

张霞对毛泽东说：“我跟港生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念书时认识的。他生在香港，长在台湾，上中学、上大学在美国。”

张霞知道，毛泽东对书的兴趣最浓，便领着他参观书房。书房里放着两台电脑。书房的整整一面墙，从地面到天花板，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白色大书架。

书架是一个窗口，可以透视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兴趣所在。张霞家的书架上，三分之一是英文版的医学图书，显然是张霞的业务用书；三分之一是英文版的经济图书，不言而喻是陈港生的业务用书；剩下的三分之一，虽然内容芜杂，却又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简体汉字图书，一部分是香港出版的繁体汉字图书，还有一部分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汉字图书。

在中南海，毛泽东跟自己的英文秘书林克以及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学过英语，不过只能说是初学者的水平而已，尚不能自如地浏览英文图书。毛泽东的目光，集中在那些中文图书上。他拿起一本《香港回归记》，打开一看，见到那个戴着黑框眼镜、教授派头的人物——现在毛泽东已经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正与英国查尔斯王子一起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香港已经回归了？”毛泽东惊奇地说。

毛泽东的话，使陈港生感到惊奇：“文老先生，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多年，您不知道？”

“董特首”为何人

这时，张霞赶紧解释说：“文老先生出院不久。他生了一场大病，昏迷多年，所以不知道香港回归，也不知道澳门回归。”

毛泽东问：“连澳门也回归了？”

陈港生答道：“香港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归祖国的，澳门是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回归祖国的。”

毛泽东显得很高兴：“祖国统一大业，前进了两大步。现在，只差第三步——解决台湾问题了！邓小平和江泽民干得不错！”

毛泽东讲这话的口气，已经完全不像书法家的口气，而是仿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上讲话。

毛泽东指着书上一面画着紫色的紫荆花图案的旗帜，问道：“这是什么旗？”

陈港生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香港盛产红花紫荆，花为五瓣，极为鲜丽。一九六五年，香港市民在评选市花时，就选中了紫荆。所以，紫荆便成了香港的象征。”

毛泽东又指着书上一个头发灰白、理着平头的人物的照片，问道：“他是谁？”

陈港生说：“董特首！”

毛泽东：“董特首？”

陈港生说：“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我们都习惯于喊他‘董特首’！香港政府的官员，都是香港人，这叫‘港人治港’。”

毛泽东又问：“香港特别行政区没有建立区党委？”

毛泽东的这一问题，显然又一次离开了书法家的身份。

张霞答道：“没有。邓小平对香港实行的政策，叫做‘一国两制’，也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仍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澳门回归之后，也仍旧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说，统一台湾之后，在台湾也可以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毛泽东对于“一国两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当年也有过这样的

想法，只是没有明确地归结为“一国两制”。

毛泽东问：“回归以后，香港生活怎么样？”

陈港生用九个字来形容：“舞照跳，股照炒，马照跑。”

毛泽东对“马照跑”不大清楚。

陈港生告诉毛泽东，香港人对于赛马，非常热心。在香港岛铜锣湾和湾仔之间，在那寸土尺金的地方，居然有一个巨大的跑马场，叫“跑马地马场”。这个跑马场始建于英国占领香港岛之初，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圈了这么一大片土地作为跑马场。后来，又在沙田建造了规模宏大的、能够容纳八万人的新赛马场。每年的六月至九月，是赛马的季节。赛马大都安排在星期六或星期日，有“日赛”，也有“夜赛”。每张马票在十元港币以上。香港是一个只有六百万人口的城市，可是每次赛马所发售的“投注彩票”，竟达五百万张之多！

毛泽东说：“看来，香港人很悠闲。”

陈港生连连摇头。他说，香港人正是由于平日生活节奏太快、工作压力太大，这才在休息日去看赛马，以寻求刺激、寻求乐趣。

陈港生说，不少香港人做“双班”。尤其是二三十岁的人，工资低，精力又好，打“双班”的更多。我认识一位电脑小姐，白天在公司做事，晚上在家用电脑为别人打字。打“双班”，拿双倍的工资，但是必须付出双倍的辛苦。即便是做“单班”的人，一上班，工作真刀真枪。在办公室里“泡”着，聊天，看报，是不大有的。正因为这样，香港的工资，大约是内地的十倍左右。当然，香港的房价，也差不多十倍于内地。

陈港生告诉毛泽东，香港人一早，习惯于在报摊上扔下一只五元港币的硬币，顺手拿一份报纸。然后进快餐店，要一碗红肠煎蛋面，来一杯热牛奶，或者来一根“油炸鬼”（油条），再来一碗粥——香港的粥里总是放着皮蛋、鸡肉、葱花之类，讲究“生、滚”。一边进早餐，一边看报纸。香港的报纸好多版，吃完早餐，未必能看完报纸。于是，一边乘地铁，或者一边乘汽车一边看报纸。进办公室时，那报纸已扔进了

垃圾箱。一上班，便全身心投入了工作。香港人的写字楼生活很压抑。由于上班时精神高度紧张，下班后家里房子又小，“上班族”们生活单调。下班之后，看看电视、电影，逛逛商店，搓搓麻将，跳跳舞，买六合彩，看赛马，算是一种生活的调节。

毛泽东说：“我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还没有去过香港。”

张霞告诉毛泽东：“现在去香港，非常方便，买张旅游票，办个港澳通行证，说走就走，从北京乘飞机，两个多小时，就到达香港新机场。你想去的话，我和港生陪你去，顺便到澳门走一走。”

陈港生说：“香港与澳门之间，有‘飞翔船’直达，用不了一个小时。”

陈港生解释说，“飞翔船”就是气垫船，速度非常快。

毛泽东问：“香港现在是‘舞照跳，股照炒，马照跑’，那么澳门是不是还应加一句‘钱照赌’？”

陈港生说：“没错。澳门虽小，却是世界三大赌城之一。另外两座赌城，都在美国，即‘拉斯维加斯赌城’和‘大西洋赌城’。对于澳门来说，‘博彩旅游业’是支柱产业之一。‘博彩’，也就是赌博。每年到澳门的旅客达五、六百万人次。其中，百分之二十是观光游客，而百分之八十是‘博彩游客’。现在，‘博彩旅游业’每年上缴的税收达三十多亿澳门元，占澳门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成了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张霞补充说：“文老，你还应当去深圳看看。”

毛泽东问：“深圳，是不是广东宝安县那个小镇？”

张霞道：“深圳真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已经从小渔村变成一座跟香港不相上下的现代化大都市！”

这时，陈港生有点疑惑：“文老先生是不是病了很久，连深圳的飞速发展都不知道。”

张世说：“文老先生病了二十几年！”

陈港生：“病了这么久呀！不过，现在看上去，文老先生气色很

好，身体很不错。”

毛泽东道：“有句话说，‘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我在医院躺了二十多年，早已成了‘落后分子’！”

张霞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深圳画册》给毛泽东看。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翻阅着《深圳画册》，对于“深圳速度”深表赞赏。

毛泽东问：“深圳怎么叫‘经济特区’？”

张霞说：“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国家给予优惠的经济政策。在中国，现在有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海南。不过，海南现在成了独立的一个省了——海南省。”

毛泽东看着《深圳画册》上邓小平巡视深圳的照片：“邓小平什么时候当上了‘总设计师’？”

张霞：“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是邓小平制定的，老百姓给了他‘总设计师’的美称。”

毛泽东看着《深圳画册》上江泽民巡视深圳的照片：“哦，江泽民成了‘总工程师’！”

毛泽东仔细看了《深圳画册》所载江泽民的另一张照片：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担任中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及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的江泽民，向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关于《广东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并回答质询。

毛泽东说：“原来，江泽民很早就参与了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工作。不过，那个时候，江泽民是个副部级干部，所以我不认识也。”

陈港生听到这位久病初愈的“文老先生”，口气倒是蛮大的：“文老先生，您原先是什么级的干部？”

毛泽东大笑说：“比江泽民要大些，只是生了一场大病，现在只好卖字糊口。”

张霞道：“昨天，文老在琉璃厂大笔一挥，写了四个字，就拿了两千元。”

陈港生说：“照这么说，文老写十个字，就足够您到深圳、香港、

澳门一游了！”

毛泽东说：“我不光是想去深圳、香港、澳门一游，我最大的愿望是在台湾岛上留下我的足印。当年，蒋介石统治台湾，我去不了；现在，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在台湾当权，我恐怕也去不了。”

陈港生说：“蒋经国早就死了！”

张霞告诉毛泽东，蒋经国死了之后，是李登辉当国民党主席和台湾政府“总统”。后来，国民党在竞选中被民进党赶下了台，现在的台湾“总统”是民进党主席陈水扁，人称“阿扁”。

毛泽东说：“我跟蒋介石还算有点‘交情’。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时候去不了，现在台湾改朝换代，跟新手‘阿扁’毫无交情，恐怕更去不了。”

毛泽东说罢，用手摸了摸唐装的衣袋。张霞一看毛泽东这动作，就知道他在摸香烟。毛泽东的唐装里，空空如也。

张霞对毛泽东说：“文老，很抱歉，我和港生都不抽烟，家里没有烟。”

陈港生说：“我去买烟。”

毛泽东说道：“我们何不一起出去走走？”

张霞问：“去哪里？”

毛泽东说：“就近去宛平城、卢沟桥吧。”

陈港生连声说：“好，好。尽管宛平城、卢沟桥近在咫尺，我跟小霞也只是在刚来丰台时去过一趟。今天中午，我就在宛平城里，请文老先生吃中饭。”

还是喜欢羊肉泡馍

从张霞家出去，就用不着“打的”了。陈港生从大楼的地下车库里开出一辆墨绿色的轿车，看上去要比“桑塔纳”轿车漂亮得多。顶上有一块透明的玻璃，车里格外明亮。

为了便于毛泽东观景，张霞仍然请毛泽东坐前座。上车之后，给毛泽东系好安全带。张霞独自坐在后座。

“文老先生，从丰台到宛平城、卢沟桥，不到十公里，很近。”陈港生说着，就驾车上路。

轿车上了高速公路，像飞一样前进。

“这是什么车？”毛泽东问。

“这是‘别克’（BUICK）牌轿车，是上海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资生产的，这家合资公司叫上海通用汽车公司。”陈港生是一位十足的“车迷”，“别克汽车公司成立于一九零三年，是以它的创始人大卫·别克（CAVID BUICK）的名字命名的。大卫·别克是一位天才的机械师，对于汽车机械有过许多重要的发明与改进。一九零八年，以别克汽车公司为核心成立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现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光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这一个公司的年产值，就远远超过中国全国轿车工业的总产值。”

听了陈港生的最后一句话，毛泽东久久沉默。毛泽东记得，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他发出了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号召，而当时赫鲁晓夫则发誓要在十五年内超过美国。如今，苏联已经土崩瓦解，而中国跟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还是很大。

“这车是你自己的？”毛泽东终于这么问道。

“是的。在北京，我算是‘白领’阶层。‘白领’们很多都分期付款买了私家车。”

“现在，一辆轿车多少钱？”

“‘桑塔纳’算是中档车，一般是十多万元人民币一辆。‘别克’虽然也是中档车，但是属于‘中上’档次，二十八万元人民币一辆。低档车的价格在十万元人民币以下，比如‘夏利’就是十万元人民币一辆。高档车就难说了，四五十万以至一百多万人民币的，都有。”

“这么贵，谁能买得起？”毛泽东问。

“现在，中国的贫富差别很大。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买得起

轿车。就连一百万元以上的高档进口轿车，也买得起。但是，‘下岗’的工人，一个月只有二三百元的生活补贴费，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陈港生说。

毛泽东不明白什么叫“下岗”，经张霞解释，原来“下岗”就是失业。

毛泽东得知中国有那么多人“下岗”，感慨地说：“过去，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失业！”毛泽东总是习惯于与过去比。

“其实，在美国，在日本，在欧洲，在香港地区，贫富差别比中国还大。”陈港生则总是习惯与别的国家、地区比。

“在中国，只有在解放前，才有私家车。”毛泽东又习惯与过去比。

“在美国，私家车比比皆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拥有自己的车。”陈港生又习惯于与美国比。

这时，张霞有所发现，说道：“文老，我发现，你的习惯思维，总是要跟过去比，这个过去包括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以至国民党时代，是‘纵向思维’、‘纵向比较’。上了年纪的人，容易进入这样的思维模式。我爷爷、奶奶的思维方式，跟你一样；我们年轻人，则习惯于‘横向思维’、‘横向比较’。港生在香港、台湾以及美国生活了多年，在证券公司工作以后，又常去日本、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所以他遇上什么事情，总习惯于‘横向比较’。我也是这样。”

毛泽东听了，十分赞同：“小霞，你倒能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人的阅历不同，思维的方式当然也不同。”

张霞道：“这叫‘代沟’。我与港生早就发现，跟爷爷、奶奶间存在着‘代沟’。这两天跟你在一起，我也发现，我们之间存在‘代沟’。”

“不过，‘代沟’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沟通。我从你们年轻人那里，学习到许多新鲜的东西。”毛泽东说。

“我也是。我从你那里学到许多历史经验。”张霞道。

正说着历史，富有历史感的卢沟桥便呈现在眼前。

如今，卢沟桥头竖立着汽车禁止通行的标志。卢沟桥只供参观，不再起桥梁的作用，因为卢沟桥见证着日本侵华史，整座桥成了一处历史文物。上桥要买十元钱门票。

冬日，卢沟桥桥下无水，宽阔的河床裸露着。在卢沟桥两侧，分别新建了公路桥和铁路桥，汽车、火车从那两座新桥通过。

在陈港生与张霞的陪同下，毛泽东走上卢沟桥。倘若在往日，毛泽东定然在前呼后拥之中登桥，处于新闻记者的重重包围之中，他的每一句话都会有人记录，作为“最高指示”，翌日《人民日报》就会在头条地位刊登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卢沟桥》。如今，毛泽东像普通百姓一样在这里参观，他感到分外的轻松。

一上桥，就见到桥头竖立着石碑，上面镌刻清朝乾隆皇帝御笔“卢沟晓月”四字。毛泽东又伸出右手食指，在左手心比画，捉摸着乾隆皇帝的书法。

卢沟桥的两侧，是两排形态各异的石狮子。毛泽东很有兴趣地观赏着石狮子。

这一回，毛泽东成了“导游”，他告诉陈港生与张霞，桥下的河，如今叫永定河，原名卢沟河，卢沟桥是因河得名。卢沟桥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是北京现存的最为古老、最雄伟的一座联拱石桥。

毛泽东又说道，卢沟桥上总共有四百九十八个石狮子，或坐或卧，形态各异。

毛泽东感慨地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队借口一个日本士兵在宛平城里失踪，要求进城搜索，被中国军队拒绝，日军按照事先的预谋，冲过卢沟桥，向宛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著名的“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八年神圣抗战从此拉开序幕。

离卢沟桥不远，是保存完好的宛平城的城楼和城墙。宛平城建于明

崇祯十一年，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宛平城筑有城楼和瓮城。城的四角有角台，角台上盖有角楼，南北城墙中设有中心台，台上设有敌楼，城墙四周外侧都有垛口，垛口上有盖板和望孔，下有射眼。城墙基础以砖石构成，厚实坚固。

在卢沟桥和宛平城墙上，毛泽东见到当年日本侵略军遗留下的弹孔。毛泽东说，日本侵华的历史是无法抹杀和篡改的。

张霞告诉毛泽东：“日本小泉首相，曾经不得不在这里低头。”

宛平城古色古香。城不大，显得典雅。时值隆冬，游人不多。他们仨在城中漫步，忽然见到前方挑出一只红色的帆子，那是饭馆的标志。走近一看，招牌上写着“羊肉泡馍”，毛泽东就踱了进去。

毛泽东对陈港生、张霞道：“就在这里‘打尖’。”

陈港生以为，用这十元钱一碗的羊肉泡馍招待文老先生，太过意不去。张霞却因为听毛泽东说过当年怎样“擅自”在北京新街口吃羊肉泡馍而挨了“批评”的故事，知道毛泽东对羊肉泡馍情有独钟，也就不加阻拦。就这样，他们在羊肉泡馍店里坐了下来。

“师傅，多加点红油、辣酱！”毛泽东吩咐道。

一边津津有味吃羊肉泡馍，毛泽东一边仍不忘“调查研究”，跟陈港生、张霞边吃边聊。

“陈先生，你在证券公司工作。证券、股票，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在香港可以，在台湾也可以，现在怎么北京也办起了那么多的证券公司？”毛泽东问。

“邓小平先生对中国的经济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陈港生说，“中国的企业，过去全是‘国’字号——国营经济，现在大量涌现‘非公经济’、合资企业、外资企业……”

“什么叫‘非公经济’？”毛泽东不解。

“‘非公’，就是‘私’嘛！”

“‘非公经济’，其实也就是私营经济。唉，绕了一个弯，来了个‘否定之否定’，听起来费劲！就像明明是男人，却一定要说他

是‘非女人’，多别扭！”毛泽东笑道。

“其实，就像把失业说成是‘下岗’、‘待岗’一样，要好听一些。”张霞说道。

陈港生继续答复毛泽东的问题：“企业进行改制，改为股份制，就有了股票。企业要向社会融资，股票就要上市，就需要证券市场、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股票市场，会使人产生投机倒把、不劳而获的心理。我看，资本主义的一套，未必适合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依然是“老脑筋”。

陈港生毕竟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他尽量超越“代沟”，向毛泽东讲解证券、股票跟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的特点……

“饭后一枝烟，赛过活神仙”。毛泽东在宛平城里买了一包中华牌香烟，慢悠悠抽了起来。

就在这时，张霞的手机响了。

张霞：“呢，是爸爸，我们正在陪文老先生宛平城里吃中饭呢。吃什么？吃羊肉泡馍。什么？怎么可以请客人吃羊肉泡馍？是文老先生自己点的，他喜欢吃羊肉泡馍。你和妈妈在等我们？好，吃完羊肉泡馍，我们就陪文老先生直接到你那里去。什么？直接去Office，好的，好的。”

三个人吃了三碗羊肉泡馍，陈港生给了招待小姐一张百元大钞，那小姐找给他七张拾元人民币。

陈港生让毛泽东和张霞在泡馍店里稍等，自己到停车场把“别克”轿车开过来。

当他们仨上了那辆光彩四射的“别克”轿车的时候，泡馍店的招待小姐们都投来惊异的目光，因为乘坐这样档次轿车的客人们。几乎很少光临他们这家小店。

第七章 奢华豪门

笑谈“下海”

“别克”轿车离开宛平城，上了高速公路，朝北京市中心飞奔。

冬天的太阳暖暖地照着。一棵棵光着枝杈的树，朝后掠去。公路两侧是冰雪覆盖的田野。

今日是周末，路上车不多。过了丰台，公路两边大楼挨着大楼，变得热闹起来。上了西三环，一路是立体交叉，没有见到一个红绿灯。再往东转弯，就进入北京的东西轴心线——长安街。过去，在毛泽东的印象中，卢沟桥是很远的地方，如今不过半个小时，“别克”轿车就从天安门城楼他那幅巨大的画像前驶过。

王府井大街出现在毛泽东眼前。在王府井大街与东长安街的交叉口，出现一大排镶着银灰色玻璃幕墙的高层大楼，气势宏伟，这是毛泽东没有见过的。

陈港生告诉“文老先生”，这是新建的东方广场，包括位于东长安街的商场和一个中央喷水泉广场、多个四季常绿的花园和一个庞大的三层室内停车场。

陈港生把“别克”轿车驶入那室内停车场，然后他们仨沿着楼宇间黑、白、红彩色地砖铺就的步行道漫步，见到变幻多姿的中心喷泉，见到鲜花竞放的造型花坛，令人心旷神怡。

陈港生又习惯于进行“横向比较”。他说，这里足以与美国纽约的曼哈顿、日本东京的银座以及香港的中环这样最繁华的商业区相媲美。

“文老先生”则习惯于“纵向比较”。他说，比起一九五九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在北京兴建的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要更加气派，更加现代化。

陈港生告诉“文老先生”，东方广场的主要投资商，是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先生。李嘉诚先生是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早年因家庭贫困在香港当过学徒、店员、工人和推销员。一九五〇年在香港开设长江塑料厂，生产玩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已成为世界超级亿万富翁。

张霞则把“幕后新闻”告诉毛泽东：这里，不仅仅是“黄金地段”、“白金地段”，而且是“钻石地段”。在这样的地段造楼，当然要造美国曼哈顿那样的摩天大楼，甚至是像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那样的一百多层高楼。只是因为造了摩天大楼，西边的中南海里的一举一动，全在眼皮底下，所以，只能造二十多层的高楼。东方广场这十三幢高楼西低东高，就因为这个缘故。

乘电梯，登上东方经贸城第十八层。张霞说，“十八”谐音就是“要发”，大公司都喜欢租这一层，所以这一层的租金最贵。

张霞熟门熟路，来到A座，门口横卧一块比乒乓球桌还大的深红色大理石，上面镶着一行金色大字：“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部”。

张霞一掀门铃，一位无锡“大阿福”一般胖墩墩的中年妇女前来开门。她穿一身紫红色的丝绒旗袍，紧紧地裹着身子，满身的肉仿佛要胀出来似的。粗壮的双脚蹬着一双白色高跟鞋。

张霞一下子搂住她的脖子说道：“妈妈，文老先生来了！”

陈港生也说道：“妈妈，文老先生来了！”

当毛泽东正在与张霞母亲握手之际，从办公室里面传出宏亮的男声：“欢迎！欢迎！欢迎文老先生！”

来者穿一身黑色西装，没有击纽扣，那便便大腹就显得更加突出。不言而喻，他是张霞的父亲。他伸出粗而短的手，跟毛泽东握手。

会客室很气派，中间是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的小区模型，那是他们正在开发的一个商品房小区。四周是一圈红色的牛皮沙发。

张霞父亲把毛泽东领进他的董事长办公室。平日，来了贵宾，他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

一进屋，毛泽东就感到脚下软软的。一看，整个房间铺着厚厚的羊毛花地毯——走廊和其他房间，铺的是化纤地毯。

屋里，全套的紫黑色红木家具，跟张霞家那白色西洋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

张霞父亲请毛泽东在宽大的红木太师椅上坐定，马上递上名片：“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豪”。

这时，张霞也赶紧替毛泽东递上“书法家文润之”的名片。

张霞母亲给毛泽东递上一杯碧螺春，张豪则给毛泽东递上一包熊猫牌香烟，说道：“这是‘邓大人’最爱抽的。”

毛泽东问：“邓世昌‘邓大人’，那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抽香烟？”

张豪惊愕这位文老先生怎么连“邓大人”是邓小平都不知道？

这时候，张霞又得重新解释一遍：“文老先生久病初愈，昏迷多年。”

陈港生则补充道：“文老先生大病之后，恢复甚好，思维非常敏捷。”

张豪笑道：“文老先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毛泽东笑道：“托福！托福！”

这时，张豪坐到自己那张宽大的“老板椅”上，面前是硕大的红木“大班桌”。他对“文老先生”说：“刚才我父亲来过电话，问文老先生来了没有？他再三叮嘱，一定要好好招待文老先生，说文老先生不仅是他的老战友，而且是他的老上级。本来，我想在家里接待您，我家就在后面的‘东方豪庭公寓’。因为今天是周末，公司里不办公，很清静，所以还是请文老先生来公司，可以为我们的楼盘题字。再说，北京饭店就在公司对门，晚上去那里吃饭也很方便。”

张豪说着，朝窗外一指。毛泽东举目望去，便见到北京饭店米黄色的外墙。

张霞母亲听了，说道：“爸爸是部长级干部，文老先生是爸爸的上级，那是比部长还大的官，是高干里的高干！”

毛泽东道：“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我是普通百姓一个。我姓文，命中注定是文人墨客。”

张霞母亲却说：“哪里，哪里。高干就是高干。在北京城里，有高干背景的好办事。”她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张豪今天能够坐在这老板椅上，他那“高干背景”起了不小的作用。

毛泽东虽说“久病初愈”，倒是听明白了张霞母亲那“话外音”。

张霞母亲问起“文老先生”的子女，以为一定个个是大老板。

毛泽东答道：“我呀，有过十个子女！”

张霞母亲一听，说道：“张家才张豪一个儿子，就已经这么风光。文老先生十个子女，个个都是大老板，不得了。”

毛泽东据实答道：“我的十个子女，在战争中只存活四个。其中两个儿子，两个闺女。长子留学苏联，后来牺牲在朝鲜战场。”

张霞母亲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毛泽东接着说：“老二也留学苏联，回国之后翻译过斯大林的五六本著作。后来长期生病，现在离休在家。”

毛泽东抽了口烟，继续说道：“一个女儿，也是从苏联回来，在国防科委工作，现在离休了，过着普通百姓生活。另一个女儿，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过报社总编辑，还当过北京市领导，现在也离休在家，靠离休工资过日子。在长子牺牲后，我劝长媳改嫁，嫁了个师长，现在在家里写回忆录。二媳妇是军人，有着将军军衔。”

张霞母亲又问起“文老先生”的孙子。

毛泽东等道：“他呀，‘书呆子’一个，研究生毕业，读了硕士，又读博士，在研究明朝历史。”

张豪道：“这么说，‘文老先生’一家，全部在‘岸上’。”

毛泽东不解什么叫“岸上”。

张霞连忙解释说：“现在把做生意，叫做‘下海’。你们家都在‘岸上’，就是没人‘下海’做生意。”

毛泽东笑道：“我们全家都是‘旱鸭子’！”

毛泽东这一句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笑毕，毛泽东道：“我的水性倒是不错，从小就喜欢游泳。我向来‘游大不游小，游长不游短，游深不游浅，游险不游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游过湘江、珠江、北戴河，我七十几岁的时候，还横渡过长江！”

这时，张豪说道：“我跟女儿小霞一样，也是‘狡兔三窟’。小霞的‘三窟’，是爷爷、奶奶家，爸爸、妈妈家，她自己家。我呢，我的‘三窟’，‘一窟’在这里的东方豪庭公寓，‘一窟’在十三陵水库，还有‘一窟’在海南岛。在这‘三窟’之中，有两‘窟’在水边，欢迎文老先生常来住住，夏游十三陵水库，冬游南海。这么一来，您也下海了！”

毛泽东不明白，张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窟”呢？

“豪门府邸”

于是，张豪这位“大老板”便向毛泽东细细道来。张豪的一席谈话，给毛泽东上了“中国当代房地产”这一课，毛泽东“隔世”已久，从未听说这么多关于房子的新概念……

张豪说，他现在过的是“5+2”的生活方式。

什么是“5+2”的生活方式？那是指一周之中，五天住在市中心，因为每天要上班；到了周末、周日这两天，到郊区去休闲。

要过“5+2”的生活，必须在市区有一“窟”，郊区有一“窟”。张豪在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买了一套别墅。

这套别墅，坐落在十三陵水库之畔，时髦的名字叫“水景住宅”，又叫“亲水住宅”。张豪说，在北京，“沾”水的住宅都看涨。有的地方没有湖，没有水库，也没有河，那就挖个人工湖，也算“沾”了一点水。

张豪说，他现在还过“11+1”的生活方式。

什么是“11+1”的生活方式？那是指一年之中，十一个月住在北京；到了“四大长假”，也就是元旦、春节、五一、国庆，每次长假七天，加起来差不多就是一个月，这一个月去旅游胜地度假。

要过“11+1”的生活，除了在北京已经有两“窟”之外，在外地还要有一“窟”。

张豪说，许多北京的大老板在北戴河、青岛、大连买房子，他嫌这些地方太近，跟北京的气候相差不大。他在海南岛买了一套别墅，专供度那“四大长假”。

毛泽东想，当年虽然他也多次去北戴河、杭州，毕竟他是中国的最高领袖，何况他去这些地方也总是在工作，再说，那些地方的房子并不是他的私产，而是公家的房子，供他临时住一下而已，就像住旅馆一样。然而，张豪这“三窟”，都是属于张豪的个人财产。

“现在不是国家分房子，而是个人买房子？”毛泽东问。

“是的。往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城市住房由国家投资建设，建成公房，然后无偿分配给职工，每月收取低廉的房租。这叫‘福利分房’。那房子叫‘福利公房’，因为分房子成了一种福利。”当张豪提及“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毛泽东的神经仿佛被烙铁烫了一下。张霞也微微一惊。

张豪接着说道：“自从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实行‘开放、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住房制度也随之大改革。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宣布结束‘福利分房’，从此房子不再跟‘福利’联系在一起，谁都得花钱买房子。房子从此也就成了商品，成了‘商品房’。”

毛泽东还是头一回听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名字，头一回听说“商品房”。

张豪告诉“文老先生”，中国的住房制度进行了大改革。就拿张家三代来说，现在的住房情况各不相同……

正说着，张军和“小放牛”来了。他们刚才去王府井大街买东西，手里拎着个大纸盒，顺路就过来了。张军穿一身西装，毛泽东差一点认

不出他来了。

知道儿子在给“文老先生”上“中国当代房地产”课，张军也就“现身说法”……

张军说，那时候，参加工作后先住几年集体宿舍，结婚时可以分到一间大杂院的住房，然后随着每一次职务的提升，往往得到一次重新分房的机会。那时是以职务大小决定房子的大小。每一次分房，都要交出所住的房子，而新分的房子总是比原先大一些、好一些。直到他成为部长级干部，才分到万寿路那样又大又新的房子。

张军说，这种由国家分配给他的“福利公房”，到了改革的年代，国家鼓励居民买下来。买下之后，这种产权属于自己的房子，叫做“售后公房”，就像他买下自己在万寿路所住的“福利公房”。

如今，他在万寿路所住的房子，就是“售后公房”。在购买自己所住的“福利公房”时，国家给了许多优惠，所以“福利公房”的价格并不高。

这时，张霞跟陈港生这小俩口说，他们没有享到毛泽东时代的“福”。他们这年龄的年轻人，还没有分配到“福利公房”，国家就关上了“福利分房”的大门。所以他们就只得自己掏钱在丰台买了商品房。

张豪的“住房经历”最复杂。他说，他有过一套“福利公房”，只是那时候他的级别远远不及父亲张军，所以当年他分到的“福利公务”很小很旧，是别人“升官”后换下来的旧房子。不过，在改革的年月，他“下海”了，生意做得不错。先是倒卖彩色电视机，后来倒卖进口汽车，接着又去炒股票，赚了大把大把的钱。他“转行”到开发房地产，先是小打小闹盖一幢商品房，后来赚钱越来越多，成了大老板，开发大片大片的商品房小区。有了钱，他先在北京市区买了一个“窟”，接着又在十三陵水库和海南岛买了两个“窟”，这才变成“狡兔”。不过，他说，他在北京市区的房子，换了好多次，从小房子换成“中房子”再换成大房子，从差的地段到黄金地段再到“钻石地段”。

张家三代的住房是中国当代不同层次不同住房的缩影：从“国家老干部”张军的“售后公房”，到“白领”陈港生、张霞的“小康”商品房，到“大老板”张豪的豪华“三窟”。

张豪直截了当地告诉“文老先生”：商品房姓“商”。所谓“商品房”，就是明明白白地说，房子是商品，就像电冰箱、电视机一样，只要付钱，谁都可以买。或者说，你想拥有房子，就像拥有电冰箱、电视机一样，必须付钱。商品房是商品。只要你手中有钱，你就可以买商品房。你爱买什么地段、多大面积的房子，都不受限制——惟一的条件是你按商品房的价格付钱。

张豪说，商品房，这本来是很普通的市场经济的产物，可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对人们传统观念的极大冲击。须知，在中国大陆，人们的“身份”原本是按照“级别”来定的。官越大，级别越高，享受的待遇也越高。那时，人们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住房靠国家，分房按等级。”这种“级别”之差，表现在种种方面：工资按照级别逐级升高；副部长以上干部不仅有轿车，而且还配有专职司机；干部的住房，级别高的往往地段好而且面积大；坐火车，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可以坐软卧……这种按照干部“级别”之差分配住房，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张豪说，这种干部“级别”之差，在开放、改革的大潮冲击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的冲击下，逐渐被金钱的“级别”之差所取代：那些新冒出来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们，收入早已远远超过政府官员们；有钱可以买高级轿车，比高级干部们的轿车更阔气；坐火车软卧原本是相当级别的干部、教授、外宾、港台人士们的“专利”。最有钱的个体户，也无法跨进软卧包厢的门。可是，自一九九五年十月起，中国铁道部终于宣布，软卧实行“认钱不认人”。只要你花钱买软卧车票，你就可以坐软卧。理所当然，住房制度也受到经济大潮猛烈冲击。商品房也是“认钱不认人”。你有钱，你就能买商品房。你愿意买黄金地段也罢，你愿意买整层以至整幢都可以，惟一的条件是你付得出大把大把

的钱。

作为房地产的大老板，张豪说，商品房的出现，表明从按“级别”分房，转变到以钱买房。这是思想观念的极大转变。这是一大转变，是商品房的一大贡献。

面对房地产的大老板张豪的一席谈话，毛泽东既感到新鲜，又困惑。毛泽东在思索着：中国住房制度的大改革，方向对不对？中国出现张豪这样的新生资本家，是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正在中国复辟？

张豪领着“文老先生”来到会议室，参观楼盘模型。张豪说，这个新开发的楼盘叫“豪门府邸”，敬请“文老先生”为新楼盘题名。

宣纸、笔墨早就准备好。毛泽东碍于张军的情面，只得挥就“豪门府邸”四个大字。

“好字！好字！”张豪虽然不懂书法，但是看得出“文老先生”的字龙飞凤舞，确实好看。他说，这四个字将制成金字，不仅镶嵌在小区大门口的大理石上，而且要镶嵌在每一座大楼的大门上方。

这时“小放牛”拿出那个大纸盒，说道：“文老先生，我和张军刚才在王府井大街，给您买了一套西装以及换洗衬衫，请试一下是否合身？”

“文老先生”摇头道：“我一辈子没有穿过西装！”

“正因为一辈子没有穿过西装，更应该穿！”张军道，“我一开始穿西装，也不习惯，渐渐地习惯了。你看，我、张豪、陈港生，爷、儿、孙三代，今天不约而同，一律西装！”

实在拗不过张军夫妇，毛泽东只得从命，换上了西装，正合身！

毛泽东走到镜子前，看到自己穿西装、系领带的模样，笑道“看样子，我也‘全盘西化’啦！”

不过，毛泽东毕竟不习惯于穿西装，最后还是换上唐装。

开国第一宴

东方广场在王府井大街与东长安街交叉口的东侧，北京饭店则在交叉口的西侧。不乘“别克”，也不坐“桑塔纳”，从东方广场到北京饭店，不过隔着一条王府井大街，步行一、两分钟就到了。

王府井大街已经改为步行街，地面铺了长方形花岗石，显得非常整洁。毛泽东在走过王府井大街时，忽然有个中年妇女给他塞过一张纸来。毛泽东原本以为是一张“文革”传单，接过来一看，却是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一张租房广告！那个中年妇女，站在街口，见到过往行人就塞一张广告，给张军家每一个人都塞了广告，令张军不由得记起“文革”年月红卫兵散发传单。

北京饭店是北京首屈一指的老饭店，而且至今仍是北京第一流的五星级饭店。对于北京饭店，毛泽东极为熟悉，因为他不知道到这里来过多少次。在一九六四年秋北京建成京西宾馆之前，每一次中共中央全会，如果在北京召开的话，必定是在北京饭店召开。在召开中共“八大”时，代表们也是住在北京饭店。每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开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往往住在北京饭店。毛泽东不仅在北京饭店出席诸多会议，而且在会议期间多次前往北京饭店看望代表。

然而，如今毛泽东踏进北京饭店，却几乎不认识了。因为北京饭店经过重新装修，焕然一新，金碧辉煌，“鸟枪换炮了！”

张豪夫妇带领着“文老先生”、张军夫妇、张霞夫妇步入宴会大厅。大厅里整整齐齐安放了八十张圆桌。张豪他们七人坐了一桌。

张豪告诉“文老先生”，今天不是一般的宴请，而是北京饭店最有特色的“开国第一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毛泽东主席在这里举行盛大国宴，成为北京饭店历史性的一天。如今，北京饭店按照那天国宴的菜单，特制“开国第一宴”。这“开国第一宴”本来只在每年十月一日晚上举行，总共八十桌，因为开国那天的晚宴是八十桌。由于四面八方的客人闻讯蜂拥而来，北京饭店不得不把“开国第一宴”改为“常设节目”，每逢周末开宴，每次八十桌！真巧，今天正值周末，赶上了“开国第一宴”……

毛泽东一直微笑地听着。对于他来说，出席“开国第一宴”，比昨晚吃“毛家菜”更加开心，因为可以重温他一生中历史性的一刻。

这时，服务小姐前来，手里拿着一叠“宴会门票”。张豪拿出支票本，大笔一挥，开了一张一万四千元的支票，交给服务小姐。服务小姐给了张豪七份“宴会门票”——每份两张。

这时，又有一位服务小姐来了，朝七人打量了一番，在纸上作了记录。没一会儿，七位服务小姐来了，每人手捧一套晚礼服。小姐们帮助客人更衣。真是难以相信，每套晚礼服都是那么合身——那位用目光“测量”身材的服务小姐，实在量得准确。小姐们送上晚礼服之后，从张豪手中拿走了七张门票。

“文老先生”问：“怎么吃饭还送衣服？”

张豪答道：“‘开国第一宴’有两种门票，一种是普通门票，每位八百元，包括餐饮费、观摩演出费；还有一种是豪华门票，每位另加一千二百元，赠送一套美国进口的晚礼服。我们买的是豪华门票。

“文老先生”笑道：“开国那天，举行晚宴，我没有见到‘赠送一套美国进口的晚礼服’！”

张豪非常惊讶：“这么说，‘文老先生’亲身出席‘开国第一宴’。了不起！了不起！”

张豪太太说：“‘文老先生’是爸爸的上级，官比爸爸大多了，当然有资格出席‘开国第一宴’。”

“文老先生”道：“今天我坐在这里，有一种‘历史感’！张豪先生，谢谢你给了我重温历史的机会。”

看到张军一家都换上晚礼服，毛泽东只得“从众”，这一回总算脱下唐装，换上了晚礼服。

客人们陆续坐满了宴会厅。

晚宴主持人身穿中山装，步上舞台：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在北京饭店，举行富有历史意义的‘开国第一宴’”。

“北京饭店是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店。这里凝聚着中国二十世纪的兴衰荣辱，历史巨变。”

“一九零零年，按照中国的纪年方法叫庚子年，这一年有两个法国人在现在的苏州胡同南边路东，开了一个三间门脸的小酒馆，这就是北京饭店的前身。他们靠卖一两毛钱一杯的红、白葡萄酒和煎猪排、煎鸡蛋之类的酒菜，逐渐发家。一九零五年，意大利人卢苏把饭店迁至现址，原本打算盖五层楼，但由于资金问题，只盖了一层楼就停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经济开始复苏，来华的旅游者日益增多，中法实业银行看准这一投资机会，买下了这座饭店，并追加投资，于一九一五年建成了一座五层红砖楼房，生意十分兴隆，这就是人们常常提起的北京饭店‘老楼’。后来，北京饭店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北京第一号大饭店。”

“北京饭店的历史，浓缩着一部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末代皇帝溥仪在御花园第一次品尝西式茶点，就是由北京饭店派出服务员服侍的，而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的袁世凯也曾在北京饭店举办过盛大的鸡尾酒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法联军总司令福煦以及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光临北京饭店。孙中山先生、张学良将军和冯玉祥将军曾经先后下榻于北京饭店。”

主持人在提及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之后，提高了声调：

“令北京饭店全体员工永远难忘的光辉日子，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饭店的中餐厅，举办一次盛大而隆重的宴会，招待各方来宾，这就是著名的‘开国第一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宋庆龄等开国元勋出席了这次盛会。北京饭店保留了‘开国第一宴’菜单。按照当时菜单，把‘开国第一宴’奉献给各位。现在，‘开国领袖毛主席’与各位见面……”

在热烈的掌声之中，那个“假毛泽东”古月出现在舞台上。他高举酒杯，向大家敬酒。

古月还走下舞台，向一桌桌来宾敬酒。当他来到毛泽东面前，身穿中山装的“假毛泽东”与身穿晚礼服的真毛泽东一起碰杯，张霞及时地抓住这一难得的瞬间，拍下了精彩的照片。

就在这时，一个跟毛泽东一样头戴法国无沿帽的中年男子，勾起数码相机，也拍下了这一镜头。那中年男子似乎对毛泽东格外注意，又走近拍了一张特写。当他还要再拍时，警惕性颇高的张军用上阻止了那男子，不许他再拍。

接着，中国歌舞团在舞台上演出。“开国第一宴”在歌舞声中开始。

毛泽东很有兴致地看着“开国第一宴”菜单，其中包括八道冷菜、七道热菜和四道点心。

八道冷菜是桂花鸭子、油鸡、桃仁冬菇、虾籽冬笋、油炸黄瓜条、五香熏鱼、镇江肴肉、水果；七道热菜是银盅鱼翅、罐焖四宝、干火烤大虾、草菇蒸鸡、鲜蘑菜心、红烧鲈鱼、清炖狮子头；点心是炸春卷、豆沙包、菜肉烧麦、千层油糕。

毛泽东的记性不错，尽管已经事隔多年，他仍记得热菜似乎没有那么多，而且没有银盅鱼翅这样的高档菜。

张豪笑道：“‘文老先生’真是好记性。原本只有四道热菜，现在增加了三道新菜，就是银盅鱼翅、罐焖四宝、干火烤大虾，而红烧鲈鱼原为红烧鲤鱼。增加三道新菜，是为了提高档次。”

“文老先生”却摇头：“应该保持历史原貌，让后人知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开国第一宴’也不过如此。艰苦奋斗的传统，要永远发扬光大。”

见到“文老先生”面露不悦的神色，擅长“横向思维”的张霞，岔开话题，说起美国的故事：“‘文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也有一家北京饭店呢！”

“是吗，美国也有北京饭店？”“文老先生”很有兴趣。

张霞告诉“文老先生”，华盛顿的这家北京饭店很有名气，连美国

总统布什也多次光顾。

“布什，不是美国驻中国的联络处主任吗？”一说起布什，毛泽东马上记起来了。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布什担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主任，毛泽东曾经接见过他。

张霞说，那个布什，如今大家都叫他“老布什”。老布什当年在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时，喜欢吃中国菜，尤其偏爱北京烤鸭。从一九八九年一月至一九九三年一月，老布什担任美国第五十一届总统。老布什多次在华盛顿的北京饭店吃北京烤鸭。

张霞又说，布什的儿子小布什，从二零零一年一月起担任美国第五十四届总统。受父亲影响，小布什也喜欢中国菜。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一天傍晚，小布什夫妇、弟弟杰布夫妇、妹妹多罗西夫妇和后来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女士，一共七个人来到华盛顿的北京饭店为杰布过生日。他们点了北京烤鸭、蒜苗肉丝、椒盐明虾、京味羊排和四季豆五道中国菜。小布什用荷叶饼卷上几片烤成金黄色的鸭片，再配上葱丝和甜面酱，显得十分内行。小布什在宣誓就任美国第五十四届总统后用的第一顿晚餐，就是在华盛顿的北京饭店！

听张霞讲述华盛顿的北京饭店的故事，毛泽东才明白，当年那个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瘦高个子的主任，后来不仅自己成了美国总统，连儿子也成了美国总统。

在歌舞谈笑声中，身穿晚礼服的毛泽东愉快地吃完“开国第一宴”。他正准备随张军回到万寿路的时候，张豪却说：“‘文老先生’，今晚另有安排，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张豪要给毛泽东什么惊喜呢？

夜宿“皇帝套房”

张豪安排“文老先生”今晚住哪里呢？

张豪带领“文老先生”等一行乘电梯从宴会大厅上了十七楼，服务

小姐打开西侧尽头一套房间，恭迎贵宾。

一进门，迎面便是八角形的“八角厅”，映入眼帘的是楠木透雕的缠枝花卉、落地花罩。上方悬挂着水晶吊灯，两侧摆着精美的陶瓷、玉和玛瑙制成的花瓶及艺术品。

步入八角厅，毛泽东却忽然记起，在井冈山上的茅坪，有一座八角楼，原本是攀龙书院的课堂，楼上用明瓦砌了八角形图案，使课堂光线明亮，也就得了“八角楼”之名。毛泽东正是在八角楼初识井冈山的女英雄贺子珍。当然，井冈山的八角楼无法与眼前这豪华的八角厅相比。

八角厅左侧为气势恢弘的会客厅。会客厅由前后两厅组成，分别为会议室和休息室。会议室靠墙摆着一排楠木太师椅，考虑到太师椅太硬，配以明黄色的软垫。墙上挂着多幅烫金龙形雕塑。

八角厅的另一侧是书房和主卧室。

书房的书柜上，摆着线装的唐诗宋词和四书五经，并配以精美的红木匣子。

主卧室又细分为外室与内室，外室放着四把椅子，两把茶几，内室安放大床。两室之间，用仿故宫葆中殿的透雕蝙蝠流云八宝落地罩相隔。主卧室内的床，是楠木四柱架子床，睡衣则是明黄缎制的，上绣花卉，看上去像是“龙袍”。

主卧室右侧为夫人卧室和随员卧室及卫生间。

这套包括八角厅、餐厅、会客厅、书房、主卧室、夫人间、随员卧室、卫生间、过厅、专用电梯间等十二个房间组成的豪华大套间，总面积为五百多平方米。

虽然毛泽东在看望会议代表时，到过北京饭店许多房间，却从未见过如此气派的大套间。

毛泽东知道，北京饭店最豪华的是总统套间。过去外国元首来访，多次下榻北京饭店的总统套间。毛泽东在看望外国元首时，也曾多次来到北京饭店总统套间。但是，总统套间也无法与这里相比。

张豪问道：“‘文老先生’，感觉如何？”

毛泽东答道：“仿佛来到了故宫。”

“‘文老先生’，您的感觉完全正确。”张豪道，“这是北京饭店从二零零一年年底开始推出的特色套房——‘皇帝套房’！这里的一切，都是具有皇宫特色的。”

这时，服务小姐前来向“文老先生”作介绍：

“每一家五星级旅馆至少拥有一套总统套房，这是世界旅馆业的‘行规’。现在，中国已经拥有二百来家五星级宾馆，总统套房在二百套以上。但是众多的总统套房，都是攀仿西方的装修，大同小异，家具大都是‘范斯哲’的，水龙头则是镀金的，跟国外宾馆的总统套房没有多少区别。

“为了使总统套房具有中国特色，我店推出了‘皇帝套房’，令人耳目一新，受到各方贵宾的青睐。

“住‘皇帝套房’，过中国皇帝般的生活，是许多贵宾所向往的我店的‘皇帝套房’，采用中式装修，以故宫的建筑风格为蓝本进行设计，以高档的楠木为主，具有皇家气派。高档楠木存世量不多，而本店装修‘皇帝套房’所用的楠木直径大都在一米二十以上，属于千年以上珍稀型材。就连‘皇帝套房’内的摆设，件件都是精心制作的。玉石选自云南，牙雕是请素有‘南浦北刘’之称的牙雕大师刘先生创作的，青花瓷、釉里红的瓷瓶出自景德镇，而仿汉代的双龙瓶在钧瓷的故乡河南禹县烧制。

“这个八角厅，是仿照故宫‘怡情书史’建造的。主卧室是仿照故宫的皇帝寝宫设计的，主卧室里的‘龙榻’，采用明代月洞式门罩架子床。客厅里的‘龙椅’，也是仿照故宫的皇帝坐椅制造的。

“我店‘皇帝套房’最大的特点是推开西窗眺望，红墙黄瓦的故宫，尽收眼底。回头一看，则是翡翠黄缎和龙床。所以，‘皇帝套房’可以说是‘故宫观景房’，入住‘皇帝套房’，也就是住在‘皇宫’看皇宫。”

毛泽东走向西窗，窗外虽然已经夜色浓重，但是在彩色泛光灯的映

照下，故宫显得那样庄重和美丽。

从南窗俯瞰，则是车水马龙的宽阔的东长安街。华灯盏盏，一片繁荣。

服务小姐又继续向“文老先生”介绍：

“我店的‘皇帝套房’，虽然是仿照故宫建筑风格装修的，但是考虑到贵宾的生活舒适度，还是采用了一部分现代化的设施。”

“比如，在各个房间都安装了电话。在‘御书房’，装有传真机以及接入宽带网的笔记本电脑。皇帝的‘龙榻’，原本铺的是褥子，现在铺的是特大型常梦思床垫。所有的照明灯，不是用古代的腊烛、油灯，而是用现代化的高级灯具——多层水晶灯。卫生间里安装了桑拿浴房。另外，在客厅、餐厅、书房以及每一间卧室，都安放了高清晰度的电视机。”

服务小姐作了一番介绍之后，用手推车送上“皇宫夜宵”，把餐厅里那张长方楠木餐桌上摆得满满的，总共一百零八种“皇家点心”。只是“文老先生”和张军一家刚刚吃过“开国第一宴”，没有胃口再“领教”这“皇家点心”。

服务小姐推着空车，退出“皇帝套房”。

这时，“文老先生”问张豪：“这‘皇帝套房’，多少钱一天？”

张豪答道：“北京饭店的‘皇帝套房’，是北京价格最高的套房，超过所有的总统套房。现在每天九千美元，相当于每分钟五十多元人民币！只有最高贵的客人，才能入住‘皇帝套房’。”

“文老先生”因为不知道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一下子还不明白“一天九千美元”是什么概念，但是他听懂了那句“相当于每分钟五十多元人民币”，因此他很快就算出，凭借他每月四百多元人民币的工资，只够在这里住八分钟！

张豪似乎也看出“文老先生”不明白“一天九千美元”是什么样的价格，便补充道：“一天九千美元，也就是七万多元人民币！”

这下子，“文老先生”听明白了：“这么贵呀！”

张豪连忙解释说：“‘文老先生’今日为我的公司新建小区‘豪门府邸’字，依照惯例是应当馈赠红包。‘文老先生’是我父亲的老上级，倘若也送红包，未免俗气，所以我想请‘文老先生’在北京饭店‘皇帝套房’住一夜，略表谢意。”

“文老先生”笑道：“我那四个字，即便是‘一字万金’，也不够‘皇帝套房’一天的房费！”

张豪也笑道：“这‘一字万金’，按照美金计算，总共四万美元，那就绰绰有余了！”

笑罢，张豪“实话实说”，告诉“文老先生”：“我与北京饭店是‘邻居’，跟北京饭店的‘老总’很熟，得知今天‘皇帝套房’正好空着，就请他给我优惠。看在老朋友的面上，他给我二折房价，也就是说一千八百美元。不过，他说明天‘皇帝套房’有客，已经预订出去了，所以只能住一夜，收半天房价，也就是九百美元，相当于七千多元人民币，算是很，便宜’的了。”

张豪接着又道：“反正‘皇帝套房’的房间很多，而我的父母以及女儿、女婿都没有住过‘皇帝套房’，就请他们一起陪‘文老先生’住在这里——我的父母住‘夫人间’，小霞、港生住‘随员卧室’。你们五个人一起住‘皇帝套房’，每人平均只一千多元人民币。我和太太就不奉陪了，我们住过‘皇帝套房’，而且我们家就在马路对面，回家只几分钟。明天早上来接你们。好，祝你们晚安！”

张豪和太太告辞。

毛泽东毕竟还是习惯于中式服装，在张豪夫妇走后，连忙脱去晚礼服，换上唐装。

电视大扫描

毛泽东穿好唐装，步入“御书房”。

毛泽东发现，这“御书房”的装修是那么的奢华，可是书房无书，

只有那几本摆摆样子的线装书而已，远远不如张军家的书房。对于唐诗、宋词，毛泽东已经倒背如流，而四书、五经，也烂熟于胸。

至于书桌上那台笔记本电脑，虽说随时可以接入宽带网，但是毛泽东的手从未摸过键盘，不知如何操作。

毛泽东对这“御书房”索然无味。

熟知毛泽东脾气的张军，明白毛泽东无书可读，无事可做，显得很无聊，便拉毛泽东去看电视。

客厅里的五十英寸大屏幕电视，令毛泽东耳目一新。当年，就连作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在中南海也只有一个二十一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而已！

“小放牛”、张霞、陈港生也都过来陪毛泽东看电视。

张军把电视机的遥控器交给毛泽东，告诉他如何用遥控器选择电视频道，因为毛泽东还从未用过电视遥控器呢！

毛泽东逐一选择频道。

毛泽东很惊讶，现在的中国电视机，可以接收那么多的频道。当年，他在中南海看电视，只有中央电视台的两个频道！

电视屏幕上出现流行歌手，一边手持话筒，一边手舞足蹈，时而扭着腰肢，时而像做广播操。在毛泽东那年月，话筒从来是竖在歌唱家面前，歌唱家笔直站着歌唱，双手合于胸前的，哪有这等跳跳蹦蹦？

毛泽东不爱看流行歌手，换了一个频道。这一回出现的是台湾作家琼瑶的言情片。少男少女，卿卿我我，嘻嘻哈哈，哭哭啼啼，毛泽东没有兴趣，又换了一个频道。

屏幕上出现蒙面大盗，飞檐走壁，空中斗法，刀光剑影，毛泽东对武侠片皱了皱眉头，跳了过去。

一部题为《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电视连续剧，令毛泽东惊讶：“我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如今怎么破改成《将爱情进行到底》？！”

下一个频道正在播送广告：一双穿着乌黑发亮皮鞋的脚在乱蹦乱跳。脱下皮鞋，一只长癣的大脚伸进屏幕，那痒不可耐的癣怎么也搓不

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忽然来了一只除癣药膏，一下子就把癣菌一扫而光。那双穿了乌黑发亮皮鞋的脚再也不痒了，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然后，出现那除癣药膏的名字“达克宁霜”以及订购电话号码。毛泽东看了，噗嗤一笑，因为在他那时候，电视里从来没有广告。

接着，出现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由于目光被“百事可乐”广告牌所吸引，自行车差一点撞到电线杆上。他掉过车头，沿着广告牌上箭头所指的方向急驶，正前方是一家“百事可乐”专卖店，一位小姐刚刚拿起一瓶“百事可乐”，就被急驶而来的男子一把夺走，一边骑车，一边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仿佛从未喝过如此美妙的饮料。毛泽东又付之一笑。

此后出现的广告是一男一女抢吃一碗方便面，方便面实在大好吃，一下子就被吃光，最后只剩下一根。这一男一女抢吃这惟一的一根面条，于是面条的这一端在男的嘴里，另一端在女的嘴里。他们都用力地吸进这根面条，男女双方竟然吻在一起。毛泽东看罢，觉得这广告有点庸俗。

这时，出现了公益卡通广告，题为《城市历险记》：一个孩子在城市里往前走，一块从高楼抛下的果核，不偏不倚击中他的脑袋，顿时肿起一个大包；接着，地上的一块西瓜皮，使他摔了一跤；一只小狗跑来，咬了他一口；一辆轿车的尾气，喷得他一脸黑灰；他蒙着双眼往前走，掉进一口没有盖子的空井……毛泽东在幽默的笑声中，体会到辛辣的讽刺。

毛泽东换到了纪实频道，很注意地看着《新闻调查》节目：

南京、成都、郑州几个城市相继发生了“倒奶”事件——白花花的牛奶倒进了江水之中，引发争议。

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奶农和加工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协调好，加之当时又处在市场销售的淡季，企业对市场的开拓不移，销售困难，因而对牛奶的需求下降，致使牛奶过剩。

又有人说，“倒奶”事件说明饲养奶牛不可盲目，并不是所有的地

方都适合发展奶业，它受到饲料、气候、品种等因素的制约。

还有人说，“倒奶”现象是市场无情地调节供求关系的一种表现。许多地方出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鼓励农民发展养殖业，因而奶源快速增长，而当地企业的加工能力滞后，造成牛奶的季节性和地区性过剩。

毛泽东望着那倒在江里的牛奶痛惜道：“大浪费了！太可惜了！”

接着，《新闻调查》播出《“黑心棉”追踪》：

出现在屏幕上的是一名中学男生，撩起上衣，后背上是一个个红疙瘩。医生说这是皮疹。医生撩起中学生所睡的褥势，撕开一看，棉絮中夹着黑色的又脏又臭的棉花。

“这是‘黑心棉’！”医生说，“你的皮疹，是这些‘黑心棉’引起的。”

电视台摄影记者在“黑心棉”加工厂偷拍，见到种种垃圾棉被掺进棉花。其中特别是一些来自医院废物桶中的棉花，夹带着血斑和绿脓！

工商局管理员在市场检查棉花胎、枕芯、儿童棉衣，一拉开，便见到“黑心棉”。

毛泽东看到这里，怒不可遏：“黑心棉，真是昧着良心赚黑钱！对于这些奸商，必须绳之以法！”

《新闻调查》又翻出关于中国贫困人口的投资：

最为贫困的地区是中国内陆的甘肃、宁夏和青海。据统计，那里有近三千万的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在一百五十元人民币以下！

贵州全省七十七个县，有四十六个是贫困县。

西部九省农村人口中的文盲率达百分之五十！

在中国大陆，未解决温饱的农民达七千万之多！

《新闻调查》播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考察广西农村的情景，使毛泽东见到了朱镕基其人：

朱镕基总理踩着嘎吱作响的楼板走进一户半截石头半截茅草搭起的人家。这个五口之家，两个劳力，承包二点一亩山地，每年收获玉米、

木薯四百公斤。打开木箱，没见到像样的衣服，看看谷桶，只有小半桶玉米。全家只有一床旧棉被，一顶破蚊帐，楼下养着两头饿得嗷嗷叫的瘦猪。

朱镕基总理心情沉重地问主人，粮食够吃喝？主人摇摇头，每年缺四至五个月的粮！

另一户三个孤儿的人家更让朱镕基总理揪心。四面通风、空荡荡的茅草房里摆着几个盛水用的瓦盆、木桶，别说粮食不够吃，就是靠天积存下来的雨水也仅够吃两个月了。朱镕基问，这几个孤儿几岁父母去世的？乡干部介绍说三兄弟当时分别是八、六、四岁，靠民政救济，顽强活了下来。由于长期得不到温饱，现在三个孤儿已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了，却长得又瘦又小。初冬的山区已寒风透骨，老二只穿件开敞的单衣，朱镕基总理怜爱地要帮他扣上衣服，可整件衣服竟没有一颗扣子。泪水在朱镕基总理的眼眶里打转，他把几个孤儿接在身旁一起照相。离开时，朱镕基总理拿出四百元钱叫秘书分别送给这两户人家买些粮食添置点衣物。在返程的路上，朱镕基总理说看到这些贫困的家庭让人掉泪……

毛泽东看了这一档《新闻调查》，望着金玉满堂的“皇帝套间”，心病变得沉重起来，叹道：“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

毛泽东又换了一个频道。这是新闻频道，毛泽东显然被深深吸引，以至把遥控器撂在一边。

新闻频道播送“国际重大事件回放”：

屏幕上出现恐怖分子劫持客机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情景，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毛泽东这才头一回知道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

激光制导的导弹，从美国轰炸机上倾泻而下，阿富汗到处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毛泽东这才知道，美国为了报复“九·一一”恐怖袭击，展开了军事打击阿富汗的战争。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出现在供奉战犯灵牌的靖国神社。毛泽东怒

斥道：“岂有此理！”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主持隆重仪式，安葬被布尔什维克处决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遗骨。毛泽东忿忿道：“简直是复辟！”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乘坐专列到达莫斯科，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欢迎。毛泽东这才得知老朋友金日成已经去世，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成了朝鲜的领袖。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下一届奥运会举办地是“北京”。中国举国欢腾。毛泽东说：“中国干得不错！”

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外国元首们穿起唐装，在上海浦东合影。毛泽东这才明白，为什么唐装在中国成了时尚。

WTO批准中国成为正式会员国。中国老百姓面露笑容。毛泽东也笑了。

就在毛泽东聚精会神观看“国际重大事件回放”节目时，“皇帝套房”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有谁会打电话到“皇帝套房”呢？

“龙榻”难眠

“秘书”张军去接电话。

“皇帝套间”里装的是可视电话。张军原本以为是儿子张豪打来的，谁知可视电话屏幕上出现的却是服务小姐：“有一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在楼下，请求与文老先生通话。”

不过，这可视电话是单向的。在“皇帝套间”里，可以从电话屏幕上看见站在底楼大厅总台打电话的人，而对方用的是普通电话，没有屏幕，看不见“皇帝套间”里接电话的“皇帝”。

张军听罢，答道：“我是文老先生的秘书，由我来跟他通话吧。”

这时，可视电话屏幕上出现一张戴法国无沿帽的男子的脸，张军马上记起是刚才在宴会上给毛泽东拍照的男子。这位男子很客气地

说：“对不起，打扰一下。我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有事要与今天晚上在‘开国第一宴’上跟古月碰杯的老先生联系。”

这个电话，马上引起张军的警觉：“我是老先生的秘书，你有什么事？”

对方说道：“我今天陪古月一起来北京饭店。我注意到那位跟古月碰杯的老先生，酷似毛泽东。我们摄制组正需要一位扮演晚年毛泽东的演员，千方百计寻找而未得，今晚却偶然见到那位老先生。我当时就用数码相机给老先生拍了照片。本想在宴会结束之后跟老先生面谈，谁知后来就不知老先生去向。我拿着数码相机上记录的老先生形象，向北京饭店总台多方询问，对方查明我确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这才说先要征得老先生的同意，方可通话……

张军一听，马上婉言谢绝：“老先生年事已高，无法为你们扮演晚年毛泽东，谢谢你们的看重。”

张军不等导演再开口，就挂断了电话。

当张军把电话的内容告诉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开怀大笑。

这时，陈港生说道：“那位电影导演，确实很有眼光。我初次见到文老先生，就有‘古月的爸爸’的感觉。”

毛泽东听陈港生称他是“古月的爸爸”，笑得更加厉害。张军、“小放牛”和张霞也笑出了泪水，只是在陈港生面前，不便点破真中目。

张军长期在中央领导部门工作，有着严格的保密观念。他事先跟“小放牛”、张霞约定，尽量缩小知道毛泽东真相的范围，以免走漏消息，所以连女婿陈港生以及儿子、儿媳张豪夫妇都不告知。

张军心想，幸亏张豪说定明天一早就走，这样可以尽早“甩”掉那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一旦明天到了十三陵水库，那位导演就再也找不到毛泽东了。

又看了一会儿电视，张军一家都面露倦意。毛泽东便打发他们回房歇息。

张军劝毛泽东早点休息。他在纸条上写下自己卧室电话的号码，放在毛泽东床头，再三关照，夜里有什么事，尽管给他打电话。

在张军离去之后，惯于在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仍无睡意。倚着西窗，看着故宫夜景。在故宫之西，便是中南海了。但是，在北京饭店的十七层，看不到中南海。毛泽东明白，当年北京饭店翻建新楼时，不许造得大高，就是为了不让看见中南海。然而，此时此刻，他却那么希望再看一眼中南海，因为那毕竟是他处于政治生涯巅峰时住了三十七年的地方。

毛泽东记得，他是从河北西柏坡进军北京。最初，他住在北京西山双清别墅。他不愿意住中南海。他说，那是皇帝住的地方，他不愿意当皇帝。但是，双清别墅毕竟还离北京市中心，来来去去诸多不便，他最后还是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入住北京市中心的中南海。

毛泽东并不看重故宫。虽然中南海跟故宫只有一墙之隔，他却没有兴致前来观赏。在毛泽东看来，故宫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这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紧接着，一九四九年他又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的又一转折点。他下令把故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是因为故宫是中华文化深厚积淀的所在。

然而，鬼差神使，阴差阳错，张豪居然把他送进了“皇帝套房”。倘若不是碍着张军的面子，毛泽东是绝对不会跨进“皇帝套房”的大门的。毛泽东不仅看不惯“皇帝套房”的极度奢华，而且看不惯那无处不在的“龙”影。在毛泽东看来，住“皇帝套房”，还不如住张军家里自在舒服。

本来就有着“入眠难”的毛泽东，这时无法入睡，他从西窗踱到南窗，俯视东长安街。这时，已是夜深人静时分，长安街上的车辆明显减少，北风里看枯叶扫荡着路面。毛泽东记起，当年每一回国庆阅兵，他乘着敞篷轿车，都是从这里徐徐驶向天安门广场。那时，十里长街，挤

满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群。在“文革”岁月，毛泽东每一回接见红卫兵，也是从这里乘着敞篷轿车，徐徐驶向天安门广场。十里长街，挤满身穿绿色军服、佩着毛体“红卫兵”三字的“红袖章”手持“红宝书”狂热地高呼：“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其实，毛泽东具有矛盾的双重情结，他既反对封建皇帝，又接受万人欢呼“万寿无疆”。他发动“文革”，声称目的是“反对复辟资本主义”，而实际上却在那里复辟独断专行的封建主义。

无书可读，无事可做，又无中意的电视可看，毛泽东在西窗与南窗之间踱着方步，觉得这“皇帝套房”对于他来说，近乎无聊。终于睡意袭上心头，毛泽东步入主卧室——“寝宫”。

毛泽东宽衣之际，发觉那张“龙榻”倒是又宽又大，适合他那魁梧的身躯，但是当他躺在“龙榻”上，这才发现那高级席梦思不适合于他。他向来睡惯硬板床。长征的时候，他的卫士知道他的脾气，每到一地想方设法找几块门板，再找几条板凳，为他铺成一张临时的床，毛泽东往往倒头便睡，睡得那么酣甜。然而，如今这上下雕龙、铺着金黄色丝棉缎被的“龙榻”，却使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第八章 又做三梦

对答如流毛新宇

实在无法入睡的毛泽东，打开了“寝宫”里的电视机，用遥控器选择频道。深夜时分，电视频道差不多都被电视剧、戏曲、歌舞节目所占领。偶然，在一个频道出现一个胖乎乎的男青年，正在答观众问。屏幕上的字幕“毛泽东嫡孙毛新宇作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本台现场直播”，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原来这胖小子就是我的孙子！

毛泽东睡意顿消，双目紧盯着荧屏。毛新宇坐在台上，许多观众坐在台下，不断举手提问，而毛新宇从容不迫地逐一答复。

毛泽东发现，观众们对于毛新宇的称呼，各种各样，不一而足，有叫“毛博士”的，有称“毛新宇先生”的，还有喊“毛新宇同志”或者“新宇”的。

毛泽东又发现，毛新宇有时候称他为爷爷，更多的时候直呼他为毛泽东，这使毛泽东听起来有点不习惯。不过，毛泽东很快就高兴起来，因为自己的孙子才思敏捷，对答如流，不愧为毛家后代：

毛新宇：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能够和大家见面，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观众：毛新宇先生，您的名字毛新宇有什么寓意么？

毛新宇：我的名字是我爷爷毛泽东取的。新宇，代表新的天地，老人家希望我将来会对社会、对国家作出贡献。

观众：新宇，请分别以历史学者和孙子的身份用一句话评价毛泽东。

毛新宇：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评价：“光荣属于人民。”以孙子的身份评价：“滚烫的回忆。”

观众：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今的毛泽东热？

毛新宇：一个有价值的思想永远不会过时。

观众：新宇，毛泽东给你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

毛新宇：爷爷留给我的财富就像他在他《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说的那样，作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观众：你是学历史的。请问，你是更多地从感情上还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上看待毛泽东？二者之间在结果上有区别吗？

毛新宇：历史与感情是不可分的，没有无感情的历史，也没有无历史的感情。从个人感情上和血缘关系上说，我对爷爷毛泽东有很深厚的感情，但是爷爷毛泽东是一位历史巨人，他属于全世界，也属于中国，所以，又要求我以理智的态度来研究我的爷爷。

观众：作为毛泽东的后人，你如何看待那些否定毛泽东的人？

毛新宇：“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对于孙子用毛泽东的诗词回击“那些否定毛泽东的人”，毛泽东感到非常痛快。不过，当今中国的观众，提问相当尖锐：

观众：毛博士，请问，你是党员吗？你怎样看今天的腐败现象？

毛新宇：我是党员。克服腐败现象是长期的任务，它是跟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树立起长期斗争的思想，才能把腐败现象遏制住。

观众：毛先生，请问，你研究历史，是因为你家史和中国革命密不可分，还是因为是你个人的原因？

毛新宇：两个原因都有，一方面家庭有一种凝重感，或者说是一种使命感；就个人来讲，对这方面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原来的学业也都是这方面的内容。

观众：你爱不爱吃辣椒？爱不爱吃红烧肉？

毛新宇：非常爱吃。

观众：你常回湖南老家吗？你对三湘文化特点有体会吗？它在你爷爷身上有体现吗？

毛新宇：湖南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爷爷的故乡，湖南这个地方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特别是在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上，谱写了中国历史重要的一页。湖南之所以在近现代史上出现了很多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当然包括我的爷爷，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位观众提出来的，湖南有一种三湘文化。三湘文化早期受到宋朝后期理学的影响，后来到了明代，由于封建理学的衰落，当时先进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兴起了一种不崇尚空谈，讲究实际的救国救民的学风，这种学风就叫实学。这种实学，就是立足于现实的社会，以现实的角度和眼光解决现实的国计民生问题，这种实学一直影响了中国几百年，三湘文化本质上就是这种实学的体现。这种实学的风气，深深影响了我的爷爷，所以说，实事求是党的灵魂，也是我爷爷毛泽东所倡导的，他跟本身的优秀的故乡文化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时至今日，我们还要提倡这种实学的精神。

对于孙子阐述三湘文化的深刻内涵，毛泽东表示赞同。观众继续提问：

观众：请问嘉宾，你爷爷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哪位元帅领会得最好？

毛新宇：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最完整、最科学的军事科学思想体系，如同毛泽东思想一样，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应该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我军的大将、元帅们，都有深刻的体会，当然在这里面，也包括作出杰出贡献的刘伯承元帅、陈毅元帅、粟裕大将等人。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又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今后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毛泽东军事思想永远是指导我军、保卫国防、抵御侵略的最有效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观众：为什么选择研究历史？和你爷爷毛泽东有关吗？

毛新宇：我的爷爷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和战略家，他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研究都是很有独到见解的，毛泽东曾经有一句名言，叫“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好好地研究”，正是因

为毛泽东十分精通中国的历史和问题，所以，他才能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立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了，同时，他又把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体系结合起来，从而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也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我曾经在一九九零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不学历史我们永远幼稚》，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九零年的《求是》杂志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一再教导要把中国的历史学好，用马克思主义的“箭”来射中国革命的“的”，我们只有把自己国家的历史学好了，才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学习历史的特殊的重要的作用。

观众：毛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国家和民族利益来评价毛泽东？

毛新宇：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在生前曾经讲过，这不光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牵涉全局的问题，应该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如果不能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一生，我国的工人、农民，包括知识分子都是不能同意的，因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党才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由于小平同志和全党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我们才能够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情况下，依然保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红旗依然飘扬。这就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结果。

观众：你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是什么？

毛新宇：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就是人民战争思想。

观众：到底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啊？那么神奇？

毛新宇：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

观众又提出了相当尖锐的问题，但是毛新宇依旧坦然相对。

观众：你认为现在和过去，公众有无神化你爷爷的现象？

毛新宇：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在长

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同时又带领我们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由于他的崇高品质和卓越的智慧，以及他的丰功伟绩，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历史上任何人都无可比拟的威望。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有些野心家借神化毛泽东来达到他个人野心的目的，但真正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世界上一切爱好正义的人们，是发自内心地崇敬和热爱他。我深深体会到，广大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不应说成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对真理的信仰，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社会主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有希望，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毛泽东作为历史的丰碑，将永远矗立在人类的历史上。

观众：如何看待至今在亚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存在的由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革命和革命游击队活动，在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这些革命活动能成功吗？

毛新宇：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被压迫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谋求解放的一种普遍的真理，因此，他在世界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一些亚洲国家，他们借鉴毛泽东思想的某些科学体系来选择本国的建设道路，但是，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他国先进的经验和思想，只能作为一种借鉴，只有把先进的思想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才能够成功地进行革命活动，才能够取得本国建设的胜利。

观众：你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怎么看？

毛新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九五零年二月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同苏联统帅斯大林签订的一个中苏两国划时代的条约，这个条约在世界上有巨大的影响。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使苏联政府派出了专家、技术人员，在我国“一五”建设期间，帮我们建立了基础的工业体系，所以，这个条约为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过巨大的效益，同时，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携手合作，也标志着世界上划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时代的开始。

观众：毛新宇同志，你好！据说有很多外国记者采访你，是吗？他

们会提一些什么问题？

毛新宇：近几年来，有法国记者、意大利记者对我进行过访问，我有义务向世界人民告知今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

观众：毛新宇，你到电视台来做关于毛泽东的访谈，你感到有压力吗？

毛新宇：没有压力，这是一件很轻松愉快的事。

观众：毛泽东最核心的思想是什么？根本出发点是什么？

毛新宇：毛泽东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为人民服务，根本的出发点是谋求中国人民的生活幸福，国家的独立、富强。

观众：请问毛博士，毛主席带给中国人民什么？是共产意识还是阶级斗争？

毛新宇：我认为，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行动指南，也是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种行动指南。

观众：请问嘉宾毛新宇，如果毛泽东健在，你认为今天中国和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局势？他会怎样应对今天美国的挑战。

毛新宇：世界上任何的真理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任何先进的科学的思想体系都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马列主义是如此，毛泽东思想也如此，都是永远需要不断发展的，我想如果老人家健在，他也会依据现在的时代和国际形势来引导中国人民走上现代化的明天。

观众：你研究历史，你认为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

毛新宇：主席是尊重知识分子的，他与许多知识分子交往很深。

观众：毛新宇，研究历史和改变历史有什么共同之处？

毛新宇：统一于实践。

观众：请从你研究的领域和你的内心两个方面谈一下你怎样评价你的爷爷毛泽东以及邓小平？

毛新宇：从我的内心来说，对爷爷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对他老人家十分崇拜，十分希望他老人家还活在我们身边。从学者的角度来

看，爷爷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十分完美的人，作为一个伟大的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他缔造了新中国，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个人品质来说，他的品德十分高尚，同时他也是一位慈父；从知识结构和才能来讲，他有十分渊博的知识，在政治、军事、哲学、经济甚至教育等诸多领域，都堪称一代大家；在艺术领域，他的诗词和书法，是现代的中国人所无法比肩的；他的个人兴趣，也十分的高雅，他有超乎于常人的坚强的意志，他有海一般宽阔的伟大的胸怀，所以，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个人品德，将永远作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象征。

观众：毛新宇，你认为，在中国出了毛泽东思想以后，还会出现更重要的思想吗？

毛新宇：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会不断发展，将来人类实现了共产主义，有可能会出现更重要的思想体系，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即使有新的思想体系，也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观众：毛泽东思想有哪些是自己真正个人的思想？他开创了哪些思想（与前人有所不同的才讲开创）？

毛新宇：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首先爷爷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并取得了成功。新中国建立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爷爷毛泽东也带领全党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同时，特别是在哲学思想上，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领域里，爷爷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特别是在辩证法思想领域里，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同时，爷爷伟大的军事思想体系也是对马列主义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观众：毛新宇先生，您如何认识毛主席个人在反帝反封建方面均贡献？您如何看待“纸老虎论”？

毛新宇：我的爷爷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一位民族英雄，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饱受苦难和屈辱，所以，以爷爷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有崇高的民族气节，绝不向世界上的霸权主义低头，同时以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气魄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

观众：请教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他独到的思维方式是从何产生？如他对抗战前途的预言，东欧社会主义的前途预言都被历史证实了。

毛新宇：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来源：第一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个是马列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正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观众的话题转向轻松，毛泽东也感到轻松起来：

观众：毛新宇，你会出国定居吗？比如说去美国、欧洲……

毛新宇：我不会出国去定居。因为和我爷爷一样，我十分热爱中国，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悠久、最优秀的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自豪。

观众：毛新宇先生，想不想去日本、英国等国家看看？

毛新宇：我十分愿意去日本、英国参观、访问，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与中国同属东方文明的国家，英国是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十分愿意去参观访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用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观众：新宇你好！请问你去过井冈山、延安这些革命圣地吗？去过的话，有什么感想？

毛新宇：我写过一首“挥锄”的歌，就是写延安的。

观众：毛博士，我不是毛主席时代的人，但我佩服他，请教毛主席的共产意识实质是什么？

毛新宇：为人民服务。

观众：新宇同志，你的论文题目是什么？能告诉吗？

毛新宇：《论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

观众：你是否认为你爷爷的胜利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结合马列的胜利？

毛新宇：人民的胜利。

观众：请问毛先生，那些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老干部，为什么在今天还热爱毛主席？

毛新宇：我党的许多老干部追随毛泽东干革命一辈子，他们对毛泽东有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他们怀着对毛泽东的坚定信仰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老干部，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有宽广的胸怀，绝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而动摇自己的信仰与追求。

毛新宇：感谢广大的观众对我和我的家人的关怀，充分表达了广大观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广大观众见面，我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希望下次再有机会能够与广大观众交流，谢谢大家！

看到自己的孙子毛新宇如此流利地答复观众提问，毛泽东欣慰地笑了。这宽心的笑，使毛泽东进入了梦乡。

喜见嫡孙

毛泽东刚刚入睡，却被电话铃声吵醒。

在中南海，打给毛泽东的电话，总是由机要秘书先接。机要秘书接了电话之后，确定这一电话必须由毛泽东亲自接听，这才转到毛泽东那里。

难道又是那个导演打来？可惜“秘书”张军不在身边，无法代接。

电话铃声连续响着，看来对方非要毛泽东接电话不可。毛泽东终于拿起电话耳机，这时，可视电话的屏幕上出现熟悉的面孔——就是刚才电视荧屏上的毛新宇。

“新宇，你在哪里？”未等毛新宇开口，毛泽东先说话了。

“爷爷，您好！我就在北京饭店底楼总台。”毛新宇答道。

“快！快！快上来！”毛泽东连声说。

毛泽东急急披上那件绣龙的黄缎睡袍，从“寝宫”走向八角厅，坐在那里等候。

才一会儿功夫，响起了门铃声，毛泽东立即打开了房门，站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位一米八的壮实小伙子和一位漂亮的姑娘。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个袋子。

毛泽东一眼就认出毛新宇，而毛新宇却不识面前这位长着络腮胡子、留着齐耳长发、穿着“龙袍”的老人。刚才，毛新宇在总台用的是普通电话，见不到爷爷的面容。毛新宇出生于一九七零年一月，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九月“长眠”时他还不到七岁。毛新宇是从诸多照片上认识爷爷毛泽东的。

定睛一看，毛新宇终于认出，面前的老人就是毛泽东。

“爷爷！爷爷！”毛新宇拥抱着毛泽东。

这时，那位姑娘关好了房门。

毛新宇向毛泽东介绍说：“她是您的孙媳妇。”

姑娘赶紧上前：“爷爷，我叫郝明莉。”

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没想到，转眼之间，我的孙子都成家啦！”

毛泽东带领孙子、孙媳走过八角厅，来到客厅，请他们在楠木的太师椅上坐下。郝明莉刚坐下，又站了起来，给毛泽东和毛新宇沏茶，那茶叶罐上印着“极品贡茶”字样。然后，她拿出袋子，里面是一大盒“脑白金”。

毛泽东还是头一回见到“脑白金”。看了包装盒上的说明词，才知道这是滋补品。这时，他记起在长安街上见到的广告，于是说道：“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

毛新宇和郝明莉大笑起来。

毛新宇问道：“爷爷，您为什么留起了长发、长胡子？我差一点都认不出您了！”

毛泽东大笑道：“爷爷如今是普通百姓一个，生怕叫别人认出来是毛泽东，所以乔装打扮，改名换姓。我现在的身份是书法家：名字叫‘文润之’，人家都喊我‘文老’。”

毛新宇也笑了：“爷爷，凭您遒劲洒脱的书法，是名副其实的书法家。”

这时，毛泽东问毛新宇：“你爸爸、妈妈好吗？”

毛新宇答道：“他们都好，非常想念您！”

毛泽东又问：“张军你知道吗？”

毛新宇点头道：“我认识张军叔叔，他过去在您身边工作。我还认识他的孙女张霞，她在纪念堂工作。”

毛泽东说：“我听张军说起你，也听张霞说起你，说你已经结婚，我非常高兴。明莉，你多大啦？”

郝明莉答道：“比新宇小两岁。”

毛泽东问：“什么地方人？”

郝明莉答道：“山东泰安。”

“泰安好地方呀！”毛泽东说，“‘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就在你们泰安哪。”

这时，毛新宇向毛泽东说起了自己的“恋爱经过”：“我是一九九四年到泰安的时候，偶然遇到明莉一见面就觉得彼此很相投。后来，经过三年多的来往，这才结婚。明莉的父亲叫郝德望、母亲叫明兰云，都是泰安的普通干部。郝明莉这名字，是父母双方的姓再加一个莉字。她后来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毛泽东说：“刚才，我在电视里见到你‘舌战群儒’。”

毛新宇喜笑颜开：“想不到，爷爷看到我的电视节目！”

毛泽东问：“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电视观众都喊你‘毛博士’，爷爷连硕士、学士都不是，甚至还没上过大学呢，惭愧！惭愧！我给你取名‘新宇’，就是希望你们年轻一代能够开辟一个新世界！”

毛新宇赶紧说：“在爷爷的丰功伟绩和渊博学识面前，我才惭愧

呢！”

毛新宇告诉毛泽东，他是一九九二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主攻“明清史”。他选择历史专业，当然是受爷爷影响。他与王震爷爷有缘，开始是由于两人都对历史感兴趣。一九八五年春节，他去王震爷爷家拜年，居然聊了一晌午的历史。老人也很高兴，讲起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的故事。有一件事，王震爷爷对他帮助很大，那就是王震爷爷亲自给中南海写条子，让他看他爷爷批注的《二十四史》，所以，他成为最早进入中南海见到他爷爷批注《二十四史》的人之一。这件事促使他对研究历史产生浓厚兴趣。

“哦，是‘王胡子’帮你忙。”毛泽东说道。

毛新宇告诉毛泽东，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他曾花费三年时间到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部攻读硕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作家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教授。《朱自清全集》就是朱乔森教授整理出版的。

毛泽东听说毛新宇的导师是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当即说：“我读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朱自清很有气节。一九四九年八月，我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过：‘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毛新宇说：“我的另一位导师是陈诗惠教授，也是中国中共党史界的著名专家。她对我帮助很大，还像慈母一样爱护我。”

从二零零零年开始，毛新宇到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军事历史。毛新宇的导师刘国语是少将研究员，也是中国军战史研究的著名专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毛新宇说，他选择了军事历史作为研究方向，是因为爷爷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这样说过：“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研究军事历史，是研究和观察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毛新宇又说，爷爷在一首题为《读史》的词中写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这首词给了他莫大的启示。在研究战争中，最重要的是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认识到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听到孙子如此富有学识的谈吐，知道孙子对自己的思想如此了解，毛泽东舒心地笑了。毛泽东在晚年，陷于深深的孤寂之中。正因为这样，见到孙子那么有出息，毛泽东内心感到无限温暖。

这时，毛新宇拿出自己带来的袋子，里面装的都是他出版的著作。

毛新宇拿出二十万字的论文集《朱元璋研究》呈献给爷爷，说：“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

毛新宇又拿出《毛泽东眼中的五大帝王》呈献给爷爷，说：“这是我主编的第一部著作。”

毛新宇拿出自己的新著《我的伯父毛岸英》呈献给爷爷，说：“我正在写我们家的红色家史。岸英伯伯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继承了您的很多优良品质，他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打过仗，务过农，学过工。我写这本书，为了纪念他。”

毛新宇拿出自己的另一本新著《我的奶奶杨开慧》呈献给爷爷，说：“一九七七年，我七岁的时候观看了舞剧《杨开慧》，对祖母有了最初的认识。后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维修祖母故居时，在堂屋中发现了祖母在牺牲前藏在墙缝中的手迹，包括诗和日记，里面抒发了祖母对您的思念之情。祖母丰富的感情世界令我深深震撼，所以我写《我的奶奶杨开慧》。”

看到孙子这样有出息，毛泽东陷于无限兴奋之中。

孙子还拿出一张题为《我给爷爷唱新歌》光盘，说道：“这张光盘里，全是我唱给你听的歌，是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毛泽东很惊讶：“你也会唱歌？也是歌星？”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学着电视中流行歌星们手持话筒，手舞足蹈的样子。

毛新宇说：“我不是流行歌星，我是为爷爷而歌唱。明莉也唱得很好。我们现在就唱给爷爷听！”

毛新宇唱起了《东方红》，郝明莉唱起了《在北京的金山上》。毛泽东想不到，孙子和孙媳唱得那么动听，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眼泪。

毛新宇唱罢，问道：“爷爷，您回中南海住吗？”

毛泽东摇头说：“爷爷现在是平头百姓一个，不可能再住中南海。现在，暂住在您张军叔叔家。”

毛新宇和郝明莉异口同声地说：“住到我们家去，我们照料您！”

毛泽东连声说：“好！好！你们肚子饿了吧，去吃夜宵。”

毛泽东领着他们来到餐厅，看到餐桌上摆放着一百零八种点心，毛新宇惊讶地说：“这是慈禧太后的‘待遇’呀！”

就在这时，客厅里响起电话铃声。毛泽东到客厅里去接电话，可视电话屏幕上出现总台小姐的面孔：“文老先生，下面有一个外国人和一个翻译求见。那个外国人说是您的老朋友。”

毛泽东问：“叫什么名字？”

总台小姐回答：“叫赫鲁晓夫。”

毛泽东一听这名字就感到头疼，本想拒见，转念一想，多年未跟这个“老朋友”见面，谈谈也好，就说道：“欢迎他们上来！”

毛泽东接完电话，前往餐厅，孙子毛新宇和孙媳郝明莉不见踪影。

毛泽东回到客厅找他们，原本放在那里的毛新宇的著作、光盘以及郝明莉送的“脑白金”，都不翼而飞。

毛泽东又去八角厅寻找，仍不见孙子毛新宇和孙媳郝明莉。

毛泽东大声地喊着：“新宇！明莉！新宇！明莉！”

毛泽东居然把自己喊醒，方知刚才又是南柯一梦！

“老朋友” 赫鲁晓夫求见

就在这时，响起了门铃。

毛泽东只得披着那件黄缎睡袍，又去开门。

门口站着西装革履、戴着毡帽和一副金丝边眼镜的壮实男子见到房门开启之后，取下了毡帽，那圆圆的脑袋上长着一层短短的白头发，像个冬瓜似的，毛泽东一眼就看出是“老朋友”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身后站着的，也是毛泽东的熟人——苏联翻译费德林。他是苏联著名的汉学家，从毛泽东跟斯大林谈判时起，费德林就已经担任翻译。

虽说毛泽东认出面前的赫鲁晓夫，而赫鲁晓夫却不认识面前这位长着长发和络腮胡子的老人。赫鲁晓夫对这位老人说道：“请向毛泽东同志通报，原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前来拜访！”

费德林随即把赫鲁晓夫的话译成汉语。

毛泽东大笑起来：“请向赫鲁晓夫同志通报，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费德林一听，双眉紧皱，似乎并不相信面前的老人就是毛泽东，但还是把毛泽东的话译成俄语。

赫鲁晓夫仔细打量了面前的老人。突然，伸出双手，拨开毛泽东下巴上的胡子，见到下巴上有一颗显眼的痣，大笑起来：“真的是毛泽东同志！”

两位“老朋友”热烈地握手、拥抱。

赫鲁晓夫笑道：“毛泽东同志，你记得吗？那一回，你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旁接待我，那时候你身穿一件蓝白条子相间的睡衣。这一回，我们久别重逢，你改穿黄色的睡衣跟我见面。看来，你对睡衣有着特殊的爱好。”

毛泽东则以牙还牙道：“赫鲁晓夫同志，我注意到你今天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不知道你脚上的这双皮鞋，是不是当年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来敲打讲台的那双皮鞋？因为那双皮鞋也是黑色的。”

双方“寒暄”毕，毛泽东请客人来到客厅坐定。毛泽东从柜子里拿出美国进口原装咖啡，费德林赶紧站起来，准备自己动手煮咖啡。这时赫鲁晓夫却说：“请给我喝中国的龙井绿茶！”

毛泽东从柜中找出一听龙井绿茶，递给费德林。

赫鲁晓夫环顾四周说这：“毛泽东同志，您退休之后的生活条件，比我好多了！”

毛泽东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我清楚记得，您是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退休’的。您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二日结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谈之后，从莫斯科飞往黑海之滨休假。就在这时，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发动了宫廷政变。当您在六月十四日返回莫斯科时，等待着您的就是在‘退休申请书’上签字了！”

毛泽东的话，显然刺痛了赫鲁晓夫的神经。赫鲁晓夫大声地说道：“勃列日涅夫这家伙是阴谋家，是混蛋！他在我的面前，装扮成‘一声不响、忠诚老实的助手’，却在暗中策划一场推翻我的政变。他在跟苏共中央委员们聊天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试探对方的政治态度，然后悄然在自己的一份苏共中央委员的名单上画了记号：凡是反对我的画上‘+’，而拥护我的画上‘-’。据说，他在推翻之前，这项‘调查’工作已经悄悄进行了一年多！他联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德戈尔内、波利杨斯基、谢列平、谢米哈斯内等，一起策划政变。然而，就在勃列日涅夫紧锣密鼓策划政变的时候，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七日，我的七十大寿，勃列日涅夫还当着我面，用非常亲热的语调宣读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贺信！”

毛泽东道：“我对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任何好感。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对你的‘光荣退休’，还是非常高兴。就在你‘光荣退休’的第三天——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下令放‘礼炮’为你送行——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赫鲁晓夫是个“寸步不让”的人，他反唇相讥道：“毛泽东同志，在我看来，您只是稍稍比我幸运。您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作

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了，但是你的那位‘一声不响、忠诚老实的助手’林彪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的勃列日涅夫’。如果林彪先生的政变成功，他比勃列日涅夫更坏：勃列日涅夫还只是退我‘退休’，林彪却要用高射炮平射您的专列，叫您粉身碎骨！您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也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您把刘少奇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大方向’完全错了。您应该打倒的是‘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林彪。很可惜，我比林彪早死两天，上帝让我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开这个世界，如果晚两天，我就可以看见中国的‘九·一三’事件，看见‘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唉，林彪这个家伙，跟勃列日涅夫一样无耻。他当着您的面，说您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林彪跟勃列日涅夫，都‘当面是人，背后鬼’！”

毛泽东针锋相对道：“赫鲁晓夫同志，在我看来，你跟林彪、勃列日涅夫没有本质的区别。当年，你宣称斯大林是你的‘生身父亲’，骗取斯大林对你的信任。可是在斯大林同志去世之后，你先是逼迫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同志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把他打成‘反党集团’，接着又把斯大林的另一个接班人布尔加宁赶下台。你大权在握之后，就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大反斯大林：你指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制！我当时就看出你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阴谋家，一个现代修正主义头子。当时，我们就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跟你展开辩论。后来，论战不断升级，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发表‘九评’——九篇评论苏共中央来信的文章，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论战越来越激烈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你‘退休’了！”

两位“老朋友”见面之后，双方剑拔弩张，依然像当年进行大论战一样。为了缓和气氛，赫鲁晓夫改换了话题：“毛泽东同志，我最初是

从斯大林那里知道您。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您从北京来到莫斯科，庆贺斯大林七十诞辰。当时，我正好从乌克兰的基辅调到莫斯科工作。我见到了斯大林。我问斯大林：‘有什么新闻吗？’斯大林说：“有，‘马察东’现在莫斯科。”我不知道‘马察东’是谁。后来才知道，‘马察东’就是您毛泽东！”

听了赫鲁晓夫这个“马察东”的故事，毛泽东笑了。

赫鲁晓夫又说：“当时，我们在苏联，首先知道中国党的领导人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其次是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后来，我知道了刘少奇——也就是您说的那个‘中国赫鲁晓夫’，因为刘少奇秘密地访问了苏联。再后来，我知道了‘马察东’！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一九五四年，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记得，那时候布尔加宁在中国患了严重的失眠症。我也失眠，只是没有他那么严重。我们从来没有失眠症病史。后来，经过医生检查，才知道是因为中国的龙井绿茶太好喝了，我们不断地喝，连睡觉前都喝，所以导致了失眠！”。

听了赫鲁晓夫这个“失眠”的故事，毛泽东又笑了。毛泽东这才明白，刚才赫鲁晓夫为什么不要咖啡，而要龙井绿茶。

赫鲁晓夫喝着龙井绿茶，毛泽东和费德林也喝着龙井绿茶。毛泽东说：“看样子，今天夜里我们俩都要患‘失眠症’！”

赫鲁晓夫接着说道：“毛泽东同志，你还记得一九五七年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吗？那时候，您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光临莫斯科。那一次，您特地向我介绍了代表团里的一位小个子。您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这才第一次认识这位小个子，他叫邓小平。”

毛泽东道：“是的，我曾经说过，邓小平‘人才难得’。”

赫鲁晓夫说：“后来，在中苏大论战期间，邓小平担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一次次来莫斯科谈判，我多次跟他打交道，他确实非常聪明，而且非常能干。我也始终非常喜欢刘少奇。我们见面交谈时，我们发现我们立刻就互相理解了，而且我们的思想方法也是非常相似的。我不

知道，您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把他们打倒？！”

赫鲁晓夫毕竟是政治家，在“马察东”和“龙井茶”之后，话题又转到了政治。于是，论战重新开始。

毛泽东答道：“我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打倒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就是因为刘少奇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代表。你刚才说，你跟刘少奇一见面，‘立刻就互相理解了’，‘我们的思想方法也是非常相似的’，恰恰表明他跟你的思想、立场完全一致。我深刻记取斯大林的教训。我绝对不允许在我身后，有像你这样的人作‘秘密报告’，有像你这样的人把我焚尸扬灰！”

赫鲁晓夫也激动起来：“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制造了那么多政治冤案，杀了那么多亲密战友，杀了那么多功勋卓著的元帅和将军，杀了那么多苏维埃的忠诚战士，他的双手沾满了两千多万人的鲜血。他根本没有资格躺在列宁墓里。作出把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的决定，不是我个人，而是经苏共中央同意、批准的。你们中国党屡屡发表文章，指责我把斯大林‘焚尸扬灰’，这完全是在歪曲事实。实际上，我们是把斯大林遗体装入棺木，移葬到红场的苏联领导人墓群之中。他的坟墓跟后来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等领导人的坟墓并排，一点也没有‘亏待’他！就连我本人，还没有这样的‘待遇’。我死后，没有安葬在红场，而是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圣女公墓里，跟名作家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芭蕾皇后’乌兰诺娃，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躺’在一起，反而感到很愉快。正因为这样，人们开玩笑地说，在红场，深夜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已故领导人会议，惟有赫鲁晓夫缺席！”

说到这里，赫鲁晓夫马上发现，自己又卷入不愉快的话题。在赫鲁晓夫看来，所有这一切，在当年的中苏两党大论战中，都已经争论过，何必旧事重提。

赫鲁晓夫又一次缓和谈话的气氛，说道：“过去的事，就一风吹了吧！你我如今都是退休老人，还是彼此交流健身经验更加有益些。我在退休之后，除了养花之外，主要是忙于写回忆录，毛泽东同志，您在退休之后，做些什么呢？”

毛泽东回答说：“我不养花，也不写回忆录。”

赫鲁晓夫追问道：“那您干什么呢？”

毛泽东回答说：“我‘长眠’了二十几年！”

赫鲁晓夫道：“听说，您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为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建造了‘毛主席纪念堂’，比红场上的列宁墓还辉煌！”

毛泽东说：“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曾经带头在死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字。当年，列宁也在遗嘱中写明，死后归葬故乡。红场上的列宁墓与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其实都是继承者为了表白自己的忠诚，做给别人看的！”

赫鲁晓夫连连点头：“毛泽东同志，您能够看透这一点，表明您的思想的深邃。我很敬佩您的这一见解。今天晚上，我们两位‘老朋友’谈得很好。希望您能够到莫斯科郊外的新圣女公墓访问，我可以带领您去拜访我的‘邻居’高尔基、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

毛泽东伸手与赫鲁晓夫握别，却发现赫鲁晓夫的手抓不住、摸不着——原来，这又是南柯一梦！

与蒋介石第三次握手

跟赫鲁晓夫作了一番争论之后，毛泽东感到倦怠，他生怕电话铃声再把他吵醒，就打电话关照总台小姐，告知要休息了，不再接电话。

“皇帝套间”寂然无声，虽然那软绵绵的席梦思使毛泽东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他在“龙榻”上还是很快就入眠了。

这时候，张军轻轻推开“寝宫”的门，见毛泽东正鼾声如雷，也就

放心地把门掩上。

然而，老年人总是睡睡醒醒。毛泽东睡了一个多小时，醒了过来，见到可视电话屏幕上闪动着一行字：“客人求见！”

原来，由于毛泽东关照过不再接电话，总台小姐不使用电话铃声惊扰客人，只好在电话屏幕上显示字幕——求见的客人正坐在总台等候。

毛泽东拿起电话耳机，可视电话的屏幕上立即出现总台小姐的面孔：“文老先生，有一位客人在此等候多时。”

毛泽东问：“来客贵姓？”

总台小姐：“姓蒋。”

毛泽东又问：“大名？”

总台小姐：“中正。”

毛泽东一听，睡意顿消，连忙说：“有请！有请！”

毛泽东这一回不再是匆匆忙忙披那件黄缎睡袍，而是端端正正穿好唐装，开了房门，“出廓迎接”——来到“皇帝套间”专用的电梯间。

毛泽东刚到电梯间，客人便乘坐电梯到了。

客人身穿长袍马褂，披着大氅，戴着礼帽，手持“司的克”，双手戴着白手套。他见了长须长发的毛泽东，以为是侍者，便准备把礼帽、“司的克”和白手套交给他，直到毛泽东说了声“欢迎蒋先生”，蒋介石听见那熟悉的湖南口音，才意识到站在面前的就是毛泽东。

蒋介石从头到脚端详面前的毛泽东，良久，大笑道：“润之兄，上了年纪，变成这等模样，几乎叫我认不出来了！”

毛泽东则道：“久违，久违。蒋先生别来无恙？”

毛泽东领着蒋介石进入八角厅，来到客厅。蒋介石在太师椅那黄缎垫子上坐定之后，说道：“润之兄，北京饭店怎么有如此豪华的总统套房？当年，孙总理病重时，曾经下榻北京饭店。我陪同孙总理来京，也曾在此住过数日。”

毛泽东道：“这是北京饭店在几年前新装修的套间，所以你跟孙中山先生来此之时，尚未有这等套间。”

毛泽东给蒋介石倒了一杯白开水，说道：“蒋先生还是当年的习惯，不喝茶，不喝咖啡，只喝白开水？”

蒋介石微笑道：“知我者，润之也。”

毛泽东道：“那我就不抽烟了。我知道你不抽烟，而且不喜欢别人当着你的面抽烟。在重庆跟你谈判了四十多天，我没有在你面前抽过一根烟！”

蒋介石说：“润之兄，你我虽为政治对手，但是见了面，总是客客气气，彼此尊重。最近，有一条关于你我的新闻，不知你注意了没有？”。

毛泽东问：“什么新闻？”

蒋介石道：“你我冤家对头，还是亲戚呢！”。

毛泽东感到意外：“你我是亲戚？天下奇闻！”

蒋介石说：“此事千真万确，还是大陆学者考证出来的呢！”

毛泽东道：“我从‘长眠’中醒来才两天，忙于应酬，未及读报愿闻其详。”

蒋介石说：“我是从台湾报纸转载的消息中得知的。此事关系到你我，所以我就剪了下来保存。”

蒋介石拿出剪报，告诉毛泽东：

经过大陆学者的考证，表明毛泽东的二十代先祖毛大华，原住江西吉水，因战乱而迁至湖南，落脚韶山。那么，在江西吉水之前毛氏居于何处？

一九九零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整理馆藏中发现了《韶山毛氏族谱》，又进一步查明：毛姓从周朝开始，最早居住长江以北，是为“北毛”。后因战乱南渡，迁居江南，成为“南毛”。“南毛”的始祖叫毛宝，是毛氏家族的第五十二代。毛宝的儿子因战功受封，居住在信安（即今衢州一带），从此繁衍生息，称为“三衡毛氏”。北宋时，时任工部尚书的毛让从衢州迁至江西吉水。这么一来，查清江西吉水毛氏，是从浙江衢州迁来。

此后，大陆学者又从《清漾毛氏族谱》中查明，毛宝的第八代后裔中，有一个叫毛元琼的，迁至石门清漾。毛氏定居清漾，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毛泽东的祖籍地，在浙江省江山市石门镇清漾村。

从《清漾毛氏族谱》中查出，近代清漾村出过六个尚书，八十个进士，在当代则出过国民党高级将领毛人凤、毛万里、毛森这“三毛”。

二零零零年四月，大陆学者郑艮安出版《毛泽东祖籍溯源——从韶山到衢州》，进行详细论证。

说到这里，蒋介石这才最后点明：他的元配、蒋经国之母毛福海乃是清漾毛氏后裔！毛福梅是清漾毛氏第一百一十三代后人，至于毛泽东系清漾毛氏第几代人，尚在考证之中。一旦考证出来，蒋介石就可以与毛泽东排定辈分！

毛泽东听罢，大笑道：“照这么考证，天下人在五百年前都是一家，说不定还能考证出来你蒋介石跟美国总统布什是亲戚呢！”

蒋介石却一本正经道：“不管怎么说，经国的生母毕竟姓毛，毛人凤、毛万里、毛森这‘三毛’也姓毛，与毛先生有着同宗之缘。”

既然蒋介石这么说，毛泽东也就随着说道：“天下真小！我既然跟贵夫人以及先生手下三员‘毛’将在五百年前有着‘亲戚关系’，这表明海峡两岸皆炎黄子孙！”

蒋介石在说完“新闻”之后，对毛泽东说道：“润之兄，你我这一回，该算是‘第三次握手’了吧！”

毛泽东答道：“不错。你我头一回见面，是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大’时。”

蒋介石说道：“不错，是在中国国民党‘一中全会’。”

毛泽东说：“那时候，孙中山先生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国国民党‘一大’代表。”

蒋介石说：“对，对，在大会上，多次宣布第三十九号代表毛君泽东发言。我就是从那时候认识你的。”

毛泽东说：“你在大会上，好像一言未发。”

蒋介石说：“那时候，你是正式代表，我只是列席代表而已！”

毛泽东说：“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的‘二大’的时候，你就很显赫了，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的就是你，在那次大会上，你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九常委之一，成为中国国民党核心人物，因为你是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枪杆子在你手里。”

蒋介石笑道：“你毛泽东也不错呀，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成为我党的‘笔杆子’。”

毛泽东也笑了：“‘笔杆子’斗不过‘枪杆子’。后来，国共分裂，我就深切地感到这一点。我上了井冈山，我号召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我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蒋介石连连点头：“润之兄，你这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至理名言，我一辈子就是奉行‘枪杆子主义’！从一九二七年井冈山‘剿匪’，到一九四九年‘大陆沦陷’，你我打了整整二十二个年头。”

毛泽东更正道：“是从一九二七年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到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你我打了整整二十二个年头。”

一个说“大陆沦陷”，一个说“大陆解放”，两个人的用语截然不同。

毛泽东回顾这二十二年的历程说：“我从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开始，举起枪杆子，上了井冈山，跟朱德一起击败你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接着，又跟你打了两万五千里，前有围堵，后有追兵，漫漫长征，从江西打到湘江，翻雪山，过草地，一直打到陕北，在那里站住了脚跟，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你吃不了我，不得不承认我，所以你我才有一九四五年八月的重庆谈判，才有你我的第二次握手！不过，重庆谈判的墨迹未干，你我又重新开战。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打掉了你的主力，你只得在北平重开和谈。和谈再度破裂，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攻下大上海，扫荡两广，进军西南，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把你赶到那一群海岛上！”

蒋介石道：“我虽然败走台湾，但是我那时候声言‘汉贼不两立’，一定要‘反攻大陆’！”

毛泽东道：“在这二十二年里，你我之间打了四百多次战役！要知道，拿破仑一生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从炮兵少尉直至法兰西皇帝，也不过指挥过六十个战役。”

蒋介石感叹道：“润之兄，虽然我一直是你的对手，但是我敬佩你。你作为一个‘秀才’，作为一个‘笔杆子’，居然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居然能够胜我一筹。我作为职业军人，我的百万大军，败在你这个‘秀才’手下，真是始料不及。不过，你说我是‘枪杆子主义’、‘视枪杆子为命根子’，就像贾宝玉离不了那块通灵宝玉；其实你我彼此彼此，你也是一辈子抓军权。你可以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做，可是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一直牢牢抓在你手里，你同样‘视枪杆子为命根子’，也是个‘贾宝玉’！”

毛泽东道：“我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把你赶出中国大陆，一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蒋介石说：“我平生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击败各路军阀建立国民政府中央政权，二是八年抗战打败日本。”

毛泽东道：“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蒋介石说：“我感到遗憾的是，反共一辈子，最终被共产党所打败！”

毛泽东道：“我感到遗憾的是，接班人华国锋没有接好班！”

蒋介石说：“我感到遗憾的是，儿子蒋经国开放党禁，埋下祸根，结果国民党第二次被打败——第一次败于你们共产党之手，还算说得过去；第二次败于小小的民进党之手，简直是奇耻大辱！”

毛泽东道：“你我都反对民进党搞‘台独’，你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这一点是你我的共识。”

蒋介石说：“对于美国那个国务卿基辛格，我从来没有好感。不

过，此人到底是博士，是‘智多星’，非常善于捕捉你我的共同点，所以才会在《上海公报》里，写上那么一段‘妙语’……”

这时，毛泽东与蒋介石异口同声背诵起来：

“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背诵毕，毛泽东与蒋介石相视大笑。

笑罢，毛泽东问：“蒋先生，你读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回忆录吗？你知道此兄是如何比较你我？”

蒋介石笑道：“我当然细细阅读了他的回忆录。我记得，他是这么评价你我：‘我觉察到他们两人在提到自己的国家时，都有点秦始皇帝的口吻。两人的姿态和讲话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他们的生命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两个这样的领袖在历史中相逢，只会冲突，不会妥协。一个成为征服者，另一个成为被征服者。’”

毛泽东道：“正因为这样，你我冲突几十年，谁都没有向谁妥协。”

蒋介石接着说道：“此兄回忆你的时候，说‘毛举止随便，说话爱简略，给我的印象是有成打的问题同时在他脑里转动。他讲他的意见，心平气和，语调平淡，在一个规模较小的会场会引人注目，但不是雄辩之材。即使在说明重大观点时，他也喜欢语惊四座。’在谈到我的时候，则说‘蒋披一件十分整洁的黑色斗篷，头剃得光秃秃的，在私人场合，同他那肃穆寡言笑的态度相得益彰。在我说话时他偿于不暇思索地连声说“好，好”，显得有一点紧张。他双眼的神采给人自信和执拗的印象。眼眸是漆黑的，有时闪出光芒，在我们交换意见之前，不时环视办公室各处。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就盯着我的眼睛看。’”

毛泽东笑道：“我跟尼克松见面时，他问我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我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趁这机会，替我作了答复：‘一般地说，我们叫他“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

对骂。’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毛泽东与蒋介石都大笑不已：“你我彼此彼此！”

毛泽东在大笑中醒来，一看，蒋介石无踪无影，自己正躺在“皇帝套间”的“龙榻”上，方知刚才又做了一梦。

第九章 深入基层

晨曦之中间国歌

“龙榻”那软绵绵的席梦思折腾了毛泽东一夜。他在似睡非睡、连做三梦中度过。他庆幸张豪只让他在“皇帝套间”住一夜而已。如果天天住这里，他实在受不了。

毛泽东向来晚起。然而，由于没有睡好，他早早醒来，早早起床。

北京冬天的早晨，黑蒙蒙的。从西窗望出去，故宫朦胧一片。从南窗俯瞰，长安街上的车流已经开始涌动。尽管这天是星期天，仍有那么多人在寒风中骑着自行车去上班。扫地车在清扫宽阔的马路。环卫工人在清理垃圾箱。交警在街头巡逻。

虽然“皇帝套间”里温暖如春，但毛泽东还是推开了窗户，大口大口呼吸着清冷的新鲜空气。

就在这时，从远处传来了《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

“长眠”多年，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熟悉的旋律。

听到这雄壮的歌声，毛泽东不由得想起，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繁忙的日子，他选定了这首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让每一个人听到这歌声，都能激起“居安思危”、“奋勇前进”的情感。

听到这雄壮的歌声，毛泽东不由得记起，当他两次出访苏联的时候，当他一次又一次迎接外国国家元首的时候，总是响起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歌声使他自豪，这歌声使他又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就在这时，张军轻轻推门进来，说道：“主席，您起得好早。昨夜，睡得好吗？”

毛泽东皱着眉头说：“躺在那席梦思上，叫我‘梦思’不断！”

张军大笑起来：“主席还是睡惯硬板床！”

张军生怕毛泽东受凉，要前去关窗，毛泽东却让他开着窗，以便听那窗外的国歌声。

张军告诉毛泽东，这是天安门广场上在举行升国旗仪式。天天举行这样的仪式，天天有许多人远道赶来，观看升旗仪式。即便在眼下的寒冬腊月，仍有很多人摸黑赶到天安门广场，注目五星红旗徐徐升起，迎接第一缕阳光。

一直到国歌声结束了，毛泽东这才关上西窗。惯于纵向比较的毛泽东，这一回来了个横向比较：“我在欢迎世界各国元首的时候，听过各国的国歌。照我看来，在全世界各国的国歌中，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最催人奋进的。不论是苏联的《祖国进行曲》，也不论是美国的《星条旗之歌》，还有那法国的《马赛曲》，都不及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

张军道：“其实，您天天早上在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天天早上在看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因为天安门城楼上，一直挂着您的巨幅画像。”

毛泽东笑了。

过了一会儿，“小放牛”来了，张霞和陈港生也来了。他们一一向文老先生问候早安。

没多久，张豪夫妇从家里过来了。他们也向文老先生问候早安。

张豪给总台打电话，请服务小姐送中式早餐来。

毛泽东说：“不用送早餐了，昨晚的夜宵，那一百零八种‘御用点心’，还没动过呢。”

张豪说：“夜宵归夜宵，早餐归早餐。这里的夜宵大都是甜点心，早餐很有特色。我给您要了中式早餐。”

正说着，服务小姐推着小车，送来满满一车早点，随便客人选用。

于是，众人各取所需、各选所爱：张军挑了芝麻烧饼和虾肉小馄

饨；“小放牛”选了上海南翔小笼包、南瓜饼和一小碗酒酿圆子；张豪拿了水晶包、叉烧包和牛奶；张豪太太看中嘉兴五芳斋的蛋黄鲜肉粽和豆腐花；陈港生喜欢粤式风味的鲜虾肠粉和皮蛋瘦肉粥；张霞奉行“减肥第一”的原则，只要了五香凤爪和珍珠奶茶。

众人一一选定，惟有毛泽东按兵不动。张军问：“文老先生，喜欢什么？”

毛泽东说：“我喜欢的东西，这里都没有！”

“小放牛”赶紧问：“您喜欢什么，尽管吩咐，这里会专门为您做的。”

毛泽东笑道：“我喜欢油炸臭豆腐，红油肉丝汤面。”

张豪马上打电话给总台小姐。总台小姐立即通知大厨。

北京饭店的厨师接到通知，红油肉丝汤面倒是好办，在肉丝汤面里加足红红的辣油就行了。但是住“皇帝套房”的客人，从未点过“油炸臭豆腐”，北京饭店厨房没有现货。当即派出专人骑着摩托车外出采购臭豆腐。十分钟之后，服务小姐送来了毛泽东点的两种早点。

毛泽东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赞扬北京饭店的工作效率。

吃罢早点，退房的时间到了。那一百零八种“御用点心”还没有动用过，张豪请服务小姐替他打包，足足打了十大包！

大家原本以为，张豪一定开着他的豪华轿车，带大家前往他那十三陵水库别墅。

谁知张豪总是要给文老先生制造惊喜：

昨晚，请文老先生吃意想不到的“开国第一宴”；

吃罢“开国第一宴”，又把文老先生送入闻所未闻的“皇帝套房”；

现在，张豪又忽然宣布，先请文老先生参加“胡同游”，然后才去十三陵水库。

文老先生不明白什么叫做“胡同游”？

张豪告诉他：“‘胡同游’，是北京新近推出来的旅游项目。胡

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俗话说：‘著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胡同好比北京的微血管。客人乘坐专门的豪华三轮车，在北京大小胡同里转悠，深入民间，体验北京市民生活，犹如进入当今的《清明上河图》。那些三轮车夫还身兼导游，他们都经过培训，不仅深知‘胡同文化’、‘胡同历史’，而且都能讲流利英语，边骑车，边讲解。这一旅游项目推出之后，深受老外们的欢迎。我想，趁老先生久病初愈，作一番‘胡同游’一定会兴致盎然。不知文老生意下如何？”

毛泽东抚掌笑道：“正合我意也！总是住在高楼里，总是坐在轿车里，我难以接近平民百姓。这‘胡同游’，可以让我直接接触普通百姓，看一看现在的《清明上河图》，真是难得机会。”

张霞用“现代语”说道：“这叫‘零距离’观察生活！‘胡同游’是视察北京的‘最佳平台’，‘酷’极了！”

毛泽东听不懂这一连串“现代语”，脸上却挂着一连串“酷笑”。

见到文老先生如此兴高采烈，张豪也欣喜万分。他拿出自己的貂皮大衣，替文老先生披上，说道：“‘胡同游’的最佳季节原本是春秋。眼下正值寒冬，文老先生多多保暖。‘胡同游’要一上午时间。请爸爸、妈妈和小霞陪同。我和太太、港生作为‘先头部队’，先去十三陵水库做准备，中午的时候来接你们。”

毛泽东点头道：“好、好。”

胡同深深情深深

毛泽东一行离开“皇帝套间”，下了楼，在北京饭店门口见到两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站在两辆红色顶篷、黑色车身的崭新的三轮车前，已经在那里恭候。小伙子身穿红色棉马夹，马夹正面写着白字“北京”，背面则写着白字“胡同游”。三轮车上的车铃，擦得银光锃亮。

看到文老先生缓缓走来，两位小伙子疾步向前，说道：“欢迎老先生参加北京‘胡同游’！”然后，一边一个，两位小伙子轻轻搀扶着毛

泽东，让他稳稳地坐在前面的一辆三轮车上。

张霞陪毛泽东坐在同一辆车上。张军夫妇坐在后面的一辆三轮车。

坐定之后，两位小伙子徐徐蹬车，驶出北京饭店，转眼之间，就像一条灵活的小鱼，“游”进了小胡同。

毛泽东戴着法兰西无沿绒帽，穿着貂皮大衣，坐在软软的车垫上，显得很兴奋。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坐三轮车了。在他的记忆中，似乎只在一九二四年夏日乘坐过“黄包车”。那是当妻子杨开慧和岳母带着长子毛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毛岸青从湖南来到上海，他到码头迎接，陪他们乘坐“黄包车”回家的时候。那时候，他总觉得乘坐这种人力车，让人拉着，心里总是过意不去，大有人“压迫”人的感觉，对于正在呼喊“劳工神圣”的他，非到万不得已，不坐“黄包车”。如今，坐这三轮车，虽说也是人力“驱动”，毕竟要比“黄包车”好多了，没有那种人“压迫”人的感觉，所以毛泽东显得很自在。尤其是三轮车可以如鲫过江一般自由穿梭于小小的胡同之中，如此近距离观察北京百姓生活，那是过去在中南海那个“圈圈”里从未有过的体验。

“老先生，我姓杨，您就叫我小杨。我是您的车夫兼导游。我们这次进行的是北京‘胡同游’，您现在就已经身处胡同之中。”小伙子一边骑车，一边用略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开始进行解说。虽说胡同的路面不像长安街那样平整，小伙子倒也小心翼翼，路遇不平，要么绕过去，要么缓缓而过。

北京的大街已是高楼林立。在大厦背后，居然还有这么多曲里拐弯的胡同。大多数胡同两边的四合院外墙，刷着青灰，也有的是黄土墙或者白墙。这里跟摩天大厦判若两个世界。毛泽东往日只是乘坐专车从北京的大街上飞驰而过，没有来过这些小小、窄窄、长长短短、弯弯曲曲的胡同。

胡同深深，承载着北京的历史、承载着北京的文化。

小伙子此时以导游身份开始讲解北京胡同的来历：

“北京城方方正正，像围棋的棋盘。里面那一个个小四方格，就是

四合院。在古代北京，达官显赫一家住三进四合院，普通百姓十几户、几十户住一套四合院，叫做‘大杂院’。古代北京就是由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四合院背靠背、面对面组成的。住在四合院里的人要进进出出，就在四合院跟四合院之间留出通道，这通道就是胡同。

“北京有多少胡同呢？在明代，北京就有一千一百多条胡同，清代的时候发展到一千八百多条，民国时有一千九百多条，现在有四千多条！”

“北京是元朝的‘大都’。胡同是从蒙古语‘忽洞格’演变而来的。‘忽洞格’的原意就是水井。那时候，每条胡同差不多都有一个水井。”

“北京最窄的胡同是前门外大栅栏的钱市胡同，最窄处只有四十厘米，连我这辆三轮车都过不去。曲曲弯弯最多的是北新桥的九道弯胡同，实际上有二十多道弯。”

“北京的胡同，名字最怪的要算‘屎壳郎胡同’，其实这个名字是根据蒙古语音译而来，原意是‘甜水井’！由于名字不雅，现在改为‘时刻亮胡同’”。

“还有，‘箍簪胡同’的蒙古语原意，则是‘苦水井’！‘局儿术胡同’，蒙古语是‘双井’的意思；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蚂螂胡同，原意是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小伙子说起胡同来，有板有眼，有韵有味，使毛泽东在车上听得入神。

毛泽东记得，他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与湖南青年罗章龙、李维汉、萧子升、张昆弟等二十四人一起，从湖南长沙，头一回来到北京。那个时候，毛泽东住在他的老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家中。杨昌济家就在胡同里——北京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那时候，他常跟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漫步在北京的胡同，或者沿着小小的胡同前往北京沙滩红楼——北京大学。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手下当助理管理员。从那时候起，毛泽东就跟北京的胡同打交道。但是，他并不知道关

于北京胡同的那么多考证，所以他对小伙子的讲解极有兴味。

张霞在北京土生土长，对于北京的胡同要比毛泽东更熟悉，她向导游问起了各种各样关于胡同的问题：“杨先生，‘无量大人胡同’是什么意思？”

小伙子答：“那胡同里住过明太祖手下大将吴良，就叫‘吴良大人胡同’。后来，传着传着走了样，叫成了‘无量大人胡同’。如今，改名‘红星胡同’。”

问：“石老娘胡同呢？”

答：“那胡同里住过姓石的接生婆。在古代，把接生婆叫老娘。”

问：“王皮胡同呢？”

答：“住过姓王的皮匠。”

问：“西单的皮库胡同？”

答：“那里曾经是存放皮料的仓库。”

问：“惜薪司胡同？”

答：“当年官府衙署惜薪司所在的地方。像这样以官方机构命名的胡同还有禄米仓胡同、按院胡同、府学胡同、贡院胡同、兵马司胡同等等。”

问：“王广福胡同是不是因为住过名叫‘王广福’的人？”

答：“不，不。那条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后来觉得不雅，改称王广福胡同。这就像‘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这两条胡同都很短，像狗尾巴、羊尾巴。”

问：“手帕胡同呢？”

答：“卖手帕的胡同，就像羊肉胡同里原本卖羊肉一样。”

问：“耳朵眼胡同呢？”

答：“因为那胡同大小，像耳朵眼那么小。”

问：“一尺胡同？”

答：“胡同很短。”

问：“盒子胡同？”

答：“胡同方形。”

问：“小喇叭胡同？”

答：“胡同一头细一头粗。还有很多用北京土话命名的胡同，比如背阴儿胡同、取灯儿胡同、闷葫芦罐儿胡同、胰子胡同、罗儿胡同、鸦儿胡同、雨儿胡同、上儿胡同、帽儿胡同、盆儿胡同、井儿胡同、嘎嘎胡同等等。”

问：“白回回胡同呢！”

答：“那里住过姓白的穆斯林。”

问：“猪毛胡同？”

答：“那条胡同里住过姓朱和姓毛的人家。”

毛泽东一听北京居然有“猪毛胡同”，笑道：“这条猪毛胡同是不是在中南海？”

小伙子答道：“猪毛胡同在什刹海。”

毛泽东大笑道：“朱毛红军在井冈山！”

小伙子又说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破四旧’，把戴家胡同改名为‘红哨兵胡同’、北豆芽胡同改名为‘红小兵胡同’、豆角胡同改名为‘红到底胡同’。老百姓谁都没理会。这些‘红名字’才几天，就被人忘掉了！”

小伙子对答如流，引起毛泽东很大的兴趣。虽说小伙子对“破四旧”很反感，毛泽东也不计较。

毛泽东问道：“小杨，听你口音，不是北京人。”

小伙子答道：“我是陕北人，到北京打工。”

毛泽东感到奇怪：“你对北京很熟呢！”

小伙子说：“我在北京上了旅游专科学校，大小算个大专生。”

毛泽东笑道：“你的文化水平比我还高呢！”

小伙子连忙说：“不敢，不敢。”

小伙子一边蹬三轮，一边又说道：“胡同虽小，却藏龙卧虎。米市胡同里有康有为故居，北半截胡同中有谭嗣同故居，珠朝街有孙中山先

生到过的中山会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是鲁迅故居，小杨家胡同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护国寺街有梅兰芳故居，后圆恩寺胡同有茅盾故居，西四北三条有程砚秋故居……”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那么多年，今天才有机会领略小小胡同的博大精深。

小伙子蹬着三轮，经什刹海西沿，过银锭桥到鼓楼，登楼俯和北京旧城区和四通八达的胡同，然后前往后海，参观京城古老的甬北官房胡同、大小金狮胡同、前后井胡同。

小伙子一边蹬三轮，穿梭于胡同，一边背诵起作家萧乾关于胡同的散文：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头‘芹菜辣青椒、韭菜倭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年糕’的车过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锯盆锯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吱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大田螺’，夏天是莲藕和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大概都是灯下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悠长，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的还挺眼。像‘硬面——’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空门而且加音的是夜乞者的‘行好的——老爷——太唉太——有那剩菜——剩——赏我点儿吃吧’。”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时在给自己壮胆。”

听着萧乾的散文，毛泽东仿佛回到胡同那远逝的岁月。他喜欢这充满乡土气息的散文，只是不喜欢这散文的作者，因为毛泽东记得，萧乾这位名记者、作家、翻译家是个“右派分子”。

四合院里访百姓

胡同深处是人家。

胡同是北京平民百姓的世界。萧乾的散文，使毛泽东很想看看四合院的百姓生活：

在胡同中转悠了半天，小杨却告诉毛泽东，下一档节目，也是最后一档节目，是参观胡同里的清代贵族人家大宅院——恭王府花园，然后在那里的旅游饭店吃中餐。

毛泽东对于恭王府花园没有大大的兴趣，因为中南海比恭王府花园要漂亮多了。毛泽东向小杨提出改变行程，看一看普通百姓所住的四合院。小杨答应了。他说，他可以带客人前往旅行社指定的四合院，那些四合院是专门对外的。

毛泽东不愿意去那些专供外宾参观的四合院，却指着眼前的一个四合院，说是进去瞧瞧。

小杨遵命，把三轮车停了下来。后边那辆载着张军夫妇的三轮车，也随着停了下来。

对于四合院，毛泽东很熟悉，因为他在中南海住的就是四合院——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东南西北四排房子。在中南海，四合院的院子里种着鲜花，房子的门窗刷着红漆，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然而，眼前的这个四合院，住了二十多户人家，成了“大杂院”。陈年旧屋，到处斑斑驳驳。墙上横七竖八拉着电线。院子里搭满“小房子”，各家各户在“扩张领土”，不断“蚕食”院子。时近中午，这些“小房子”，很多都开始冒烟，因为那里正是各家搭建的厨房，是烧饭做菜的地方。毛泽东深切地感到，这里跟北京饭店的“皇帝套房”，有着天壤之别。

正值严冬时节，四合院家家户户都紧闭门户。毛泽东见到北屋的一扇房门打开，一位大娘从屋里出来，往外倒煤灰。毛泽东来到门前，向大娘打招呼：“大娘，可以进来看看吗？”

大娘马上热情地说：“老人家，进来坐坐，喝杯热茶！”

在张霞那座高层大楼里，毛泽东见到每家每户都装了不锈钢的防盗门，壁垒森严，邻里间“鹅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然而，在这大杂院里，不论谁家都只有一扇木门而已。应大娘相邀，毛泽东、张霞和张军夫妇都进了屋。两个小伙子说是等在门外。大娘说是屋外冷，尽管屋里那么小，硬是把两个小伙子拉进屋里。

这房子很小，十平方米左右。屋里只有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个炕，一台二十一寸的彩色电视机。一个中年男子坐在轮椅上，上在用灵巧的双手做着漂亮的绢花。桌上堆满做好的鲜红、淡黄、紫色、白色的郁金香绢花。大娘把两把椅子让给上了岁数的毛泽东和张军，她和“小放牛”、张霞以及两个小伙子挤在炕上。

大杂院里屋挨屋，就连在床头吃柿子，隔壁都能听得见。看见大娘家来了这么多客人，隔壁一对中年夫妇知道大娘家没有那么多的茶杯，就送来了一摞一次性塑料茶杯。大娘从煤炉上提起铝水壶，给每位客人都冲上一杯热茶。

毛泽东一抬头，见到墙上竟然挂满十几本彩色挂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年一本，都挂在墙上。这些挂历上，清一色都印着女影星的大照片。

见到毛泽东注意起墙上的挂历，大娘说道：“我们家只有娘儿俩，儿子喜欢这些挂历，舍不得丢了，就一年一年挂在墙上，越挂越多。”

毛泽东关切地问：“你的孩子什么时候残疾！”

大娘说：“小时候得了一场大病，一连高烧几十天，好不容易退了烧，却再也站不起来了！”

毛泽东感叹说：“你真不容易！”

大娘说：“儿子很勤快，也很孝顺，我再苦也高兴。现在，儿子学会了做绢花的手艺。我们娘儿俩靠着做郁金香绢花，日子过得还可以。”

这时，儿子抬起头来，对客人们说：“我和娘做的绢花，还出口到

美国呢！”

在墙上的一大排女明星大挂历中间，极不协调地挂着一张照片。那是两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者的合影。其中一个是那中年男子，另一个胖墩墩的，板刷头，比中年男子年长。

毛泽东指着那个板刷头的残疾者问：“他是谁？”

男青年显得惊讶：“他都不认识？”

这时，张霞连忙说：“他是中国残疾人协会主席邓朴方，邓小平的儿子。”

毛泽东又问：“邓小平的儿子也残疾？”

中年男子说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给活活折磨死了。邓小平成了‘中国第二号走资派’，从北京被驱逐到江西。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也受到迫害，跳楼自杀未成，断了两条腿，落了个终身残疾！”

毛泽东一听，脸色顿时变得非常严肃。

中年男子并不知道自己面前坐着的老先生是毛泽东，继续说道：“唉，我爷爷、父亲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的。我父亲是普通工人，姓金，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出生。爷爷很高兴，给他取名‘金大陆’，意思是‘金色的阳光照耀中国大陆’。爷爷是个‘解放兵’，本来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小兵，在辽沈战役中投诚解放军，当天就穿上解放军的衣服，成了‘解放兵’。谁知道爷爷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历史反革命’，活活被红卫兵打死。我父亲的名字‘金大陆’，被红卫兵说成是‘进攻大陆’！这么一来，父亲成了‘现行反革命’。七斗八斗，父亲从北海大桥上跳下去，再也没有回家！‘文化大革命’不光使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这样的大人物遭殃，害得我们这些小人物也家破人亡！”

听了中年男子诉说的身世，毛泽东久久无语。

张军明白，男青年无意中的一席话，深深刺痛了毛泽东的心。为了结束屋内尴尬的气氛，张军说道：“谢谢大娘！我们能买几枝绢花作纪

念吗？”

大娘马上挑了几朵郁金香绢花，送给毛泽东。张霞给大娘塞钱，大娘怎么也不肯收。

“过几天，我买一本新的大挂历，送给你们！”临走，张霞这么说，大娘倒是乐了。

毛泽东一行刚出门，走过隔壁时，方才那对送来塑料茶杯的中年夫妇，热情地邀请毛泽东到他们家坐坐。

就这样，毛泽东跨进了四合院北屋的另一家。

这一家的房子跟隔壁大娘家差不多大小，也不过十平方米左右。不过，房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屋里除了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方桌、一台二十五寸的彩色电视机之外，比大娘家多了一个书架。另外，在靠窗的地方，显眼地放着一台电脑。

还是老样子，毛泽东和张军坐在椅子上，其余的人坐在床沿。大家刚刚坐定，大娘就进来了，送来一罐茶叶——她连邻居家的茶叶用光了都知道，就像中年夫妇知道大娘家茶杯不够一样。中年夫妇给客人们一一沏了热茶。大娘的儿子也凑热闹，摇着轮椅过来，把小小的屋子挤得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大杂院的居民们，都喜欢这样彼此来来往往。

“先生贵姓？”毛泽东问主人道。毛泽东已经“习惯”于称呼先生了，不再称“同志”或者“师傅”。

“免贵姓夏。”对方显然有一定文化修养，答话很斯文，“老先生贵姓？”

“在下姓文。”毛泽东也很斯文地答复，“今天是星期日，夏先生、夏太太休息在家，对吗？”

“今天是星期日？”夏先生似乎忘了星期几，“我们天天‘休息’在家，所以也就无所谓星期几！”

“天天‘休息’在家！”毛泽东感到奇怪，因为看得出，他俩都未到退休年龄。

“我俩都‘下岗’了！”夏先生回答说。

幸亏昨天毛泽东在跟陈港生聊天时，知道了“下岗”是什么意思：“夏先生，夏太太，你们怎么会‘下岗’呢？”

“我是中学语文教师。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家家户户都是独生子女，学生人数大大减少，北京的许多中学教师过剩，我也就‘下岗’了。”夏先生解释道，“我的太太本来在纺织厂当工人。纺织业不景气，她也‘下岗’了。”

“你们都‘下岗’了，日子怎么过呢？”毛泽东关切地问。

“我们参加了‘4050’工程。”夏先生答道。

“4050”工程这新名词，使毛泽东糊涂起来：“噢，你们都去当工程师？”

毛泽东这话，引起满屋子的笑声。

张霞赶紧解释道：“‘4050’工程这‘40’，是指四十岁以上的女性‘下岗’人员；‘50’，是指五十岁以上的男性‘下岗’人员。四十岁以上的女性‘下岗’人员和五十岁以上的男性‘下岗’人员，是再就业难度最高的人员。因为他们年纪偏大，学习新技术上比较困难。政府为了解决这样年龄段的‘下岗’人员再就业问题，专门组织了‘4050’工程，进行适合他们年龄的培训。”

经过张霞这么一解释，毛泽东明白了‘4050’的含义，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叫“工程”。

这一回，夏先生进行了解释：“‘工程’是现在最流行、最时尚的新名词。比如，关心青少年的工作，叫‘爱心工程’；帮助贫困学生的工作，叫‘希望工程’；解决城市的副食品供应问题，叫‘菜篮子工程’；新官上任，要许愿给老百姓办多少好事，叫‘民心工程’；帮助退休老人的工作，叫‘银发工程’……”

毛泽东笑道：“我是书法家，看样子要进行‘书法工程’。”

“我经过‘4050’工程的培训，学会了电脑打字，现在家里承接各种打字业务。我的太太经过‘4050’工程的培训，学习了‘家政学’，拿到‘星级保姆’证书。”

毛泽东又感到疑惑：“‘星级保姆’？”

这时，夏太太说道：“现在，做保姆也要经过培训。星级越高，工资越高，就像宾馆一样，星越多，房价越高。‘五星级’的保姆会讲很流利的英语，会做各种西餐，可以到外国人家里工作。”

毛泽东笑道：“做保姆也要会讲很流利的英语，我恐怕连做保姆的资格都不够呢！”

夏先生道：“我的太太做不惯保姆。她还是‘老脑筋’，以为那是侍候人的工作。正好我打字，缺人校对，缺人跑‘外勤’——跟公司联系电脑打字业务，她就帮我校对，跑跑腿。”

毛泽东说：“原来，你们在外面‘下岗’，在家里‘上岗’。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夏先生说：“光是维持我们两口子的生活，还算可以。不过，我们的儿子正在上大学，大学是‘老虎口’，太厉害了！”

毛泽东问：“大学怎么会是‘老虎口’呢？”

夏太太道：“‘现在的大学，这个费，那个费，太多了。一个孩子上大学，一年要花一、两万元！”

毛泽东说：“我的女儿上大学的时候，只用交伙食费、教科书费，再给点车费，我每个月只给她三十二元人民币。”

夏太太道：“文老先生，你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老黄历’了！那时候是毛泽东时代！”

听了这话，毛泽东的脸上浮现了笑容。夏太太的话，驱走了刚才在隔壁金家的不快，毛泽东的心里得到平衡。

毛泽东问道：“你们以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好呢，还是现在好？”

坐在一侧的老大娘，这时候说道：“当然是现在好：在毛泽东时代，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买鱼要鱼票，买糖要糖票。现在，你走进超级市场，样样都有，想吃什么买什么。”

夏太太则说：“现在的商品当然比过去丰富，什么票证都不要，只

要一种票——钞票！可是，现在贫富差别太大，有钱人一个人有好几套房子，又大又好，像我们这样的‘下岗’工人，只能挤在又小又旧又破又冷的大杂院，而且还只能住北屋。我做过一年多保姆，到过好几家，看看人家住花园洋房，看看人家开着私家车进进出出，看着人家做股票一个上午就赚了好几万，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我就发誓不做保姆！”

夏先生并不赞成太太的意见：“在毛泽东时代，固然贫富差别不大，但是那时候大家都穷，‘穷比穷，穷光蛋比乞丐’而已！”

大娘的儿子也发言了：“毛泽东时代，极左思想、极左路线太过分。又是‘反右派斗争’，又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是‘内行’，搞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如果不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我爷爷，爸爸死在‘阶级斗争’之中，我恐怕也要死在‘阶级斗争’之中！”

听老大娘、夏先生、夏太太的话，毛泽东还能保持“虚怀若谷”的状态，而一听大娘儿子的话，毛泽东差一点要骂他是“右派言论”了！

跟打工仔聊家常

夏先生家里高朋满座，正在七嘴八舌评论“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惊动了“邻居的邻居”，三位小伙子挤在门口听得入迷。

屋里的评论刚刚结束，三位小伙子就邀请文老先生到他们里作客。

毛泽东早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那三十一天里，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就曾经在湖南城乡开过诸多调查会，“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今日，毛泽东走访四合院，仿佛年轻时在湖南作调查研究一般。

三位小伙子所住的也是北屋，也是十来个平方米。屋里放着三张双层格子铺，可见是六个人住在这里。屋里除了两只小方凳之外，连电视

机、小方桌都没有。三间屋子相比，这间屋子最乱，住的人也最多。床头挂着湿漉漉的毛巾，床下放着脸盆以及旅行袋。

就像滚雪球似的人越来越多，当毛泽东一行来到这间小屋时，夏先生夫妇跟了进来，大娘和她的残疾儿子也跟了进来，真可以说济济一堂。为了节省塑料杯和茶叶，客人们手持在夏先生家未喝完的茶水进屋。照例，毛泽东和张军两位老人坐在方凳上，大娘的儿子坐在轮椅上，其余的人分坐在三张双人铺上。

三位小伙子告诉毛泽东，他们是“打工仔”。他们六个人，有三个人打工去了。他们分别来自安徽、山东、河南、四川、湖南和吉林。他们三个分别做着运送纯净水、送报纸和餐馆服务员工作，另三个则在建筑工地工作，正在上班。

望着眼前这小屋，毛泽东不由得记起一九一八年八月和二十多名湖南青年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他起初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后来跟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人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挤在一间小屋里，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而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所以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二零年出版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期中称“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只是当年没有双层床而已。

三位小伙子告诉文老先生，这房子是他们合租的。房子的主人原本是大杂院的一分子，后来做生意“发”了，另买了一套两房一厅的二手房，搬出去了，把这间北屋出租。这么破旧的房子，每月租金一千元。他们六人合租，每人每月出一百多元租金。虽说很拥挤，但是毕竟在北京有了落脚的地方。

运送纯净水的小伙子说，他每天的工作是骑着三轮货车，给家家户户运送纯净水。给高层大楼的居民送纯净水还算好，因为有电梯，不算吃力。最吃力的是给多层住宅顶楼的住户送水。北京老的多层住宅，一般是五层，也有的是六层。现在的多层商品房，开发商为了多赚钱，有的七层，有的甚至八层。每桶纯净水十九公斤重，两桶就是三十八公斤，从底楼扛到七楼、八楼，累得直喘气。每月打工的收入，除了付房

租、饭钱之外，能够给家里寄几百元人民币就算很不错了。

送报纸的小伙子说，这屋子里每天起得最早的是他。他总是摸黑起早，迎着刺骨寒风，骑着自行车来到邮局。在那里，先要忙着把报纸分好。现在的报纸，每一份都是好多个版，沉甸甸的。分好报纸之后，骑着自行车在弯弯曲曲的胡同里，挨家挨户去投送。到了下午三点钟，又要赶到邮局，忙着分送《北京晚报》。这样的打工收入，跟运送纯净水差不多。

在餐馆里打工的小伙子说，这屋子里每天睡得最晚的是他。也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才回来。早上最晚起床的也是他。因为在餐馆工作，上午十时到那里上班，直到夜里十一时才下班。下午有两小时休息。那家餐馆上下两层，厨房在底楼。他每天不知要多少次爬梯，把菜从底楼送到二楼，再把二楼的脏盆脏碗送到底楼。他的工作收入跟运送纯净水、送报纸的小伙子差不多。在餐馆工作，惟一的优待是可以在那里吃两顿免费的工作餐。今天他轮休，所以在屋。

三位小伙子又说起各自的感受。

运送纯净水的小伙子见识很广，因为他要给各种各样的家庭送水。他见到过铺着大理石的豪华大客厅，见过拖着小猫、小狗整日无所事事的小姐，见过终日忙于“蛙式游泳”、“上肢运动”——打麻将的老太太，见过终日空守闺房的“包二奶”。他很少在胡同里运水，因为大杂院的住户们几乎不喝那十几元一桶的纯净水。就连他自己，回到大杂院，还是喝自来水。

送报纸的小伙子见识也很广，因为他每天送报之余，可以浏览各种各样的报纸。他知道“恐怖大王”本·拉登的种种秘闻，知道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躲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几次暗杀，他知道影星刘晓庆怎样被捕，他也知道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生活琐事。他每天回到大杂院，成了“流动广播电台”，总是把最新消息告诉大杂院的伙伴们。

在餐馆工作的小伙子见过的场面挺多。他看见过一万元一桌的酒席吃些什么，他看见过大大小小的“公仆”们如何醉倒在餐馆，他看见吃

一点、动一筷甚至“秋毫无犯”就把整盆的菜倒进泔脚缸，他还从吃吃喝喝的顾客那里学会了许多“中国现代顺口溜”：

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浅，舔一点；
感情薄，喝不着；
感情厚，喝不够；
感情铁，喝出血！

能喝八两喝一斤，
这样的干部党放心；
能喝一斤喝八两，
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能喝白酒喝啤酒，
这样的干部得调走；
能喝啤酒喝饮料，
这样的干部不能要。

在餐馆工作的小伙子甚至“朗诵”起根据毛泽东《长征》一诗韵脚改编的歪诗，把毛泽东的肺都气炸了：

当官不怕喝酒难，
万盏千杯只等闲；
鸳鸯火锅腾细浪，
海鲜烧烤走鱼丸；
桑拿按摩周身暖，
麻将桌前五更寒；
更喜小姐白如雪，
三陪过后尽开颜。

还有另一首歪诗：

公仆不怕饮酒难，
千杯万盅只等闲；
‘习水’ ‘洋河’ 腾细浪，
‘孔府’ 佳酿佐鱼丸；
‘酒鬼’ 下肚肚里暖，
‘特曲’ 壮胆胆不寒；
更喜 ‘茅台’ ‘五粮液’ ，
诸君饮后尽开颜。

毛泽东气得脸色铁青。所幸那长发和胡子都是假的，不然毛泽东真的要“怒发冲冠”了！

登上林肯豪华大礼车

虽然那两首乱改一气的“步《长征》韵”的歪诗，气得毛泽东吹胡子瞪眼睛，但是跟三位打工仔聊天，毛泽东感到非常愉快。尽管毛泽东对于什么“包二奶”、“三陪”以及“孔府”、“酒鬼”、“习水”、“洋河”之类新名词、新商标不明白，但是年轻人充满青春活力，同他们在一起，毛泽东也仿佛年轻了。

毛泽东问三位打工仔：“你们在老家是干什么的呢？”

三位打工仔说，都是农民。他们告诉毛泽东，过去毛泽东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打败了蒋介石。现在中国是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

毛泽东一听，连打工仔都知道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非常高兴。

三位打工仔说，现在的中国农村，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力过剩。于是，大批年轻的农民进城打工，“农村包围城市”。其实，城

市也正需要劳动力。特别是一些粗重的体力活，城市里的老百姓不愿干，打工仔们干。比如，中国那么多城市都在大批建造商品房，建筑工人绝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打工仔。他们同屋的六个人之中，三个就在建筑工地上干活。还有，送纯净水、送牛奶、送报纸的，不少也是打工仔。农村姑娘进城，主要做两种工作，一是在当保姆，二是在餐馆当服务员——这两样伺候人的工作，城里人“面皮薄”，不愿干，反而成了农村姑娘的“强项”。

三位打工仔指着穿红马夹上写着“胡同游”的那两个小伙子说：“他们会说英语，是‘高级打工仔’，收入比我们高多了！”

两位穿红马夹的小伙子笑道：“导游行业，通常是城里人的天下。只是这‘胡同游’，要蹬三轮车，城里人怕丢面子，不愿干，所以才使我们这些打工仔有机可乘。城里人的面子观念很重，很多人宁可‘下岗’在家，男的不愿去为‘胡同游’蹬三轮车，女的不愿去当保姆。”

两位穿红马夹的小伙子说，“胡同游”半天的价格是二百五十元人民币，一天下来就是五百元。其实，这收入是归旅游公司，他们只从旅游公司领取工资和奖金。当然，他们的收入，在打工仔里算是高的了。不过，要干他们这一行，要懂英语，又要懂历史文化，起码是中专水平，需要花时间学习，这叫“高投入才有高产出”。

两位穿红马夹的小伙子还说，来自农村的打工仔，在北京有几百万之多。在每年春节，大批打工仔回家过年，把火车挤得水泄不通，这叫一年一度的“春运高峰”。打工仔们回家过年，这时候，北京的建筑工地停工，牛奶没人送，纯净水没人送，连报纸也没人送，城里人这才明显感到打工仔们的“份量”！正因为这样，城里的公司在春节期间出双倍甚至三倍的工资，以求留住一部分打工仔。

毛泽东笑道：“农民在城市里成了这么重要的角色，那真的叫‘农村包围城市’了！”

说说笑笑，时间过得飞快，已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毛泽东还在那里聊着。直到有人往屋里送来三盒盒饭，毛泽东这才赶紧打住。大娘和

她的儿子、夏先生夫妇纷纷告辞回家。

三位打工仔说，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动手买菜、烧饭，太麻烦了。所以他们向附近的快餐店订盒饭。

送盒饭的，也是一位打工仔。

毛泽东从来没有吃过盒饭。向那位送盒饭的打工仔说道：“我买六份盒饭，请你马上送来，好吗？”

穿红马夹的小伙子马上说：“老先生，旅行社已经在恭王府花园的旅游定点星级饭店给各位订好中餐。”

毛泽东却坚持说：“我就在这里吃盒饭。”

穿红马夹的小伙子无奈，只好让毛泽东在这里吃盒饭。

送盒饭的打工仔掏出一张盒饭菜单，总共有五个品种：

大排青菜盒饭；

鸡腿青椒盒饭；

荷包蛋卷心菜盒饭；

红烧肉梅干菜盒饭；

三鲜什锦盒饭。

毛泽东点了红烧肉梅干菜盒饭；张霞点了荷包蛋卷心菜盒饭；张军点了鸡腿青椒盒饭；“小放牛”点了三鲜什锦盒饭；两位穿红马夹的小伙子，点了大排青菜盒饭。

盒饭每盒十元人民币。张霞给了送盒饭的打工仔六十元人民币。两位穿红马夹的小伙子要自己另付，被毛泽东拦住了。

没一会儿，送盒饭的打工仔送来十二盒盒饭——六盒菜，六盒米饭。另外，还给每人一双一次性筷子。

毛泽东打开那装着红烧肉梅干菜的塑料盒，一闻，好香！毛泽东说了一句“可惜没有辣酱！”

一位来自湖南的打工仔，立即从自己的床头拿出一瓶“王大妈”辣酱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笑道：“多谢老乡！”

不知道是饿了的缘故，还是头一回吃盒饭，毛泽东边吃边说：“味道好极了！”

毛泽东此言一出，引起哄堂大笑。毛泽东被笑得莫名其妙，因为他不知道“味道好极了”是家喻户晓的雀巢咖啡广告词。

毛泽东吃罢盒饭，到了“饭后一支烟”的时候。他已经一上午没有抽烟，吃过中饭，习惯性地要抽一支烟。所幸，他昨天在宛平城买了一包中华牌香烟，没抽完，正放在唐装口袋里。毛泽东拿出中华牌香烟，请打工仔们抽，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抽烟。毛泽东只好独自点燃了一根烟。

就在这时候，张霞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张豪打来的，他说在恭王府花园的旅游饭店，怎么见不到文老先生？

当张豪知道文老先生在打工仔这里吃盒饭，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张豪问明了文老先生所在的地点，说是开车到胡同口等候他们。

毛泽东连忙掐灭了才抽了几口的香烟，向三位打工仔告辞。不料，大杂院的住户们是那般的热情，不仅三位打工仔要送毛泽东到胡同口，就连夏先生夫妇、大娘都来送行，大娘的儿子摇着轮椅也来送行。

毛泽东不坐三轮车，跟大家边谈边走，来到胡同口。

到了胡同口，送行的大杂院住户们惊呆了：那里停着一辆雪白的高级轿车，那轿车比平常的轿车几乎长了一倍！这辆轿车前后有五个车门，车头上的标牌是长方菱形，中间一个“十”字。熟悉汽车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辆美国名牌车“LINCOLN”——“林肯”。

大杂院的住户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豪华的加长大礼车！

其实，就连毛泽东也没有见过这样豪华的加长大礼车！

张豪戴着白色手套，正站在车前恭候。

毛泽东跟大杂院的朋友们一一握手。不论是大娘的残疾儿，还是下岗的夏先生，还有那三位打工仔，特别是辛苦了一上午两位穿红马夹的小伙子，都依依不舍握着毛泽东那宽大的手。

张豪打开后面的车门，里面是一张长长的橘黄色转角真皮沙发。毛

泽东脱去貂皮大衣，张豪扶着他上车，然后张军夫妇上了车，最后是张霞捧着郁金香花上了车。

不知道是被这加长豪华大礼车所震慑，还是车窗安装的是单向透视玻璃——里面可以清楚看见外面而外面看不见里面，以至毛泽东在轿车开动时向大杂院的朋友们频频招手致谢，他们都没有反应，只是用眼睛呆呆地紧盯着这极其罕见的大轿车。

张豪戴着白手套，在前面的驾驶室里驾车。本来，大礼车是由专门的司机驾驶的。为了表示对于文老先生的尊敬，大老板张豪亲自驾车。

大礼车跟普通轿车不同，驾驶室跟座舱是用电动私密隔板隔开的。关上隔板，座舱里的所有谈话处于私密状态，司机是听不见的。但是，座舱与驾驶室之间可以用专门的高保真话筒通话。这样，坐在座舱里的贵宾可以通过话筒随时向司机发出指令。由于今天是张豪亲自驾车，他打开了电动私密隔板，所以他也可以直接参与座舱里的谈话。

毛泽东坐在宽大、柔软的真皮沙发上，车舱里开着暖气，喷着巴黎香水，那感觉跟刚才乘坐三轮车简直有天壤之别。

这种加长大礼车全长达八米五，座舱里铺着羊毛地毯，有樱桃木吧台，有电视机。酒柜里有成排的名酒，还有专门的不锈钢香槟酒桶以及香槟高脚雕花酒杯，冰箱里有各种饮料和水果，供客人随意取用。转角沙发可以翻成一张舒适的床，客人可以在车上睡觉。

张豪告诉文老先生，这是“林肯200型”五门加长车。加长大礼车的车厢宽大，舒适，是世界上最豪华的轿车。一辆加长大礼车的价格，相当于十辆或者更多普通轿车的价格。

张霞这时讲起了美国故事：林肯，也就是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是一位作出杰出贡献的美国总统，他在一八六二年九月起草了著名的《奴隶解放宣言》，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同时也招来奴隶主们的憎恨。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晚十时十五分，林肯总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福特剧院总统包厢里观看劳拉·基恩主演的喜剧《我们的美国亲戚》时，遭到奴隶主雇佣的杀手、演员约翰·布思的突然袭击，

中弹身亡。为了纪念林肯总统，美国一家汽车公司以林肯作为品牌。这种加长大礼车，是林肯牌轿车中的王冠。

张豪说，除了林肯汽车公司生产这种豪华加长大礼车之外，只有CADILLAC（凯迪拉克）、MERCEDES-BENZ（梅塞德斯-奔驰）、ROLLS ROYCE（劳斯莱斯）几家著名汽车公司生产这种加长大礼车。在加长大礼车上，不仅可以收看电视，而且可以放映DVD、VCD，音响设备也是第一流的。

毛泽东注意到车里亮着“禁止吸烟”提示灯，本想再抽几口烟的他，也只得打住。

刚刚走出大杂院，刚刚吃过盒饭，毛泽东有点不适应眼前这奢华。他从“皇帝套房”到大杂院，然后又来到这大礼车，仿佛经历了马鞍形的巨大落差。然而，这“皇帝套房”、大杂院、大礼车，都同时存在于今日北京，今日中国。

第十章 新新人类

重游十三陵水库

白色的林肯豪华加长车沿长安街西行，上了西三环北路，进入北三环。

出了北京市区，在公路两侧仍是新楼接二连三。这些新楼多姿多彩，坐落在成片的树丛之中。只是眼下树叶凋零，倘若在夏日一定是一片浓绿。当年，这里只是一座座黄色土墙垒起来的农村小屋而已。公路笔直，宽敞，通畅，三环路上没有一盏红绿灯。

为了使久病初愈的文老先生多看看北京的巨大变化，张豪还特地绕道亚运村、正在建设中的奥运村以及大型体育场馆。张豪说，二零零八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北京正在大兴土木。

张豪还指着一大片正在兴建中的高层大楼以及错落有致的多层楼房，说那就是他最近开发的商品房楼盘“豪门府邸”。

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之后，林肯豪华加长车朝北进入驶往昌平的高速公路。昌平是北京的一个郊县之一。十三陵水库，就在昌平县城北面不远的地方。

乘坐林肯加长车，又快又稳。毛泽东作为国家元首，往日也没有乘坐过如此豪华的轿车。然而，张豪却说，这辆林肯加长车，是他的私家车！

张豪说，在毛泽东时代，“科、处、局、厅、部”，干部的级别是身份的象征。在邓小平时代，在今日中国，房子和车子成了身份的象征。

张豪颇为自豪地说，平常，一位戴白手套的司机专门替他开这辆白色的林肯豪华加长车，一位保养工专门为他保养这辆专车。

据张豪说，有一种林肯豪华加长车安装了防弹玻璃，专供国家元首、政坛要人乘坐。

张豪说起他为什么要买昂贵的林肯豪华加长车。那是在看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时，男主人公所讲的一句话“要充分享受每一天”，深深打动了他的心。看到“泰坦尼克号”冰海触礁时，上千人葬身海底，连那位男主人公也被无情的冰冷的海水所吞没，张豪益发觉得“要充分享受每一天”这句话是至理名言。从此，这句话成了他的座右铭。

毛泽东没有看过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不过在他看来“要充分享受每一天”这句话却值得质疑。毛泽东向来倡导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以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正因为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三篇著作称为“老三篇”，所有中国人都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进行学习。毛泽东的人生观，显然与张豪格格不入。当然，在毛泽东看来，这也容易理解，张豪作为“大老板”，早已属于“资产阶级”，正因为这样，张豪把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男主人公的话作为座右铭。

张豪继续说道，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大批进口轿车涌进中国市场。他在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上看到了林肯豪华加长车，毫不犹豫当即决定买下。他的决定使美国林肯公司销售商大为震惊，因为这家公司把最新款式的林肯豪华加长车运到中国展览，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生产实力而已，压根儿没有想会在中国卖出去——他们知道，中国政府对于公家买车有严格的规定，绝不允许政府官员买如此豪华的轿车，而中国私人购车，也绝不可能花大钱买这样贵重的轿车。然而，张豪却在开出一张巨额支票之后，在一片惊羡的目光之中，从汽车博览会上开走了这辆林肯豪华加长车。

这时，张豪问毛泽东：“文老先生，你知道，当我开走这辆林肯豪华加长车的时候，那美国林肯公司的销售代表说了句什么话？”

毛泽东没有回答，因为他实在猜不出那美国人会说什么话。

张豪大笑道：“那‘老美’说，‘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张豪的话，又一次在无意之中，刺痛了毛泽东的心，就像刚才在大杂院，大娘儿子的一句话，使毛泽东久久不快。

这时，张军又一次把话题岔开：“文老先生，您多久没有来过十三陵？”

张军的话，勾起了毛泽东的回忆：“哟，好多年了！记得，我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岁月，来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修筑水坝。”

毛泽东记得，为了解决北京农田的缺水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在北京北面军都山下，拦蓄温榆河支流沙河洪水，修建总库容量八千二百万立方米的大型水库。由于这里邻近明朝皇家墓地十三陵，就叫十三陵水库。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六月，周恩来总理又两次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的部长、司局长及工作人员，来到工地，与水库建设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建设者们受到鼓舞，加快了进度，七月一日，隆重的落成典礼在十三陵水库举行。

张豪道：“文老先生，您那时候，是‘干部参加劳动’，对吗？”

毛泽东答道：“是呀，那时候，北京几十万干部、大学生、解放军战士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大家推着独轮车，运土上堤。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歌声。干部们住帐篷，吃窝窝头，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

张豪道：“我听父亲说，他当年也参加了修筑十三陵水库的劳动。”

张军说：“那时候，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总司令、邓小平、彭真市长，都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周总理还在工地干了一星期。”

张豪道：“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清廉，能够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听了张豪这句话，毛泽东的心态又得到了平衡。

这时候，张霞开口了：“邓小平也不错呀，‘邓大人’不仅在当年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而且后来在‘全民植树节’，总是一手牵着小孙女，一手拎着红色塑料水桶，到十三陵水库种树。”

车过昌平县城时，毛泽东发觉，这小小的县城居然也是高楼林立，而且大变。

过了昌平县城，山清水秀，一个巨大的碧玉般的湖泊突兀在眼前。哦，十三陵水库到了！

久违，十三陵水库！毛泽东一见到镜子一样明净的十三陵水库，顿时兴奋起来。

张豪驾车绕十三陵水库转了一圈。在来到十三陵水库大坝时，张豪停下车子，张霞扶着毛泽东下车。

十三陵水库的大坝高达二十九米，坝顶长六百二十七米，大坝外侧镶嵌着红色的“十三陵水库”五个大字，乃毛泽东手笔。

毛泽东看着大坝上这五个大字，再度陷于兴奋之中。毛泽东记得，他那次前往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听取工地负责人对工程的介绍。应工程指挥部的要求，毛泽东当即挥毫，题写了“十三陵水库”五个大字。这五个大字后来被放大，镶嵌在水库的大坝上。

张豪差不多每周都要来十三陵水库，这五个红色大字不知看过多少遍。然而，他今天看这五个大字，却忽然发现，文老先生昨天所题写的“豪门府邸”，跟毛泽东的书法如出一辙！

“文老，您的字怎么跟毛主席的字，那样相似？”张豪问道。

“我以毛泽东主席的书法为师，写的是‘毛派’字。”文老先生只好这么解释说。

毛泽东发现，今日十三陵水库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水库，而是成了北京的风景区，成了北京的旅游景点。

水库四周，星罗棋布着“十三陵水库纪念碑”、“十三陵水库陈列馆”、“水库公园”、“明皇度假山庄”、“东海龙宫”、“水族世

界”、“‘特特乐’动感影院”、“小人国旅游世界”、“九龙度假村”、“蟒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及众多的餐馆、疗养院、别墅小区，彩色纷呈的建筑物像一串珍珠项链一般挂在十三陵水库的胸前。

此外，乘游艇在十三陵水库里游览，也是一项惬意的旅游。只是眼下正是朔风呼号的日子，人们坐在船舱里欣赏美景，不能像夏日那样在游艇甲板上迎风猎猎，享受着空气和阳光的沐浴。

毛泽东对于“东海龙宫”、“动感影院”之类没有兴趣，他喜爱的游泳，却又因水温太低无法下水，于是当张豪问他愿意到附近哪里走走，他说“去‘朱家大院’”。

张豪一愣：“这里附近没有‘朱家大院’呀？！”

当张豪明白“朱家大院”的意思时，车里爆发出大笑声。

原来，毛泽东所说的“朱家大院”，就是指十三陵。

十三陵是“明十三陵”的简称，是明代皇陵，明代十三个皇帝安葬于此，因而得名。明朝是朱家皇朝。明太祖朱元璋开创了朱家皇朝，明十三陵，当然也就是“朱家大院”了。

毛泽东记得，一九五八年他和朱德一起前往十三陵水库劳动时，便曾经开玩笑地对朱德说：“今天去拜访你的老祖宗！”

毛泽东的幽默感，使林肯加长车里的气氛变得轻快。

发思古之幽情

中国的皇帝讲究“朝南坐”。北京故宫所有的宫殿，“户户朝南”。中国的皇帝死了之后，陵墓也讲究朝南。明代皇帝这“朱家大院”，便坐落在天寿山南麓，面对十三陵水库。

“朱家大院”这十三处明代皇帝陵墓是：明成祖的长陵、明仁宗的献陵、明宣宗的景陵、明英宗的裕陵、明宪宗的茂陵、明孝宗的泰陵、明武宗的康陵、明世宗的永陵、明穆宗的昭陵、明神宗的定陵、明光宗的庆陵、明熹宗的德陵、明毅宗的思陵。

张豪驾驶着林肯豪华加长车，朝北进发，向十三陵驶去。

十三陵陵区三面环山，左右有蟒山、虎峪雄踞两侧，北京平原则横陈于前。陵区面积达四十平方公里。前后花费了二百多年，这才陆续建成明代的十三座皇陵。

毛泽东选择了游览十三陵，除了他本来就对明史甚有兴趣之外，还因为嫡孙毛新宇在研究明史，在研究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

进入十三陵，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用汉白玉雕刻而成的石牌坊，旁边竖立着刻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石碑。在明朝，官员到此，就必须下马而行。石牌坊之后是八百米的神道，两侧排列着十八对石人石兽。

张豪担心文老先生走这长长的神道太累，就绕道而行，直奔长陵。

长陵是十三陵中最早和最大的一座。墓碑上刻着“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表明这是明朝第三帝朱棣的陵墓。朱棣当了二十二年皇帝，在他称帝的第六年就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前后用了五年时间，才建成了长陵。

张豪、张霞扶着毛泽东步入长陵的祔恩殿。

祔恩殿又称献殿、享殿，是长陵的主体建筑，是举行祭祖的主要场所。祔恩殿耸立在三层汉白玉台基之上。

张豪笑道：“祔恩殿和故宫中的大和殿一样大。朱棣仿佛死后还要在这里坐朝议政！”

祔恩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全殿由六十根金丝楠木巨柱支承，每根木柱高达十五米，直径达一米一，梁、檩、椽和檐头也全部使用楠木，虽历时五百余年，仍是那般坚固，香气袭人。就连故宫太和殿，也没有这样的全部使用楠木建造——惟有北京饭店的“皇帝套间”，实现了“楠木化”。祔恩殿黄瓦红墙，垂檐廊顶，气势非凡。

张豪叹道：“这长陵比毛主席纪念堂还要气派！”

文老先生听罢，却不以为然：“其实，人死后，就从生物变成了非生物，何必这么铺张？！”

文老先生博古通今，历数中国的皇陵：“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在西安临潼建造秦始皇陵，历代皇帝都建造规模宏大的陵墓。西汉建都长安，十一个皇帝都在关中建陵。唐代九个皇帝除昭宗李晔葬于河南，其余也都建陵于关中。北宋建都开封，开国皇帝赵匡胤和他的几个子孙的陵墓都在河南巩县；南宋建都临安，六个皇帝的陵墓都建于绍兴。元代‘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墓建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明代除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明孝陵在南京外，其余十三帝均葬于此。清入关后共有九帝，五帝葬于河北遵化清东陵，四帝葬于河北易县清西陵。”

文老先生叹曰：“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他的弟子们却按照封建王朝的规矩在南京城紫金山为他建造中山陵。毛泽东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他的接班人也按照封建王朝的规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他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唉，人死了，就身不由己，听人摆布，就连孙中山和毛泽东也不能例外！”

听了文老先生这番历史的感慨，张豪也感触万千：“其实，这种封建帝王的陵墓文化，不光中国历代如此，世界各国也都如此。埃及的金字塔，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宏大的帝王陵墓。不过，从秦始皇到孙中山，死后葬于青山绿水之间，倒也清静。可是，号称‘反帝反封建’的无产阶级领袖们，从列宁开始，就葬在热闹非凡的莫斯科红场，不仅死后不得安宁，而且还把遗体像展览品那样放在墓中供人们参观。在列宁之后，斯大林、胡志明、金日成直到毛泽东，个个死后躺进水晶棺，个个遗体成了展览品，躺在车水马龙之处，何等的嘈杂。这难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如果没有这样的‘传统’，也就不会发生赫鲁晓夫把斯大林遗体逐出列宁墓，火化之后另行安葬的一幕！”

文老先生听罢，说道：“看来还是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比毛泽东‘轻松’，他们死后把骨灰撒进大海，与大自然融合为一体，无忧无虑，无挂无牵！”

在参观了长陵之后，张豪驾车驶向定陵。通常，参观十三陵，总是参观这两座陵。长陵的参观者多，因为长陵最早、最大，最有代表性；

定陵的参观者多，因为定陵是十三陵中惟一一座被打开的陵墓，人称“地下宫殿”。

张豪隔三差五带着朋友来十三陵，他已经是非常熟练的“导游”。

张豪告诉文老先生，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及其二后的陵墓。明神宗十岁即位，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当皇帝时间最长的一个。他的陵墓前后修了六年，动用各种工匠、民工达到三万多人，总共耗费白银八百多万两，相当于当时两年全国田赋的收入！

文老先生听罢，直摇头：“大奢侈！大奢侈！”

张豪说，其实最初准备发掘的不是定陵，而是长陵。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中国文化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联名写了《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送呈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发掘。”但是，由于找不到长陵的入口，发掘工作一再延着。然而，发掘工作队队长赵其昌有一回到定陵勘察，休息时偶然见到红色高墙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地方，有一个直径半米的圆洞。他断定这是定陵地下玄宫的入口。就这样，专家们决定放弃长陵，改为发掘定陵。经过艰难的发掘，终于打开定陵地下宫殿——由前、中、后及左、右五座高大宽阔的殿堂连结而成，全部是拱券式石结构建筑。在后殿发现万历皇帝和孝端、孝靖两皇后的棺槨，三具棺槨周围放有梅瓶、玉料及装满随葬金银玉器的红漆木箱二十六只，各棺槨内也装有大批随葬物品。

张豪告诉文老先生，开棺之后，发现万历皇帝驼背，身高只有一米六十四而已。

定陵的地宫距墓顶达二十七米。文老先生在张豪张霞搀扶下进入深深的地宫参观，见到了万历皇帝的金冠，通体用极细的金丝编结而成，上嵌二龙戏珠，冠顶镶嵌着的食指大小的猫眼石，光芒四射。但是，不见万历皇帝的遗体。

张豪说，很遗憾，在“文革”中，保存在定陵博物馆的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尸骨，被“红卫兵”当作“地主阶级头子”在定陵门前广场

示众批判后烧毁！

文老先生听了，叹了一口气，他没想到在地下宫殿里，也听到了对于“文革”的批评之声。

豪宅里的叹息

出了定陵地下宫殿，张豪问文老先生是否还想看看其他的十一座明皇陵？

文老先生说，有点累了。

于是，张豪驾驶林肯加长大礼车下了山，往南直奔他在十三陵水库畔的家。

林肯加长大礼车在一幢白墙红顶的西班牙式别墅前的花园里停下。车子刚刚停稳，张豪太太和陈港生就从别墅里跑出来，拉开车门，扶着文老先生下车。

眼前的这幢别墅，就像十三陵一样朝南而筑，背靠青山，面对水库。张豪领着文老先生在花园里漫步，花园里有花有草有果树。然后，穿过花园中用青砖铺成的古朴小道，步入别墅。

别墅上下三层，全部铺着浅黄色的地板。底楼是宽大的客厅，地板之上铺着羊毛花地毯，正中挂着水晶大吊灯。客厅里放着两圈红色牛皮沙发，可以坐二十来人，看上去像个会议室。

张豪请文老先生在朝南的上座就坐之后，张军等人也就随意各自坐下。

别墅里温暖如春。张豪家中的保姆穿着花旗袍给客人们上茶。

落座之后，张豪问文老先生：“文老，您老对风水一定深有研究。”

文老先生摇头道：“我不信风水，因此对于风水也就毫无研究。”

张豪说：“我喜欢这里靠山面水的环境，风水甚好，所以特地在此建造别墅。可是，不少人说‘十三陵’这‘十三’不吉利，‘陵’更不

吉祥。现在，中国人越来越讲究风水，讲究避讳。这种忌讳太多，中国的许多商品房大楼没有‘十三’楼，没有‘四’楼、‘十四’楼、‘二十四’楼。”

文老先生说：“‘十三’是个洋忌讳。据说，基督‘最后的晚餐’，总共是十三人，所以西方人以为十三不吉利。记得当年周恩来总理请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人住上海锦江饭店，电梯停在十三楼，基辛格博士就拉长了脸，不愿住十三楼。那‘四’算是什么忌讳？”

张豪笑道：“‘四’的谐音是‘死’，所以成了忌讳。特别是‘十四楼’，因为‘一’习惯于念成‘吆’，‘吆四’也就成了‘要死’！”

文老先生道：“没有‘十三楼’、‘十四楼’，那十五楼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张豪解释说：“那是把原先的十三楼，改称十五楼。也就是说，十二楼上面，紧挨着的就是‘十五楼’。还有‘四楼’、‘二十四楼’也被‘删’去。所以，第二十五楼，实际上是二十一楼，因为‘四楼’、‘十三楼’、‘十四楼’、‘二十四楼’都被‘删’去。”

文老先生笑道：“我今年八十三，看样子要改成八十五！”文老先生的话，引起客厅里一片笑声。

张豪说：“我偏偏不相信‘洋忌讳’。我说，在我们中国，有‘十三太保’、‘十三妹’、‘十三陵’，十三有什么不好？就连北京新建的东方广场的高楼，也不多不少，正好十三幢！”

文老先生则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共十三人，十三有什么不好？我老家韶山的房子，也是十三间哪。”

张霞道：“美国的星条旗，那红白横条就是十三条！”

陈港生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楼，也是十三扇大门！”

张豪、文老先生、张霞、陈港生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否定了“洋忌讳”十三。

张豪道：“我现在开发的高层商品房，最好卖的楼层是‘八楼’、‘十八楼’、‘二十八’楼。”

文老先生问道：“这又是为什么？”

张霞说：“‘八’的谐音是‘发’，‘发’也就是‘发财’呀！”

陈港生发挥起“横向思维”：“在香港，带‘六’字的楼层也好卖，‘六六顺’嘛！俄罗斯人喜欢‘七’，以为‘七’吉利，商品价格的尾数往往是‘七角七分’。美国人喜欢‘九’……”

陈港生的话还没说完，张霞插话道：“不过，‘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是‘九’字打头！”

张霞的话，又引起一片笑声。

张霞说：“现在，每到五月十八日，中国的饭店几乎被预订一空。”

文老先生问道：“为什么？”

张霞：“‘五一八’的谐音是‘我要发’！”

众人大笑。

张霞又说：“现在给孩子的压岁钱，要么一百六十八元，要么一千六百八十元。”

文老先生又问道：“为什么？”

张霞：“‘一六八’的谐音是‘一路发’！”

这时，“小放牛”说道：“给孩子的压岁钱，也有的给八百八十八元，‘八八八’，‘发发发’！”

文老先生笑道：“照这样‘发’下去，中国人个个都‘发’成了百万富翁！”

张豪道：“在今日中国，百万富翁不过‘小康’而已！即便这‘百万’不是人民币，是美元，也不稀罕。中国现在的千万富翁也不少，还有很多亿万富翁呢！”

张豪拿出美国著名的财富杂志《福布斯》（FORBES）给文老先生看，上面开列了“中国大陆当今十大富豪榜”，名次如下：

第一大富翁荣智健（上海市）：个人资产三十五亿元人民币。

第二大富翁牟其中（四川省）：个人资产二十亿元人民币。

第三大富翁李晓华（北京市）：个人资产十八亿元人民币。

第四大富翁吴志刚（湖南省）：个人资产十二亿元人民币。

第五大富翁史玉柱（安徽省）：个人资产十亿元人民币。

第六大富翁罗志福（贵州省）：个人资产十亿元人民币。

第七大富翁张宏伟（黑龙江）：个人资产十亿元人民币。

第八大富翁刘永好（四川省）：个人资产七至十亿元人民币。

第九大富翁洗度鑫（海南省）：个人资产五亿元人民币。

第十大富翁翁韩信（辽宁省）：个人资产三亿元人民币。

这时，张军拿出北京出版的一本杂志，上面有一篇题为“三个‘三’”的文章，写道：

目前中国大陆还有三十万户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不足两平方米！

目前中国大陆还有三百万户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不足四平方米！

目前中国大陆还有三千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危房等待改造！

报道指出，最为贫困的地区是中国内陆的甘肃、宁夏和青海。

据统计，那里有近三千万的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在一百五十七人民币以下！

据统计，贵州全省七十七个县，有四十六个是贫困县。

据统计，中国西部九省农村人口中的文盲率达百分之五十！

据统计，在中国大陆，未解决温饱的农民达七千万之多！

看罢这两篇报道，文老先生叹息道：“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实在太大了！我赞赏中国这样的古训：‘等富贵，均贫贱’‘不患寡，只患不均’‘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文老先生在张豪的豪宅里赞赏这样的古训，多少使张豪有点尴尬。

遭遇“美眉”和“帅哥”

窗外渐渐黑了下来，又到了晚餐时间。

毛泽东细细回想，三天来的三餐，天天不同，餐餐不同：

第一天在张军家吃家常早餐，中午吃“小放牛”做的“海派中餐”，晚上在毛家饭店用餐；

第二天早餐吃意大利快餐“必胜客”，中午在宛平城吃“羊肉泡馍”，晚餐为北京饭店的“开国第一宴”；

第三天吃“皇帝套房”早餐，中午与打工仔在大杂院一起吃盒饭。下午在十三陵上上下下奔走，眼下早已饥肠辘辘。

张豪会请文老先生吃什么样的晚餐呢？张豪办事总是喜欢事先不说，以便给人以惊喜。

他请文老先生以及全家坐上了林肯加长车，然后驾车绕水库而行。

正是华灯初上时分，盏盏彩灯倒映在水面上。张豪特地放慢了车速，让客人能够细细观赏水库的夜景。此时此刻，毛泽东仿佛置身于熟悉的杭州西湖之畔。他没有想到，如今连北京十三陵水库四周，入夜也是如此满目繁华。

张豪驾车绕十三陵水库半周，来到水库：北面一排斗大的红色霓虹灯招牌闯入毛泽东的眼帘：“新新人类之家”。

毛泽东不明白这“新新人类”究竟是何等人类？然而，张豪居然把车拐入“新新人类之家”，在院子里停了下来。

“新新人类之家”是一座三层大楼，底层为餐厅，二楼为歌舞厅，三楼为健身房。

毛泽东一行来到门口，玻璃门便自动移开。

毛泽东进门之后，吃了一惊：四位红头发的“美眉”，蓝眼圈，猩红的嘴唇，分列两侧，犹如佛寺山门的四大门神。

她们的发型怪怪的：一位的头发直冲云天像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被撞时冒出的烟雾，一位的头发乱糟糟像鸟窝，一位的头发短短像男孩，一位的头发像爆炸的炸药包。

她们的衣服也怪怪的：一位身穿蓑衣像渔翁，一位的牛仔衣裤打满补丁而且挂着一缕缕纱线，一位在这么冷的天赫然露出肚脐，一位则一身白纱裙仿佛新娘。

四位“美眉”一边向客人鞠躬，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欢迎！欢迎！”

毛泽东点了点头，走进底楼，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是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餐厅。地面铺着镜子般的大块瓷砖，倒映着盏盏筒子灯。

在张豪陪同之下，毛泽东刚刚走进餐厅，一个“黄毛”小伙子足蹬滑轮飞驰而来，一手托盘，一手持叉，来到毛泽东面前做了个半躬姿势，说道：“WELCOME！”

毛泽东不知道眼前的这位“黄毛”小伙子是人是猴。

毛泽东摸了摸小伙子“人”字型的头发，才知道小伙子理的是最时髦的发型。

“这是英国足球‘帅哥’贝克汉姆的发型！”小伙子自豪地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道。

毛泽东虽然通古博今，却不知道贝克汉姆为何人！

张豪告诉文老先生，这里是自助餐厅。这家自助餐厅的墙上，醒目地画着刀叉与筷子的图案，表明这是“刀叉与筷子并举”的餐厅。通常的自助餐厅，要么是中式的，要么是西式的。“新新人类之家”餐厅与众不同，把中式菜肴与西式菜肴交错陈列，供客人们自由选择，既可以吃中餐，又可以吃西餐。这种“中西合璧”的自助餐厅，是“新新人类之家”的一大创新，特别受欢迎。正因为这样，“新新人类之家”餐厅在十三陵水库一带，生意最为红火。

就像毛泽东从来没有吃过盒饭一样，他也从来没有吃过自助餐。张霞领着毛泽东梭巡于一排排食品台、吧台之间，挑选了红烧肉，也挑选

了美国牛排；挑选了上海“邵万兴”的黄泥螺，也挑选了法国蜗牛；挑选了葱烤鲫鱼，也挑选了日本生鱼片；挑选了扬州炒饭，也挑选了意大利空心面；挑选了绍兴黄酒，也挑选了德国红葡萄酒；挑选了湖南辣酱，也挑选了美国芥末……

毛泽东发觉，这样的自助餐，有着充分的“民主意识”，有着充分的“自由权利”，可以“各取所需”，倒也不错。

毛泽东还发现，穿梭于自助餐厅的顾客，大部分是年轻人。这些“美眉”和“帅哥”，十有八九染了头发，把黑头发染成白色、黄色、咖啡色、红色以至绿色！

餐厅里放着一排排长方桌，桌子上放着一只只玻璃杯，杯子里点着蜡烛，射出幽幽的昏黄的光芒。每张长方桌旁，三三两两散坐着年轻人。看得出，在远离北京市中心的十三陵水库，能有这么多顾客光临，可见“新新人类之家”的餐厅生意确实不错。

文老先生在一张长方桌旁坐定之后，问起什么叫做“新新人类？”

张豪用一句话，简单明了他说出了“新新人类”的含义：“一九七六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中‘叛逆的一代’，‘反传统的一代’，是‘另类的一代’，叫做‘新新人类’。男的叫‘帅哥’，女的叫‘美眉’。”

文老先生不明白为什么以一九七六年作为时间界线。

张豪回答说：“其实，新新人类是世界性的，不光是中国才有，在美国，一般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称为‘新新人类’，因为他们是在电脑网络时代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在中国，把一九七六年作为划定‘新新人类’的时间界限。这是因为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重要的一年，是中国发生历史巨变的一年：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去世的一年，是‘文革’结束的一年，是粉碎‘四人帮’的一年。一句话，是毛泽东时代结束的一年。从一九七六年开始，是‘毛后时代’。”

文老先生对于“毛后时代”这种提法不以为然，追问道：“为什么

把‘毛后时代’的年轻人，称为‘新新人类’呢？”

这时，张霞插话说：“一九七六年之后诞生的中国年轻人，跟此前的中国人，生活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新新人类’没有哥哥、姐姐，没有弟弟、妹妹，因为中国从‘文革’之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新新人类’全都是独生子女，是家中的‘小太阳’，‘无限宠爱在一身’，是在百般宠爱之中长大的。”

张军则说：“‘新新人类’是在甜水里泡大的一代。他们一出世，就比他们的父母幸福得多，他们享受着极好的物质条件，享受着空调、彩电、电脑、VCD、DVD。‘新新人类’再也没有受到‘阶级斗争’的冲击，再也没有政治运动的苦难。他们的政治观念淡薄，而经济观念浓厚。挣大钱成了他们奋斗的目标。他们大学一毕业，拿到的工资就远远超过了父辈。他们忙着用‘明天的钱’，买车、买房、旅游、出国。他们是深深接受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代。他们不知道林彪，不知道刘少奇，不知道赫鲁晓夫，甚至不知道毛泽东。他们只知道中国大陆的‘四大名旦’——赵薇、周迅、章子怡和徐静蕾，香港的‘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周润发和谭永麟，他们只知道台湾的‘辣妹’高山族歌星张惠妹，他们只知道美国的麦当娜和英国的戴妃。他们从小看的是日本卡通阿童木、一休和变形金刚，他们从小看的是美国大片《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泰坦尼克号》和《蜘蛛侠》，他们不知道《在烈火中永生》、《上甘岭》、《永不消逝的电波》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他们不知道‘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也不知道‘红五类’、‘黑六类’、‘红卫兵’、‘造反派’、‘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毛泽东非常注意地倾听着，甚至停住了手中的筷子。

这时，餐厅里的音箱响起悠悠的流行歌曲《你说我能不吃醋》。张豪、“小放牛”跟着轻轻哼了起来：

也许你不知道，

也许你不相信，
有多少人羡慕你，
羡慕你年轻。
我们曾经的年轻，
是两手攥空拳，
而新一代的年轻，
机遇和财富竞相向他们飞抛媚眼。
你说我能不吃醋？
你说我能不吃醋？

“新新人类”与“旧旧人类”

这一回，张豪给文老先生的惊喜，与其说是第一次吃了自助餐，第一次吃了中西混合的自助餐，倒不如说第一次见到了“美眉”与“帅哥”，第一次遭遇了“新新人类”。

“照这么说，我该是‘旧旧人类’！”文老先生这么自嘲道。

吃完水果之后，文老先生结束了这顿中西结合的自助餐。张豪建议说，不妨到二楼歌舞厅看看。于是，文老先生便与张军一家上了二楼。

对于跳舞，毛泽东并不外行。早在一九三七年初，美国女记者艾格妮斯·史沫特莱进入延安采访，多次访问了毛泽东，并倡议在周末举行舞会。毛泽东就在那个时候，学会了跳舞。进入北京之后，在周末，中南海也常常举行舞会，毛泽东经常光临。

然而，步上二楼，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新新人类舞厅”，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鼓点般强烈节奏的音乐，震耳欲聋。闪烁着的彩灯，一明一灭，发出耀眼的光芒。新新人类在那里摇头晃脑，扭动腰肢，扭动屁股，完全没有往昔舞会那种温文尔雅的气氛。歌手在台上领唱，那歌声尖厉，歇斯底里。毛泽东在一侧看了一会儿，实在不敢跨进舞池，跟“帅哥”、“美眉”们同歌共舞。

见到文老先生对于“新新人类”的歌舞不感兴趣，张豪便领着文老先生上了三楼。

三楼要比二楼安静得多。保龄球、桑拿浴、足浴、美容厅、温水游泳池，一应俱全。

当文老先生来到三楼一角的阅览室，见到里面正在举行一场“新新人类”与“旧旧人类”的辩论会，倒是饶有兴趣地走了进去。

辩论会是从一部电影《嫁个有钱人》引起的。电影中的“美眉”，高声喊出这么一句话：“我一定要嫁个有——钱——人——！”辩论的正方和反方围绕这句话，展开论战。

正方是“新新人类”，一律彩色头发，名牌服装；

反方是“旧旧人类”，一律花白头发，随便穿着。

文老先生一行在旁听席上坐下。

“新新人类”首先发言：“‘我一定要嫁个有钱人’，这是现代‘美眉’的必然追求。有人说，爱情是一个多彩的气球，必须注入金钱的氢气才能变得浑圆、完满；没有了金钱的爱情，充其量是一块好看的彩色橡皮而已。这是真理。”

“旧旧人类”反驳道：“‘我一定要嫁个有钱人’，但是嫁个有钱人，真能得到幸福吗？爱情如果建立在金钱之上，那就等于大厦建立在沙滩之上。”

“新新人类”说：“请不要忘记，我们处在金钱社会之中。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有钱，就能买到最好最大的房子，就能买到最豪华的轿车，就能娶到最漂亮的‘美眉’。”

“旧旧人类”道：“确实，钱很重要。但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并不是金钱。金钱万能，金钱至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掉进了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新新人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金钱是最重要的，人都是为金钱而活着，为金钱而拼搏。黄金是金钱的象征，是最珍贵的，也是最尊贵的。有钱能使鬼推磨。黄金高于一切。”

“旧旧人类”：“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说过：‘黄金的枷锁是最重的。’”

“新新人类”：“如果枷锁真的是由24K黄金做的，我们宁愿要这黄金的枷锁！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出现那么多的贪官污吏，比和坤还和坤！他们贪什么？他们贪的就是金钱。他们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追求金钱，他们不怕戴上黄金的枷锁！”

“旧旧人类”：“我非常欣赏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的一段话：‘我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理想！……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我们不应该追求‘猪栏理想’！”

“新新人类”：“爱因斯坦的观念是陈腐的。今天，我们就是要追求‘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们一点也没有感到‘可鄙’。比如，我们就是追求名牌，崇尚名牌。在我们看来，衣服是身份的象征。没有钱，就没有名牌。这既不‘虚荣’，也不‘奢侈’。对于我们来说，街上的‘回头率’比什么都重要。”

“旧旧人类”：“说起衣服，使我记起居里夫人的女儿艾芙·居里是怎样描写自己父母的风貌的：‘一个外表不整齐的男子，衣服穿得很随便，在布列塔尼某空路上推着一辆自行车向前走，陪着他的那个年轻妇人，装束像农村妇女，看见这样两个人，谁会想到他们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有一个美国记者，报馆派他访问著名学者居里夫人，她在什么地方呢？他必须向别人打听……就向这个赤足坐在门口的石级上的大胆妇人打听吧，她正抖着一双装满了沙土的凉鞋。这个妇人抬起头来，她那灰色眼睛注视着这个冒昧闯来的人……他立刻看出她和报纸上登出的成百成千的相片一样，这就是她！’”

“新新人类”：“居里夫人有着俊美的脸庞和身段。她不穿名牌，

使我深深为她惋惜！”

“旧旧人类”：“其实，爱因斯坦也是如此。他在出席日内瓦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的典礼时，‘只戴了一顶草帽和穿一身日常便服’，如此而已！”

“新新人类”：“科学家不懂得生活！”

“旧旧人类”：“科学家并不是不懂得生活，他们自己的人生观。苏联昆虫学家柳比歇夫说了一段这样的话：“照我看，一个学者的衣着最好保持最低水准，过得去就行。因为：（1）有些人，把穿一套好衣服当作真正的乐趣，何必同这些人比赛竞争呢？（2）穿朴素的衣服，行动方便自如；（3）稍有些故作‘癫狂’，并不坏，小市民会对你有些讥讽嘲笑，这是一种有益的心理上的锻炼，能让你培养我行我素的精神……”

“新新人类”：“你们所引述的马克思的话也罢，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柳比歇夫的故事也罢，早已大江东去！今天，我们是在二十一世纪进行这场辩论，我们必须面对二十一世纪的现实！物欲横流，金钱第一，就是今天的现实。‘美眉’通过爱情，通过‘我一定要嫁个有钱人’而获得金钱，这正是社会现实的反应。”

“旧旧人类”：“贪官贪污金钱，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美眉’通过‘我一定要嫁个有钱人’获得金钱，将爱情变成了获取金钱的捷径。”

“新新人类”：“我们的‘爱情宣言’是：贫穷的爱情我不要！让没有钱的爱情走开！”

“旧旧人类”：“发誓‘嫁个有钱人’的‘美眉’，未必幸福。让爱情远离金钱！”

“新新人类”：“爱情需要金钱来‘保养’。没有金钱的爱情才是不幸福的！”

“旧旧人类”：“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爱情才是不幸福的！”

“新新人类”：“有钱就是幸福。有钱的男人就是好男人。”

“旧旧人类”：“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买不到真正的爱情。”

“新新人类”：“只要有了钱，是否幸福其实无所谓。有钱不一定幸福，没有钱却一定不幸福！嫁鸡嫁狗，嫁钱第一！”

“旧旧人类”：“亲爱的‘帅哥’和‘美眉’，我们之间不仅存在着金钱观的巨大差异，而且存在着爱情观、幸福观的巨大差异。一句话，存在着人生观、世界观的巨大差异。”

“新新人类”：“对方辩手，我们发现你们的观念太陈旧！”

“旧旧人类”：“对方辩手，我们发现你们的观念太偏激！”

“新新人类”：“跟你们辩论，仿佛隔着一条世纪的鸿沟！”

“旧旧人类”：“跟你们辩论，仿佛隔着一条世纪的鸿沟！”

“新新人类”：“我们是新世纪的新人！”

“旧旧人类”：“你们是新世纪的异类！”

“新新人类”：“你们是旧道德的卫道士！”

“旧旧人类”：“我们是传统文明的继承者！”

就在这时，辩论的主持人用木槌敲了一下，发出“啪”的一声：“我宣布，由于正方与反方互相指责，辩论无法继续进行，到此为止！”

虽然辩论已经结束，正方与反方纷纷离席，文老先生却仍然坐在那里，因为“新新人类”与“旧旧人类”的辩论使他陷入沉思。直到张豪和张霞扶他离席，他这才慢慢的走出了三楼的阅览室。

离开“新新人类之家”之后，张豪驾车继续绕十三陵水库半周，以使文老先生充分欣赏十三陵水库的夜景。

绕行半周之后，林肯豪华加长车到了张豪别墅。

文老先生刚在底楼大客厅的大沙发上坐下来，穿旗袍的保姆马上过来给他沏了一杯龙井茶。

文老先生从怀里掏出中华牌香烟想抽上一根，见到客厅里挂着“NO SMOKING”标志牌，也就赶紧收起了香烟。

或许是今天上午乘车跑了那么多胡同，或许是下午在十三陵爬了那

么多坡，或许是无法抽烟提神，或许是毕竟八十有三，倦意笼上了文老先生的心头。

知道文老先生困了，张豪当即安排他休息。

张豪的别墅共三层，除了在底层设有保姆房之外，在二楼、三楼各有四套带卫生间的卧室，所以安排文老先生以及张家三代夫妇在此过夜绰绰有余。张家三代每逢周末，常在这里聚会，所以有着各自的卧室。张豪、张军、张霞陪同文老先生上了二楼，步入一套豪华大客房。张豪说道：“文老先生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只是寒舍远不及北京饭店的‘皇帝套房’，请文老先生见谅！”

其实，张豪别墅的这套客房，倒是远比张军家的卧室宽敞、考究。客房里还设有会客室，而卫生间的三大件全是进口“TOTO”名牌。

张豪指着床头的三个分别为白色、黑色、红色的电钮说：“如果半夜需要什么帮助，请摁白色电钮，保姆就会上来照料。如果需要找我，摁一下黑色电钮。倘若发生紧急情况，请摁红色电钮，‘110’中心的警察在五分钟内就会赶到。”

这时候，张霞对张豪说道：“爸爸，把黑色电钮那根线接到我的卧室里吧。如果夜里有什么事，我来照料文老，毕竟我是医生。”

张豪点头同意了。

文老先生并不在意这些电钮，他倒是注意到会客室里没有禁烟标志，说道：“在这里可以抽烟吗？”

张豪赶紧说：“文老先生要抽烟，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抽。大客厅里的禁烟标志，是小霞挂的。”

张霞连忙解释说：“那‘禁烟标志’原本是专门‘针对’爷爷的。”

张军笑道：“我在戒烟初期，经常‘复辟’，所以小霞到处给我挂‘禁烟标志’。”

文老先生道：“我是戒不了罗，算是‘顽固到底’！”

张豪出去了一下，才一会儿功夫，就像变魔术似的，“变”出一条

中华牌香烟一条熊猫牌香烟，还“变”出一个烟灰缸和电子打火机。

张豪道：“这些香烟和烟具，平时‘坚壁清野’，不让我父亲看见。只有来了抽烟的客人，我才拿出来。”

张军笑道：“你别把爸爸的‘觉悟’估计得太低！”

张豪特地向文老先生介绍说：“这中华牌香烟，是毛泽东最喜欢抽的；这熊猫牌香烟，是邓小平最喜欢抽的。”

文老先生道：“你怎么知道毛泽东喜欢抽中华牌香烟？”

张豪说：“从爸爸那里听来的。过去，爸爸老是抽中华牌香烟，说是从毛泽东主席那里‘继承’的‘光荣传统’。”

在一阵大笑之后，文老先生对张豪说道：“你怎么不从你父亲那里‘继承’‘光荣传统’呢？”

这时，张豪正色道：“文老先生，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真正的光荣传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实，这也是从您那里继承的光荣传统，因为听父亲说，您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张豪的话，使文老先生深为震惊：“你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张豪说道：“严格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新党员。”

张豪此言一出，文老先生——毛泽东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毛泽东的眼里，张豪是名副其实的资本家，“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发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成了毛泽东消灭的对象。毛泽东对资本家采取“团结、利用、改造”的策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在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时，把资产阶级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会基础加以彻底铲除，整个资产阶级几乎在中国大地上绝迹。毛泽东不明白，在他“长眠”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怎么会冒出这么多像张豪那样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更不明白，资本家怎么可以加入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当年就曾经把赫鲁晓夫吸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加入苏联共产党，斥责为“全民党”！毛泽东一辈子都在斥责“新生资产阶

级”、“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要求人们警惕“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见到文老先生如此震惊，惟一能够理解他心情的是张军，惟一能够作出政治解释的是这位中共党史专家。

张军向文老先生解释说，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中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社会分化为四个不同的阶层：“下岗”工人和贫苦农民，成为“贫困阶层”；普通工人属于“低薪阶层”；白领们属于“中产阶层”；“先富起来”的人们，被称为“高收入阶层”。

张军说，“高收入阶层”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万元户”是富人的代名词。对于当时许多月收入不足百元的人来说，一万元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文数字”。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款”取代了“万元户”，成了富人新的代名词。“一万元不算富，十万刚起步，百万才是真正富”的顺口溜，反映了当时对“大款”标准的理解。很快的，如今“百万富翁不算富”！“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中国迅速涌现。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在今日中国不叫“资本家”，不叫“新生资产阶级”，而是有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所掌握的大批私营企业，叫做“非公经济”。

张军说，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就发生了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能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而且也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问题，因为“新的社会阶层”所掌握的“非公经济”，已经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作出了吸收“新的社会阶层”入党的重大决定。

张军这位中共党史专家，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新理论：“从所有制性质上看，尽管私营企业主作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者，与广大员工存在雇佣关系，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他们与旧社会资本家有着本质

的区别。因为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在党的政策指引下，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对于他们的可贵的政治热情和高尚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多些尊重和激励，引导和保护，把他们吸引和凝聚在党的周围，符合党员条件的，还应当吸收到党内来，而不应该打击和排斥，把他们关在党的门槛之外，更不应把他们视作异己力量推到党的对立面。”

张军说，中共中央作出吸收“新的社会阶层”入党的重大决定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所重视的是“思想入党”。中共中央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张军说，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纪念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诞辰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表示，“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既然“新的社会阶层”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当然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从“新的社会阶层”吸收新党员。张豪正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军告诉文老先生，他的一家是“党员之家”，如今一家三代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和“小放牛”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接着入党的是张霞。在张霞之后入党的是陈港生。此后，属于“新的社会阶层”的张豪成了新党员。最晚入党的是张豪的太太。

经过张军的这番解释，毛泽东那震惊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尽管张军宣称关于“新的社会阶层”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毛泽东建党思想和党的历史经验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

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的伟大创新”，毛泽东却难以苟同。不过，毛泽东毕竟明白了像张豪这样的“新的社会阶层”能够入党的“理论依据”。

与邓小平论“左”右

在进行了一番关于“新的社会阶层”入党问题的讨论之后，夜深了。

张豪、张军、张霞向毛泽东道过晚安，各自回屋歇息。

毛泽东脱去唐装，只穿一件白衬衫。他在会客室里，面对着张豪送来的中华牌香烟和熊猫牌香烟，选择了熊猫牌——因为这三日以来，他一直在抽中华牌。

毛泽东抽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吞云吐雾，好爽快，真过瘾。就在他伸手去取第二根熊猫牌香烟时，毛泽东忽然发现，另一只手也伸向熊猫牌香烟！

毛泽东吃了一惊，抬头一看，透过袅袅烟雾，见到对面沙发上坐着一个人！

毛泽东定睛一看，此人理着板刷头，长着一对熊猫眼，穿了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

“小平，你怎么来了？”毛泽东欣喜地问道。

邓小平瞪大眼睛朝毛泽东看了半天，这才说道：“主席，你怎么也赶时髦留起胡子、长头发？”

“鄙人现在是书法家。艺术家当然留胡子、长头发。”毛泽东笑道。

“主席，你也喜欢熊猫牌香烟？”邓小平说道。

“你我都是‘老烟卤’，彼此彼此！”毛泽东笑道，“记得，在沙家店战役中，战斗持续了三天两夜，我未合一眼，总共吸了五盒半烟，歼敌三十五个师，平均抽一盒烟要歼敌七个师！”

“日本朋友樱内一雄曾经劝我：‘吸烟有害健康，最好戒掉。’我回答说：‘正因为我的健康状况很好才抽烟，有人说抽烟还有很多好处呢。’”邓小平也说起了他的“抽烟理论”。

毛泽东与邓小平在浓浓的烟雾之中，相视而笑。

“主席，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七年。”邓小平回忆道。

“不错，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的时候，我见到你。那时候，你瘦瘦小小的，毛头小伙子一个！”

“我当时是会议的记录员。”邓小平说道，“后来，一九三一年冬天，我们在江西瑞金县城东北的叶坪村，第二次见面。那时候，你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我作为瑞金县委书记，向你汇报工作。”

“你的记性不错。”毛泽东说道，“记得，跟你一起来的，还有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维俊。”

“主席，你的记性也很不错。”邓小平说。

“后来，我在江西苏区挨批判，你也挨批判。你和我的弟弟毛泽覃、谢维俊，还有我的秘书古柏，这‘邓、毛、谢、古’，被说成是支持我毛泽东的‘毛派’，你就是‘毛派的头子’。博古他们反对‘邓、毛、谢、古’，实际上就是反对我。”毛泽东回忆往事，感慨万千，“后来，‘毛、谢、古’都在战争中牺牲，只剩下你这个‘邓’！”

“我虽然侥幸活了下来，可是被撤了职，又丢了老婆，天天写检讨，没人敢跟我说话。”邓小平回顾往事，也不胜感叹。

“小平，正因为你是经过严峻考验的，所以我两次把你定为接班人。”毛泽东说道，“一次是在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被选为总书记。还有一次，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被打倒之后，我又重新起用你，我说你‘人才难得’……”

“我很感谢主席的支持。”邓小平说道。

“不过，你也使我失望。”毛泽东终于坦率地说出了这句话。

邓小平一听，当然明白毛泽东所说的“失望”，无非是指他当选总书记之后，跟刘少奇一起实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无非是指在林彪事件之后，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重新起用他，他上台之后大搞“整顿”，几乎要“整”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无法容忍他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他第二次打倒。

“主席，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不走改革、开放之路，就没有出路。”邓小平也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按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路线走下去，中国经济必然走向崩溃。经济的崩溃，也就导致党的崩溃，国家的崩溃。苏联亡党亡国，就是前车之鉴。”

“不，不，苏联亡党亡国，因为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连连摆手，顽固地维护着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理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使毛泽东深为不悦。毛泽东说：“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苏联亡党亡国，就在于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没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你不是搞了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吗？苏联亡党亡国这一‘实践’，正是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正确。”

“不，不，苏联亡党亡国，正是证明了不进行对外开放、不进行经济改革，就没有出路。”邓小平针锋相对地说，“苏联多年实行斯大林的计划经济那套僵化的理论，使苏联经济日益衰退，早就埋下了亡党亡国的祸根。赫鲁晓夫企图改革斯大林模式，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失败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竭尽全力与美国争霸世界，进行军备竞赛，但是苏联国库空虚，经济停滞，已经难以支撑。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经济已经奄奄一息。正因为这样，我以为党的中心工作不能是‘阶级斗争’，必须是经济建设。改革才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说。

“我们应该一心一意搞建设。必须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落后就要挨打！”邓小平说。

“我们必须反右派，反右倾。‘左’是态度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毛泽东说。

“其实，我们吃亏，就吃在‘左’上！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就越来越‘左’。到了‘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左’，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邓小平说。

“怪不得人家说你是‘打左灯，朝右拐’。”毛泽东说。

“我是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党根深蒂固的是“左”。’”邓小平说。

“其实，你是在反‘左’的口号之下，反对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理论。”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话，不以为然。

“对于主席，我始终是非常尊重的。”邓小平说，“在一九八〇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我就多次强调过，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你没有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那样大反毛泽东，这一点我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毛泽东说道，“不过，你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确’，全由你邓小平说了算。实际上，也就是把我符合你的需要的思想，说成是‘正确’的，把我的不符合你需要的思想，说成是‘错误’的。你还批判了华国锋。你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实际上，你把毛泽东思想分为‘毛泽东同志早年的正确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取前者，舍后者。其实，我的思想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允许这样加以分割、加以取舍。我更加珍视我晚年的思想，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也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你是打着我的旗帜，反对我的路线。”

“不，不。”邓小平这时反驳道，“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

争’以来，您的思想越来越‘左’。您的晚年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左’字。正因为这样，我主张摒弃您的晚年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过去，我曾经说，邓小平和江青是两个‘钢铁公司’。今天我们见面，彼此成了两个‘钢铁公司’！”这时，毛泽东笑了，“既然你我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吧。”

“是呀，你我谁也说服不了谁！遇上这种场合，我常常主张‘不争论’。”邓小平也笑了。

“你我有争论，也有共同之处。我拜读了《邓小平文选》，拜读了你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毛泽东说，“我从你的文选中，知道你在一九七九年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知道你在一九八五年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知道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了‘六四风波’。我很仔细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你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我非常赞赏你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采取坚决的态度镇压了反革命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今天，中国共产党有今天，你是立了大功的。”

邓小平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如此仔细读过《邓选》。两个“钢铁公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镇压“六四风波”上，找到了共同点。

“主席，我设想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到二十世纪末，花二十年时间，使中国国民经济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说。

“应当说，在经济建设方面，你比我踏实，我有点浮躁，急于求成，恨铁不成钢。这时，毛泽东居然作了自我批评，“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面对着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苏联将超过美国的挑战，我提出了用十

五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在一九七二年赶上英国，并设想再用二十年三十年时间，也就是在二零零零年左右，赶上并超过美国。当时提出的在短期内‘超英赶美’的口号，看来是过于急躁。”

毛泽东在作了一点自我批评之后，话题一转，又批评起邓小平来：“我还注意到，在《邓小平文选》中，收入你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在一九八六年九月的谈话。就连这位美国记者，都向你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他还问，‘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这个美国记者，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你在中国搞的是资本主义，就连‘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都感到意外’！”

邓小平当然又进行反驳：“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谓‘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其实，富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穷不一定是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现在，中国老百姓普遍富了，富了并不意味着就是资本主义。”

当毛泽东准备与邓小平再度交锋时，忽然笑了：“我们两个‘钢铁公司’，还是‘不争论’为好。不然一直争到天亮，谁也说服不了谁。”

毛泽东与邓小平你一枝，我一根，在烟雾中交谈，烟灰缸里积满了烟头和烟灰。屋里烟雾大浓，连毛泽东都觉得有点窒息感，便站起来开了一扇窗通风。

待烟雾渐渐散去，毛泽东回头一看，邓小平已不知去向。

毛泽东这才明白，刚才太倦了，坐在沙发上睡着了，做了一梦。

对江泽民的谆谆教导

大约刚才抽烟太多的缘故，本来就有着“入睡难”的毛泽东，这时候更难入眠了。

夜读是毛泽东多年来的习惯。毛泽东见到客房会客室的大玻璃柜里，放着许多装帧考究的大书，既有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也放着《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朵夫》、《牛虻》等外国文学名著。此外，还有《鲁迅全集》、《巴金文集》、《第三帝国的兴亡》等等。

毛泽东打开玻璃柜，伸手取书的时候，那书怎么也拿不出来。细细一看，那一排排的书全是假的，只有最前面的一本书有封面、最后面的一本书有封底，其余的书只有书脊！如果说，“皇帝套房”的“御书房”里那几本装模作样的线装书还是真书的话，张豪家中的这些书，全是摆摆样子的假书。毛泽东觉得，倒是张军家中的书房，货真价实，有着许多毛泽东感兴趣的书。可惜，今晚只能呆在这“无书世界”，不能回到张军的书房。此外，毛泽东以为，张霞家的书房也不错，有那么多中文书和英文书。毛泽东十分感叹，就张家三代而言，钱越多的人书越少！

就在毛泽东陷于无书可读的苦恼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

在这深更半夜，有谁来访呢？

“请进！”毛泽东打开了会客室的门，见到一个中等身材、胖胖的男子，戴一副宽边深色眼镜，西装革履，教授派头。

来者用带有苏北口音的普通话问道：“请问，毛泽东主席在吗？”

毛泽东倒是一眼就认出来访者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因为毛泽东早就从照片上认识这位总书记，说道：“欢迎！欢迎！‘总工程师’同志！”

江泽民愣了一下。

毛泽东补充说了一句：“刚才，‘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来过，现在我要接待‘总工程师’江泽民同志了。”

经毛泽东这么一说，江泽民细细打量面前这位长胡子，长头发的长者，这才发现跟过去从照片上认识的毛泽东十分相像。

江泽民哈哈大笑起来，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进入会客室。

“主席怎么留起胡子、长发来了？”江泽民提出跟邓小平一样的问题。虽然江泽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虽然如今人们也称江泽民为“江主席”，但是他仍按照当年人们的习惯，称呼毛泽东为“主席”。

“我现在不当主席，我是书法家。艺术家当然留胡子、长头发。”毛泽东用回答邓小平的话，回答江泽民。

“刚才，小平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是见到了您，所以我马上从中南海赶来了。”江泽民说道。

“我很高兴见到你。”毛泽东风趣地说道，“用小平的话来说，我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领导核心——‘毛核心’；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的领导核心——‘邓核心’；你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的领导核心——‘江核心’。今天，‘毛核心’既见到了‘邓核心’，又见到了‘江核心’，我非常高兴。我希望再过些日子，能够见到中国共产党第四代的领导核心。”

“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我能够见到主席，深为荣幸。”江泽民在毛泽东面前，显得恭恭敬敬，有点拘束。

毛泽东问江泽民：“你喜欢中华牌香烟还是熊猫牌香烟？”

江泽民摇头道：“谢谢主席，我不抽烟。”

毛泽东道：“你没有继承‘毛核心’和‘邓核心’的‘光荣传统’嘛！”

毛泽东说罢，大笑起来。江泽民也跟着大笑，打消了拘束感。不过，在毛泽东面前，江泽民毕竟是晚辈，所以他们的谈话总是毛泽东

问，江泽民答。

毛泽东道：“‘烟花三月下扬州’，你的老家扬州是鱼米之乡哪！”

江泽民说：“我的祖辈原籍江西婺源，后来迁往扬州。”

毛泽东道：“听说，你喜欢唱歌，会吹笛子，也会写诗，书法也还可以。”

江泽民说：“那是从小受祖父江石溪影响，他是落第秀才，毕生从医。”

毛泽东问：“听说，你是烈士遗孤？”

江泽民答道：“我的三叔江上青是革命烈士。三叔牺牲之后，我父亲把我过继给三叔家。”

毛泽东又问：“听说，你在基层干了几十年，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

江泽民答道：“我在上海、长春、武汉做过多年基层工作，后来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九八五年，担任上海市市长。”

毛泽东又问：“一九八五年你几岁？”

江泽民答道：“五十九岁。”

毛泽东说：“你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之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应该是六十三岁。我在一九四三年成为中共中央主席，那时候我五十岁。我在一九四九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五十六岁。小平在一九五二年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四十八岁。一九五六年，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五十二岁。看来，过了‘知天命’之年，人才走向成熟。邓小平这位‘总设计师’选择了你这位‘总工程师’，是选择对了。”

江泽民说：“您和小平同志，都是经历了严峻的战火的考验，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比我们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更加艰难。”

这时，毛泽东点燃一根中华牌香烟，抽了一口：“战争的考验固然是严峻的，但是经济建设中的难关，是另一种考验。照我看，你这

位‘江核心’，有几件事办得不错：一是经受了‘六四风波’的严格磨炼，使党从极其困难的状态中走出来；二是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澳门的主权，使统一祖国的大业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三是经济建设一直保持百分之八左右的年增长率，使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长足的进展。”

听到毛泽东的表彰，江泽民连忙说：“我们这一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站在您和小平同志的肩膀上。请主席对我们的工作，多多给予批评。”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深沉地说道：“中国现在是家大业大。一九五八年，当时我想把中国的钢铁产量搞到‘一零七零’——一千零七十万吨，发动‘大炼钢铁运动’，老百姓把家里的旧铁锅都拿出来了，好不容易才完成‘一零七零’。现在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过了一亿吨。上海的一个宝钢的年产量，就超过了‘一零七零’。经济上去了，生活富裕了，要警惕‘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这时，江泽民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记录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毛泽东继续说道：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要深刻记取。”

“要坚决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要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

江泽民以小辈的身份，在毛泽东面前只是记录而已，他不可能像邓小平那样跟毛泽东争论。

毛泽东呢？往日，他需要起草什么文件，跟前就坐着政治秘书陈伯达或者胡乔木。他说一句，陈伯达或者胡乔木就记一句。这时候，他仿佛把眼前的江泽民，当成了陈伯达或者胡乔木一句又一句地口授着：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断进行，要七八年来一次！”

“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要斗私批修！”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江泽民只管埋头记录，对于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不置一词。

毛泽东接着又说道：

“在你们现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时候，要特别警惕西方的腐朽思想的侵蚀，要警惕帝国主义的颠覆阴谋。别忘了当年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说的一句‘名言’：‘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也别忘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毛泽东再三叮咛：

“你应该多读一读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江泽民依然只顾记录。

大约是过于疲倦，或者是由于江泽民毫无反应，毛泽东说着那番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竟然睡着了。

老人总是睡得不深。毛泽东睡了一会儿，又醒了过来。他睁眼一看，手持笔记本的江泽民早已不知去向。

“泼辣记者” 法拉奇来访

就在江泽民离去之后，又响起了敲门声。刚才江泽民敲门，那声音轻轻的，因为江泽民对于毛泽东充满敬慕感；然而，这一位的敲门声却是重重的，仿佛是煤气公司的抄表员上门抄表，或者是电话公司的师傅上门修理。

毛泽东开了门，出乎意外，站在门外的竟然是一位长发披肩的外国中年女士，双肩背着一个牛津挎包。毛泽东仿佛在什么书上见到过她的照片。

她打量了毛泽东许久，说道：“Are you Chairman Mao？”

当年，毛泽东跟英文秘书林克学过英语，能够听懂这样的“您是毛主席？”的简单英语。

毛泽东答道：“Yes.”

那位女士自我介绍说：“I am Oriana Fallaci.”

毛泽东一听，原来是奥琳埃娜·法拉奇，意大利的名记者。毛泽东记得，在那本《女人与神话——奥琳埃娜·法拉奇传》上，见到过她的照片。另外，从《邓小平文选》上，读到过她在一九八〇年八月采访邓小平的谈话记录。毛泽东明白，这位以提问泼辣著称的女记者，要找他唇枪舌战一番。

毛泽东记起床头的黑色电钮，摁了一下。半分钟之后，响起了敲门声，张霞来了。张霞原本以为毛泽东身体不适，一看会客室里坐着一位外宾，就明白一定是请她来当翻译。当张霞知道是法拉奇前来采访时，显得非常兴奋。

这时候，法拉奇已经从牛津挎包里取出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和笔记本，摆开了采访的阵势。

毛泽东在沙发上坐好。张霞帮他把白衬衫的领口钮扣扣上：当张霞问毛泽东，是不是该系上一根领带时，毛泽东连连摇头。

法拉奇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就在毛泽东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法拉奇端详了一下毛泽东，建议毛泽东把络腮胡子以及假长发除去，恢复本来面目。因为整个采访过程，法拉奇要用自动遥控摄像机拍摄下来。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同意了法拉奇的意见。张霞帮助毛泽东“卸装”。于是，坐在沙发上的，便是人们经常从照片、电影中见到的那个毛泽东了。

“卸装”之后，毛泽东顿时感到轻松，因为那络腮胡子和长头发，毕竟是一种累赘。

法拉奇一上来，就这么提问：“请问毛主席，您的御林军是‘八三

四一’部队。‘八三四一’意味着您在八十三岁时离开这个世界，而这时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算起，正好是四十一年。这是一种天意，您说对吗？”

毛泽东马上就领略这位女记者提问的猛烈火力，笑道：“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有什么天意。那只能说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法拉奇：“遵义会议，是您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在那次会议上，您联合张闻天、王稼祥发动突然袭击，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手中夺取了领导权。能不能说，您的一生，是善于玩弄权术的一生？”

毛泽东：“遵义会议确实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我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其中包括原‘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

法拉奇：“有人说，您如果在一九五六年去世，您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革命领袖了。”

毛泽东当然明白法拉奇提问的含意，却故意反问：“为什么你那么看重一九五六年？”

法拉奇：“那是因为你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摧残了一百万知识分子，在接下去的‘大跃进运动’中饿死了三千万农民，到了十年‘文革’，几乎把中国折腾到快要崩溃的地步！所以，如果您在一九五六年去世的话，您就不会犯晚年那么多不可饶恕的错误。在苏联，列宁在一九一七年领导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七年——一九二四年就去世了，所以列宁没有给人留下太坏的印象。斯大林就不一样，他的双手沾满他的战友们的鲜血！”

毛泽东：“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你——‘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法拉奇：“有人评价您是‘马克思+秦始皇’，或者说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秦始皇’，您以为如何？”

毛泽东：“不错，我尊崇秦始皇。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非时，就说过：‘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

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

接着，毛泽东说起他对秦始皇的评价：“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说：“我还给郭沫若写过一首诗，题目叫《读〈封建论〉——呈郭老》……”

毛泽东说着，背诵起自己的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虽说张霞在美国留学多年，英语不错，可是翻译起毛泽东关于秦始皇的评价以及那首诗，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毛泽东说完秦始皇，接着说道：“攻击我的人，总爱骂我是‘当代秦始皇’，是‘马克思+秦始皇’。其实，秦始皇无非是专制、独裁。面对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我就是要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镇压无产阶级的敌人。”

法拉奇：“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被您的接班人华国锋装进水晶棺，成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展览品。这是您生前的意愿吗？”

毛泽东：“一个人死了之后，只能听任别人摆布。我提倡火葬，是

政治局里第一个在文告上签字——逝世以后遗体火葬的领导人。”

法拉奇：“那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呢？”

毛泽东：“我说过‘邓小平人才难得’。”

法拉奇：“华国锋把您作为展览品，而邓小平把您作为木偶。邓小平实际上是打着你的旗号，把毛泽东思想空壳化，抽去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您同意在邓小平主持下所写出来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

毛泽东：“我无法同意那个决议中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我始终认为，我所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法拉奇：“那么您如何评价‘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呢？”

毛泽东：“‘苏联解体，东欧易帜’恰恰证明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法拉奇：“您曾经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在今日中国却是‘一私就灵’。您如何看待私营经济也就是所谓的非公经济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呢？”

毛泽东：“我主张要斗私批修。”

法拉奇：“有人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阶级斗争、公有制、计划经济、大民主、反西方、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那么您以为如何呢？”

毛泽东：“我劝这位概括者系统的读一下我的著作。”

法拉奇：“您读过您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关于您的回忆录吗？”

毛泽东：“没有读过。李志绥不是我的‘私人医生’，而是我的保健医生。此人医术高明，但品德不好。”

法拉奇：“姑且不论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种种内幕，我注意到，一九二八年五月您在井冈山上与贺子珍同居的时候，您的元配夫人杨开慧并未去世，而是带着长子毛岸英被关押在湖南军阀何键狱中。她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四日被何键枪决，年仅二十九岁。”

毛泽东：“当时，道路阻隔，消息封闭，我并不知道杨开慧的情

况。我一直怀念我的妻子杨开慧。一九五七年我所写的《蝶恋花》，就是为怀念杨开慧而写的，我称她为‘骄杨’。一九六二年，当章士钊先生问及‘骄杨’的含义时，我答复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法拉奇：“我从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以及那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回忆录中得知，一九三七年贺子珍从延安出走，是因为史沫特莱带来一位漂亮的女翻译吴莉莉（又名吴广惠），引起贺子珍的猜忌。就在贺子珍出走西安之际，上海影星江青（蓝苹）来到了延安，成了您的第三位妻子。您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用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呢？”

毛泽东：“这是因为当时江青最能领会我的思想，所以成为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得力助手。”

法拉奇：“您预料在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江青必定会被赶下台？”

毛泽东：“这当然在我的预料之中。江青个性太强，树敌太多。我多次劝过她，要团结大多数，她不听。所以她被华国锋、叶剑英逮捕，完全是咎由自取。”

法拉奇：“在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们清点您的遗物，发现您存有一百多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您天天说，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均贫富’，连八级工资制您都以为不合理，为什么却允许自己拿那么多的稿费？”

毛泽东：“我这个人，指挥千军万马，打过那么多仗，却从来不佩枪，不摸枪。‘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我倒是笔不离身。即便是在井冈山，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我一直让我的妻子贺子珍带着文具袋，袋里装着纸、砚、毛笔。‘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我很欣赏拿破仑说的一句话，‘一枝笔可以抵得过三千枝毛瑟枪。’我是用我的‘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同样，我这个人，当党的主席、国家主席，批拨过亿万经费，我却从来不摸

钱，我的身边永远没有一分钱。我的钱是由管理员吴连登代管，我并不知道我究竟有多少钱。”

法拉奇：“在今日中国，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先富起来’人群之中，亿万富翁也相当多。今日中国，您的财富不仅无法跟‘非公经济’的老板们相比，也无法跟‘日进斗金’的明星们比。在今天，您仍主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吗？”

毛泽东：“我仍然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最重要的。最近三天以来，我住过每天房价为九千美元的北京饭店‘皇帝套间’，坐过房地产大老板的林肯豪华加长轿车，也去过大杂院，跟残疾人、下岗工人、打工仔们一起吃盒饭。中国老百姓过去天天唱《东方红》，是因为我能够‘为人民谋幸福’。今日中国巨大的贫富差别，使我深感不安。”

法拉奇：“您认为今日中国最令您担心的是什么？”

毛泽东：“腐败！往日，资产阶级的炮弹，还要裹上一层糖衣；现在，已经是万炮齐轰，明目张胆。腐败是癌症，是党的癌症！我担任中国党政领导时，送礼者甚多。比如，一九六四年非洲一个国家的总统送了一个大象牙，两个人都抬不动；瑞士总统送了两块全金表。当时工作人员把这两块金表给我看的时候，问我是否留下？我说：‘这种礼品不能要，谁当主席他送给谁，你当主席也会送给你。我是代表人民的，这种礼品不能收，一定要送仓库。’”

法拉奇：“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意识到腐败的严重性，不断开展反腐败斗争，也清除了像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这样的高层腐败分子。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没有监督的权力是最容易孳生腐败的。您认为中国可能实行两党制、多党制吗？”

毛泽东用很坚决的口气回答说：“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不可能搬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法拉奇：“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是一党专政？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就一定是终身制？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采取由领袖指定接班人的制

度？朝鲜劳动党领袖金日成甚至指定儿子金正日接班，实行封建皇帝的世袭制！这有什么民主可言？”

毛泽东：“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表面上的民主。你别看美国竞选总统轰轰烈烈，但是历届美国总统，哪一个不是百万富翁？哪一个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老百姓享有最充分的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就是民主的充分体现。”

法拉奇：“邓小平对您的评价是‘三七开’，陈云对您的评价是十二个字——‘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评价？”

毛泽东：“我向来只管大步向前进。至于别人如何评价，那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不过，我绝对不可能接受‘文革有罪’这样的评价。我始终认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比战胜蒋介石更加重要。”

法拉奇：“听说，您的秘书田家英曾经讲过，当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席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您以为田家英的三条意见如何？”

毛泽东：“田家英的这三条意见，已经被定为‘反党言论’。”

法拉奇：“田家英在‘文革’中悲愤地自杀于中南海您的书房里。在今日中国，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老百姓反对‘文革’！”

毛泽东：“那是因为他们受了否定‘文革’的错误思潮的影响。”

法拉奇：“您如何自我评价？”

毛泽东：“我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中，已经说过：‘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就是刘邦。”

法拉奇：“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前途？”

毛泽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闪回”纪念堂

好不容易，法拉奇总算结束了采访。毛泽东这才意识到这位女记者的厉害，她的提问是何等的尖锐。不过，毛泽东也感到欣慰，只有这样的高手，才值得与之对谈。

法拉奇像一阵风似的从毛泽东面前消失，张霞也忽然不见了。

毛泽东这才明白，刚才又做了一个梦。

三天以来，毛泽东不仅吃过九顿不同风格的饭，而且当他屈指数梦，发现三天以来竟然每夜都做三个梦，三夜一连做了九个梦：

在梦中，毛泽东见到了接班人华国锋，见到了妻子江青，见到了嫡孙毛新宇；

在梦中，毛泽东也会见了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会见了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

在梦中，毛泽东还会晤了“老对手”赫鲁晓夫、蒋介石；

在梦中，毛泽东回到了故乡韶山；

最后，在梦中，毛泽东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

回味这九个梦，毛泽东显得非常兴奋。

不过，面对法拉奇的连珠炮似的提问，毛泽东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在法拉奇走后，毛泽东感到疲惫，躺在床上沉沉地睡去。

毛泽东睡到黎明时分，被屋外吵吵嚷嚷的声音惊醒。

毛泽东拉开窗帘一看，不得了，屋外停着几十辆轿车，很多人要往屋里冲，而张军一家三代连同保姆都在那里拦阻。

毛泽东一抬头，见到十三陵水库的环库公路上，一长串轿车亮着晃眼的灯光，正在朝这里驶来。

一看这势头，毛泽东意识到出事了。他连忙去床头，摁下那红色的电钮——向“110”报警。

就在闪耀着红灯的警车朝张豪别墅急驶来的时候，吵吵嚷嚷的人群冲破了张军一家的阻拦，闯进了别墅。

张军、“小放牛”和张霞连忙回身，退进别墅。在张家三代六人之中，只有他们仨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有他们知道“文老先生”的真实身份是毛泽东。

他们仨这时惟一的念头，就是确保毛泽东的安全。

他们仨赶紧退到二楼。

没想到，那一大群人跟着上了二楼。

他们仨赶紧退到毛泽东的会客室。

没想到，那一大群人跟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室。

张军、“小放牛”和张霞紧紧保护着毛泽东。

顿时，闪光灯亮成一片，众多的采访话筒伸向毛泽东。

毛泽东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岁月，当他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会出现这样热烈的场面。

毛泽东不明白，怎么会涌来这么多的记者——其中有不少是高鼻碧眼的外国记者。

不过，记者们虽然那么多，那么拥挤，却一直对毛泽东保持着“一米线”，谁也没有挤压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从记者的提问中才知道，法拉奇是一个办事快如闪电的女人，她在采访之后，迅速通过美国的电视台，向全世界播出这一特大新闻。尽管当时在中国北京尚是凌晨三时，而在美国却正是下午，千家万户收看了法拉奇采访毛泽东的专题节目，题目叫《毛泽东重返人间》。出现在电视中的毛泽东，侃侃而谈，看得出这是毛泽东本人，而绝非任何演员扮演——法拉奇的高明之处，在于采访时请毛泽东卸去了假胡子和假发，露出“庐山真面目”。这一重大新闻，震惊了美国。美国总统也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收看了《毛泽东重返人间》。

世界各国的电视台，也在第一时间内转播了这一重大新闻。

这时，尽管北京的记者们，其中也包括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们，正在酣睡之中，但是来自美国、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使他们从温暖的被窝里一跃而起。他们从法拉奇那里知道毛泽东的住处，连忙从北京的各个

角落驱车前往十三陵水库，前往张豪别墅……

记者们络绎不绝蜂拥而来，已经无法在大门口阻挡的张豪夫妇和陈港生，也退往二楼。当他们见到处于闪光灯的包围之中的“文老先生”，原来是毛泽东时，都惊讶得目瞪口呆！

就在这时候，警察们也赶到张豪别墅，冲进了二楼会客室。当警察们见到毛泽东端坐在那里时，大声问道：“古月先生，出了什么事？”

警察们此时把毛泽东当成了古月！

然而，毛泽东却没有答复，因为他并不知道警察把他当成了“古月”！

警察们把记者们往后推，挤向“古月”，而记者们寸步不让，急着要采访毛泽东。

警察与记者们互相推搡，先是口角，接着是拉拉扯扯，再接着警察们拿出电警棍。顿时，会客室里充满尖叫声，秩序大乱。记者们此时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然而，即便在如此混乱之中，居然还有记者不忘职责，忙于拍摄双方你推我拉的局面。

在混乱之中，警察们好不容易冲到了“古月”面前，却发现“古月”已经不知去向！

警察队长吹响了警笛，这才好不容易把秩序安定下来。房间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毛泽东刚才坐过的沙发。只见沙发上留下一身唐装，一只络腮胡套，一只假发套。

其实，就在那满屋子吵吵闹闹的时候，毛泽东已经“闪回”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

警察队长大声问道：“谁是这里的主人？”

张豪夫妇应声答道：“我们是这里的主人。”

警察队长问：“你们为什么向‘110’报警？”

张豪夫妇说：“我们没有报警。”

警察队长又问：“还有谁向‘110’报警？”

这时，张军夫妇说：“我们没有报警。”

这时，陈港生说：“我没有报警。”

这时，保姆说：“我没有报警。”

这时，张家惟一没有说话的是张霞，因为张霞猜想，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摁了红色报警电钮。

见张霞没有作声，张豪夫妇问：“小霞，是你摁了红色报警电钮？”

张军夫妇也问：“小霞，是你摁了红色报警电钮？”

陈港生同样也问：“小霞，是你摁了红色报警电钮？”

警察队长大声地问张霞：“是你向‘110’报警？”

张霞想说是毛泽东向“110”报警，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毕竟她只是推测，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报的警。

警察队长又大声地问张霞：“是你向‘110’报警？”

张霞的脸涨得通红。

张霞觉得仿佛有人在使劲地摇着她的身子。这时，张霞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正坐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值班室里，一缕初升的阳光正照在她的脸上，班长正在用手摇着她的身子，连声呼唤道：“张医生，下班了！”

张霞这才从酣梦中醒来。

班长说：“张医生，你睡得好沉呀！”

张霞顿时不好意思起来，脸涨得通红。

张霞把那本英文版的《苏联解体亲历记》放进了手提包。她在离开毛主席纪念堂之前，特地到瞻仰厅看了一下，毛泽东安详地躺在那里，仿佛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

尾声：叶永烈采访梦境

张霞回到丰台家中，脑海里一直盘旋着值班室里做的怪梦。

张霞觉得那梦虽然怪怪的，倒是非常有意思。也可以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为她长期陪伴在毛泽东的遗体旁，常常思及，如果老人家能够活过来，他会怎样看待今日中国？

本来，张霞值完夜班之后，回到家里倒头便睡。然而，今天一反往日，那怪怪的长梦，使她的脑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难以入眠。

陈港生上班去了，家中只有张霞一人。无法入睡的张霞，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把那长长的怪梦写下来，像那本《苏联解体亲历记》一样出版，一定会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不过，张霞毕竟是个医生，不会写作。她记起自己有个要好的作家朋友在上海，名叫叶永烈。于是，张霞拨通了叶永烈家的电话。

叶永烈一听，凭借他作为作家的职业敏感性，在当天中午就带着录音机、采访笔记本飞往北京，赶到张霞家中。

张霞面对着叶永烈的录音机，断断续续地回忆梦境。很遗憾她没有那种绘声绘色讲述故事的才能，所以把那么精彩的梦，只用三言两语就打发掉了。

作家叶永烈毕竟消息灵通，主意又多，他记得从互联网上看到过一条消息，北京一家医学研究所发明了一种“录梦机”，能够把人们的梦制成“梦的VCD”。

经叶永烈一提醒，张霞到底是学医的，知道那个医学研究所在哪里，而且还认识那里主持研究工作的金教授。张霞说，刚刚做完梦，梦的信息正完整地储存在脑细胞里，越是在这个时候去“录梦”，录制的“梦的VCD”的清晰度越高。

叶永烈一听，赶紧与张霞一起“打的”到那家研究所。不过，叶永烈跟张霞约定，到了那里，只说自己做了一个怪梦，不要泄露梦的内容。另外，在录制过程中，不许研究所拷贝。

正巧，金教授在那里。听说张霞要“录梦”，金教授问：“什么时候做的梦？”

张霞回答说：“今天凌晨值班的时候做的。”

金教授又问：“做完梦之后，你又做了些什么？”

张霞说：“做完梦之后，下班，回家。打电话给叶永烈。然后，到你这儿来。”

金教授道：“你的梦还很‘新鲜’，而且做完梦之后没有受到大的干扰，相信梦境的录像会相当清晰。”

金教授带张霞和叶永烈来到一个地下室，关上了厚厚铁门。在那里，万籁俱寂，连绣花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金教授让张霞躺在一张带轮子的小床上。他告诉张霞，必须安静地在床上先躺十分钟，以使脑海平静下来，去除杂念。

十分钟之后，金教授推着小床，把张霞的头部置于一个巨大的倒“丫”形的机器正中。

金教授摁动遥控器上的电键，那巨大的机器上各种指示灯像满天繁星一样闪烁。

静静地在地下室里度过了一个多小时，那闪烁着的各种指示灯渐渐暗了下来。没多久，机器里吱的一声，掉出一张银光锃亮的光盘——那便是张霞的“梦的VCD”。

金教授很尊重录梦者的隐私权。倘若没有得到录梦者的同意，金教授不会播放“梦的VCD”，也不会制作拷贝。

张霞和叶永烈回到丰台，把VCD光碟塞进VCD机。当电视机荧屏上出现清晰的梦境画面的时候，张霞兴高采烈地说道：“金教授的判断没错。我的梦很‘新鲜’，所以清晰度很高。”

既然张霞的梦有了清晰的“梦的VCD”，而张霞这时候已经显得困倦，叶永烈就带着张霞“梦的VCD”告辞了，当天夜里就飞回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叶永烈几乎天天在书房里观看张霞的“梦的VCD”。有了这张“梦的VCD”，叶永烈得以采访梦境。

叶永烈不断把张霞的梦，以及“梦中梦”——在张霞的梦中，毛泽东做的九个梦，用文字记录下来。

叶永烈把每天所写的文字不断用E-mail发给张霞，张霞进行补充和

校对。

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叶永烈完成了根据张霞的梦所写成的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重返人间》。

在写完《毛泽东重返人间》之后，叶永烈想把张霞的“梦的VCD”从头至尾重新看一遍，以便对书稿作一些补充和修改。不料，那“梦的VCD”的碟片竟然卡在VCD机里面。当叶永烈好不容易把“梦的VCD”的碟片从VCD机中取出，发现那“梦的VCD”的碟片已经严重损坏，再也无法播放。

叶永烈深为遗憾，因为无法把这惟一的张霞“梦的VCD”的碟片还给张霞。

好在张霞通情达理。她在电话中说：“反正已经有了《毛泽东重返人间》这部书稿，那‘梦的VCD’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向您提供创作素材。”

叶永烈感谢张霞的宽容。

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叶永烈把《毛泽东重返人间》电脑稿用软盘、光盘拷贝了好多份，并立即交到了出版社的手中。

当《毛泽东重返人间》一书迅速出版，叶永烈一拿到样书，当即用特快专递从上海寄往北京，送给张霞……

后 记

二零零二年七月，中国诗界的最高刊物《诗刊》发表了《叶永烈的诗文——我的诗缘》，我接到好几个记者、读者的电话，问道：“叶先生，您早年写诗？”

不错，我平生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便是一首诗。我在早年，写过许多诗。

我想，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又会引起诸多读者的提问：“叶先生，您也写小说？”

不错，我早年也曾经写过许多小说，在《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这样的中国第一流纯文学刊物上发表。

后来，我转向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创作，接连推出上千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以至在读者中形成了“叶永烈=纪实文学作家”的局面。

我写这部《毛泽东重返人间》的灵感，产生于一九九三年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我又一次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当我的目光注视着躺在水晶棺中的毛泽东遗体时，我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倘若毛泽东活了过来，走出毛主席纪念堂，他会怎样看待今日中国——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当我走出毛主席纪念堂，面对外面灿烂的阳光，我就确定了要写这部长篇小说，书名就叫《毛泽东重返人间》。

后来，我在读《邓小平文选》时，读到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其中华莱士充满想像力的提问，使我深受启示。

华莱士问邓小平：

“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

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

华莱士还问：

“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邓小平面对华莱士的问题，没有正面给予答复。然而，我想，我要写的《毛泽东重返人间》，正是回答华莱士的问题！

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国，被称为“毛后中国”。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到现在，“毛后中国”发生了巨变。这巨变不仅仅是经济的巨变，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巨变。《毛泽东重返人间》便是以毛泽东的视角来看“毛后中国”，来看改革开放的中国，来看邓小平的中国，来看江泽民的中国。毛泽东重返人间，毛泽东对于“毛后中国”的巨变不仅仅是表示惊讶，更重要的是发生思想观念上的剧烈碰撞。在我看来，毛泽东重返人间这不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而且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政治巨变、思想巨变、经济巨变、文化巨变。

我开始构思《毛泽东重返人间》，构思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框图”和人物设计。

在这期间，有过多次记者采访。当记者问及我准备写什么新作时，我只能闪烁其词：

“我在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反映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

我还说：“我正在准备写我自己想写的作品。”

记者们喜欢追根究底，问我所写的是什么小说。我含糊其词，说是一部“幻想色彩浓厚的小说”，说是一部“黑色幽默派的政治小说”。我明白，我一旦说出《毛泽东重返人间》这一书名，马上就会在中国文坛上引起震动！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重返人间》在整个酝酿过程中，处于严

格“保密”的状态。知道这一构思和写作计划的，只有我的妻子而已。

应当说，我在“三度空间”的多方采访，使我有了更多的比较感。所谓“三度空间”，就是指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中国是当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仅存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是当今最大、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是当今从社会主义蜕化为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国家。穿梭于“三度空间”，那种强烈的反差，使我对写好《毛泽东重返人间》有了许多感悟。

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我曾经被上海的文友们称为“半个北京作家”或者“上海的北京作家”，因为我的采访对象——那些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几乎都集中于北京。我熟悉北京的红墙，我采访过诸多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罗光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云夫人于若木，张闻天夫人刘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胡乔木夫人谷羽，毛泽东儿媳刘松林，等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跟我谈起毛泽东。

在莫斯科红场，我步入列宁墓，见到躺在水晶棺里的列宁。我也在克里姆林宫墙根见到了简朴的斯大林墓。我还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圣女公墓里，拜访了赫鲁晓夫墓。站在他们的墓前，我想起正在酝酿中的《毛泽东重返人间》。

我一次次来到美国。在美国旧金山的小岛，在那样安静的地方，我和妻子每天漫步于海滨。大洋彼岸就是中国，就是上海。在这样毫无干扰的地方，我开始往手提电脑中输入我的关于《毛泽东重返人间》的构思。

在《毛泽东重返人间》中，毛泽东重返人间之后住在张军家中，我设计了张军家不同身份、不同阅历的三代人，不论是当年作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张军，出身于延安文工团的张军妻子“小放牛”，依靠高干背景成为房地产大老板的张军之子张豪，美国留学归来的张军孙女张霞以及生于香港、长于台湾的孙女婿陈港生，都是我所非常熟悉的人

物。

我在北京饭店、万寿路、丰台都住过，我甚至参加过十三陵水库的修建，所以《毛泽东重返人间》所描写的种种典型环境，我也都非常熟悉。

我设计了毛泽东重返人间三天内所吃的九顿不同的饭，我更精心设计了毛泽东三夜里所做的九个梦：

毛泽东在梦中会晤了已经垂垂老矣的“接班人”华国锋，见到了关在狱中、怨气偷天的江青，跟“老朋友”赫鲁晓夫展开辩论，与“老对手”蒋介石回顾往事。当然，最使毛泽东高兴的是在梦中见到获得博士学位的嫡孙毛新宇以及在梦中回到故乡韶山。毛泽东读了《邓小平文选》，在梦中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了长谈，也在梦中接见了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江泽民。梦的高潮，也是全书的高潮，是毛泽东被那位以提问泼辣而著称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追踪，作了专访，回答她关于“毛后中国”的一系列问题的地方。

在《毛泽东重返人间》中，通过毛泽东的所见所闻，展现了一幅中国当代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既有拥有林肯豪华加长车和多套豪宅的房地产大老板，也有大杂院里的残疾人，下岗工人，打工仔，还有“新新人类”等等。

所幸的是，毛泽东本人是一个谈吐幽默、博识广闻的人，因而《毛泽东重返人间》也相应充满幽默感、历史感。

关于《毛泽东重返人间》的“属性”，是最使我困惑的：说是“黑色幽默派小说”，不完全是；说是“政治幻想小说”，也不确切；说是“科学幻想小说”，并无科学可言；说是“梦幻小说”，倒也可以，只是“梦幻小说”内容通常荒诞怪异，而《毛泽东重返人间》是一部严肃性作品。在我看来，还是以“小说”一言而蔽之吧。

其实，作者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写了类似的小说《巴金的梦》，这篇小说描述了巴金关于“文革博物馆”的梦。这篇小说在中国大陆被多次退稿，压了三年，最后于一九八八年在四川一家并不引人注

目的刊物上发表，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不仅被北京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而且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后来，这篇小说连载于香港《争鸣》杂志，并被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配乐广播。作者把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以及小说《巴金的梦》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以使读者了解作者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贯立场以及多年前创作的类似风格的小说《巴金的梦》。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像《毛泽东重返人间》这样的作品，尽管是小说，尽管小说的特性就是虚构，然而在当代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出版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我只能把这部长篇小说，交给港台出版社印行。

随着《毛泽东重返人间》的出版，会不会引发一系列的“重返人间”出版热呢？比如，写一部《蒋介石重返人间》，描述蒋介石重返人间，惊叹国民党成了台湾的在野党，而陈水扁的民进党居然执掌台湾大权……又比如，写一部《斯大林重返人间》，斯大林惊叹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东欧易帜，资本主义复辟……笔者正在创作《蒋介石重返人间》和《斯大林重返人间》，以与本书组成“重返人间三部曲”。

本书香港版承老朋友江迅、周芝凤夫妇暨香港共和出版有限公司大力支持，得以迅速问世，谨表深切感谢。

叶永烈

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日

于上海“沉思斋”